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

狂人兴盛篇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希特勒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残暴专横和战争狂人。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的一些战犯在谈起他们的“元首”时，仍然“谈虎色变”。许多当年希特勒的部下，直到战争结束十多年后，才敢胆战心惊地诉说希特勒的各种隐私，可见这个法西斯头子确是一个残酷独断的世纪魔鬼。

本书从希特勒的身世一直写到死亡，记述了希特勒凶恶、卑鄙、专横的一生。关于希特勒的出身，史学家有多种说法，最有趣的就是希特勒一生都在仇恨、杀掠犹太人，而历史学家却经过多次取证，证明了希特勒的血管里至少流着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这是不是历史的有意嘲讽？

希特勒出身上层社会，童年，少年的日子都过得并不开心，青年时代当过流浪汉。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在短短十多年间，一跃而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从乞丐到帝国元首的人生经历，不仅奇特，而且在古今中外的国家元首中都是独树一帜的。

何以如此？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谜。如果说是“乱世出魔王”，希特勒又是“乱世魔王”。众多国家何以任其吞并、占领，这又是一个最大的谜。读者在书中可以寻找答案的端倪。

对于人类社会，希特勒是没有良心和责任感的，更不要说正义感。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残暴哲学来统治人民，而德国人民仅仅是任其宰割的羔羊。在他爬上德国统治高位的十多年时间，他从未考虑过德国人民的利益，而是让人民做战争牺牲品。

很多人证实希特勒是性健全者，他数百次宣称“终身不娶”，“我们新娘是德国”是他的一生的至理名言，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希特勒虽然是在一生的最后三天才同爱娃结婚，但是他的情妇却遍布德国。正如他政治上的个人膨胀野心一样，只要是他看中的女人，没有一个能逃出他的魔掌。在性的问题上，希特勒的家族本身就有乱伦的传统，所以，就不难理解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及他的外甥女都先后成为他的情妇的原因。

关于希特勒的死亡，一直是史学界争吵不休的话题，本书参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对希特勒之死作了判断，相信读者会从中受到启发。

从人到魔鬼，是希特勒一生的基本性格。本书既写出特勒“人”的一面，又用大量的事实对他的魔鬼性格作了充分的刻划，写出世纪魔王希特勒完整的一生。

本书一九九四年八月第一版发行。根据数年来读者的要求，又增添很多过去未详尽涉及的内容，更深刻全面的刻划希特勒的一生。

狂人兴盛篇

第一章希特勒出身之谜

1. 四分之一的犹太人

希特勒一生都在屠杀犹太人，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史学家却证明了他还是犹太人的后代。

维也纳银行家罗特席尔德男爵是一个精明而富有的犹太人。他们家的少爷有足够的资本去追逐维也纳城中那些漂亮而有教养的贵族小姐。但贵族小姐们总是忸怩做作的。不耐烦的少爷便把饥不择食的眼光投向了家中的女佣。这个乡下来的姑娘毫无选择地顺从了，恐惧中亦有几分憧憬，以为因此能沾上这豪门富户的好运。然而这个不切实际的美梦很快就象肥皂泡一般破灭了。可怜的姑娘腆着羞而不得不见人的大肚子回到乡下的破屋子里，生下了一个引人非议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将人类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纳粹魔王希特勒的父亲。

这并不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传说或居心叵测的虚构，而是事实的希特勒家族秘史。其简单的推论是让世人包括史学家都目瞪口呆的——希特勒，这个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的刽子手，体内竟然流着四分之一的犹太血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犹太后裔！关于希特勒的祖父是犹太人的说法，是从1921年起在慕尼黑开始流传的，当年7月，希特勒争当纳粹党第一主席，遭到党内一部分人的反对。纳粹党员恩斯特·埃比施佩格散发传单，指责希特勒“替犹太人及其帮手办事”，还说他是“真正的犹太作风”。这以后，慕尼黑经常出现希特勒是犹太后裔的传说。这里诚然有政敌造谣惑众，攻击希特勒的可能，但无风不起浪，正因真有其事才被政敌查找出来作为把柄。

1933年10月14日，英国《每日镜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和一篇文章，说布加勒斯特犹太公墓里有一个墓，死者名叫阿道夫·希特勒，是刚上任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美国和波兰的犹太人报刊先后转载了这一消息。虽然后来的考证表明，该死者生于1832年，比希特勒的父亲大五岁，根本不可能是希特勒的祖父，但这并不能解除人们心中的疑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战犯都被关在纽伦堡。希特勒的私人法律顾问、后任第三帝国波兰总督的汉斯·费兰克在单身牢房交给美国随军神甫、方济各派教士西克图期·奥康诺一份材料，披露了一个秘密事件：

约1930年底，弗兰克突然被希特勒紧急约见。当弗兰克匆匆赶到希特勒处时，只见他神情忧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脸上还隐有怒气。弗兰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使得这位纳粹党的领袖如此不安。希特勒说，他收到了侄子帕特里克的一封勒索信，信中要挟说：“联系到某些报刊消息，应注意不要把我家家史的某些情况张场出去。”所谓“某些情况”就是当时报刊上所登的“希特勒的血管里有犹太人的血因而没有资格反犹”之类的话。犹太人当时普遍受到排斥，反犹是希特勒获取政治声望和扩张势力的手段之一。如果他本人是犹太人后裔的话，那么不仅没有反犹资格，连自己也要被反了。弗兰克深知其中厉害，在希特勒委托下积极进行秘密调查，澄清家史污点。

在调查过程中，弗兰克听到一种传说，称希特勒的祖母曾在格拉茨一个姓弗肯贝格尔的犹太人家里当厨师，同这家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少爷发生了关系，生下了希特勒的父亲。可是弗兰克没能找到确凿证据。但他仍在材料中写道：“不能完全排除希特勒的父亲是个半犹太人”，也就是说，“希特勒可能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

这份材料曾引起极大的混乱，尤其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间，震惊，争论，否认，诅咒，饱受苦难、几乎遭到灭种危险的犹太人，当听说他们的遭受的

不堪回首、惨不忍睹的无以复加的灾难，竟然是犹太人自己造的孽时，他们如何能面对现实？在第三帝国时间，有六百多万犹太人被无辜虐杀，如果罪魁祸首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犹太子孙，犹太子孙还能对谁诅咒而又向谁祈祷呢？

1956年，天主教会修士弗立茨·耶青格发表了《希特勒的青年时代，幻想谎言——以及事实》一书，其中说，希特勒的侄子帕特里克，那个试图敲诈叔叔的人，在1939年8月5日的《晚巴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希特勒的祖父是格拉茨的一个名叫弗肯贝格尔的犹太人。作为希特勒家族的人，他的话无疑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但由于他的话也是别人间接叙述的，所以可靠性又少了几分。后来人们查到了1939年8月5日的那份《晚巴黎》，上面确有帕特里克的文​​章，详述了到1938年为止他同希特勒的关系，但并没有耶青格的书中述及的那些话，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希特勒的祖母。这样，犹太血缘的谜案又一次陷入了死胡同。

希特勒虽是犹太人的后裔，他对犹太人的屠杀也不难解释。且不说当时社会上的普遍排犹思潮，单是在希特勒的身世中，犹太血统也是他心灵上的阴影和身体上的污点。他的祖父不过是强迫了一名下贱的女佣，这才有了希特勒的父亲，希特勒对他的祖父没有理由不产生恶感，而他的“二分之一犹太人”的父亲，也是他和他亲爱的母亲及兄弟姐妹们的暴君。再加上他试图通过屠杀犹太人來洗刷污点和争取政治权力，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犹太人的刽子手。

推测毕竟是推测，传说也只能是传说，希特勒是否犹太人的后裔，还需要有更充分的证据。至今人们仍在猜测和考证，但假如这考证永远没有结果的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不可能改变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惨剧，不可能再去影响那个疯狂魔王。

2. 不安分的家族

希特勒根本不是德国人，这个将德国民众的情绪煽起到顶峰，然后又把他们的命运抛掷向深谷的国家元首，不过是与德国毗邻的小国奥地利的一名农家子弟。虽然历史上德奥曾经一体，可现在它们已经是界线分明了，当德国人一想到他们国家命运曾经被一名奥地利人随意把玩时，他们定会感到恶心吧？

这个与众不同的奥地利农家子弟没有光荣的家族史，也没有辉煌的地方志。他的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是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这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之间是奥地利的一个县，距奥地利只有五十英里左右。这里是一片穷乡僻壤的景象，特产是私生子。生活象死水那样无趣，偷情和野合成了不可多得的快乐和刺激。如果希特勒的祖母不是从维也纳城中带来一个大肚子的话，人们还可以进行各种合理的推测。比方这样一个传说就有很高的可信度：一个漂亮的寡妇，不时有男人光顾，但这些人都是只求一时之欢，并不想承担什么责任。寡妇自恃年轻，也不着急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人，乐得自由快活。她接待情人之多之频，夸张一点说是门庭若市。不过她绝不是明妓或暗娼。她仅仅是想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必要的及额外的乐趣。假如有的情人顺便带些东西来的话，她也没有必要拒绝，虽然她也缺乏这些，但他本心却无这种要求。后来她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情人们闻风而逃，没有一个人肯承认他对这个孩子负有责任。可怜而无奈的女人只好自个养着这个私生子。正当她觉得难以撑持时，一个外乡农民打工来到她家，和她发生了关系并愿意娶她。她当然也愿意嫁他。二人一拍即合，她卷起家当抱上孩子就跟他走了。后来孩子长大了，追问他的母亲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他母亲叹口气道：“那时我太标致了，上门的人那么多，谁知道是谁呢？”从此他就只好认定了他的养父。而他的儿子希特勒，也就不知道他的祖父究竟是谁了。还有一些关于希特勒祖母偷情野合而产下他的私生子父亲的传说，情节大同小异。这些传闻也许都是为了攻击，咒骂希特勒而编造的。可并不耸人听闻。在这个贫穷的小县城，随处可以碰到一个私生子，或是一对偷情的男女。假如希特勒一生就生活在这儿的话，他对此也会习以为常的，而不会象后来那样，在人们议及他的家史时惶恐不安。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另一特产是近亲通婚。这是贫穷和愚昧的产物，也是一种无形的不稳定的传统。这个闭塞的地方，人们的交往较少，亲戚间的接触较多，容易产生感情，或者说当内心产生冲动时，自然就把异性亲戚作了幼想中的对象。再加亲上加亲的观念，近亲通婚就更普遍了。希特勒后来与外甥女吉莉的畸形恋情，在此可找到地域根源和家族根源。

希特勒母系祖先方面的情况比较稳定，他母亲克拉拉·波尔兹尔一家四代都在希皮塔耳村庄第三十七号那块农田上务农为生。希特勒父系祖先方面的情况却颇为不同，这一家的姓氏经常变化，有时是希德勒（Hjedler），有时是休特勒（Huetler，Huetler），有时是希特勒（Hitler）。居处也经常变化。这一家人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总是要想从这个村庄搬到另一个村庄，从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不愿有紧密的亲属关系。而在同女人的关系上喜欢过一种彼希米亚式的生活。希特勒本人也是如此，到处流浪、闯荡，又想当艺术家又想当建筑家。后来才做了政治家，陪伴过他的女人也有好几个，有的甚至为他而自杀或殉葬。

希特勒的出生地，是在德奥边境。这一点后来证明是有重要意义的，在

为希特勒早在青年的时候就怀有这样的想法：这两个德语民族不应该有边界隔开，他们应属于同一个国家。他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而且经久不衰，到他三十五岁蹲在德国一所监牢里口授那本日后要成为第三帝国的蓝图的著作时，他的头几句话就同他的出生地的象征意义有关。《我的奋斗》是以这几句话开始的：

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莱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座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为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这是一番自命不凡和自吹自擂的话，但是他能由一名小镇上的农家子弟流浪维也纳而后再闯荡慕尼黑直至在柏林大展宏图，除了祖先血液中的不安分、好闯荡的因子，眼观两国视野胸襟因之开阔的地域因素也是一个方面。只是具有这种祖传和地域造就的秉赋的人，最后却成了个恶魔，这就不能简单归因于家族遗传和地理环境，而更需从他的后天经历和时代环境找源由了。

3. 有过两个姓氏的私生子

希特勒父亲的亲父是谁虽无定案，但他是一个私生子却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养父约翰·格奥尔·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串来串去，除了打零工挣零钱，爱情上也零零碎碎吃些“白食”，碰上谁家姑子嫂子有意，便权得一时鱼水之欢。1824年约翰·希德勒结了婚，五个月后就有了孩子。这可能是他娶了一个怀有他人孩子的弃妇，但亦有可能是他自己做事自己当，在游戏之中使对方怀了孕后不得不娶了她。他本来也许从此会好好过日子，可妻儿在产后都死了。他又开始了游逛的生活。十八年后他娶了一个四十七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早在结婚前五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也就是希特勒的父亲。人们推测，阿洛伊斯本就是约翰·希德勒和玛丽亚私通的产物，也就是说阿洛伊斯的继父或养父本就是他的生父亲父。约翰·希德勒是在游荡得厌倦了之后才想要一个家，并承担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这个推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

约翰娶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之前，阿洛伊斯随母姓施克尔格鲁勃。既然阿洛伊斯成了约翰的儿子，接通常习惯他就该随新父亲而叫阿洛伊斯·希德勒了。但不知为什么约翰竟没有想到在结婚后将这个儿子正式登记，所以这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失去约束的约翰难以按捺好闯荡的天性，又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从此杳无踪迹，不知云游到了何方。从他不对阿洛伊斯负责任来看，他不大可能是这个私生子的生父，否则他从创造这个孩子到遗弃他都是造孽。他不过是这个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地孩子的养父而已。缺少父爱母爱她缺乏管教的阿洛伊斯也养成不了安分的心性和恶劣的脾气，后来成了希特勒最痛恨的人。

约翰·希德勒直到八十四岁那年才重新出现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威腊镇，这时他已改姓为希特勒。他当着三个旁证的面向一位公证人宣誓，说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然而这并不能够证明他就是希特勒的真正祖先。有一种解释是：约翰的弟弟、阿洛伊斯的叔叔有一笔遗产，由于约翰不是阿洛伊斯的亲父，他弟弟也就不是阿洛伊斯的亲叔叔，阿洛伊斯也就没有资格继承这笔遗产。约翰的迟到得太久的认子不过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不管怎样，既然经过了宣誓公正，阿洛伊斯的姓氏就可以由母姓改为父姓了，他的非凡的儿子也就得以“希特勒”闻名于世、遗臭于史。

在阿道夫·希特勒古怪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十三年的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假如这个人十四岁的流浪汉没有在他妻子死后三十年突然归来，承认自己是他年已三十九岁的儿子的亲生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有许多德国人这样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呢？这个姓氏念起来是拗口而好笑的，要是狂热的德国群众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以及在互相打招呼不是简短地喊“希特勒”而是冗长的“施克尔格鲁勃”，那真是难于想象。希特勒年轻时曾对他的密友奥古斯特·库比席克说，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让他高兴的了，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非常粗鄙俗气，且不说累赘拗口了。“希德勒”也不好，太软。只有“希特勒”最让他满意，好听也好记。阿洛伊斯是由他的叔父养大的。他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毫无定性，不久就到维

也纳去谋发展了。十八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当上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九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他当警察不久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为妻，她给他带来一小份嫁妆和社会地位。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十四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十六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三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思卡·马茨尔伯格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后一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三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弗朗席斯卡在一年之后因肺结核去逝。两度丧妻不仅是阿洛伊斯的不幸，后来证明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因为假如没有阿洛伊斯的第三次婚姻，也就不会有希特勒这个魔王出生了。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阿洛伊斯一波三折的婚姻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偶然，人类历史的一波三折则是一种必然。阿洛伊斯怎么知道他的第三次畸形婚姻会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呢？他只是需要一个妻子，需要占有一个他早就想得到的女人——他的外甥女、养女克拉拉·波尔兹尔。

4. 近亲乱伦者之家

四十八岁的阿洛伊斯的新嫁娘克拉拉·波尔兹尔比她的堂舅、新郎整整小了二十三岁，他们已经相识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约翰·马，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或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

阿洛伊斯和他的祖先一样在同女人的关系上酷爱自由和浪漫。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尚在世时，他就以膝下空虚为由，将克拉拉领养过来做继女，而他的真实用心则是为自己培养一个候补妻子。克拉拉在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亲看到了这朵鲜花由含苞待放到盛开的全过程。他内心时的涌助着她的欲望，可是碍于名分，最主要碍于妻子他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心中对那大他十几岁的妻子是厌烦的，而娇嫩的小甥女正好弥补了他爱情和生理上的缺憾。在他发妻病倒后打算等她一死就和克拉拉成亲。到这个姑娘满十六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遗产的事。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而他这时又和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好上了，对于娶克拉拉一事暂时不怎么上心，所以年已二十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在阿洛伊斯第二个妻子去世前，克拉拉又回到了他家，帮助照料病人。弗朗席斯卡去世后，家务都由她一手操持。阿洛伊斯和克拉拉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了夫妻。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娶了他的爱人。因为他们的亲缘关系，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罗马教廷恩准了他们。婚后四个多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出世了，不幸的是这个过早的结晶没能活多久就夭折在襁褓中，1886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如此，似乎是对他们近亲乱伦、放纵情欲的惩罚。第三个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和成长，显见其强大的生命力。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1894年出生的第四个孩子埃德蒙活到六岁，终没能逃过命运的追索。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这样，加上阿道夫的同父异母哥哥小阿洛伊斯和姐姐安吉拉，阿洛伊斯家共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

克拉拉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精力充沛，勤劳善良，并信宗教。无论在她做佣人还是在做主妇时，这个家总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对于这个家她操劳了一生。为她长久治病的布卢克医生说她是一个和蔼安详、柔情依依的女人。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孩子们尤其是阿道夫身上。对比她大二十三岁的丈夫，她也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逆来顺受。

阿洛伊斯于1895年在林茨海关总局任职时，购买了霍菲尔德村的一幢房子连同三万八千平方米的地产，全家迁入此间。当年6月他提前退休。他在家中是一个暴君，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他把大儿子打得不省人事，另一次又几乎把阿道夫打死。他还经常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由孩子们将他搀扶回家。到了家中，他就开始大发酒疯。退休后他靠领取退休金过活，更是经常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冲突。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在十四岁那年离家出走。阿道夫则从此成了父亲的出气筒，阿道夫虽是母亲的娇子，可柔顺的母亲也保护不了他。

小阿洛伊斯的出走，据他儿子亦即阿道夫的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说，主要是因为继母一直虐待他，并在他们父子间挑拨是非。父亲原准备送他到一所技术学校深造，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在第三次婚姻前，阿洛

伊斯是十分疼爱大儿子的，并对他寄予厚望。克拉拉的挑拨使阿诺伊斯不再关心大儿子，并开始为阿道夫的教育积钱凑款。继母的计划终于如愿以偿了，而小阿洛伊斯只得高家当了名小侍者，在一家饭店跑堂。这份职业当然不会让他满意。

小阿洛伊斯一生中有好多时间在吃官司。1900年，他因偷窃被判了五个月的徒刑，1902年又因重犯前科而坐了八个月的牢。出狱后，他到伦敦当了名侍者。1909年他同爱尔兰姑娘布丽奇特·道林结婚。1911年生下威廉。1913年他抛家别子，独自到了德国。他的婚姻很不美满，仅在四年间，家庭就破裂了好几回。他的血液中有祖传的不安定成分，他们一家人都注定了好几回。他的血液中有祖传的不安定成分，他们一家人都注定了要惹事生非。据说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大发酒疯，不仅打妻子，甚至还想打襁褓中的婴儿。夫妻曾分居了一阵，后来他就去了维也纳。

1924年，小阿洛伊斯因犯重婚罪被传上汉堡法庭，本来要判六个月的刑，但由于原妻未起诉，才免于“三进宫”。他同那名不合法的德国妻子生了一个私生子。在这期间，他从没有给原来的妻子和孩子寄过钱。他后来从事过很多行当。1934年，他在柏林开了家饭馆，以后，这家饭馆成了冲锋队员们的聚合场所。

据他儿威廉说，小阿洛伊斯在孩提时代就十分憎恨阿道夫，他抱怨母亲惯坏了弟弟，以至自己经常被迫做阿道夫份内的家务。阿道夫也经常搞些恶作剧，使哥哥备受克拉拉的责骂，乃至父亲的处罚。小阿洛伊斯常对人讲，他小时候经常拧阿道夫的脖子。阿道夫对同父异母的哥哥非常讨厌，在《我的奋斗》中他提都不提哥哥，也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个人。阿道夫态度倨傲，对所有亲属都要加以干涉、制约。希特勒掌权后，兄弟俩无甚来往。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小阿洛伊斯在柏林郊区先开发一家啤酒店，战争爆发后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姐姐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姑娘，也许是这一家族中最正常的。人们一致认为她既勤劳又善良，而且非常正直。小时候，尽管她十分埋怨母亲对阿道夫的宠溺，但还是非常喜欢他。1907年克拉拉去世时，留给了孩子们一小笔遗产。由于两个女孩最需要照顾。兄弟俩便把自己的一份送给了她们，阿道夫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给了妹妹宝拉。后来，安吉拉嫁给了税务官拉包尔。但很不幸，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她又返回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在一所犹太学校当食堂经理，在一次学生骚乱中，她曾想方设法保护犹太学生，使他们免遭袭击。

安吉拉对弟弟怀有深厚的感情。当阿道夫被囚于兰兹贝格时，安吉拉千里迢迢从维也纳赶来探望。1924年，她带着女儿吉莉迁居慕尼黑，并为希特勒管家。后来她又在伯希特斯加登为其管家。此后一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听到他们谈起她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希特勒，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他的姐姐也有一种病态的占有心理，所以她的离去和结婚使他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也有人说，安吉拉的离去是因为和戈林密商在伯希特斯加登毗邻他的宅第处购置田产，这使希特勒老羞成怒，责令她离开。

安吉拉是阿道夫一家人唯一一个在他后半生仍然密切来往的人，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她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女人，希特勒

一生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希特勒对他姐姐的依恋的畸形转嫁，而从舅舅和外甥女近亲乱伦方面看，则完全是阿道夫父母的翻版。

比阿道夫小七岁的妹妹宝拉在孩提时代就同阿道夫难以相处，他们互相嫉妒和争吵，特别当小阿洛伊斯帮助宝拉时，他俩的关系就会僵。母亲克拉拉死后，宝拉的行踪一行是个谜。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她穷困潦倒地栖身于维也纳的一个阁楼里。当时，她的职业是为一家保险公司抄写信封地址，人们都称她为沃尔夫太太。有一次，布卢克医生前去拜访她，希望她能代他向希特勒求情，允许他流放出国时携带一些钱财。医生敲了好几下门，不见回音。后来，沃尔夫太太的邻居出来告诉医生，沃尔夫太太脾气很古怪，从不见任何人，并答应替医生转交信。于是医生在信上详细谈了自己的困难。第二天，他抱着能同她面谈的希望，又来到那里，然而邻居只对他说宝拉愿意尽力帮助他，事情就此结束。

据说，从母亲克拉拉去世到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这段时间里，宝拉和希特勒形同路人，希特勒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到过宝拉，只是每月给她一小笔生活津贴，使其免遭贫困，避开舆论的关注。1939年，威廉在拜罗伊特的庆典大会上遇到宝拉，那时她以沃尔夫太太的称呼出席庆典。希特勒也从未向任何人说她是自己的妹妹，只说她有些弱智，不爱讲话。

希特勒就是诞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薰陶和影响。

5. 对父亲的反抗

在希特勒父亲退休的那年，年满六岁的小阿道夫被送进林茨西南不远的菲许拉姆村的公立学校读书。由于他父亲按捺不下心来靠养老金安安静静过活，在林茨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希特勒也不断换学校。到他十五岁时，他已搬过七次家，换了五个学校。有研究表明小时的改变居住环境对人的智能大有好处，希特勒也许由此受益了吧。但这对他的人际关系和脾性却没有好处。因为不断的变换同学，使他不能和他们建立友谊，更多的是由陌生引起的戒备和敌意。当新同学生而使他受到委屈时，他仇恨世界的种子也许悄悄埋下了。他一生只有一个密友，这与他小时的人际关系不和谐是有关的。他没能好好和人接触、亲近，没能感觉到友爱也不会对别人表示友爱。加之在家庭中与父亲、兄妹的冲突，更造成了他孤僻、冷酷的心性。

1896年9月，七岁的希特勒被送进兰巴赫县老本笃派修道院的教会学校上二年级。他被吸收为修道院唱诗班成员。这是他日后津津乐道的童年经历。在神圣宁静的教堂中，有清脆的童声在回荡，小阿道夫的心灵受到了净化。家庭和学校中的烦恼不快全部融化在上帝的声音中，那时，他对院长哈根的纹徽发生了兴趣。那是一个“卐”字，象征捕狼的陷阱。谁知道若干年后这个纹徽会成了纳粹党的党徽，成了屠杀羔羊的屠宰场的标记呢。

教会节庆是希特勒最快活的日子，那富丽堂皇的场面令他陶醉。他置身其间，仿佛置身于绚丽迷人，无忧无虑的天国。他唱着赞歌，从心底里感到了上帝的无处不在并愿意为他献身，想要和他合而为一。那一刹那他产生了当神职人员的念头，过一种宁静的内心充满了虔敬的信仰的生活。

但当他走出教堂，他的心境便改变了，除了母亲让他稍感安慰，他对酒鬼父亲和乱哄哄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厌恶之情。他不爱接近同学，同学也不来接近他。他孤僻，内心狂躁，他倒是真需要上帝，可是上帝不需要他，他还得朝他的魔鬼生涯走去。

1900年8月，阿道夫小学毕业，成绩令人满意。他被送到林茨去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财，也说明他希望阿道夫继承自己的农钵——当一个公务员。因此才不让儿子上文科中学而硬要他上普通中学。然而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从现存的两张他小学时和初中时的全班合影来看，小学生希特勒站在最高一排正中央，两手交叉在胸前，神气活现，另一张林茨中学时的全班照上的希特勒站在后排边上，一脸不满相，毫无自信心。他从内心里不愿当“国家公务员。”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十一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

他在《我的奋斗》中以诚恳的态度详尽而如实地记载的传记性事实并不多，他在十岁刚出头时顽强地同他冷酷刚愎的父亲的坚决斗争则是其一。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什么，画家？艺术家？”

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

……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心！

这场父子冲突第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强不屈的个人意志，这种意志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别人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达到了他那样的成就，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学习了。“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他说，学校的功课“使我喜欢的我就学，我觉得没有意思的或者对我没有吸引力的，我就罢学。”

三十四年后希特勒说的这些话，未必都是实情，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在中学的不光彩历史作辩解。他小学时成绩良好，中学时却一塌糊涂，以至在林茨中学没有得到应有的证书，不得不转学到距林茨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也没能呆多久，未毕业就离开了。

6. “我最讨厌中学老师”

希特勒与父亲的冲突使得他讨厌学习，上了普通中学后成绩一团糟。志愿受挫也许只是他学习失败的一个方面。他的一位老师，爱德华·休麦，曾经指出了他成绩不好的个性因素。

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某些学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一些，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脾气暴躁，不能遵守学校纪律。他也不用心，否则有他这样的天赋，他就会有好的成绩。

希特勒却因自己的不光彩历史而迁怒于他的老师们。他们对没能给他好成绩而耿耿于怀，反过来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和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三四年。当他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上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常常抽一个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回忆他年轻时碰到的教员怎样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自指挥部署在伏加尔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大军的最高统帅了，他的这种聊天内容还保留下一部分在《希特勒秘密谈话录》里：

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点疯癫。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

——1942年3月3日

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教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是没有任何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合适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

——1942年4月12日

我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妇女的教育。但是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人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文一点也没有天赋——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白痴的话。我一看见他就感到憎恶。

——1942年8月29日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金失败了。

——1942年9月7日

很明显，希特勒直到临死的时候，还忘不了也不能原谅他的教师给了他坏分数。但是他却能把实际情况歪曲到可笑的程度。

他的教师在他成了世界名人以后回忆起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有简单短的记载。希特勒似乎还喜欢的少数教员中，有一个是教过他科学的西奥多·吉辛格老师。吉辛格后来回忆说：“就我来说，希特勒在林茨中学既没有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留下坏印象。他在班里肯定不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细长挺直，而孔苍白瘦削，几乎像是一个生肺病的人。他的眼睛常常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

希特勒的成绩虽然极差，可对绘画和历史极感兴趣，成绩尚过得去。林茨中学有一位历史教员，名叫利奥波德·波伊契，是一个泛德意志主义者。

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利用讲授历史的机会向学生讲授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希特勒尚未成熟的心，对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影响，使他很快就成为哈布斯堡多民族帝国的反对派，也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位历史老师给希特勒的历史分数不过是“中”，他却是在《我的奋斗》中受到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他说：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取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茨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严格的长者，不仅能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

他的激烈言辞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样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生在台下，心中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下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这些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科目。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大约三十五年以后，即 1938 年，希特勒总理在强迫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以后到奥地利各地进行胜利的巡视，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来探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在奥地利独立时期被取缔的地下纳粹党冲锋队的队员。他同这位老先生单独谈了一小时的话，后来告诉党内同志说，“你们想像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7. 成绩单作了手纸

1903年，希特勒的家庭发生了重要的变故。1月3日，他的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因肺出血溘然去世。他的病是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客栈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中。当他的十三岁的儿子看到他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

他的母亲当时42岁，搬到林茨郊外马尔法尔一所简陋的公寓去住，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宝拉。正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所说，她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厚望继续让她儿子上学——“换句话说，要我学做公务员的行业。”不过，虽然年轻的寡妇很溺爱她的儿子，而且他似乎也很爱她，他却“比以前更加坚定地下定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因此，尽管母子间感情很深，却还是存在着矛盾，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1904年秋，15岁的希特勒，在母亲的督劝下，经过补考，终于初中毕业，转到施太尔的州立中学上高中，独自借居在格林广场19号。次年6月，克拉拉以一万克朗之价卖掉莱昂亭的房产，实得7480克朗，带着室拉迁到林茨洪堡街31号居住。

高中一年级上学期结束，阿道夫的成绩单上写着：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四门不及格。由于苦闷和恼火，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一家农村酒店去喝酒，越喝越起劲，淋漓尽致地发泄了一通，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他喝酒后上了趟厕所，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成绩单当了手纸。回家的路上，他走不动了，瘫倒在路边。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一个早起的挤奶姑娘发现了她，将他扶了回家，房东太太问他要成绩单，他一摸口袋才想起已丢进粪坑了。他只好回到学校补领，被校长狠狠训了一顿，他发誓这一辈子再不喝酒了。虽然后来在许多国内国际大事上言而无信，可这个誓言倒是终生恪守的，他以后不仅不喝酒吸烟，而且还食素。

将成绩单当手纸的事，有人记叙说是在他高一上学期结束后的事。这件佚事是1942年1月8—9日晚上他在最高统帅部里回忆过去时讲出来的，他本人也可能记不准时间了。希特勒高一下学期的成绩单也只配作手纸，那上面记着：品行：满意；勤奋：尚可；德语 数学、物理、化学不及格；几何绘图和画法几何：补考后及格；宗教课和唱歌：满意；体育和自由绘画：优秀。他完全学不下去了，可他的母亲仍然对他寄予厚望，要他完成学业。母子间为此争执不休，彼此痛苦。这时候，“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他在快满十六岁时得了严重的肺病，至少不得不停学一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乡，在他姨母家休养了一个时期。农村的新鲜空气以及摆脱了烦人的学业后的松快心情，使他恢复得很快。病好后，他暂时回到学校。医生告诉他的母亲，像他这种身体将来不能当职员。于是克拉拉只好同意他退学。把成绩单当手纸的阿道夫从此就离开了他恨之入骨的普通中学。

8. 退学以后更快活

退学后的两三年是希特勒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如《我的奋斗》中所言，“好象梦幻一般”。虽然他的母亲劝他——他的亲戚也催促他去做工，学一个行业，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他永远忘不了十六岁到十九岁这一段年月里“懒洋洋的日子”，做“妈妈的心肝宝贝”，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不愿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他天生着不安分的血液，注定要过一种非凡的生活。

希特勒觉得快成年的这几年这么快活，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可以不必工作，这就使他有时间去沉思梦想。白昼在城市街头或乡间田野闲荡，向同伴畅谈社会流弊和纠正办法；夜晚埋头读书，或者在林茨，或者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后排座位后，站立着出神地谛听理查·瓦格纳的神秘的异教音乐。

这时的希特勒是一个面容苍白、沉默寡言，但是在听到不同意见时，也会突然发出神经质的怒言。

这几年最大的快乐，应该是他对一个漂亮女孩的自以为深深的爱。这位迷人的金发少女名叫斯蒂芬妮，是希特勒的近邻。希特勒在林茨的兰街大街上和母亲一起散步时，经常碰见他的心上人。他常常悄悄地久久地凝视她，在心中幻想她也注意到了他并且敬仰他，爱慕他，用她的轻柔的小手来爱抚他。他仿佛看见她冲他微笑，朝他走来，象一个有翼的小天使，带着他一起在艺术的天空飞翔。然而他的这种单相思情感一点也不曾为她所察觉。她象一片彩云在他的世界里飘来飘去，却从不曾为他驻足和回眸。而希特勒也似乎满足于这种单相思，满足于自己的白日梦，他从来没有作丝毫努力同她结识，而像许多其他东西一般，宁愿把她保留在他的幻想驰骋的心灵世界里。他后来成为独裁者后所追求的不也是这么一种不确定的空幻的东西吗？支配他种种不可思议之行为的不也是一种狂想的白日梦吗？

每个恋爱中的少年都是诗人，希特勒也不例外，他本来就有艺术气质甚至是天赋，在爱情的激动下，他的诗情迸发了。他给她写了许多爱情诗，用各种各样的美丽词句来赞美她，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种种微妙感受和甜蜜心情。只是这些诗从不曾寄给她一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小诗人之意似乎也不在得到爱人的实体，而只有在想象中，在精神占有她就满足了。他需要有人分享他的快乐，来听他的情诗朗诵，尽管这听众本该是斯蒂芬妮，可腼腆的他却只敢念给亲密的好友库比席克听。他的《献给心爱的人的赞歌》连库比席克都为之感动。在这些爱情诗里，斯蒂芬妮成了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少妇，她身穿一件随风飘扬的深蓝色天鹅绒长袍，骑着一匹白马，驰骋在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在世人心目中希特勒只是个冷酷的魔王，是个刻板的变态的政治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库比席克在《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一书中，对他这个同伴去维也纳流浪生活前四年的情况作了一番很有趣味的叙述。这番描绘不仅填补了德国元首一生传记的空隙，也纠正了此前人们对希特勒早年性格的错误印象。希特勒也曾有一颗丰富、活泼、有灵气、有情味的心，只是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才折磨得冷酷，况且那外表的冷酷仍潜藏了一股温情，只是一般情况下难得表现出来。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否则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家，但是他在十六岁时，已对政治表现出非常的兴趣

了。当时他对哈布斯王朝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十六岁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只是这种思想在他艺术家的梦想未破灭前尚未引起他自己的惊觉，但要不了几年，它就会推动他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世界大事压得了透不过气来，他的快活的日子渐渐失去了魅力。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了，转移到他一生中应该注意的方面，那是天命所在。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他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譬如斯蒂妮芬，并非她给了他挫折，而是由于他胆怯、消极、耽于幻想，不敢付诸行动，大胆追求，所以他的挫折感是自己的个性造成的，他用阴暗的心理看世界，世界就更让他不满意。他再也感不到快活了，他开始感到别扭了，也开始给这个世界带来别扭”。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参加了林茨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在借阅图书。据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首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林茨只是一个外省城市，满足不了这个不安分的少年的心。金碧辉煌的巴洛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在向这个雄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他告别了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要去寻找苦难和制造苦难。

9. 不及格的艺术考试

希特勒的艺术家之梦在认识库比席克后更加狂热，因为库比席克正是一名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作曲家和指挥家。希特勒在他影响下学习了四个月钢琴，在当地歌剧院观看了瓦格纳的全部歌剧，同时还自学了绘画，绘制剧院、桥梁、城市、公路建筑草图，他开始想入非非，带着母亲和亲戚们凑的一些盘缠，到维也纳去混了两个月。一切都使他目眩心迷。他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他打听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手续后才回家，心里也构思好了下一次的出征。这时他母亲因患小乳肌恶性肿瘤在林茨医院开刀。手术后，克拉拉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佯作好转之状。10月间，希特勒动身去维也纳投考美术学院。

这个充满幻想和信心的青年挟着他自己创作的一大包画登程了，他“坚信能够儿戏般轻易地通过考试”。维也纳美术学院坐落在席勒广场上。这回的考生总共一百十三人。头两天为“考场创作”，每场两个小时，考生从以下四组题目中任选两题当场完成。第一场的考题是：

- (1) 逐出伊甸，狩猎，春，建筑工，死亡，雨。
- (2) 浪子回头，出逃，夏，代木工，悲哀，火。
- (3) 该隐杀死亚伯，回乡，秋，车夫，欢乐，月夜。
- (4) 亚当和夏娃找到亚伯的尸体，告别，冬，牧人，舞蹈和暴风雨。

第二场的考题是：

- (1) 大洪水轶事，圈套，清晨，家夫，音乐，祈祷。
- (2) 三圣王，逃亡（追捕），正午，乞丐，占卜女，遇难。
- (3) 乐善好施的撒马利亚人，朝圣者，余暇，渔夫，讲童话的女人，掘宝者。
- (4) 参孙被缚，散步，黑夜，奴隶，和平，导师。

三十三名考生被淘汰，希特勒进入了第二轮：“评议习作”，即考生平日的画作。希特勒交出他那“一大包画”，“焦急万分但又骄傲自信地期待着揭晓”。但是，从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甄别名单上的记载可以看到，他挨了当头一棒：

下列诸生考试成绩不良，不予录取

阿道夫·希特勒

籍贯：茵河畔的勃劳瑙。

生日：1898年4月20日。

民族：日耳曼。

宗教：天主教。

父亲职业：公务员。

学历：中学四年。

考题：人头像。

评语：试画成绩不够满意。

一百一十三名中仅有二十八人被录取。希特勒于心不甘也不服气，跑去找院长论理，院长告诉他，他带来的画“无可争辩地”表明他“不适合当画家”，说他的能力“显然在建筑术领域上”。希特勒想报考建筑学院，这需要高中文凭，他却拿不出来，只好悻悻地离开了席勒广场上哈森设计的堂皇建筑。

10. “若不得志决不回乡”

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阿道夫从维也纳急忙赶回。爱华德·勃洛赫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切除乳房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

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晚上，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希特勒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不屈不挠，毫无怨言。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间，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勃洛赫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芒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旁，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是他最后的记忆。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气潮湿，大雾弥漫。载着一口坚硬、光滑、四周用金属镶紧的木棺的灵车沿着泥泞的街道，缓缓地朝教堂驶去。在举行简短的仪式后，小小的送葬队伍又缓缓越过多瑙河，翻过一座山，朝里昂丁驶去。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则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雾茫茫的坟场里。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顶黑色高顶帽，他的脸色更苍白，严峻而镇静。

对希特勒一家而言，圣诞之夜是悲哀之夜。医药费共计359克朗，这笔款项确实不小，约占克拉拉资产总额的十分之一。阿道夫穿着一套黑色外衣，领带打得不紧，双眼盯着地板，一撮头发披着前额。他抓住医生的手，目光直落在医生的脸上。“我将永远感激您”，他一边说，一边深深鞠一个躬。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诺言。给他的好处，在全德国和奥地利，他都未给过任何一个别的犹太人。

拉波尔一家邀请阿道夫和宝拉到他家过节，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请。他对姐夫越来越不满意，因为姐夫抓住一切机会劝说他放弃当画家这个愚蠢的梦想。所有亲戚都在纠缠他，他才逃到维也纳去。他一定会成为画家的，他要向心胸狭窄的家族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们。

为了将去维也纳后永不再回来的决定告诉他的监护人，希特勒再次去了里昂丁。阿道夫与安吉拉和约翰娜婶婶住在一起，将家事作了最后的安排。

所有债务约已清算完毕。阿道夫也谢过了各位邻居，感谢他们在他母亲病中所给予的帮助。一切债务还清后，由于克拉拉生前省吃俭用，其遗产尚能结余 3000 多克朗。由于安吉拉承担了照料 11 岁的宝拉的责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二。阿道夫在维也纳开始其生涯的钱就很少了。

1908 年 2 月 10 日，他填写了自己和宝拉领取孤儿津贴的表格。三天后，表格被退了回来，还附来一份通知，说表格还应由他们的监护人签署。阿道夫把表格转给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贴办公室的答复，便迫不及待地打点行装（包括衣裳、书籍和绘画材料）告别了家人。

父母的去世，使十八岁的希特勒和十一岁的宝拉成了孤儿。他并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力量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担心。他向亲戚告别，发誓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房东太太的母亲住在维也纳，并且认识宫廷歌剧院舞台美术设计主任兼工艺美术学院教师阿尔弗雷德·罗勒教授。房东太太出于同情心，请她母亲替希特勒写一封介绍信给罗勒教授。就这样，希特勒只身一人前往维也纳，追逐他的目标去了，他后来回忆这次壮行道：

我手中提着一只装替换衣衫的衣箱，心中怀着坚定的意志，动身到维也纳去，我也希望从命运手中夺取我父亲在五十年以前取得东西；我也希望“有所成就”——但是决不做公务员。

第二章 维也纳乞丐

1. 魔术般的民族熔炉

18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来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这个魔迹般的城市。他住在一位波兰妇人斯通帕大街29号查克雷斯太太家。1909年1月，天气虽然沉闷，阿道夫却神采奕奕。2月18日，他给库比席克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明信片：

焦急地等待着你前来的消息。你一定要来，并快点写信告诉我，以便我作好准备，好好地迎接你。全维也纳都在等待……正如我们说过的，你先与我住在一起，以后看情况如何。在所谓的政府当铺里，只要花50—60弗罗今便可买到钢琴。我再次请你快来！

1905年深秋，希特勒在林茨结交了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库比席克是个装修商的儿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已会拉小提琴和大提琴，还会吹小号和低音喇叭，而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乐学校学习乐理。一天晚上，两人在剧院里见了面。希特勒寡言少语，穿着考究，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演出的进展，他眉飞色舞。库比席克本人则外表敏锐，宽额，头发卷曲，好像注定要当艺术家。

5天后，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六，库比席克身背一个盛满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来到了维斯巴诺夫。正当他站在候车室被车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时，他瞥见业已成为维也纳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来。他身穿高级黑大衣，头戴黑帽，手中拿着那根象牙柄手杖。看上去，他真是风度翩翩。阿道夫见朋友前来，高兴极了，连忙亲吻朋友的面颊。

他们跨进威武雄壮的斯通帕加斯29号的宽敞大门，走过一个小小的院落，来到了一座较破旧的楼前。他们艰苦地沿着黑暗的楼梯走上二楼。房内，到处是画稿。阿道夫在桌上铺好一张报纸，将自己仅有的牛奶、香肠和面包放在桌上。库比席克将这些食品推在一旁，从帆布口袋里将烤肉、刚烤好的面包、奶酪、果酱、咖啡等一件一件取出来。

因为房子太小，住不下两个人和放一架钢琴，善于言辞的阿道夫说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将她的大屋换给他们。他们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没想到钢琴占地太大，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内的家具便又重新安排，给阿道夫腾出了三步长的空地。

不到两天，库比席克便在音乐学院通过了入学考试。希特勒对库比席克所取得的进步也不感兴趣。一天，库比席克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学来访，他竟大闹了一场。她走后，希特勒一边踱步，一边大放厥词。库比席克感觉阿道夫神经错乱。为一点点小事，竟大发雷霆。无论库比席克做什么，总不合希特勒的口味。在他看来，处处都存在不义、仇恨和敌对情绪。

一天，他突然大声痛斥美术学院“……都是些头脑硬化的老顽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达理的蠢货！整个学院都该炸掉！”他脸色铁青，双眼放射着仇恨的光芒。他终于泄露真情，又落选了。

尽管他侈谈有决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罗勒教授的帮助。几次，他手中提着皮包，前往这位名扬四海的舞台设计师画室，却没有胆量去敲门。最后，他把介绍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后再受他的引诱”。他这一举动，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够水准所致，也可能是内心之失败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为罗勒名望过高而不敢去求见。

在希特勒离开林茨后约一星期，得知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将得到300克朗，一直领到年满24岁。津贴办公室授权梅洛福先生全权处理每

年应领的 600 克朗，而他则决定每月分给每个孤儿 25 个克朗。这笔定期款子，毫无疑问，给希特勒带来了新希望。但是，假定遗产中的 650 个克朗仍大部归他所有，生活仍是相当艰苦的。一连 5 天，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有时候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较长的歌剧，他们是未看完便离场，他们必须于晚上 9 时 45 分离开，赶在斯通帕加斯 9 号关门前到家，否则就要给看门人小费。回房后，希特勒便强迫库比席克将未看完的部分用钢琴弹出来给他听。

瓦格纳的作品希特勒是百听不厌的。他推崇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瓦格纳的音乐使他心旷神怡，使他遁进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乱的天性所带来的紧张。阿道夫最喜欢的《罗安格林》，他们就在一起看了 10 次。“诗歌会”其成员多为劳工阶层也同样使他入迷。

多少个夜晚，两个年轻人都一起参加音乐会。因为库比席克是音乐学院的，他能搞到免费票。阿道夫居然也开始“嗜好交响乐”，这使库比席克感到惊奇。希特勒特别喜欢浪漫主义作曲家韦伯、舒伯特、门德尔松和舒曼。

那时正是歌剧和音乐的黄金时代。在维也纳文学艺术界有成就的人物中，许多都是犹太人，例如，雨果·冯·霍夫曼斯达尔、阿瑟·施尼茨勒、理查德·比尔·霍夫曼，以及赫尔曼·巴尔都是犹太人。那时的维也纳，正是奥匈帝国全盛时代末期的首府，是个语言混杂、没有统一语言的城市；人口来自奥匈帝国的四面八方，是个光辉夺目的大都会；在那里，生活的乐趣与城市的没落并存。从传统上说，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国式的，但其城市却是独特的。维也纳不仅是财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时装和文化的首府。与德国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协调的民族的熔炉。由于多少世纪以来，南斯拉夫人、马札儿人和意大利人都涌向这里，这个城市已没有一滴德国血液了。城内有一波希米亚剧场，一家意大利歌剧院；有法国的歌星，也有波兰人的俱乐部；在某些咖啡馆里，你会读到捷克文、南斯拉夫文、波兰文和匈牙利文的报纸，就是没有德文的。维也纳不是德国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样，离开了奥地利其它城市和乡村来到维也纳的人们，拜倒在它的魔力下。维也纳是个魅力和贫民窟混杂的城市；既具有铁一般的传统习惯，又有知识分子们激进的试验；既有思想自由，又有强烈的民族偏见。阿道夫虽然被吸进了闪闪发光的维也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成功希望的破灭，这个值得怀疑的、魔术般的民族熔炉也开始使他反感了。

他和库比席克常常空着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穿过居住着中产阶级的昏暗的街道，走向辉煌的大楼和华丽的旅馆林立、门前还站着衣着炫眼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变得越来越叛逆，常常诅咒由不劳而获的财富和缺乏正义的社会。比饥饿更令他讨厌的是到处爬满臭虫的斯通帕加斯那间房子。希特勒对与身体疾病有关的东西尤其敏感。

希特勒对维也纳的这种感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维也纳既给人们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潜力，同时又具有阻碍实现这些成就的最顽固的反抗力。在这种奇特环境下成长的杰出人物，一旦成名，就在对维也纳爱恨交织的混合体中生活。在维也纳居住的都是些爱鸣不平者，他们有专门攻击杰出公民的传统。

年轻的希特勒，时而如痴如醉，时而愤俗疾世，常常想方设法打探这座表面华丽的城市的罪恶。库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会良知的病态伤感

者。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计划是极不稳定的。他会跑到梅德林区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会去林格大街和邻近地区考察，一去就是几小时。回到又脏又小的房后，他便为首都重新设计。这个青年既是市政计划者，又是建筑师。他一边在门与大钢琴间的过道上来回踱步，一边又强迫库比席克听他没完没了地讲解谨慎的计划。有一回，他一连失踪3天。回来后，他宣布住宅区应该铲除，并连夜设计工人模范村。

晚间，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煤油灯。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写东西。出于好奇，库比席克问他在干什么，希特勒便把作品递给他：背景是“圣山”；前景是一块巨大的祭祀石板，四周长满了橡树；两名身强力壮的武士同执一头黑牛，将庞大的牛头按倒在石板的空处。笔直地站立在他们身后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师。他手执大刀，并将用此刀斩牛头。周围站着许多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手执长矛，依着盾牌，全神贯注地看着。

库比席克摸不着头脑。希特勒解释说这是话剧。基督教传至巴伐利亚时，山里人不愿接受新的信仰，决心要杀掉教士。

一日中午，库比席克吃完午饭回来，发现希特勒坐在钢琴旁。“我要把维兰写成一部音乐剧。”他说。数晚后，希特勒把前奏曲弹出来，焦急地等待着库斯特尔的意见。库比席克觉得，这是瓦格纳的二等货，但基本的主题是好的，并主动提出将它写成诗的格式。希特勒对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满，便日以继夜地继续谱曲，还设计场景和服装，甚至还用木炭将主人公画了出来。过了几个星期，希特勒把歌剧一事束之高阁。

他们的生活中，性却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时，姑娘们常狡猾地向她们递送秋波。起初，库比席克还以为秋波是递给他们的，后来他很快发现，她们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们的目邀于不顾。他们没有与女人发生性行为，但晚间却谈论女人，爱情和婚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当然，与通常一样，谈话总被阿道夫垄断。他一再坚持说，他必须保持生命火焰的纯洁性，他认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都得保持肉体 and 灵魂的贞洁，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繁殖健康的后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却也常常萦绕在他心头。他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谈论堕落的性风俗。他猛烈攻击娼妓，不但谴责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而且也谴责社会。一天晚上，他拉住库比席克的胳膊说：“咱们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恶的阴沟’。”他们沿着又窄又黑的施皮特尔伯格街走着。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灯火通明，连里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们坐在屋里，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有的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有的在照镜子，但她们无时不在注意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也会有个把男人在房前止步，与姑娘说上一两句话，然后，灯火便灭了。当他俩走到小街的尽头时，转过脸来又久久地看着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后，阿道夫又对娼妓问题大发议论。

2. 流浪生涯

在考试中，库比席克成绩优异，期终音乐会还由他指挥，7月上旬，库比席克该回林茨去了。他要回去与父母一起消暑，待秋天再回来，但他坚持要付一半房租。关于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字未提；而当库比席克立誓要当维也纳交响乐团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在维斯巴诺夫车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诉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会多么无聊。

希特勒就住在那间空气沉闷、满是臭虫的房子里。8月，他再次给库比席克写信说，他的生活依然乏味。信中，与通常一样，充满了自怜。希特勒透露，他将离开维也纳去希皮塔耳，到8月底，他已在乡间呼吸该村的新鲜空气了。除此之外，可供欣赏东西就没什么了。不断增加的压力迫使他改变在维也纳的生活方式；这次呢，压力来自约翰娜婶婶。最后一次劝他当官的尝试也归徒然。甚至连宝拉也显示出生大哥的气的迹象。此时，宝拉已12岁，对大哥的劝告反感。他们是兄妹，虽然常常吵架，但还是互敬互爱的，不过，生活在一起时，互相都把对方的乐趣破坏了。

兄弟姐妹之情是有的，但彼此间了解肤浅，也没有多少共同爱好。先前与安吉拉和小阿洛伊斯是这样，现在与宝拉也是如此。发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标志着希特勒的青春期的结束。家人劝他考虑一个比较实际的职业，遭到他的拒绝，这就使他断绝了与家的关系。他第四次去了维也纳，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9月中，希特勒再次报考艺术学院。他所呈交的画，是一年来孤军奋战的劳动成果，却被人不屑一顾，连考试都不准他参加。他再次遭拒绝所带来的打击，使他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所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间房子，已耗尽了其所继承的财产。另租一间较便宜的房子。11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清了当月他应付的一份房租。搬进了座落在维斯巴诺夫另一端的一座阴暗的大楼内。

11月18日，他到警察局登记了新住址（这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规矩，搬家需登记），所填职业是“学生”，而不是“画家”。

阿道夫与库比席克割断了关系，他对林茨和家乡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对库比席克的感情并不像库比席克对他的那样强烈；就希特勒而言，他们的关系已告一段落。1904年4月20日，希特勒在费尔伯大街那座可怕的大楼里孤零零地庆祝了自己的20岁生日。一月又一月，他忍受着周围毫无生气的环境，继续过着他在林茨过的那种梦想生活。他孤独地、安静地打发着日子，深居简出。他对人彬彬有礼，但与人疏远。他性格孤独，喜欢读书。

到了夏末，希特勒又面临另外一个危机。除了每月25克朗津贴外，他已未路穷途了。他又迁至塞斯奥塞大街58号，21号房一个小房间。这里与先前的住地一样嘈杂，狭窄的街道上电车来来往往。8月22日，希特勒重新在警察局登记了地址，这次他称自己是“作家”。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又离开了较像样的住所，消失在穷困的底层社会中。他未留下片言只语，警察局表上“将来住址”一栏是空白；“何时迁出”一栏里填的是“未定”。他身无分文，又不能或不愿工作，在尔后3个月内，他到处流浪，成了一名流浪汉。他睡在公园里或门廊下。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家就是多瑙河彼岸的游乐场。若遇大雨，他就在园厅的拱桥下躲避，以外衣当枕。1909年10月底，他被迫在室内寻找栖身地，他睡在酒吧间里，脏室里或宿于价钱便宜的低级

客栈内。他还在凯撒大街一家咖啡馆里睡过，也在埃尔伯格大街一犹太慈善家开办的“热室”里宿过。一次，他在一劳工营里找到了一席之地。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们共宿。

他后来写道，“一想到那些可怜的窝，那些避难所和栖身地，那些齷齪、恶臭的可怕图景，我就全身发抖。”那曾是“我生活中最苦难的时期的活记忆。”他转而求助于教堂，每晨9时便在修道院门口排队领汤。对流浪汉说来，这叫“拜访卡瑟”。卡瑟可能是修道院的名字。

3. 收容所里的乞丐

时至深秋，希特勒差不多已将衣裳变卖净尽，连那件冬天御寒的黑大衣也卖了。这样，大雪和寒冷迫使他进一步蒙受耻辱。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黄昏，他缩身于单衣内，急急忙忙赶至城郊的梅德林。他花了两个半小时才抵达贫民收容所。抵达时，他双脚疼痛难忍，筋疲力尽。这家收容所是某慈善团体兴建的，在这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只需花点小钱，便可住上房间。凡体力上允许的住客，仍需做点家务或打扫卫生之类。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孤零零地耸立在一片开阔地上，楼内房间宽敞，空气充足，供应的面包和汤均极充裕，气氛也相当愉快。楼内众多的淋浴室、洗碗处，还有厕所。

12月，当时天气寒冷，希特勒与其他冻得全身发抖的被抛弃的人们一起，排队站在收容所大门前。门终于开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排队进了收容所，按性别分开，小孩则跟随母亲，希特勒领一张卡片，允许他住一星期，且被分配在一大宿舍里。这是一次令人难受的经历。与众人一起淋浴和将其满是臭虫的衣服进行消毒。排队进饭堂领面包和汤。

谁都能理解一个平日骄傲惯了的青年，在这样一个机构的大门内第一天所受的耻辱。收容所为人们提供住处，当人们踏进这个大门，就意味着加入了赤贫人们的行列。收容所里的人们，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已变成了犯人。新来的人们，由于屈辱，顷刻间也会不知所措。希特勒也不例外。收容所里的人们住在军营式的大宿舍内，喋喋不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坐在整洁的小床上的希特勒，在第一天晚上，是一幅忧郁而沮丧的图画。

希特勒邻近小床上的一名流浪人教给他一个秘诀，想要在收容所呆上比规定的一星期时间更长，他只需花点钱，将离院者未用完的入院卡买过来就行了。这个人叫莱茵霍尔德·汉尼希。希特勒谈吐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也为他编造的有关德国的故事所迷。汉尼希注意到，当希特勒听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怕上帝外谁都不怕”这句话时，他眼睛似乎光芒四射。

汉尼希告诉他的学生说，要在社会的底层度过严冬，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均不能丧失。清晨，他们离开收容所，阿道夫穿着捉襟见肘的外衣，冻得发紫，长着冻疮，步行至“卡瑟”，及时赶上喝汤；然后再在某温暖的室内或某医院内呆上几小时以避严寒，再喝点汤，于傍晚时分收容所刚好开门时赶回。途中，若有较长时间停留，他们便为人扫雪或在维斯巴诺夫扛行李，以挣得几文钱。然而，希特勒身体瘦弱，干不了多少体力活。每走一步，他的脚都疼痛难忍。一次，他碰上有人要请人挖沟，希特勒有意要去申请。但汉尼希却劝告他，赶快把这个想法打消，你要是去做这等苦工，你会爬不起来。

阿道夫想行乞，以碰碰运气。但他既没有行乞的天才，也没有向人伸手的胆量。后来，他成了收容所内一名同行的客户，希特勒同意五五分成，他出去时不但带有地址，而且还有专门指示在身。例如，要是在索登林碰上一个老太太，他就用“赞美耶稣！”一语作问候，然后说，他是教堂的画师，或神像雕刻者，但失业了。一般说来，听了这话她就会打发你两个克朗，但希特勒用这句宗教上的陈词滥调换来的却是麻烦。对于其他，希特勒的运气也差不多坏。于是，他又只好再次求助于教堂，他能得到3块小肉饼。修道院院长在听到“赞美耶稣！”的问候语后就给一个克朗。

汉尼希不明白的是，像希特勒那样受过如此好的教育，又有这份天才的人，为何要到处流浪。他问希特勒在等待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希特勒没精打彩地回答说。汉尼希从未见过如此痛苦，如此令人同情的脸孔，便决定尽点微薄之力。但他并不是纯粹为了他人。他看出骨瘦如柴，愁肠百结的希特勒身上未来有饭票可取，于是便力劝他去画明信片赚钱。希特勒说，他衣着太破烂，不好在街上卖明信片，也不好挨家挨户去兜售。汉尼希说，明信片由他去卖，得款对半分。汉尼希会装成瞎子或瘸病音，在小酒店里出售。汉尼希同阿道夫来到阿德伯餐馆借来一支铅笔，按照两位推销员的意思，给约翰娜婶婶写了一张明信片，要她用平邮寄些钱来。几天后，希特勒在邮局里领到一封信，里边有一张 50 克朗的银行支票。希特勒大喜，于当晚在收容所站队时向众人炫耀。他的狡猾朋友要他将钱藏好，否则，他会遭劫或遭受借债的人的打击。希特勒咳嗽日益加剧。他在政府办的当铺里以 12 克朗的代价买了一件黑大衣。

4. 单身公寓里的卖“画”人

收容所里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工作。曼纳海姆有座单身汉公寓，房子虽然很小，但每人各占一间，还有公共房间供大家从事自己的爱好，设备较好。

这座单身汉公寓坐落在多瑙河彼岸。1910年2月9日，希特勒穿过维也纳市中心，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由于它是工业区，居民混杂，犹太人之多仅次于利奥波德区，它也是个过路区，许多居民用此地作为向上爬的落脚点。曼纳海姆离多瑙河约半英里之遥，是一座大楼，座落在梅尔德曼大街25—27号，可容纳500名单身汉。

这是座现代化建筑，建成不到五年。由于设备较好，维也纳的某些中产阶级的居民竟然为其“豪华”而感到吃惊。主楼内有一个大型餐厅、灯光明亮；墙的下半部还用绿瓷砖镶嵌，给人以温暖感。食物全在柜台上供应，价格很便宜，质量好，量也足。

有许多阅览室、娱乐室；还有一个图书馆和一间“写作”室，在那里，10多个人可同时从事自己的事业。

宿舍是单身汉都喜欢的一间小房，长约7英尺，宽5英尺，仅能容纳一张小桌、一个衣架、一张很窄的小铁床。

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1910年2月来到这座专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居住的住宅的。他交费后（每天半个克朗，若以星期计则更便宜），经消毒和淋浴，便住进了一个小室。收容所的设备虽然不错，但由于这个慈善机关不像收容所那样正规化，他觉得自己较像个人。

不到一星期，汉尼希便来到了曼纳海姆。很快，希特勒便画成了不少与明信片一般大小的画儿。他画得很慢，但很用心，将画中或照片中的维也纳市景摹下来。没费多大气力汉尼希便将这些画在游艺场的酒厅里卖了出去，并将半数收入归己。但是，他很快发现，大画卖价更高。于是，希特勒便转画水彩，画的是维也纳景色，每天一幅，画幅约等于两张明信片大小。

几个星期后，两人合伙所得的果实，以及曼纳海姆的较舒适的生活条件，便拯救了这两位青年，使他们免受寒冷和穷困的折磨，也使他们不再带着咕咕叫的肚子上床。希特勒满心喜欢，因为他可在用瓷砖砌的淋浴室里洗得干干净净。由于他只有一件衬衣，每隔几天，便在洗澡时将它洗干净。他虽然较先前富裕，但仍买不起衣裳，他穿的依旧是粘有消毒剂的破衣。加上长发和胡子，他的外表还是很不得体。

温暖和食物使他对政治产生了某种兴趣。他常把“写作”室变成争论或演讲的场所。这里是曼纳海姆那些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稍为熟悉的人们，一般是知识分子常常聚首的地方。举止正派的工人也可进去。阿道夫成了这群人的领袖，他长篇大论地抨击政治上的腐败。这些讲演有时变为叫骂比赛。如果发生政治争论，尽管希特勒在工作，他也不能抗拒这一战斗号召，便挥舞着丁字尺或画笔像武士一样前来参战。每逢此时，若汉尼希卖画回来，他便将希特勒缴械，用好言将他哄回小屋。然而，只要汉尼希一走，阿道夫便又起身，大声谴责社会民主党人的丑恶行径，或称赞卡尔·卢格这个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只要一激动，希特勒便控制不住自己。他大喊大叫，坐卧不安，两手不停挥动。但是，只要安静下来，他就大不一样了，他很节制自己。

阿道夫对政治兴趣很浓，他倾听形形色色的辩论，听得如痴似呆，虽然这些辩论常常蜕变为多种语言的混杂声，甚至是叫骂声。此时，他便回到自

己的“书房”，大喊大叫的独自演说，实际上是泛德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无神论的谴责和对他们攻击国家、企图夺取整个国家政权谴责的大杂烩。

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这些暴风雨式的辩论中，希特勒从未攻击犹太人。阿道夫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他自己是受益者之一）表示感激，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表示钦佩，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个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

他在曼纳海姆结识的知己朋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一个是名叫鲁宾逊的独眼锁匠，此人常帮助他；另一个是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名叫约瑟夫·纽曼，此人对希特勒衣着褴褛深表同情，曾给他一件长大衣。希特勒对纽曼深表敬意，曾说过他“是个正经人”。对为他贩卖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只一次对汉尼希说过，他宁愿与犹太人做生意，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冒风险。

希特勒自己也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只是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冷酷无情，寡廉鲜耻，斤斤计较的娼妓老板”时，音乐和艺术阶层均受犹太人控制时，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均受犹太人统治”时，他才死心塌地反犹的。这些说法极可能是出现于后来，而当时他的偏见比一般的维也纳人也不见得多多少。在奥地利的首都，几乎每个异教徒都是反对犹太人的。在维也纳，人们有组织地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年轻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书摊毫无价值书刊的贪婪读者。

希特勒经常阅读《东方天坛星》杂志。此刊由林茨的冯·利本弗尔斯创办，此人是个神秘的理论家，其理论和态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本杂志是神学和色情的大杂烩，其编辑宗旨是实际运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保持欧洲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毁灭。利本弗尔斯喋喋不休宣扬的主题是：通过消灭黑人和混种人的办法，让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前者被谴责成劣等人种。《东方天坛星》充斥着雅利安妇女屈服于这些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生物的引诱和性能力的淫猥的插图。这份杂志在号称种族优越的同时又显出几分恐惧。请看大字标题：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创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危险在威胁你！

《东方天坛星》煽动对犹太人无穷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控制着金钱，他们在艺术界、戏剧界的发达，他们对妇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东方天坛星》里刊登的金发碧眼女郎拥抱黑人的淫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尚未形成焦点，因为他的反犹思想也就减弱了。

在维也纳这段未成熟的时期内，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透露“一看见穿长衫大褂的，我就恶心”对自己的命运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点点胃气痛，我也正设法用戒口的方法治疗它，因为医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觉得，说我神经系统有毛病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我其它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画笔作画了，而且其乐无穷，虽然油画艺术对我仍非常困难。我未能考取艺术学院去学画，这对世界是个重大损失。或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

1910年春，希特勒对政治和世界形势已非常关心，他已无法再完成汉尼希的订货。遭斥责后，他保证会多下点功夫，但是，只要汉尼希一离开大楼，他又在通读各报。即使他作画，某项问题的讨论又会吸引他，使他无法安心

去画那些业已厌烦的画。在绝望中，为了逃离汉尼希的纠缠，在夏季一开始，他便与他的犹太朋友、匈牙利纽曼一同出走了。他俩曾常常议论移居德国，所以便一起出发寻找他们的理想去了。但是，维也纳的奇观，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欢的博物馆，终使他未能成行。后来，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又回到了曼纳海姆。他拼命工作，但挣来的收入仅能维持一个星期。不久，他与汉尼希拆伙。这样，他便再次独立。

5. 违天理的人生哲学

1910年秋天，希特勒再次试图考进美术学院。他背着一大包画，找到了霍夫博物馆里切尔教授的办公室。里切尔教授是负责保管和复原各种画的。希特勒恳求他助一臂之力，以进入美术学院。虽然教授承认，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他的画画得很精确，但希特勒的作品却未能使他产生深刻印象。阿道夫没精打彩地返回曼纳海姆，继续在书房作画。不过，没有汉尼希的合作，他无法出售自己的作品。由于急着要钱，他只好求助约翰娜婶婶，不是写信就是亲身前往希皮塔耳。现在，她已是个快死的人，12月，她将全部存款从银行里提取出来。这笔款数目相当可观，共计3,500克朗，她将大部分给了侄儿。

1911年年初，她与世长辞，没有留下遗嘱，当安吉拉得悉，阿道夫得到的遗产比谁都多时，立刻向林茨法庭提出申诉，要求将阿道夫的孤儿津贴归她。这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她是个新寡，不仅要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且还要抚养宝拉。阿道夫同意放弃数年来使他得以糊口的每月25克朗的津贴金。

希特勒仍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吃的是自己烧的饭，穿的还是破衣裳。阿道夫自立后，便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发奋作画。他有艺术家的风度，对人彬彬有礼，常帮助工人或提出忠告，从不卑躬曲膝，一旦谈起政治，他便立刻激动起来，大喊大叫、指手划脚，连头发也在飞舞。他常常如此，他越来越不受人欢迎。一天，他在厨房里烧饭，把两个搬运工人给弄火了。这两个工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劳工组织，希特勒骂他们是“笨蛋”。他得到的报酬是头上一个大疙瘩，作画的手上一块伤巴和鼻青脸肿。

新结交的一位新朋友警告他，他挨打是活该，“因为你听不忠告，谁也帮不了你。”几个月前，当希特勒弯腰曲背在画一教堂的水彩画时，约瑟夫·格莱纳被吸引住了。格莱纳是个富有想像力的年青人，常与希特勒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既谈论经济、宗教，也谈论天文学和神学。他们长篇大论地议论人的易受欺骗性。其中一例是广告里画的是一个女人，其长发垂地。广告说：“本人名叫安娜·西拉希，有着莱茵河女妖式的长发。何来此美发？原因是我使用了本人发明的发油。凡欲得此美发者，请给安娜·西拉希去信，你将免费得到一份说明书和一封感谢信。”

“这就是我所指广告”，希特勒说“宣传，只要人们还相信这种胡说有用，就要宣传。”这种概念令他激动。他说宣传可把怀疑者变成笃信者。

在1911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长时间地与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作画，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作的水彩画《维也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非常精确，简直说是照片。从技巧上说，是令人惊奇的。画建筑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画人物，他却不行了。画中若有人物，这些人物肯定画得很糟。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但是缺乏艺术性。希特勒是个技师，不是艺术家。到1912年，他已能用铅笔作画，水彩画也画得不错，油画画得更好。

他稳步地工作着，所画的画通过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和其他画商销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嘘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们常常聚集在他房内赞赏他的作品，他则轻蔑他说，他是外行，画画还未入门。他认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来，他私下对一友人说，他作画是为了赚钱，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都是以建筑为主题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观也有所改善，衣着虽旧，但干净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获得人们的尊敬，连曼纳

海姆的主管也会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很难得到的荣誉。

他的举止也端庄多了。他虽然仍继续争论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学会了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异常原始幼稚。”他发现，树敌的办法并不能控制他们的心。

最能显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过于他的书房。为表示对他的崇敬，谁也不想去占他最喜欢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客想占这个位子，有人便会说：“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

在书房中，希特勒是知识阶层的核心。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说来，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然与人和睦相处，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希特勒不骄傲，不傲慢。他心肠很好，也愿帮助别人。

在一般的政治辩论中，希特勒除继续作画外，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不过，一旦出现“赤色分子”、“耶稣会会员”这样的字眼，或某人的发言“惹了他”，他就会唰地立起来与人争辩，非常冲动，顾不得言语粗鲁。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已与维也纳下层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维也纳已没多少东西给他了。近几月来，他的思想已转向德国。在他床头的镜框中有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自由和光明正大，我们坚定我们仰望祖国！万岁！

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迷人的首都，希特勒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这五年半中他对维也纳是又爱又恨。“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岁月”，是他生活中最悲惨的时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学更使他定型的时期。他认为，这“是我生活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1913年5月24日，希特勒动身背一只盛着全部财产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纳海姆那扇双层大门。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去寻找他的前程。他说“抵达这个城市时，我还是个大小伙子，离开她时我已是成人了。我变得冷静严肃。在那里，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政治观点，已初步形成。我从未将之抛弃，只在后来详细地加以充实。”

经过四年最悲哀的岁月，希特勒终于没能成为艺术家。这是他的暂时的不幸，却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不幸，因为维也纳的流浪生活使他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个时期，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巩固基础”。这是一种极度扩张自我和反人道违天理的哲学，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带有变态和疯狂的空想主义的世界观，在此支配下希特勒随着时势的潮流，一步一步地展开他的魔王生涯。

第三章 德军不士

1. 绘画谋生慕尼黑

希特勒下了维也纳开来的火车，走到了慕尼黑霍班霍夫区。巴伐利亚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连人们的说话声在他听来都是和谐悦耳的。这城市对他是那样的亲切，好像他曾在里边住过多年似的。

1913年，春光明媚，阳光普照，被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山风洗涤过的空气清新。5月25日那天希特勒首次漫步慕尼黑，街上的楼宇和雕像令他瞠目，他以后说：“从我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小时起，我就深深爱上了这个城市，比爱其他城市要深得多。这是个德国城市。”

在街上如醉如痴地漫步半小时后，他来到了施莱斯默大街。波普缝衣店的窗口贴出一张的告示：“有房出租，设备齐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希特勒上了三楼，波普太太引他进房，房内有床一张，桌子、沙发、椅子各一只。墙上挂着两幅仿油画之石板画。“这青年与我很快便达成协议”，波普太太回忆说。“他说这房子很合用，还付了预租金。”她让他填一张登记表。他写道：建筑画师的阿道夫·希特勒预付了租金。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在某地拣来的画架，立刻开始画画，一画就是几个钟头。不到几天，他画好了两幅画，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剧院。

希特勒满腔热情地来慕尼黑，想在那里学习绘画和建筑。他未实现梦想，未能进入当地的艺术学院。比起维也纳来，想靠绘画谋生，这里更难，商业化的市场并不比维也纳的更大，他被迫走家串户或在啤酒馆里卖画。

在这个富饶的地域，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复活了。在图书馆里，他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凡是有关的理论文献他都加以研究。他以后回忆说：“……我再次埋头钻研这个新世界的理论文献，试图弄清这种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所带来的各种事件与现实的种种现象加以对比。现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这个全球瘟疫上。”

从图书馆回来，他常常一个腋下夹着一二本书，另一腋下夹着香肠和白面包，匆匆走上楼梯，走进自己的小屋。他是个容易相处又乐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点神秘。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几天。他像个隐士，闷在房中，从早到晚都在读书。他常到啤酒馆或咖啡馆去，常常有人听他高谈阔论。但是，他一把话匣打开，马上便有人反对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辩论于是便展开。在这种论坛上，在与这些对手的辩论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变得更加锋利。

冬天一到，买画的顾客便稀少了，这给希特勒增加了困难。即使如此，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满意足的时期。慕尼黑则永远不会失去其魔术般的引诱力，11年后希特勒在牢房里回忆说：“在今天，如果说，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我更爱慕尼黑的话，部分原因是，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同我开拓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那时我取得了内心满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这个维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个斤斤计较、但又具有丰富感情的人身上所产生的魔力所致。”

1914年初的一天下午，希特勒突然受到了威胁。有人在急剧地敲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面目严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刑警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1914年1月20日自动前往林茨的卡瑟琳·伊丽沙白30号码头报到入伍”。如不按时报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诉或罚款。当

局如发现他犯有为逃避兵役而离国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3年前当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他曾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杳无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心烦意乱，手抖抖地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逮捕了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总领事也怜惜这个面黄饥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茨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至2月初。总领事允许他写信向林茨当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的信：

在传票中，我被说成是个画家。我有权得到这个头衔，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才正确。不错，本人是靠出卖自己的画为生。因为本人一无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之卖画是为了能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建筑画师，本人仍处在训练阶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时间作画谋生。我之收入甚微，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时慕尼黑之书画市场正是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早在1910年就曾向维也纳当局申请入伍，接着，他便描绘了一幅他如何在维也纳挣扎的可怜的情象。

那时，我年轻，缺乏经验，又得不到经济援助，而我又极自尊，不愿向人开口求助或行乞。在孤立无援，只能自食其力，所得的几文钱，也仅能夜求一宿。那两年，我唯一的女友是“忧愁”和“需要”，而除了饥肠外，我也没有别的同伴。我从不知“青春”这个美丽的字眼为何物。5年后的今天，我的记忆依然是长满冻疮的手指、手背和脚。然而，当我忆起那段岁月时，我不免多少有点喜悦，因为我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虽然我贫困不堪，我周围的人也常怀疑，我却保持了洁白无瑕的名声，在法律面前我也无罪。除未向军方报到外，本人问心无愧，而未报到之原因则又是本人一无所知。我应负责的仅此一项。如要罚款，小额罚款也还足够，本人也情愿支付此款。

他成功地利用总领事的同情心。总领事写了一封便笺，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发出，便笺写道，总领事与慕尼黑警方均可证明，希特勒是诚实可靠的。建议希特勒前往萨尔茨堡报道。无需远涉林茨。待林茨当局同意后，希特勒于2月5日，由领事馆出资，前往萨尔茨堡。当局发现，希特勒身体太弱，不适宜执行战斗，无法荷枪。他瘦弱的体格使他无资格服役。

阿道夫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内，继续靠绘招贴画和出售画作为生。到6月28日，他强行挣扎的画家生活和成为建筑师的希望终于破灭了。奥地利的皇位继承人，弗朗兹·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杀了！谋杀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的凶手是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希特勒早年对斯拉夫人所怀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现在又得以复活。

在慕尼黑愤怒的人群已开始涌向塞尔维亚租界。一些政界头目感到，这场悲剧将在欧洲导致一种危机。德皇秘密地向哈布斯堡王朝施加压力，要他们入侵塞尔维亚。德国已做好战争准备，会援救塞尔维亚国家的俄国却未做好准备。在这种压力下战争爆发了。

2. 获二级铁十字勋章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申请加入巴代利亚步兵团被批准。他所在的第十六步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开拔仪式。在路德维希三世面前，士兵们宣誓效忠于他和德皇威廉。接着，希特勒与另外数名奥地利籍士兵亦向他们自己的君主奥皇弗朗兹·约瑟夫宣誓效忠。希特勒对10月8日值得纪念的仪式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因为在那一天，他们领到了双饷，还吃了一顿特别午餐，吃到了烤猪肉和土豆沙拉。

次日清晨，十六步兵团开出了慕尼黑，前往离慕尼黑约40英里的勒希菲尔德兵营。士兵们背着背包，艰难地步行了11个钟头，一路上大都在滂沱大雨中行军。他住在马房里，全身湿透了，根本无法入眠。次日，星期天，他们急行军13小时，还在野外露营。由于天气寒冷，士兵们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待他们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星期一下午了。士兵们虽然累得要死，随时有可能倒地，还是雄赳赳地开进了兵营。在兵营是他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训练的时间冗长，晚间还要行军。第十六步兵团与另一兵团合并组成一个旅。真到10月20日晚，新兵们被装上火车。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奥地利来的大爱国主义者，终于踏上了为德国而战的征途。

该团的团长已多年不在役，各连大都由后备役军官指挥，士兵们所受训练很马虎。团里的机枪寥寥无几，士兵们甚至连钢盔都没有，他们开赴前线作战，只有油布帽。该旅士兵的热情弥补了装备与训练之短缺。火车徐徐出站时，士兵们又唱又笑，就像去参加盛大的晚会一般。

拂晓，希特勒所在部队乘的火车正沿莱茵河奔驰。大多数巴代利亚士兵都从未见过莱茵河。随着朝阳透过晨雾缓缓升起，耸立在尼德瓦尔德象征着日耳曼帝国的巨大的雕像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整列火车的士兵自发地唱起了《莱茵河卫士》。

希特勒所在连队在伊普列斯附近参战。当士兵们冒着晨雾前去解救受困部队时，英军和比利时军的炮弹不断在前方树林中开花。一阵阵炮弹在他们头顶呼啸而过，在林子的边缘爆炸，树木像稻草似的被削倒。他们好奇地观看着，不知有何危险，谁也不害怕。大家匍匐在林子的边沿焦急地等待冲锋的命令。头上是呼啸而过的炮弹；四周是被打倒的树木。炮弹在林子边沿爆炸，顿时打得硝烟弥漫，泥土石块满天飞，连大树也被整根拔起。德国人终于反攻了。他们冲锋四次，都被压了回来，他们这群士兵，只有希特勒一个人生还，奇迹般的安然无恙。后来，他们第五次出击占领了林子的边沿和农庄。

战斗持续了3天。团长战死，中校副团长负了重伤。希特勒此时已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冒着猛烈的炮火，找到了一名军医。两人协力将副团长拖到急救站。到11月中旬，第十六步兵团仅存军官30名，士兵总数不到七百，幸存的士兵只有五分之一，但进攻的命令却仍不断下来。新团长恩格尔哈特中校，在希特勒和另外一名士兵陪同下，来到前沿视察敌阵地，被敌人发现，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打来，两人跃至团长跟前，将他推进沟内。恩格尔哈特一声不响地与两人热烈握手。团长表示要授两人铁十字勋章，但到了次日下午，正当他与众人讨论授勋一事时，一颗英军炮弹打中了团部的帐篷，有3人被当场击毙，团长和其他人受了重伤。就在几分钟前，因为有4个连长没有来开会，希特勒和另外3名士兵离开这个帐篷去找他们。希特勒又一次九死一生。

德军成功地夺取了伊普列斯，攻势也告结束，战斗转变为阵地战。在团部工作的人也就相对地静寂下来。团部设在梅辛纳斯村附近一平静地区，希特勒也就有时间作画。希特勒身边带有画具，画了几幅水彩画，其中有一梅辛纳斯村附近的断瓦颓垣一幅、维斯切特村附近的战壕一幅。新团长的副官魏德曼要为一军官餐室上色。该餐厅内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垂死的士兵浪漫在横卧在铁丝网上，显得与餐室极不协调。魏德曼叫梅克斯·阿曼中士在团部工作人员中找个善于油漆的人来。阿曼带回来的是希特勒，希特勒观察到由于阳光照来，房子呈淡红，他于是便建议涂成蓝色。

魏德曼上尉和阿曼中士将应获勋章的人员列了个清单。他们建议授希特勒一级十字勋章。由于他是团部人员，名字也就列在最后。希特勒被拉了下来，得了一枚二级勋章。这是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

在慕尼黑时，希特勒身体太弱小，连背包都难以背动。现在他手持步枪，头上歪戴着钢盔，八字胡子下垂，眼中放射出生气勃勃的光茫，到处走来走去，俨然是前线的战士。其他通讯兵对他之无畏深表尊敬，却不明白一个奥地利人为何要如此冒险。

尽管他滔滔不绝地告诫同志们抽烟、喝酒是恶习，阿道夫还是博得众人的喜欢，因为每逢危险时他很可靠。若遇到有人受伤，他从不将伤兵丢下不管；遇有危险的任务，他也从不装病；在漫长而乏味的战斗间隙中，他又是个好伙伴。他是个画家，使他与士兵们的关系更加亲近。生活中若有笑料，他便将它画成漫画。

希特勒与众不同，他未从家中带来罐头之类东西。为了满足他那永远满足不了的食欲，他只好向厨子或厨房帮工额外购买食品。他又不好意思分享别人的罐头食品，常拒绝别人的好意，魏德曼中尉提出，在圣诞节从伙食费中抽出 10 马克给希特勒，当场被希特勒谢绝。

3. 九死一生

1915年1月休假一结束，全团又重新开赴前线，天气很坏，常常在敌人的重炮火力下在齐膝深的水中一躲就是几天。他们盼望有几天的喘息机会，并希望在数天内全线展开总攻。

就是在这种僵持的时刻，一条小白狗跳进希特勒的战壕，追逐兔子。希特勒将狗抓住。开始时，那条白狗老想逃跑。他以巨大的耐心对它，慢慢令它习惯与他相处。希特勒给它取名叫“小狐狸”，并教它诸如爬梯子之类的把戏。白天，“小狐狸”与他从不分离；晚间，它就睡在他身旁。

一月底，希特勒在一封信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恶战的情景：

……由于雨水不断，又近海，地势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无底的沼泽；街道上到处是粘粘糊糊的泥浆。

步兵的战壕、掩体、大炮阵地、交通沟及铁丝网、“狼窝”、地雷阵等等，都设在这样的泥潭里。这真是奇形怪状的阵地。……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能把账与这伙强盗算清楚，不管代价如何，能尽快与他们交手。待我们中有幸返回家园的人们回家时，能看到家园更加纯洁，并荡涤尽了外国影响。这样，成千上万人每天在这里忍受的牺牲和痛苦，为了反对国际敌人，这里日日流成河的鲜血，不但使德国的外侮得以消灭，且能使国内的国际主义得以打破。

希特勒总是说，他的家是十六团不是奥地利。战争结束后他将在慕尼黑生活。他们将赢得战争！在这点上，他是疯狂的，如果有人开玩笑说战争永远也不会打胜时，他便变得疯狂，在室内来回踱步，说英国必将失败，如同祷告时必说阿门一样。

人们在谈论食物或女人时，他则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作画。但是，一旦话题转入严肃的主题上，他便会停下来大发议论。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议论，个个都如痴似呆。他们都喜欢听他口若悬河地议论艺术、建筑等等。他眼前常常摊开一本书，他是个知识分子的印象得到加强。他背包中常常有几本书，其中一本系叔本华所著《我从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位哲学家强调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必然取得胜利。

到1915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团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与各营各连指挥所相通的电话线常被敌炮火打断，通讯只好靠通讯员联系。希特勒是最可靠的通讯员，其他通讯员对他之机智和不平凡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东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与众不同，责任感太重。他急于上阵，常常不请自来，替其他通讯员送信。

六、七月间，战斗的速度加快了，送信的任务十分频繁，他的脸变得蜡黄而消瘦。每当天不亮英军开始炮击时，他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拿起步枪，在室内急剧地来回踱步，像出发前的赛马一样，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对别人的笨拙，他变得更加不耐烦，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厉声驳斥。

9月25日，英军加紧进攻。至黄昏，十六团全线吃紧。与前线的电话通讯突然中断。希特勒与另外一名通讯员前往看个究竟。他们侥幸回来报告电线已被打断。由于敌强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广播，以警告各部队。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击毙。

在过去数月中，他多次差点儿送命，却化险为夷。他的命好像有护身符似的。多年后他对一名英国记者说，“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同志一起吃晚饭，突然，有个声音好像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不绝于

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走了约 20 码。我坐下来继续进食时，心也安定多了。但我还没吃两口，只见火光一闪，接着便从我原来的地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流弹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那年秋，正当秋霜使大地变得灰白时，他写了一首怪诗。

每当寒夜来临，
我便独往宁静的沼泽之橡树旁。
用黑暗势力使众志成城——
月色以其魔力铸成北欧之古文，
日间轻率无比者，
晚间必被魔法变为渺小！
闪光的钢铁由他们炼造——非用于战争，
却硬成了石笋
于是，虚伪与真实分道扬镳——
我罗织文字数行，
带着我的祝福和昌隆，
献给正义的好人们！

几星期后，他向军人们作了一惊人的预言：“我会让你们如雷贯耳的。等待我的时代的来临吧！”

那年 12 月，阴雨不断。整个弯弯曲曲的战壕都灌满了水。第二个圣诞节，较之于第一个更为惨淡。别人都在拆开家中寄来的包裹和慰问信，希特勒则独自昏昏沉沉地坐在行军床上。在三天的假期中，他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大家让他分享家中寄来的圣诞礼物。他一一予以谢绝，回到他私人的小大地里去了。假期一结束，希特勒一反阴郁之常态，马上高兴起来，对同志们安静度假等讥讽之词，报之一笑。

1916 年夏初，希特勒所在之兵团开赴南方，刚好赶上关键的松姆战役，英军发动猛攻，第一天就有近两万联军被打死或打伤。7 月 14 日晚，在弗隆美尔一带，十六团的野外电话线全被打断。希特勒和另一名通讯员在几乎必死，每走一公尺都挨打的情况下，被派去查线。他们躲进水满的弹坑或壕沟内避弹。同行的通讯员累倒，希特勒将他拖回战壕。

7 月 20 日，战役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折兵损将无数都未前进分毫。在以后的两月中，战斗成了沉闷的阵地战，炮火猛烈，双方前进或后退的长度仅能以码衡量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希特勒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汉斯·孟德彼调至后方。但他仍有两个战友在身边，即恩斯特·施密特和伊格纳斯·维斯登基希纳，还有他的爱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弗美尔，有多少次他在凝视他的爱犬‘小狐狸’，注视着它发怒、咆哮的各个过程，希特勒吃饭时，“小狐狸”就坐在他身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三个月后，松姆战役仍打得难分难解。联军不断进攻。在此战役中，双方损员惨重；这是无谓的屠杀，因为德军的阵线丝毫未动。一周来，他多次执行危险任务，10 月 7 日晚，他的幸运结束了，他与其他通讯员一起，正坐着睡在一条通往团部的狭窄的地道里。一颗炮弹在狭窄的进口处炸开了，把通讯员们打成一堆。希特勒大腿受伤，仍要求让他留在前沿。

4. 获一级铁十字勋章

希特勒被送进一所野战医院。他的伤势并不重，但在病房内，他患了一种惊骇症，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见一个德国女护士在跟他说话。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几乎使他“惊”倒。

他上了一列开往德国去的救护车。住进了位于柏林西南的一所陆军医院。西月后，他出院了，被调至慕尼黑的一个补充营。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士气为何崩溃的答案。是犹太人！在后方密谋让德国倒台的就是他们！他也深信，犹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国的生产，这只蜘蛛正开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细胞中的鲜血。

希特勒讨厌慕尼黑了。他觉得，补充营的气氛实在可憎。谁也不尊敬前线下来的士兵。这些人对希特勒在战壕里受过的苦难毫无认识。他渴望回到自己人中间去，遂于1917年1月致函魏德曼中尉说，他已康复，可再次服役，希望回到原来的团和原来的同志中间去。3月1日，他回到了十六团，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欢迎。

数天后，全团开赴阿拉斯地区，准备发动另一次春季攻势。但希特勒仍有闲暇作画，画了不少水彩画，内容皆系对他有意义的战场景象。希特勒战时的画作具有高度的艺术性。那年复活节，他的艺术转向群众。他用石灰将煤球涂成白色，在团长的花园里摆成“1917年复活节快乐”一语。几个月后，十六团又来了一个新团长冯·图波夫少校。新团长是个少壮派人物，有活力，到任便重整军纪。他不但使官兵们难堪，还敢让他们批评上级。为了消除受挫折的闷气，图波夫出门狩猎，希特勒是赶兽出林者之一。

尽管服役时间长，战斗也勇敢，希特勒仍然是班长。希特勒缺乏领导才干。不拘小节，行为草率。他的头老歪向左肩，行走时垂头弯腰。见军官前来他也不立正。更重要的是，没有让通讯员当中士的合法规定。如果要得到晋升，希特勒就得放弃其现行职务，这样一来，团部就会失去一名最好的通讯员。

1918年夏季，十六团回师首战过的比利时战场，准备参加夺取伊普列斯的第三次战役。这次战役仍与第一次一样猛烈。7月中旬，他们连续十天十夜遭敌炮击。头上飞机的嗡嗡声不绝于耳，接着便是爆炸声。此外，他们还不断受到毒气的威胁，士兵们有时得连续24小时戴防毒面具。7月的最后一天，守卫者们面临着坦克恐怖。侥幸的是，滂沱大雨将无人地带变成了泥潭，坦克全深陷其中。

8月，受创的十六团退出战场，调往阿尔萨斯休整。就在此时，希特勒两度遭惨痛损失。在部队下火车时，希特勒竟找不到“小狐狸”。另一个“猪猡”用枪挑开了他的背包，偷走了装有速写画、油画和水彩画的箱子。

那年10月初，施密特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去休假18天。这是开战以来首次休假。他们的目的地是德列斯登，施密特的妹妹住在该地。但他们在布鲁塞尔、科隆和莱比锡均作了停留，以观赏各地风景。希特勒特别欣赏莱比锡。使他难忘的还是那高达300英尺的“民族之战”的巨型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为纪念1813年战争之阵亡将士兴建的，看上去它更像个堡垒，而不是神坛。

年底前，十六团战斗任务没有多少，希特勒也就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对小说和杂志，他不屑一顾，把全部精力放在攻读历史和哲学上。战争迫使人们深刻地思考人性，他说过：“就生活中之各种问题而言，4年战争等于30年大学之训练。我最恨的莫过于闲聊文学。如果要关心人类的命运，人们只

能读荷马的作品和《福音》著作。在战争的后期，我读的是叔本华的著作，而且反反复复地钻研”。

冬天，在前线作战之士兵异常艰苦。给养比先前任何时候都缺乏，士兵们被迫用狗猫充饥。希特勒喜欢猫肉，若有食物可得，他最喜欢的是烤面包涂蜂蜜或果酱。一次，他发现了一大堆面包片，为满足辘辘之饥肠，他有条不紊地取了出来，还机敏地从底部一包包地取出。他与同伴们分享这一份特殊所得，他们用面包片换了些砂糖后，然后制成了前线风味的奥地利点心。

在国内，老百姓也被迫以狗猫充饥。面包是用锯末和土豆皮为原料制成的，牛奶也几乎无处可得。德国的盟友也吃了苦头。在维也纳，由于食品奇缺，奥地利政府被迫向柏林求援粮食。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罢工事件不时爆发，1918年1月28日，全德工人实行总罢工。罢工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和平，增加粮食定量，废除军事管制法，在全德建立民主政府等。在慕尼黑和纽伦堡，上街请愿要求实行和平的工人达数千名，在柏林，走出工厂要求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就达40万。虽然罢工工人不到一周便被驱回工厂，革命的精神却在首都洋溢，全面爆发革命只是个时日问题。

总罢工的消息传到前线时，士兵们的反应不一。许多士兵都与后方的百姓一样厌战，但也有许多人觉得被自己的同胞出卖了。希特勒称之为“整个战争中最大的欺骗”。他简直是疯了，他说：“家里人都不要胜利，军队还在打什么仗？巨大的牺牲和贫困是为了什么？军人是要把仗打胜的，家里人却闹罢工反对！”

3月西线战场处于僵局，其余战场德军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俄国都已屈服。东线敌人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调100多万军队开赴法国，在西线进行决战。总司令部下令大规模反攻，大部分部队对此均忠实地响应。在尔后的数月中，希特勒所在的十六团参加大规模春季攻势的各个阶段：在松姆、在恩河以及最后在马尔纳，希特勒的战斗精神较前更加高涨。6月间，在前线，希特勒在一战壕里看见法国的头盔。他往前爬去，发现那是4名法国兵。希特勒拔出手枪，用德语向他们大声喊话，好像他有一连人马。他亲自将4名战俘交给了冯·图波夫上校。没有什么情况会阻碍他执行最困难、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为了祖国和他人，他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安宁。8月4日，希特勒获一级铁十字勋章一枚，但这是为表彰其先前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为此卓越的功勋。除这次的奖章及1914年所获的二级十字勋章外，希特勒还得过下列勋章：1917年9月17日获三级军事铁十字勋章一枚，外加战刀；1918年5月9日因作战异常英勇获团部勋章一枚；1918年5月18日获伤员奖章一枚；1918年8月25日获三级服役奖章一枚。这枚勋章是指名让他受勋的营部副官雨果·古特曼上尉、一个犹太人，亲手授予的。

形势已明朗，攻势已惨遭失败。西线的失败使人们大受震惊，士气一落千丈，连老兵也不例外。士兵的秩序大乱，军官们不得不朝窗外开枪。在每个车站，士兵们四散奔逃。试图维持军纪的军官们遭石块和手榴弹的袭击。列车两侧用粉笔写满了诸如“我们不是为德国荣誉而战，而是为百万富翁而战”的革命口号。

希特勒获十字勋章后第四天，联军在亚眠附近冒着大雾发动反攻，突破了德军阵线。这天是这次战争中德军的末日！德皇悲伤地说：“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已山穷水尽了，必须结束战争。”

在国内面临革命、前线即将崩溃的情况下，希特勒更常与人争论，并大谈特谈赤色分子如何进行欺骗。然而，希特勒的声音却被后备部队的抱怨声所湮没。希特勒变得怒不可遏，常厉声高喊说，战争败就败在和平主义者和退缩者手里。一天有个见习军官说，再继续战是蠢举，他竟遭希特勒的袭击。两人拳脚交加，最后，在受了不少惩罚后，希特勒击败了对手。那时以后新来者都鄙视他，但我们这些老同志却更加喜欢他。

4年来，丧失人性的战争，使希特勒无比憎恨国内那些“在祖国身上背后插刀”的和平主义者和逃避兵役者。他，以及像他那样的人们，都满腔热血，发誓要对这种背叛进行报复，产生了未来的政治观点。战场生活给他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信。他为德国而战，而且是真正的德国人。他曾被迫光明正大地自食其力，长大成人后有自己的自诩感。入伍时，他还是个不成熟的青年，现在，他已是个成熟的人，准备在世间争取一个成熟人的位置。

5. 时势造“英雄”

1918年10月希特勒所在的十六团进入科明尼斯阵地。13日晚，英军以毁灭性的炮火猛轰德军前沿，然后便施放毒气。这次炮击，系三个月前战局急转直下以来德军所承受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中最猛烈的一次。德军虽在后撤，战线也在弯曲，但未崩溃。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的是巴代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兵团，他们躲在山间和田野间的战壕里，抬不起头来。战场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到处是弹坑。士兵们个个精疲力尽，蜷缩在战壕里；英军的炮弹在他们四周一颗颗爆炸，将地面撕裂。德军阵线上，谣言四起，说不少德军业已哗变，这又使他们没精打彩，士气低落。老兵们全身麻木，新兵则吓得魂不附体。

猛然间，一阵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气味，涌进战壕。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毒气”！这是他们首次碰到芥子气。有人闻着，它是香气；有人闻着，它却辛辣刺鼻。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内的空气已变得浑浊不堪。有个新兵，因憋不过气来，将面具取下，以图吸取新鲜空气，但吸进的却是致命的毒气。毒气一进他的喉咙，他便仰身倒地，窒息得口吐白沫，咕噜作响，接着便慢慢死去。

到了拂晓，毒气才慢慢消散。士兵们撕下面具，大口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还充满了火药味。这阵间歇却是短暂的，喘息未了，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和硝烟。来不及戴面具的，便立即翻身倒毙在地上。那些幸免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他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向众人建议，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这样，士兵们排成单行，跌跌撞撞地前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一直来到第一个急救站。在被从窒息的死亡中营救出来的士兵中，就有一名年仅29岁的下士，阿道夫·希特勒。

列车带着希特勒东行时，他仍是个瞎子，且处在身心全部崩溃的边缘。他双眼红肿，脸鼓鼓的，像个皮球。这些士兵说话的声音，像鬼似的，有气无力，非常可怕。若有护士前来照料，他们往往大发雷霆，予以拒绝。他们不吃不喝，不准人们

去治疗发炎的双眼。不管医生怎样说他们的视力很快可得到恢复，这都无济于事。他们所需要的，是一动不动的躺着呻吟，将痛苦解除，即使靠死亡来解除也好。

这个身体受伤，意志消沉，15年后竟成为帝国元首的希特勒下士，不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全过程，4年前，当德军首次发动强大攻势使比利时军、法军和英军无法招架时，希特勒所在的兵团，曾在同一地区首次血战，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竟不可想象地损兵折将达80%。对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损失并不令人沮丧，而正是德军之战斗精神。他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可骄傲地说，从第一天起，我兵团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连仅存两名中士。战斗至第六天，我兵团3600名官兵仅存611人。”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德国式的英雄气概。然而，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战争成了僵持不下的阵地战。两军对峙，中间是无人地带的焦土，只在一方企图突破对方防线时发生冲突，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都要付出伤亡百万的代价。早期的乐观情绪慢慢消失了，躲在战壕里

的士兵们士气低落。在国内，随着英国人的封锁，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饥饿和痛苦在德国人民中蔓延开来。战争进入第三年和第四年时，德军的思想便从胜利转向活命。士兵们常常斥责高级指挥机关的愚蠢，他们明知再战也无益。也有少数官兵对这种失败主义的议论，嗤之以鼻，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一再表现英勇，他还是个下士，尽管未被重视，他也不觉得沮丧。他常常大声呵斥同伴，特别是对新兵他便会大发雷霆，双手往口袋里一插，来回踱步，破口大骂悲观失望的人们。

悲观主义者也许是错了。随着 1918 年的到来，4 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摆好架势，准备再次发动攻势，除了西线处于僵局，在其余战场上，德军均取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最后是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屈服，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使德国人得到了乌克兰的大片平原。由于东线敌人已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抽调了 100 多万人马，开赴法国，以求打破僵局，在西线进行决战。“皇帝之役”即将开始。

春天，德军发动了 4 次大攻势，迫使英国、法国先后撤退。势成背水，英军被命令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7 月 15 日，决战在莱姆市附近开始，双方都明白，此仗一打，胜负即见分晓。“如我在莱姆斯进攻得手”，鲁登道夫说，“此次战争我们便赢了。”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看法表示同意。他曾说过，“如德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此次战争我们便输了。”进攻失败了，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联军不但有美国师为之加强实力，武器和粮饷还源源不断从美国涌来。

8 月初，英军在亚眠附近发动突袭，德军几乎一枪未发便全线崩溃。德军后撤了，但阵地仍在，愿意履行军人职责者却数以百计。国内的信念却渐渐消失了，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死硬派人物看来，安全的、未受骚扰的后方，以及那里的落伍者、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者，还有对德国这个祖国既不热爱也不尊敬的犹太人，是在最严峻的时刻出卖了战斗的前方。事实上，真正丧胆的是鲁登道夫本人，极力催促文官政府签订和约。

德国是受贵族统治的世界，所有高级的职务统统由贵族担任。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出现了像希特勒那样夺取实权的人物。这些人物平凡庸俗，但他们控制着民众反战的无情巨浪。当火车拉着希特勒前往设在波默拉尼亚省之小城巴斯瓦尔克的医院时，自身的痛苦与失望使他的崇高愿望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经过几个星期治疗后，希特勒恢复了视力。角膜炎已消去，双眼也已退肿，眼眶之剧痛也开始减轻，慢慢地，他看清了周围事物的轮廓。

视力的恢复给希特勒带来了希望，使他重新对目前的各种事件发生兴趣。柏林本身已实际上被包围，新任经理敦促德皇退位，以便签订停火协议。在德国国内，革命事件此起彼伏，11 月间，一天早晨，一群“赤色水手”涌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希特勒原就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又见水手的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愤怒令他不得不再次卧床。说不出真正感觉如何。

11 月 9 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病人们聚集在小厅里，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仑市议会不再悬挂德国皇冠，德国已成为共和国时，众人好像全气得周身发抖。当这位年老的牧师称颂霍亨佐仑所作的贡献时，他不禁轻声哭了起来，在这个小厅内，人人心头沉郁万分，谁也止不住泪水。牧师接着说，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一切均已失去，人们不得不拜倒在获胜的

盟国脚下求饶。在希特勒看来，革命是无法容忍的。

希特勒在极端的失望中，他下定了决心：“是步入政界呢，还是继续当建筑师，我一直摇摆不定。现在我再不摇摆了。当晚，我便下定决心，如视力得以恢复，便步入政界。”希特勒的二度失明，在医学上找不到解释，福斯特医生坚信他的病人是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患者。希特勒本人坚信他永远失明了。

11月11日，德国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使他痛苦万分。突然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重见光明了！他庄严地宣誓，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在巴斯瓦尔克冷清的医院病房里，20世纪一般最凶残的势力出世了。

6. 陆军里的特工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巴斯瓦尔克医院，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经过了柏林，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

希特勒不信任发起革命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希特勒前往施霍宾地区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起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特别令希特勒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和施密特两人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曾在战壕里服役过的。

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自由兵团”突然兴起。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

由于“自由兵团”干预，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首都西南150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出任国防大臣，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1919年6月28日，获胜的盟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政府没怎么拖延便批准了条约的条款。条件很苛刻。德国被迫独自承担引起战争的责任，并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大片大片的帝国领土被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马尔梅蒂地区割给了比利时，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割给了波兰。德国还丢失了她的殖民地。丹吉克成为一个自由邦。萨尔、施莱维希和东普鲁士将拥有公民投票权。盟国将占领莱茵河最少达15年之久，莱茵河右岸30英里宽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便达到了顶点。

“自由兵团”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立即开始行使比其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军区成立了一个新闻局，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耳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其人。

希特勒及其他政治特工人员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的政治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一次讲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在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人们像着魔似的。有个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进越起劲。这些人的激动是

他高谈阔论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苍白的小脸。他头发蓬乱，不像军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蓝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热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学生中有个天生的演说家？”米勒教授指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过来。”希特勒带着目中无人的窘态，笨拙地走了过去。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他终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个团里当上了教官。

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耳上尉对他的讲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的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希特勒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一样生活，回来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雄辩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以他的狂热和对听众的魅力，使听众聚精会神。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协助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约 50 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第四章纳粹党

1. 希特勒参加了一个现成的党

1919年9月的某一天，希特勒下士突然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

当时的德国秘密结社的风气很盛，各种政治倾向的团体都纷纷出现，主张宽容和人道，反对战争。与此相反，图勒协会的宗旨则是“为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人而斗争”。它的成员主要上流社会的人士，包括亲王、伯爵、男爵、工厂主、教授和大学生。

军方对工人的团体一直很疑忌，因为它们常常受到社会党或共产党的控制。但他们听说“德国工人党”这个小团体有些特别，所以想调查一下。

希特勒奉希埃尔少校之命去参加该党集会。

这次集会一共有二十五人参加，地点设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

希特勒从一开始坐到散场，党内会议沉闷而平常，他感觉不到这个组织的新奇之处，这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真正成气候的却不怎么多，一般都过不了多久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希特勒认为这个党就是这样的。

散会后，希特勒起身回去，这时有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到了他的手里。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正是把书塞进希特勒手中的人，他叫安东·德莱克斯勒，锁匠出身。这个人1918年3月7日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工会。但他所拉到的会员从来都在四十人以下，1919年1月这个委员会与一个叫做“政治工人集团”性质差不多的团体合并，改名为“德国工人党”，成员将近一百人。原“政治工人集团”的领导人，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担任新组织的第一任主席。今天的会议就是他们组织的。

第二天早上，清晨五点希特勒就醒了。按他的习惯，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着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撒在地上的面包屑。他曾为此种行为作过解释，说自己一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所以很能够想象小动物们的饥饿和快乐。突然他记起昨天带回的小册子，就取出来随便翻翻。

小册子的题目是《我的政治觉悟》。

希特勒看着看着，出乎意料地惊异起来，这里反映的不正是自己这几年来所确立起来思想吗？因而更认真地读下去。

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要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但又与社会民主党不同的保持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他和希特勒一样，瞧不起资产阶级完全不关心工人家庭和他们的社会问题。他也和希特勒一样，仇视犹太人领导的共和国，希望恢复德意志国帝国。

那一天，还有一件事令希特勒感到惊异。

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后来回忆到这件事情时说，“我从未表示过我要参加一个现成的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未免太自作主张了，我根本不能答应。”

希特勒正准备写信作复，一股强烈的好奇涌上心头。他决定先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到会上再亲自说明他不参加的原因。

委员会会议在一家下等酒店进行。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

着四个年轻人，其中就有小册子的作者。他一见到希特勒进去就马上非常高兴地与之打招呼，欢迎这位新党员。

这次会议同样没有给希特勒留下好印象，但是他没有象他当初打算的那样表示他不想参加这个党。他也没有说同意参加。他在不满的同时发现了这些小人物身上有着什么东西吸引他。也许这就是他们“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

那天晚上，他回到营房，慎重考虑他“一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是否应该参加这个党。

理智让他推辞。但感觉又提醒他，正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经过了两天伤透脑筋的思考之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原来的主意。

希特勒将发现的情况向梅耳上尉作了汇报。梅耳上尉又将情况转报给了一群高级军官和资本家，他们每周在“四季”饭店碰头一次，讨论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各种办法。他们的结论是，只有靠德国工人的支持，目标才能取得。可把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作为一个开端。一天，鲁登道夫将军出现在梅耳的办公室，要求允许希特勒参加这个工人党，并协助它的建设。

新军的成员参加某一政党，这本来是非法的。但为使鲁登道夫高兴，便下令让希特勒参加工人党并助它成长。在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国工人党”党员，并登了记，领到了一份党证。

这是希特勒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工人党的第七名委员。

正如他后来所说，“跨出了这一步之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2. 国家社会主义：纳粹

希特勒有了政治活动的舞台，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的各种各样的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渠道，迄今为止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来的内在精力现在开始迸发出来了。他开始大干了。

首先他敦促原来一直缩手缩脚的委员会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会。

委员们热情不高，他就自己亲手打字、发请贴。他根本不畏惧失败。有一次他发出了八十多张请贴，最后主席宣布按时开会，出席会议的仍然只是他们自己的七个人。但后来他发了更多的请贴，终于成功地举行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激动人心的集会。这次集会上，他还在主席不赞同的情况下（主要是担心希特勒的演讲才能），发表了十分钟的演说。他的滔滔雄辞使听众象触电一样感动。令主席、也令他自己感到惊异。

此后，他接管了党的宣传工作。

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组织了小得可怜的党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会场设在一个可容纳两千人的宴会厅。座无虚席。

委员会中的同伴们事先都认为他疯了，为表示抗议，哈勒辞去主席职务。德莱克斯勒继任主席，虽答应允许希特勒进行准备，但内心同样表示怀疑。

但希特勒愿意冒险，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摆脱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对社会舆论产生真正的影响。

会议终于如期举行。先由一个预定发言人作了一个反应冷淡的讲演，接着，希特勒开始演讲。

他高兴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他声音中充满感情，他打着手势，眼睛放射出光芒，他的精神，令群众感到温暖，听众开始鼓掌湮没了喊叫声。

希特勒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宣读《二十五点纲领》和对这些纲领进行阐述。

《二十五点纲领》是由希特勒、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共同起草的。纲领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是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立国方针。要求废除凡尔赛和圣日尔曼和约，由所有的德意志人结合成一个大德意志国，并使之拥有殖民地。

二是建立民族国家的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具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民族同志”。只有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国民。犹太人和其它非德意志人既不是民族同志，就不能做国民。应该阻止非德意志人继续迁入立即离开德国，在无法养活国家的全体公民的情况下，必须驱逐异民族的非国民。民族国家将用“德意志公共法”代替“罗马法”，建立“民族军队”和“强大的国家的中央集权”，它对地方政府拥有绝对权威，还控制新闻出版，取消犹太人和外国人的舆论自由。在民族国家内部，实行公益先于私益的原则，各阶级都要服从民族利益。德国必须重新崛起，再图霸权。

三是社会改革要求。要取消不工作和不出力而得的收入，粉碎利息奴役制度，对一切已经社会化的托拉斯企业实行国有化，分享大企业利润，兴建养老设施，造就一个健全的中等阶级，把大百货公司收归地方政府管理并以低价租给小业主经营，实行适应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取消地租，禁止任何土地投机，处罚高利贷者、黑市商人等等。

《二十五点纲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具体化。因而这次集会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次大曝光。

当希特勒宣读纲领时，大厅里一片哗然。有喊叫声，撞击声，拥护者和反对者的打骂声，也有经久不息的掌声。

尽管他们的纲领并没有得到听众的广泛认同，但是，希特勒相信，大会散去，大厅渐空的时候，他们运动的原则已经跟着德意志人民一起走了出来，不可能再被忽视和遗忘了。

对希特勒而言，包括反对派的捣乱在内，是个完全的胜利。当人们列队离开会场时，希特勒觉得，通向自己的未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我宣布散会时，不止我一人在想，狼已经出世了。这个狼是注定要冲进拐骗人民的骗子群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阿道夫源于日耳曼“幸运的狼”一词。从那天起，“狼”一字对他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为了明确的提醒人们记住国家社会主义纲领，希特勒决定在党的名称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

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为N.S.D.A.P，简称纳粹党。这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名称。在希特勒的坚持下，造了党的花名册，发了党证。第一份党证编号是501，“画家”希特勒的党证号是555。

3. 退伍从政

希特勒交往的圈子不断扩大，来往的人各式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热爱日耳曼的任何事物和恐惧马克思主义。陆军内的代表人物是恩斯特·罗姆上尉，他是个同性恋者，曾当过连长。罗姆是个模范军官，是在危险中可以信赖的同志，他长得又矮又胖，心发剪得整整齐齐，笑起来很是逗人。他是战争的活纪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弹痕，现在在国防军当军官。他曾说过，“因为代是个恶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战争和骚乱，而不是你们市民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从两人首次在一民族主义组的秘密会议上见面时起，罗姆便坚信，这个勇于献身的下士是领导“德国工人党”最合适的人选。由于罗姆带来了许多军人，在吵闹的会上维持秩序的正是这些军人。鲜血和苦难把希特勒和罗姆两人紧密连在一起，因为两人同为建立前线战士的手足之情立下过汗马功劳。在不久前罗姆接替了梅耳上尉的职务成了希特勒的指挥官，他坚持让希特勒对他使用昵称。这样亲密的关系也导致希特勒被其他军官接受。

希特勒与作家底特利希·埃卡特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埃卡特曾说过，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必须有能力承受机枪的咆哮声。“我宁愿要一只微不足道的猴子，只要他能对赤色分子作辛辣的回答，并在群众向一群学问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时不逃跑就行。”此人应是个光棍，“这样我们便能吸引妇女！”尽管两人年龄相差21岁，背景又不相同，埃卡特是个大学生，他们结成了好友，并不只是政治上的相识。两人均是波希米亚人，能讲下层社会的语言；两人均是民族主义者，都憎恨犹太人。埃卡特认为，凡娶日耳曼女人为妻的犹太人都应监禁3年，如再执迷不悟，继续犯罪，则予以处决。

埃卡特是个浪漫的革命音，善于进行咖啡馆争论的大师。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个江湖木士，常出现于舞台；若有机会讲演，不管是在家中、在街头、还是在咖啡馆，他津津乐道，讲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瘾，又是个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会背景造成。希特勒热衷于与这位热情的、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海盗相伴，而他则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为希特勒吹捧。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导师。他给了希特勒一件军大衣。改正他的语法，带他逛高级的饭馆和咖啡馆，并将他介绍给名人文士，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音乐、文学艺术和政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这位作家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霍夫布劳群众集会后几星期，两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霍尔·冯·卢特维兹将军率领的“精锐自由兵团”，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开赴首都，占领了柏林，并由卡普担任总理。希特勒和埃卡特两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的潜力，双双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罗姆上尉把他们送上一架教练机。驾驶员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是战时的一流飞行员，很年轻，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空军的最后一个统帅。

凡有地位者，谁也不愿在卡普总理的内阁任职。当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总罢工时，工人们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权无法施政。电力被切断，交通停顿；全城无水，垃圾在街上腐烂；商店和办公室关门，只有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响。这种腐败的现象系由一部拍得过分电影所致。该电影写的是一群11岁的小妓女，浓妆艳抹，与穿着高筒皮靴的亚马逊人争风吃醋的事。城内仍有供各种口味、各种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馆和餐馆，有男性同性恋者、女

性同性恋者、裸体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体已成为艳事，而艺术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厌世。

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却为左派中的一次叛乱浪潮开辟了道路。迫使埃尔伯特总统不得不出面恳求数天前离政府拂袖而去的冯·塞克特将军担任全体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乱。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重新纠集刚被解散的“自由兵团”。

“自由兵团”横扫鲁尔区，消灭了红军的据点，残酷地对待未被消灭的红军。甚至枪杀了10名红军的红十字会的姑娘，她们身上带有手枪。她们怎样喊叫、怎样哀求饶命都不行。带枪的就是敌人！”

当希特勒和埃卡特从慕尼黑乘着令他们恶心呕吐的飞机来到柏林时，卡普起义已近尾声。他们从机场直接前往帝国总理府，与卡普的新闻代表、匈牙利犹太人特莱比希·林肯进行了交谈。此人是个冒险家，又有点流氓习气，在纽约他曾被当作德皇的奸细。他告诉他们，卡普刚刚出逃，他们还是不要暴露身份为好，免得被人逮捕。

1920年3月31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这可能是出于自愿，更有可能是陆军新闻局授权这样做的。他打起背包，领取了50马克的退伍费，以及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一件衬衣、若干双袜子和鞋。他在德尔希大街41号向别人转租了一间小房。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靠近易萨尔河。这里大都是三四层楼的建筑物，楼下是商店或办公室，楼上是小单元房或单身房。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长15英尺，宽只有8英尺。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只有一箭之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以后（1923年）成为党的机关报。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部由这家纸反映出来。

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和希特勒首次相见时的印象不甚深刻。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

这一时期，希特勒的恐惧布尔什维克与仇恨犹太人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他把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扩大了党的基础，希望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们。

4. 卐：一种象征

希特勒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却不愧为一个天才的宣传家。

1920年夏天，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看到纳粹党缺少一个能够表达它自己主张打动群众心灵的徽记，一面旗帜，一种象征。希特勒认为群众必须要有一面鲜明的旗帜挥舞着他们前进。

他经多方考虑和试验，想出了这么一面旗帜：红底白圆心，中间嵌进卐字。

卐字可能是从东方文化中的卐字得到的灵感，卐字的历史差不多同人类一样悠久。在特洛伊的废墟中，在古代的埃及、中国、印度都可以见到它。把卐翻过来写作卐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据后来人们考证，这样翻过来写不是希特勒的发明，据说在近代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一些小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同徽中出现过这个图案。德国人在1918年—1919年卡普政变期间开进柏林时曾把它漆在钢盔上，埃尔哈特旅到慕尼黑的时候希特勒正在那里，可能看见过。至于颜色，希特勒对红白黑三种颜色情有独钟。这三种颜色不仅是前帝国国旗的颜色，而且是他曾经为之战斗的德国军旗的颜色。所以他决定采用这些颜色。

希特勒对他的创作表现了极大的兴奋。

“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后来他写《我的奋斗》时，得意洋洋地指出了他创作的意义，他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

这说法是纳粹的党旗。

不久，希特勒又给冲锋队员和党员的制服设计了卐字臂章。

两年后，又设计了纳粹的锦旗，供在群众游行时使用和在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装饰。这种锦旗模仿古代罗马的图样，上面是个黑色的金属卐字，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长方形金属框，刻有纳粹党的缩写字母，挂着有流苏的绳子，整个锦旗就是一个方形的卐字旗。上面写着“觉醒吧，德意志”！

从此，纳粹党有了一个其它任何党所不能比拟的标志，带钩的十字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无依无靠生活元着的人们。他们开始在这个旗帜下聚集起来。

5. “领袖原则”的确立

1921年，由于希特勒惊人的演讲才能和宣传组织才能，党的领导权无可争辩地落到他的手中，虽然他还没有立即取得主席的职务。他旁若无人，独断专行的习惯从这时就形成了。为了保持这种习惯，他还经常使用一些冷酷无情、机智狡猾的手段，让委员会的同伴们尝够了苦头。

夏初，希特勒到了柏林。他准备与北德民族主义分子建立联系，并到他们的大本营国民俱乐部去演讲。这一举动的目的是想掂量一下把他的运动扩大到全德国的可能性。

希特勒在柏林呆了六个星期。

这对那些受够了希特勒的气的委员们来说，简直是一个难逢的机会，他们想推翻希特勒的权威。

委员们的办法是，让纳粹党与南德有同样思想的团体结盟，他们看中了“德国社会党”，这个党是希特勒的死敌和竞争者、一个著名的反犹太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纽伦堡组织的。如果合并成功，希特勒的地位自然就下降了。

希特勒又一次表现了他的精明。他发现自己地位受到威胁就立刻回到慕尼黑。

他准备赶回收拾这帮“愚蠢的疯子”。

他当然不能直接了当地惩治跟自己作对的人，但他可以以退党相威胁。他知道自己对党的重要性，一旦他走了，襁褓中的纳粹党肯定要夭折。7月11日他宣布退党。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希特勒提出苛刻的条件：

他要求让他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如果没有铁一般的坚强领导，党就会失去其原来的性质。

取消委员会，停止同其它团体的勾勾搭搭。

希特勒让委员会在18天内采取行动。德莱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绝妥协。由于当时党内又在散发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形势便更加严重了。这本小册子叫《阿道夫·希特勒一叛徒？》是事实与幻想棍为一谈的捏造，旨在中伤。但是，大部分内容（例如，希特勒称自己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费了大笔金钱，是犹太人花钱雇佣来的之类）都大荒唐可笑。

期限过去了。德莱克斯勒和委员会仍继续拒绝行动。希特勒的讹诈眼看要失败了，但是，在最后一年的秘密会议上，埃卡特劝说德莱克斯勒妥协奏效。德莱克斯勒继而说服了其他执行委员，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们仍可组成一个小组。于是，他们便正式通知希特勒，答应赋予他所要求的独裁权，并用华丽的词藻，请他出任党的主席，以表彰“您之异乎寻常的学识，您为本党之成长作出的不平凡牺牲和光荣的贡献，以及您的不平凡的雄辩口才。”

为让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决定于7月29日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大会由一名叫赫尔曼·埃塞的巴伐利亚人主持。尽管希特勒年轻，埃塞成了元首的心腹顾问之一。埃塞喜欢与女人交往，以此著称，希特勒称他是一条“必须拴链的猎犬”。会上，他将希特勒介绍给听众。接着，希特勒便宣称，为使本党不致蜕变他曾反复进行斗争。“我们并不希望与其他组织联合”，“我们坚持让他们合并进来，这样才能保持领导权。谁不接受，可以走。”在结束讲话时，他一再重申与德莱克斯勒的友谊，并说，他准备就任党的主席。投票结果是“543票赞成，1票反对。”

希特勒及其“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掌握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的绝对权力后，德国工人党的所有传统全被抛进大海，党的精英完全同意，在旧的基础上是无法建立新秩序的。党内不允许再出现议会式的辩论和民主的秩序。他们将属于元首原则。

同时，希特勒用不显示权力的办法，极力抚慰老头子。他于当年夏天在慕尼黑忙着加强党内的支持力量，并悄悄地将原来维持政治大会秩序的那个召之即来且手段凶狠的小组，扩充为一支组织严谨、身穿制服的编外部队。这支编外部队于8月初建立，名曰“体操运动师”。据党的一份公告称，建立该师的日的“是要将青年党员纳入一强大的组织，利用他们作为进攻力量，供党指挥。”两个月后，它获得了一个较能说明问题的名字：“冲锋队”。就希特勒而言，冲锋队不外乎是维持秩序的一种工具。冲锋队队长罗姆却将它看作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的私家军。冲锋队的战歌是：

头戴于字盔，
臂戴黑白红袖章，
希特勒冲锋队，
我们的名字多响亮！

德莱克斯勒由于参与了与他作对的行动，宣布退位，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希特勒从战争中带回的思想，对领导绝对服从的“领袖原则”建立起来，这个原则始而成为纳粹党的党纪，继而成为第三帝国的国法。

6. 纠集在领袖身旁的党徒。

策特勒日后最亲信的干将大多是这一段时期入党的。而鲁道夫·怎斯1920年入党。

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的儿子。14岁以后回国上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与希特勒在一个部队服役，但彼此不认识。战后在慕尼黑大学读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看来他并没有把心思主要用在书本上。人们经常看见他不是散发反犹太人的小册子，就是在斗殴。在1920年的某一个晚上，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讲，对希特勒的口才深为佩服，就决定参加这位偶像的党。他与希特勒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接着他做了领袖的私人秘书。

希特勒看重而且喜欢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当他看到赫斯的一篇题为《领导德国恢复早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时，他毫不掩饰他的赏识。

这篇文章说：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间也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但他本人同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必要时他不会怕流血而退缩……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人民前进……”

赫斯所描绘的领袖，也许不是希特勒当时的肖像，但的确是希特勒所想要实现的肖像。

在赫斯之后，戈林也入党了。

赫尔曼·戈林入党时间是1921年。

与赫斯一样，戈林战后也到慕尼黑大学学经济学，而且用心同样不在书本上。

戈林也当过兵，战斗中表现出色，曾获得德国战时最高功勋奖章。战争结束后回到平民生活他倍感单调和无聊，由于难以适应，后来在瑞典做了一段时间的运输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驶飞机到罗森伯爵家去做客，认识了伯爵的妹妹卡林，她是一个大美人，二人陷入爱河，接着他们结了婚，来到了慕尼黑，依靠夫人的财产过上了奢华的生活，为打发时光，戈林进了大学。

1921年戈林结识了希特勒，很快拜倒在希特勒个人魅力之下，他要求加入纳粹党，为此慷慨解囊，向党捐助了一笔经费。

1922年，戈林被任命为冲锋队队长。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常常被称为纳粹党“思想领袖”，“哲学家”的庸人入党的时间比赫斯、戈林等人稍早。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1918年底来到慕尼黑，1910年底参加了纳粹党。1923年被任命为党的机关报《观察家报》的主编。

这些人后来都对希特勒的“事业”帮了大忙。

前后这一时期凑涌到希特勒周围的还有一批名气不太大的恶棍，例如马克斯·阿曼、乌里希·格拉夫、海因里希·霍夫曼、赫尔曼·埃塞、尤利乌曼·施特莱彻等等。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

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他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希特勒明知道有些人的坏名声，但仍然乐意吸收和使用他们，因为对他有用。

他曾经在公开场合说道：

“我知道埃塞是个无赖，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用处，我就留他一天”。他对他的所有亲信都是这个态度。

7. 天赐良机：德国人吵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德国人先打起来，后来失败的也是德国人。

在战争结束初期，虽然国内各阶级斗争激烈，动乱不已，但德国人民对于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很少考虑。他们似乎忘记了不久前，即 1918 年 3 月 3 日，当时还处在胜利中的德国统帅部曾经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强迫战败的俄国接受一个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耻辱的和约，这个和约剥夺了俄国几乎所有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加起来一般大的领土，32%的居民，1/3 的铁路线，73%的铁矿，89%的煤产量，以及 5000 多个工厂。此外还有 60 亿马克的战争赔款。

1919 年晚春时节，德国人受报应的日子来了。

5 月 7 日，协约国在柏林发表了来经与德国协商而片面制定的凡尔赛和约。对于一个在最后一秒钟还沉溺在幻想中的国家的人民而言，这是一个惊人的打击。

德国人难以承受这一打击。全国纷纷举行群众游行，对和约表示愤怒的抗议，要求政府拒绝签字。

德国政府态度也很强硬，临时政府谢德曼总理高声叫道：

“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

监时总统埃伯特公开声称：

“和约的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

和约让德国人感到愤怒的是它未免“欺人太甚”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

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

归还一块领土给比利时；

归还丹麦在俾斯麦时代被迫割让的土地给它的旧主；

归还夺去的波兰领土；

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其它 800 名战犯交给协约国处置；

担负战争赔偿，具本数目另定，但 1921 年之前必须先付值 50 亿美元的金马克，无现款则以实物如煤、船只、木材、牛羊等支付；

禁止设立军队参谋总部，陆军人数不得超过 10 万名，不得拥有飞机、坦克、潜水艇，舰只不得超过万吨以上；

这些规定对原本的德国自然并没有伤筋动骨。（这比德国对付俄国要仁慈得多），但是，一向骄傲的充满信心的德国人仍然认为它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从人民到政府都坚决反对接受和约。

6 月 16 日，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必须在 24 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他们的条件所必须的步骤。”

这意味着把战争继续下去。

如果拒绝和约，德军能够抵抗协约国不可避免要从西方发动的进攻吗？总统向德军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这个问题。埃伯特说，“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有些成功的可能，我就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

兴登堡元帅对埃伯特作了这样的答复：

“一时战端重起，我们能够重克波兹南省，守住东部边境，但是在西部，很难指望我们能抵抗敌军的强大攻势，因为协约国在人力上占优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两翼包抄我们。”

因此，总的来说，军事行动是否能成功，是颇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

军队表示武装抵抗不会有结果，而且有造成陆军珍贵的军官团的消灭，甚至造成德国本身灭亡的可能。

既然军队领导人承担了责任，国民议会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协约国驻柏林代表克里孟梭时，距协约国最后通牒期限只差 19 分钟。四天以后和约签字完成。

从这时候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德国人吵起来了。

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临时政权）成了众矢之的，虽然最后的决定是由军队作出的，但德国人很快忘记了这一点。

保守派利用他们掌握的经济实权来资助各个政党和政治派别与共和国作对，败坏它的名誉。

共产党也在猛烈地谴责共和国。

军队开始躲避和约的限制，对全国政权保持独立地位，成为国中之国。

只有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的协助下独立地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反对者的痛恨、咒骂、甚至是子弹的袭击。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浪潮兴起了。

希特勒看到了这股浪潮，并开始驾驭这一浪潮。

他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从 1919 年 11 月到 1920 年 11 月，纳粹党共举行四十八次集会，希特出场三十一一次，他充分发挥他的讲演才能，讲了许多题目，诸如—《高利贷者和黑市商人》

《国际交易所资本和靠小额利息为生者》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凡尔赛》

《拆帝国墙脚的家伙和法国佬》

《作为工人领袖的犹太人》

《为什么我们是反犹太主义者》

《德国之崩溃和重新崛起》

希特勒把共和国说成是犹太人的代理人，他越来越热衷于说“犹太人的国际阴谋”。他说，犹太人就是国际交易所资本，他们用金钱操纵英法政府，使之犹太化，来打德国，使德意志民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说犹太人是红色革命的煽动者，11 月革命就是他们干的；他说整个德国都被犹太人统治着，犹太人坐在政府里，搞幕后交易，而德意志用脑和用手的劳动者竟然受犹太人的煽动，这都是耻辱。他说德国人一定要进行斗争，直到把最后一个犹太人赶出德国。

他还仿效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全世界反犹者联合起来！”

8. 准备进军柏林

1921年1月底，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向德国索取2260亿金马克的赔款，这是最终确定的赔款数字。法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最坚决，它想以此使德国变成“经济病夫”，再不能在欧洲逞强争霸。德国国内又一次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

2月6日，慕尼黑的联合祖国会，民团，纳粹党等组织在奥的翁广场集合抗议，大会主持人未让希特勒演讲，盛怒之下希特勒决定次日晚在王冠马戏场由纳粹党单独召开大会。这个区

区小党出人意料地吸引了六千五百多人参加集会，希特勒作了一个轰动性的讲演《未来还是沉沦》，被报纸头版报道，巴伐利亚邦政府总理冯·卡尔接见了各党领袖时也邀请了希特勒，表明政府对纳粹党的承认。

正当纳粹党和希特勒锋芒初露之时，时局的发展又帮了大忙。

由于协约国对德国的经济扼杀，德国马克1921年开始贬值，跌到与美元比价75：1，次年又继续跌至400：1，1923年初为7000：1，7月1日更猛跌至160000：1，11月至40000000000：1，马克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薪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生的积蓄荡然无存，人民对社会经济失去信心。

德国人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

希特勒认为美好的时辰来到了，纳粹党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带领人民向共和国开战。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极力向人民鼓噪，“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一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一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国家本来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然而就在希特勒越来越相信1923年的混乱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不可再来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的时候，他发现他和党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纳粹党虽然人数日增，但还远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党，在巴伐利亚以外，它更是默默无闻。这么一个小党怎么能够推翻共和国呢？

希特勒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想起了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墨索里尼轻易的胜利触发了他的灵机，他也可以这样做。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的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一直倾向于保守的巴伐利亚邦政府、武装团体和驻军的支援之下，由他指挥人民进行一次向柏林的进军。

他的计划很快开始实施。

1923年2月间，经过罗姆的努力，巴伐利亚有四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组成了一个“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

9月2日，巴伐利亚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以庆祝1870年在色当战败法国五十三周年，南德大部分民族主义团体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得到全场起立欢呼。会后纳粹党联合其它团体成立另一个强有力的联合组织“德国人战斗联盟”，这个联盟公开声明自己的宗旨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这次集会在检阅示威群众游行时，希特勒在检阅台上站在了战时英雄鲁登道夫将军的旁边，他开始在内心里琢磨日后要利用这位将军。

这时，共和国中央政府与巴伐利亚邦之间已经发生了危机。9月下旬中央政府宣布结束鲁尔对法国人的消极抵抗，恢复支付赔款，使危机达到顶点。

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前一年（1922年）秋天，德国政府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遭法国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法国政府命令军队占领了鲁尔。德政府指示鲁尔居民进行消极抵抗。

鲁尔放弃抵抗和恢复赔款的决定引起了极右民族主义分子和极左的共产党人的严厉谴责，为了避免反叛，保住共和国——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保住这个危难中的民族，总统宣布了紧急状态。根据紧急状态法，德国的实际权力由国防部长和陆军司令行使。冯·西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成了全国的实际独裁者。

但巴伐利亚不准备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巴伐利亚内阁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长官。卡尔和驻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洛索夫将军及邦警察局长赛塞尔上校成为巴伐利亚邦三巨头，拒绝执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

中央政府要求取缔纳粹党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因为它恶毒攻击共和国；又命令逮捕巴伐利亚一些武装团体的首脑，因为他们胡作非为，臭名远扬。卡尔对此都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这是对共和国的公然挑战，对中央政府的藐视。

西克特将军不能容忍这种反叛，他向巴伐利亚三巨头，向希特勒和武装团体发出了明白的警告：他们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将要受到武力的对付。

警告对三巨头或许产生一定效果，但对希特勒这位纳粹领袖来说，已经太晚了。他的激进的党徒都要求开始行动，希特勒本人也认识到如果中央政府赢得了时间，恢复了国内的平静，自己的机会也将丧失，因此他要求三巨头赶在柏林方面动手之前就向柏林进军。

“时候到了！”希特勒耐心地而又急切地对他们说。

9. 啤酒馆政变

三巨头果然被西克特警告吓住了。他们不打算为了作出无益一的姿态而自毁前途。他们告诉战斗联盟，不能采取轻率行动。但同时，他们也不反对进军柏林的必要性，只是表示要希特勒自己拿主意。

希特勒清楚，如果要单独举行政变，还没有足够的后盾，他必须得到巴伐利亚邦政府、军队和警察的支持，才能开始自己的行动。

他决定劫持三巨头，强迫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力。

正当希特勒一连策划两个劫持计划都告失败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应慕尼黑企业团体之请，卡尔等人将在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讲话。日期是11月8日晚上。

这是一个把三巨头一网打尽，用枪口逼迫他们同纳粹党一起进行“革命”的好机会，希特勒决定带着党的冲锋队立即开始行动。

1923年11月8日晚上8时45分，卡尔对三千名市民刚刚讲了半小时的话，冲锋队包围了啤酒馆。希特勒排开人群走进了大厅，他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跳上一张桌子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这时机关枪已经在会场门口架好了。正在主席台上的卡尔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希特勒把他赶下了台，自己对听众们叫喊开了。

“安静，安静！”希特勒嚷道，“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个地方已经由600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不许离开大厅。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我们对大家没有恶意，你们喝你们的啤酒吧”。

接着他用枪口命令卡尔、洛索夫、赛塞尔跟他到后台一间私室里去，三巨头服从了。

希特勒在那里胁迫他们组织“新政府”。

在小房间里，希特勒向三巨头发表宏论。他说你们三个人必须宣布革命，参加新政府；必须接受革命需要你们担任的职务，否则谁就别想活。他派给卡尔的职位是巴伐利亚执政者，洛索夫当国防军部长，赛塞尔当国家警察局长。可是三个人根本不答理他。

高官显爵和枪口都没有能使三巨头答应跟他走，这出乎他的意料。

希特勒气愤之余，忽然心血来潮，他一言未发就冲到外面大厅里去，走上讲台，对着吵吵嚷嚷的人们宣布，三巨头已经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政府，“由我接替全国政府的政策指导工作，鲁登道夫将军将担任国防军的领导工作，”全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对罪恶的渊藪柏林的进军以拯救德国人民。”不明真相的人群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开始激动的欢呼，欢呼声甚至打动了仍旧被关在隔壁小间的三个人。

这时，鲁登道夫将军，那个曾让希特勒在他身边检阅过游行队伍的战时英雄，被希特勒的手下接到了这里。将军对发生的事情事先一无所知，他发现自己被希特勒利用了，很生气。但仍然还是接受了希特勒要他用自己的声望去说服三巨头合作的恳求，结果三巨头终于屈从了这个“重大的民族的事业。”

希特勒最后宣布：

“这现在要履行我五年前在军事医院里一时成了瞎子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德国！”

10. 希望终成泡影

希特勒圆满地宣告散会。

但巴伐利亚政府要员被冲锋队扣留，希特勒自己监视着三巨头。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高地联盟的打手们与正规军工兵营房发生了冲突，希特勒不得不亲自前往解决争端。他把啤酒馆的事交由鲁登道夫将军处理。

鲁登道夫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让三巨头一个个设法溜掉了。

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回到这里时，发现鸟儿已飞出了笼子，他满以为部长们已经拟出了进军计划，而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做。除了罗姆带领“德国战旗”冲锋队占领了陆军部一个办公处以外，任何战略要地都没有占领。

政变的消息从电报局传到柏林，西克特将军命令巴伐利亚军队实行镇压。

形势顿时发生了转变。

洛索夫一溜回部队就发出了命令要郊外的驻军驻军赶到城里来增援，清晨时分罗姆占据的陆军部被包围。

赛塞尔下令警察局逮捕效忠于希特勒的前慕尼黑警察局长波纳和他带去的一批冲锋队员。

卡尔指示在慕尼黑到处张贴告示，宣布他们三人“在枪口威胁之下被迫发表的声明一概无效”，“勒令解散”纳粹党和高地联盟、德国战旗两个武装团体。然后为安全起见把政府迁到了累根斯堡。

希特勒看来垂手可得的胜利，入夜以后迅速成为泡影。他一直希望军队，警察和执政政治集团支持自己的革命，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

9日上午接近11点钟，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三千人的冲锋队员，从啤酒馆向市中心前进，试图占领市中心。同他们并肩走在前面的是纳粹党的几个骨干和战斗联盟的领袖。一幅字旗和高地联盟的旗帜在队伍前面随风招展。后面跟着一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冲锋队员肩上都挂着马枪，有的还上了刺刀。

途中与荷枪实弹的警察发生了战斗，战斗短暂到只有六十秒钟就结束了，十六名纳粹党人和三名警察毙命。戈林等人受了重伤，游行队伍先是卧倒躲避子弹，接着在希特勒带头下，纷纷溃逃。只有鲁登道夫例外，他以一个军人的传统继续前进，被当场逮捕。

几天内，所有的反叛领袖都被捕入狱，纳粹党的政变以失败收场。

第五章 铁窗生涯

1 · 被捕

特勒痛苦地挣扎起来，托住受伤的左臂。他忍着伤痛，缓缓地离开了战场。他脸色惨白，头发散落在脸上。陪同他的是慕尼黑冲锋队医生瓦尔特·舒尔兹，一个高个青年。在人行道上，他们碰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大量流血。希特勒想把他背走。舒尔兹连忙将他妻子的表兄弟叫来，让他将孩子肯定。在梅克斯·约瑟夫广场，他们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旧车，车内装满了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个年长的急救人员林兰克尔与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希特勒与医生则坐在后排。舒斯特抱着受伤的孩子站在踏板上。他让司机将车子开至贝格勃劳酒馆，因为他要看看那里的情形如何。在马利安广场，他们碰到了密集机枪火力网，只好多次改变方向。路德维希大桥也被封锁，他们只好返回。此时，孩子已苏醒过来，舒斯特连忙下车，以便送孩子回家。车子继续朝森德林格托尔广场开去。在这里，他们又在南方公墓附近遭枪击。由于无法前去啤酒馆，他们只好南行，朝萨尔茨堡奔去。

希特勒从未想到到乌夫因乡间别墅藏身，但由于所发生的不幸之事，使他被迫这样做了。在离慕尼黑 10 英里左右的地方，希特勒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突然说，他的左臂肯定中了弹。“发烧吗？”舒尔兹大夫问，“不发烧。或许里边有颗子弹，要不就是什么被打断了。”他们在林子里停住了车子。舒尔兹发现，他的左膀严重脱臼，可又无法将它复位，因为无帮手，且又是在车内。他用一块手中将希特勒受伤之手固定在身上，并建议逃往奥地利。希特勒否决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继续南行。快到慕尔瑙时，希特勒说，汉夫施坦格尔在乌夫因的别墅就在数公里外。他令司机将“塞尔夫”藏好，与医生、急救员一同步行前往乌夫因。

他们于下午 4 时许来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别墅。这是个用石块砌成的小建筑，离该村的教堂不远。赫仑纳将三个筋疲力尽的来客领至楼上的客厅。这时，希特勒开始痛惜鲁登道夫和他的忠实的格拉夫之死，他曾目击两人倒地。他越来越激动。他说，正因为鲁登道夫可靠，他才付出了自己的性命；正因为格拉夫之忠诚，他希特勒才失去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副官，接着，他便谴责三政治巨头的出卖行为，发誓说，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要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舒尔兹医生和急救员扶他进了楼上的一间卧室，试图帮他脱臼的膀子复位。因为膀子肿得厉害，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再次复位时，希特勒脸呈痛苦神色，这次成功了。接着，急救员将他的胳膊和肩膀绑上了纱布。透过房门，赫仑纳听见希特勒在呻吟。

在乌夫因，那是个焦急的不眠之夜。而为了减轻痛苦将主人的英国式的旅行毯紧紧地裹在身上的希特勒无法成眠。翌晨。时间似乎永无止境似的，快到中午时，舒尔兹医生将沙尔勃鲁赫的助手带来了。他们一起检查了希特的肩膀，发现情况良好，便只更换了绷带。希特勒指示舒尔兹转告德莱克斯勒，在他不在的期间，由他代表他。他还让舒尔兹将此事转告赫斯等人和鲁登道夫，如果他仍在世的话。

10 月 11 日，星期天。希特勒直到吃午饭时才出现。只披了一件汉夫施坦格尔的深蓝色的提花浴中。他那蜡黄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笑。下午，希特勒更是坐立不安，在客厅内不断来回踱步。贝希斯坦的车子是否能来？他越发心烦意乱了。为什么还不来？用不了几小时，甚至在几分钟内，警察就可能跟踪至乌夫因的。黄昏，他让赫仑纳将百叶窗放下，并将窗帘拉上。之后，

他又在房内来回踱步。5 时一过，电话铃响了，是赫仑纳的婆婆打来的，她就住在邻近的别墅里。正当汉夫施在电话中说警察在搜查她的房子，某位官员突然客气地阻止她说话。

她缓缓地上楼。希特勒身上依旧披着那件过大的浴衣，站在走廊里，期望着好消息。她小声告诉他，警察很快就要来了。霎时间，他惊慌失措，失声喊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再继续下去也徒劳！’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支手枪。

“你到哪里去？”赫仑纳说。她抓住他的手，没怎么费力气便把手枪夺了过来。“你怎么能一受挫折就灰心丧气？”她训斥他。“想想跟你的人们吧，他们相信你，信任你。现在，你若将他们抛弃，他们会丧失对你的一切信任。”她镇静自若他说，“你怎么能离开相信你的救国思想的人们而自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将头埋在手里。

她对他说，他入狱后，党应如何活动？你该把指示写出来，交给最亲密的同事。他只需在若干空白纸上签字，内容由她以后再——填写，然后由她转交给他的律师。希特勒感谢她提醒他的责任，口述了指示内容。首先，他要求阿曼把商业来往事务以及党内的财务搞好；罗森堡要“照顾好”党报。汉夫施坦格尔要通过国外的关系协助办好《人民观察家报》。埃塞和其他领导人则继续搞政治。希特勒签署了这些指示后，赫仑纳便将文件藏进面粉箱里。

片刻后，车声响了。接着便传来简短的喝令声和警犬的吠叫声。敲门声响了。来人是个年轻的警察中尉和另外两名警官。中尉客气地作了自我介绍，抱歉地问是否能搜查她的屋子。赫仑纳领警官上了楼，把客房门打开。希特勒身披睡衣和浴巾，一动不动站在室内。希特勒突如其来的出现，使警官们吓了一跳，竟不敢靠近他。希特勒不但完全恢复了平静，且放声谴责政府及其官员。他口若悬河，声色俱厉。刚才还萎靡不振的希特勒，此时已完全恢复常态。他突然停住了口，叫中尉勿再浪费时间。他与中尉握了握手，说他准备与他一起上路。

那天天气很冷，他却没有大衣。他拒绝了穿上汉夫施坦格尔的大衣再走的建议，只在蓝色的浴巾外加了他那件军衣。中尉允许他在军衣上别上“铁十字勋章”。

他于晚 9 时便被送进慕尼黑以西约 40 英里的兰茨贝格监狱。天下起了滂沱大雨，并刮来阵阵大风；风雨交加，令车身晃动。一路上，道路弯弯曲曲，杳无人影。希特勒情绪低落，愁眉苦脸。

在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业已准备采取措施，以防起义分子前来劫狱。他被关的堡垒区的 7 号牢房。这是唯一有“客厅”的牢房，“客厅”仅能容下一个哨兵。

人们一般认为，希特勒再不能被认为是一股政治力量。他的骰子已经甩了出去，输得精光了。然而，在慕尼黑，一道藐视当局的命令正在发给纳粹：“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它已按原设想净化了‘空气’。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为德国淌了血。通过希特勒的鲜血和卖国贼反对我慕尼黑诸同志的钢铁，我爱国之‘战斗同盟’，不管前途是凶是吉，业已团结起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来，他经历了两次重大危难：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

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在蒙受最后的一次危难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猎误的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

2. 绝食

茨贝格这个小镇龟缩在莱希河谷，两边是丛林密布而陡峭的山岗，兰茨贝格监狱就座落在前面的山头上。这是一座由许多灰白色的建筑物组成的监狱，四周有又高又大的石墙围绕。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关押普通罪犯，另一部分则用来囚禁政治犯。

在政治犯区，7号牢房的犯人拒绝进食。在牢房内，希特勒卷曲着身子，一言不发。这倒不是因为房子小或不舒适。牢房内的白色铁床，虽然窄，却也够舒服的；而那扇加了双重防护的窗户给室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还可看到树木和灌木林等景致。

希特勒左臂疼痛难忍，令他难于成眠。狱医布里斯坦纳发现，“他左膀脱臼，上臂骨折，引起外伤神经痛。”他可能“终主左肩局部僵硬和疼痛。”

然而，令他精神萎靡的却不单纯是疼痛，也不单纯是向柏林进军已在灾难中结束。统帅府前的溃败又被报界嘲笑为“渺小的酒吧间革命”。外国记者把描述成“鲁登道夫的吵吵闹闹的小副官”，是皇家政变的爪牙。《纽约时报》描述“慕尼黑起义肯定消灭了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倘若饥饿和皮肉之苦，尚可忍受，嘲笑却深深地伤害希特勒。

他的外表使前来探监的人震惊。他既消瘦又面无血色，几乎认不出来，他坐在铁窗前纹丝不动，像冻僵了似的，两周来，希特勒几乎粒米未进。狱医警告德莱克斯勒说，如他继续绝食，就会死亡。德莱克斯勒决心拯救这位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他向希特勒说：“不管环境看来何等恶劣，你没有权利认为业已失败而放弃一切。全党都在看着你要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如果没有你一起前进，我们毋宁死。”德莱克斯勒整整谈了1小时又45分钟，直到相信他已“使他回心转意。”

希特勒的故态复萌，因为几个人声称是他把希特勒从饥饿中解救出来了。其中一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汉斯·尼尔希。当尼尔希前去探望骨瘦如柴、精神不振的希特勒时，尼尔希责备他不该抛弃业已赢得如此众多追随者的事业。没有他，事业便可能从此失败，党也可能解体。起初，希特勒不住地摇头，后来，他胆怯地问“谁还会再跟随一个遭此惨败的人呢？”尼尔希回答说，起义在事实上已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希特勒自己不能失去自我信任，大多数伟大的领袖都是通过失败才取得成功的。尼尔希一席话说服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从了狱医的劝告，吃了一碗饭。他吃得很香，他记住尼尔希的忠告。

拯救希特勒的可能是尼尔希，可能是德莱克斯勒，也可能是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赫仑纳曾写信给希特勒道，她在乌夫因阻止他自杀，并不是要让他兰茨贝格狱中将自己饿死，这正是他的宿敌求之不得的事情。不管是何种情况，在希特勒同意进食之前，他已不准备绝食至死。

阿道夫·希特勒复活的新闻，由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于次月初证实。她于12月初一个天色阴沉、大雾弥漫的晚上前去探监。她原以为他会意志消沉的。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的精神又跟先前一样高涨，身体也很好。他的胳膊虽然还给他找麻烦，但是已复原了。

希特勒的政党，虽依法被解散，却仍在暗中活动，活动的中心在慕尼黑。为了继续进行纳粹活动，罗森堡在慕尼黑建立了委员会，但其进程却因私人争吵和思想分歧而受阻。

在慕尼黑，人们仍相当器重希特勒。那年圣诞节，参加了运动的一群施

霍宾的画家，在布鲁特咖啡馆放映了活动画《阿道夫·希特勒在狱中》，以庆祝节日。帷幕拉开：那是一间牢房，小铁窗外飘着雪花，书桌前坐着希特勒，低着头，双手捂着脸，伴以男声合唱《沉静的夜晚，神圣的夜晚》。接着，一个天使将一株五光十色的圣诞树放在桌上。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了脸孔。许多人认为那真是希特勒本人，整个人厅都在抽泣。灯光亮后，放幻灯的人注意到，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湿润。

狱医证明，在体力上希特勒是能承受审判的，在1月8日呈报给典狱长的特别报告中，布林斯坦纳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他的病人没有精神紊乱或精神病的症状。这位似乎曾受过精神病治疗训练的医生的结论是，“希特勒任何时候均能自控，其意志及思维能力并未受其疾病之损害、即使他声称起义的目标是有不足之处的。”

在兰茨贝格的囚禁中，他重新检讨其过去。在安静的小牢房里，他终于认识了过去的一些错误。他计划将起义变成向柏林进军的开端，并效法墨索里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政权。从起义的失败中，他吸取教训。为民族振兴，每个国家必须采取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他使自己相信，是惨痛失败拯救了他。“这次起义的溃败是我们国社党人最大的幸运”，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与鲁登道夫合作，这本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党未作好准备，在全德迅速夺取政权必然会导致最大的困境；统帅府前14位同志的“流血牺牲”，是最有效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

在过去时间里，他几乎通读了所能读到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他教育的地方，使人知识化的地方。他说，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

3. 审判庭上的宣传战

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不到 10 个星期，希特勒便从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他深信自己将成为德国的领袖，长时间地在考虑国家的经济问题，甚至想出了一条让许多失业工人就业妙计。建立公路网，使全国紧密地联成一体。大规模生产小型经济汽车，让小人物也有能力购买。2 月，当他和同伴们一起被押出牢门转至慕尼黑拘留所时，在精神上作好了受审的准备。审判将于 4 天后开始，它将决定希特勒之未来。

那时，曾预言此次起义必将失败的埃伯汀太太，刚好也在慕尼黑写一篇占星文章，他为希特勒作了新的预言：他的失败不会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将成一只凤凰而飞起。

2 月 26 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至少在全德国都在注视慕尼黑，因为对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另外 8 名被告所指控的叛变罪行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命运的范围。

希特勒穿着最好的衣裳，胸佩铁十字勋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红砖结构的旧建筑物，被遗弃的步兵学校的大礼堂里。希特勒准备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决心迎接战斗。

在审判中，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鲁登道夫。然而，很明显，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众目所视的中心人物。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从开口辩护时起，很明显，他的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如同在狱中，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迫使他发动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为出逃，以及他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但矢口否认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在主持审判的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尼哈特法官是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这次审判。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 2 月 28 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

他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

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

尽管官方和非官方的抗议不少，审判继续成为希特勒的讲坛。在 3 月 11 日和 14 日两天的判决前审判中，希特勒大显身手。与英国的制度不同，在这种时刻，法律规定可让被告发表长篇讲话并自由向证人提问。于是，希特勒便把政治三巨头当作罪人对待。当冯·洛索夫将军就位时，希特勒跳了起来，

高声向他发问。身材高大、光头的将军也不示弱，大声反驳，还用细长的食指，活像一支手枪，指着前下士希特勒。希特勒只好坐下，不吱声。片刻后，他又起立，指责曾保证加盟于他的三位先生。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只能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不得不叫他放低声音。他果然放低了音量，但是，当洛索夫说他一半感情用事，一半是残暴时，他又按捺不住了，他从椅子上跳出来。“你的金言跑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感情用事的和残暴的希特勒吗？”

洛索夫双眼盯着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不，坏了良心的是希特勒。”此话一出，又招来了一阵辱骂，洛索夫只好转向首席法官。由于法官未斥责希特勒，这位将军便起身鞠了躬，离开了法庭。只在此时，尼哈特法官才迟迟宣布，希特勒此举是人身攻击，是不容许的。“本人接受这一指责”，希特勒讽刺说。

狂欢气氛一直持续到审判结束，希特勒的滔滔雄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也达到了高峰。他的最后一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但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因为，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是有最后发言权的。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一名政治鼓手和其动机仅出自野心之说断然否认。说他想当部长的指控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相对比是何等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是个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是没有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

他对法庭说，11月起义虽然败北，他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支持起义者理想的人们是注定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卐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肯定会到来的。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当我得悉是市警首先开火时，我未受玷污。军队，不管是官是兵，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的。”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迅速地与之俱增。即使在此时此刻，本人仍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作出判决。”

在唇枪舌战中，希特勒取胜了。希特勒是个机灵而投机的人，在审判讲坛上使自己名传德国，乃至全世界。法庭休庭考虑判决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被判无罪。尼哈特法官，不顾所作的证词，坚持要开释鲁登道夫。其余3名外行法官，包括一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不断以阴郁的目光偷看希特勒的法官在内，也一致同意开释主要被告。“以我的辩护词为依据”，在审判过去很久后希特勒评论说，“他们深信，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与我一样有罪。人们将反对意见通知他们，如若开释，案子有可能被转至莱比锡法庭的危险。这就使陪审团不得不深思。他们的结论是，判我有罪比较保险，尤其是他们也得到保证，在判决后6个月内将我赦免。”

4月1日，助理检察埃哈德赶来参加宣判时，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他们

的偶像佩花的妇女。他下令将花除掉。其他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上午 10 时过后，被告一伙被带到大楼前集体拍照。全身军服、头戴钢盔的鲁登道夫怒容满面。希特勒穿的军大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看上去像是新的。他的胡须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下垂，看上去，他很镇静，充满信心。

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被判 5 年徒刑在兰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 4 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对希特勒的 3 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他说‘不行’，或者，在 11 月 8 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 7 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写道：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1924 年 4 月 1 日于

兰茨贝格

4. 出牢笼

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但是，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

每天清晨 6 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吃饭。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8 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 20 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口的政治理论问题。

上午 10 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

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

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希特勒，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在公共室内进午餐。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看书看信，或写日记。

下午 4 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4 时 45 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6 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

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

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尔，支持民间集团参加巴代利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而且还列入了 32 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 4 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 19.19 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代利亚人民党”。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得了 200 万张选票。34 名候选人中，有 32 位（包括斯特拉塞尔、罗姆、弗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这次成功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即是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正在在全国发展。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一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

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卢德克决心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对党内的争吵，希特勒似乎一点儿也不垂头丧气，他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党的裂痕继续扩大，几星期后，斯特拉塞尔与鲁登道夫一起，建议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奠基，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党，国社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也迫使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7月7日，《人民使者》宣布，希特勒“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在服刑期间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请求他的追随者勿前来探视，因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于著作。”

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这个主意一直缠绕着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来个休假，以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用两个指头将手稿打出来。

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顶楼的一位新来的鲁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搏后，赫斯听从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劝告，自首了。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还帮他打字。

起初，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叫《四年半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包括了对希特勒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的叙述。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不仅使他能讲述三个他最拿手的题目，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且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梅毒的毒害、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墨，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他说：“在我坐牢期间，我有时间去为我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基础。”

希特勒争取狱卒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他已将狱中大部分工作人员争取到国家社会主义方面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犯人们竟发行打印的地下报纸。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文章一般均由希特勒撰写，他也常为它画讽刺漫画。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写过信。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1923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们，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决不是懦夫。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歧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

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早日能宣布获释。9月18日，典狱长雷波尔德给巴代利亚司法部打了一份极有利于希特勒的报告，获释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该报告称服刑数月来，希特勒“严守纪律和秩序”，“历来合作，谦虚

谨慎，对人彬彬有礼。”在报告末尾，雷波尔德预言，释放后，希特勒不会再从事暴力或非法活动。“毫无疑问，在监禁期间，与先前相比，他变得更加沉静，更加成熟，便更深恩熟虑。他并未考虑反对现行政府的行动。”

开始，雷波尔德的强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于初秋获释。但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于9月22日密报内务部，提出于10月1日释放希特勒，为安全故，他应被押解出境。他一旦获释，暴乱必然会由他而生，因为他有能量。刑法一处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以宣誓出狱。但是，司法部长提出申诉，理由是，犯人肆无忌惮地违反了来访条例。这一申诉得以维持，出狱宣誓遂遭否决。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与从前一样，他很快便克服了沮丧情绪，重新致力于著书的工作。一直到深夜，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声，和向赫斯口述的声音。

11月已悄悄过去了，元首也仍在狱中。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下令立即将他释放。消息是雷波尔德典狱长亲口告诉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狱中服刑年后，希特勒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将身上所有的钱（282马克）给了他们。他离开兰茨贝格时，大家都哭了。

那天，天色阴沉。希特勒简短地问候了前来接他回家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摄影师霍夫曼。然后，他轻松地踏上了那辆旅行车，在乘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旷神怡。

车至帕辛，遇上了一群开摩托车前来的纳粹，于是，他们便护送希特勒进城。一群忠实的党员已在他住处外边迎候。在楼梯口，希特勒差点儿被他的兴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内放满了鲜花和桂花圈。邻居早就给他送来了一桌子食品和饮料，还有一瓶葡萄酒。他并不悔恨在兰茨贝格度过的岁月，他认为牢房生涯对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入狱时，对许多问题他只有本能的认识，刑期加深了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希特勒离开监狱时，边境锤炼了他，对自己的偏见也更加坚定。党内的争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显受挫，并未使他脸红或难堪。返回慕尼黑后，他决心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以往的错误。先前，他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为别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劳。此后，他要做名副其实的元首，朝着长远的目标，用自己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纲领。

5. 重振旗鼓

某种意义上，纳粹党的基础比先前更加雄厚了。党内的两派虽然裂痕甚大，互相厮杀，但希特勒有信心设法诱使他们超越分歧而忠实于他。在宁静而孤独的牢房中思考出来的东面，在获得自由后的当晚，他不知怎么办才好。希特勒毕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只有时间才能恢复他与现实的联系。于是，他便决定沉寂几星期然后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务。

为了重新取得一个公民的沉静，他所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于圣诞之夜访问汉夫施坦格尔夫妇。

在他离开前，他与赫仑纳单独在琴室呆了片刻。她坐在长沙发上。突然间，他又膝跪在地上，一头埋在她的怀里。“要是有人照顾我就好了”他说。

“喏，这样不行”，赫仑纳说。她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我永远不结婚，因为我已奉献给了国家。”他的行动真像个小孩子。

霍夫曼邀请希特勒到他家欢度除夕之夜。人们焦急地等待他前来，尤其是女宾们，因她们谁也没见过他。果然不失所望。他穿着长礼服，非常潇洒，他的头发尚未下垂前额，头发虽然不浓，却更加深了他的魅力。

一位漂亮姑娘将希特勒引到槲寄生树下，吻了他（按英国风俗，槲寄生树被用作圣诞的装饰品，圣诞节那天，凡走过槲寄生树下的女人，谁都可与她接吻）希特勒脸上露出惊慌和恐怖的神色！这位妖艳的姑娘也感到自己过于不慎，周身不舒服，一声也不敢吭了。他目瞪口呆，像孩子一样，一筹莫展，咬着嘴唇，强忍怒气。霍夫曼试图一笑了之：“希特勒先生，你会与女士们交好运的！”此语并未使希特勒高兴。

希特勒自从兰茨贝格出狱以来，他就生活在半孤独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适应。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的范围内，拒绝透露自己的新打算。

1925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这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1925年1月4日作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10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篇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

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在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党的会议。大厅年已挤满了4000名听众，而门外还有1000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3名要员未来。“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很自尊，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酒面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得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

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人们，在卐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呼吁。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他说：“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他的演说感染了听众。“万岁！”的喊声顿时在大厅爆发。归人们在哭泣，人们从后厅往前拥去，有的从桌椅上爬去。曾经是势不两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样，拥上讲台互相握手，不少人热泪盈眶。他将变成公开的元首。他不但统一了纳粹党，而且还建立了党的领导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希特勒重振旗鼓后的翌日，德国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的去世引起的全国大选中，78岁高龄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被选为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很明显，这位右派英雄并不同情共和，在试图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未大力加强共和势力。内阁危机依旧丛生。

国内政治的变化以似乎不可避免地将为希特勒的权力膨胀提供新的动力。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作广泛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

数天后，希特勒又写一封信，解决驱逐他回奥地利的问题。他单刀直入，要求林茨当局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3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脱了被驱除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尚不是德国公民，因而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

比较迫切的问题倒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当元首尚在狱中时，他纠合了冲锋队的残余势力，重新搞了个组织，叫“冲锋会”。罗姆相信，如果将“冲锋会”置于党的管辖之下，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将失去。于是，他便于4月16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有3万名成员的“冲锋会”可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置于罗姆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请求的同时，他还提到过去的友谊，并立誓忠于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个他无法控制的组织，这是多大的灾难。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变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冲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递交了辞去“冲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罗姆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沉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冲锋会”，而他自己则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满活力的冲锋队。

6. 东山再起

年春天，希特勒个人的梦想至少有两个已得到实现。首先，他好歹算是搞到一辆红色的新“麦塞蒂斯”汽车，他乘坐着它，与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亚乡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其次，他在山村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个辅助总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养神和寻找精神刺激。简朴的生活令他迷恋，他常穿起皮裤外出散步。

在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姐妹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不同意，说希特勒比她16岁的妹妹大20岁。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们去参加党的会议。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拒绝了。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两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说，‘我要把你压扁’，他欲火上升。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侣。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以便同居。

7月18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尔出版在慕尼黑问世。根据阿曼的建议，书名被改成《我的奋斗》，即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销路是好的，至1925年底，已售出10万册。

希特勒肯定明白，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德国北部全权组织纳粹党是危险的。他越是成功，便越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对手。斯特拉塞尔虽然反犹，却不反动，他是国社党左派的典型，这就使他他在重新组织革命力量方面的作用特别突出，9月初，反南方的斗争在哈根举行的党的会议上公开化了。会议是由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召开的，其目的在于南北联合以反财慕尼黑的官僚政府。会议参加者天真地希望，他们能把元首从反动的巴便利亚顾问手中挖出来领导德国，使德国永远成为革命的人民国家。

不管是何种情况，2月14日，星期无，希特勒将党的领导人全部召至班贝格。坐在这次秘密会议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颇有不安之感。在数量上，南方代表占绝对优势，而希特勒一踏上讲台，就主宰了大会的进程。他前来班贝格时，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他明白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领导权已受到威胁。所以，他一开始便开诚布公地说明，他是元首，是运动的核心。在纳粹党内不允许存在议会式辩论，不再搞什么民主程序。他不允许有分裂派别存在。每个地方长官，每个党员都必须保证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击斯特拉塞尔或戈培尔。他来班贝格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北方干部，而是将他们引上正轨。他用左派的语言圆滑地攻击了左派，然后为矛盾的双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作为折中。他让党跳出政治圈子，将它纳入迷信领袖的神话。

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人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希特勒坚信，班贝格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

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3月初，斯特拉塞尔投降了，他致函他的追随着，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希特勒演讲学会了使用体姿。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

1926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5月22日贝格勃劳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25点是不可修改的。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7月份，在魏玛举行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希特勒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7月4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3500名冲锋队员。

尽管怨声未绝，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4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也是够威武雄壮了。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希特勒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再振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的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他想启用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夏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希斯特拉塞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希斯特拉塞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希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在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希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5万。党的工作机关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3辆汽车和25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希特勒还把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第一部负责对付政府，第二部负责各项政策，两部分下设许多工作部门，如外交、工会、新闻、农业、司法、内政、劳工等局。此外还单独设立了宣传部。

党的最重要的肢体是冲锋队，在魏玛代表大会期间又新建了8个支队，借以证明冲锋队是纳粹党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此同时，在元首的直接指挥下，地方和区域的冲锋队进行了协调。为了适应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选了“天生的组织家”和严于律己者弗朗兹·普弗费尔·冯·苏罗门负责主持这一合法的非军事性组织的工作。希特勒写信给普弗费尔说：“不应该将它隐藏起来，而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个秘密组织的种种神话……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未

来的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希特勒是党和冲锋队的最高领袖。

1926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这本书在德国风靡，在日耳曼人身上产生魔力。他们发疯发狂、东征四杀。《我的奋斗》是德国人的信条，纳粹人的圣经。希特勒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和行动纲领。

希特勒的思想是他在维也纳和世界大战时期形成。充满了德国民族主义的狂热，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和犹太人的刻骨仇恨，确信上帝选择了日耳曼人做主宰种族。

7. 《我的奋斗》

特勒写的《我的奋斗》开始出版。第一卷是1924年在监牢里写的。1926年完成第二卷。1933年销售100万册，1940年销售600万册。这本书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的奋斗》力图表达这样一种精神：不仅要使战败的混乱不堪的德国在太阳底下占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个新式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以人种为基础，要包括所有在当时住于境外的日耳曼人，在这个国家里元首有着绝对的独裁权力。

所以他首先谈到的是未来德国如何称霸世界的问题。他说必须同“德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法国算帐，要“对法国来一次最后的总算帐……一场最后的决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结束我们自己同法国的永无休止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结果的斗争；当然首先假定，德国实际上不过是把灭亡法国当作一种手段而已，某目的是在将革命能够为我国人民在其它地方进行扩张。”

其它地方主要是指哪里呢？他直言不讳：德国必须在东方进行扩张——主要牺牲俄国。“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所走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希特勒对资产阶级一直要求恢复1914年德国疆界感到可笑，因为当时的疆界并没有把所有日耳曼人居住地区都包括在内，所以它尽管比现在的版图要大些，仍然很不合理。“必须恢复东进”，他说，“我们纳粹党人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终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要把我们的目光向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来谈论欧洲的土地，我们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国和它的附属国”。

他很高兴俄国现在由布尔什维主义统治。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掌握这个国家，向它进攻完全符合纳粹党的反犹太精神。“这个东方大帝国崩溃在即，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的结束，也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

接着，希特勒谈到了为什么党要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他再一次表达了1992年曾表达过的意思，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有了解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含义是德国至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希特勒对未来的纳粹国家体制表明了态度，他说新帝国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贯穿第三帝国的统治原则是领袖原则，元首实行绝对独裁，元首身边的那些人是一批承上启下的较为次要的领袖。政治权力至关重要，没有必要去过多地关注经济问题，“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这一点，在慕尼黑讲演时他讲到“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既然权力如此关键，就决不能被多数人去玩弄，“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权力……要取消议会不大可能的，但是议会的议员届时基本上将只提供建议……无论上院下院，都不进行表决。”他把领袖原则看成是绝对责任和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

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普鲁士击败法国后，俾斯麦在1871年建立。这两次帝国都为德国带来了荣誉。希特勒，要恢复侵略的军

事帝国的名誉，建立第三帝国。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扩展，是靠普鲁士赤裸裸的侵略形成的。

普鲁士原来是易北河以东一个小国，叫勃兰登堡。统治勃兰登堡的是霍亨佐伦家族，他们是些军事冒险家。普鲁士已经靠自己的武力成了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德意志帝国法律，原来禁止诸侯称王，但是在 1701 年，皇帝默许了选侯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境内的国王。

1862 年，奥托·冯·俾斯麦亲王是普鲁士首相，这个“铁和血”的人，运用武力，在 1871 年结束了 1000 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建立了普鲁士大帝国。近百年来，先是俾斯麦，后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后是希特勒，对权力和军国主义的狂热，对民主自由和种族平等极端仇视的大日耳曼主义情绪极力推崇。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几经盛衰，对欧洲和世界曾带来严重的破坏。

《我的奋斗》还以很大篇幅大谈哲学，谈希特勒和纳粹党人的人生观和历史观。

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种族优越论。

他说：“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只会灭亡……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了自己的伟大，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凡是想生存的，必所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现实！”

他说，现今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所以看来“只有亚利安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造者，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最初的文化产生于亚利安人在遇到低级民族后征服低级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服从自己意志的地方，后来被征服民族使用了征服者的语言提高了自己，主奴之间壁垒倒塌了，亚利安人放弃血统的纯洁性，人种水平下降，文化就开始衰亡。“人类并不会由于战争失败而灭亡，却会由于抵抗力的丧失而灭亡，而这种抵抗力只有在纯粹血统中才能继续保持。”

希特勒认为德国民族，即日耳曼人，就是现代的亚利安人，就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其它民族却是劣等人种，尤其是犹太人，斯拉夫人更是糟粕。所以必须使日耳曼人成为地球的主宰，日耳曼人要称霸世界。为此，日耳曼人一定要关心自己血统的纯洁性。

“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婚配的水平提高，使它脱离原来那种不断损害种族纯洁性的水平，而使它具有有一种制度的神圣性，必须复制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复制人和猿之间的怪物。”

到 1928 年，希特勒出狱后“新建”的党已经拥有了十万八千党员，这时，政府取消了对希特勒的演讲禁令，贴在他嘴巴上的封条完全撕却了。他开始在柏林体育馆公开演说，纳粹党的活动中心从慕尼黑移到首都。纳粹党内部已经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它按照希特勒的设想带着它自己的完整国家结构建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的政治路线已经确定，要用专政代替民主，强化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军事国家，准备打仗，同法国算帐，向东方挺进，占领苏联，独霸欧洲。

它正野心勃勃地等待着未来。

第六章从乞丐到帝国总理

1. 我决定当一个政治家

一个一文不名的维也纳街头流浪汉到德意志帝国的总理，这听起来的确象一个神话，可不幸的是，历史却偏偏让一个政治狂人成了这幕令人惊悚的神话剧的主角。

富丽堂皇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没有给希特勒带来任何好运，这位未来的元首此时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想当艺术家却总是榜上无名，想找工作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炒“鱿鱼”，在这举目无亲的维也纳，希特勒不得不到火车站替人搬行李，或者打扫积雪，扫地毯。在实在是无法活下去时只得排队在福利机构办的免费施粥站领取一点救济食物充饥，或者干脆沿街乞讨。有一次，他穷极无奈，竟向一个喝醉的绅士要钱，挨了这位绅士的手杖。1909年11月因元钱交付房租，又被房东赶了出来。

这个“不幸的人”的的确确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汉，当时认识他的人后来追忆说，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象一件土耳其长袍，这也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一个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他的头上戴一顶肮脏的油光发亮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他的一头乱发，前额斜梳，像他日后那样，颈后的头发乱糟糟的盖住了污秽不堪的衣领，因为他很少理发修面，面颊和下颊往往胡鬃丛生。用一个早年曾认识希特勒后来成了艺术家的人的话说，希特勒就像“一个在基督徒中间很少出现的鬼怪。”

谁能想象，就是这个“基督徒中的鬼怪”，这个肮脏可怜巴巴的以乞讨为生的流浪汉，这个想当艺术家却没有艺术天才的怪里怪气的奥地利人，不久以后，却要成为纳粹党领袖，德国总理，“第三帝国”元首，成为那个使世界震惊的真正的魔鬼般的人。

1913年春天，希特勒突然决定离开这个不能给他带来好运的维也纳，到他无比热爱的德国去。他当时已经二十四岁了，除了他自己以外，在其他人看来，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古怪的、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他只有样东西：狂热的自信和同样狂热的使命感。

他就带着这两样东西来到了德国，也许是天意在引导他，在这里，他将注定要使世人注目。

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希特勒潜往德国，历史学家至今还没完全弄清。有人认为，他在维也纳偷了东西，为逃避警方逮捕，才逃往德国慕尼黑。有人认为，他是为了逃避在奥地利服兵役，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胆小鬼，希特勒的胆子可是一点也不小，而是因为他不愿同犹太人、斯拉夫人一起在军中服役。

在德国慕尼黑，同在维也纳一样，他仍旧翼空如洗，举目无亲，他不得不重操旧业，自称是建筑图案家，以卖画糊口，招摇撞骗。

1914年夏天，战争爆发了，战争象一阵旋风把希特勒和千百万人一样卷了进去，然而，和千百万人不一样的是，他对战争的到来欣喜若狂，他说：“我完全被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动感情支配着，双膝跪地，衷心地感谢上苍有限，感谢它使我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他再也不能错过了。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战争的阴云给老百姓带来的是黑暗，却给希特勒带来了光明。在《我的

奋斗》中，他写道：“对我来说，这仿佛是把我从年轻时代压在我身上的穷困下拯救出来。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同这场巨大的斗争相比，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也许，希特勒有一种对战争的本能的爱好和狂热。对他来说，和平就是灾难，因为和平将使他这样的人碌碌无为，而战争却是喜讯。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要为千百万人带来死亡的战争，却为这个25岁的野心勃勃的青年翻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据说希特勒在战场上的确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士兵。他受伤二次，而且还因作战英勇而两次获奖，他之所以能得到那些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十五名英军，有人也怀疑这种说法，但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看，他仍是个古怪的家伙。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也从来不要求休假，甚至连一般战士对女人的兴趣也没有。而在军队里，对那些长期得不到性满足的士兵们来说，女人始终是一个热衷的话题，然而，希特勒下士却对此嗤之以鼻，也从不参与这些士兵们的战争的间隙追逐乡下姑娘的勾当。而且，希特勒还特别厌恶在军队里比较流行的同性恋行为。

如此勇敢、严肃、规矩的希特勒为什么直到战争结束却还是一个下士？为什么他没有获得上司的赏识和提拔？这始终是一个谜。

1918年11月10日，一个阴暗的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尝到了他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一个牧师到柏林东北的军事医院对士兵宣布一个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当时正在那个医院休养，他一个月以前在一次战斗中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战争打败了。

听到这消息，希特勒目瞪口呆，异常震惊，他在《我的奋斗》中追述到：“我忍不下去了，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回病房，扑倒在床上，……一切都白费了，两百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难道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伪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据他自己说，他平生第二次失声痛哭——第一次是在他母亲去世时。他像当时的很多德国人一样，无法接受这俟一般的事实：德国打输了这场战争。

大概就是在那天夜里，他原先那种当建筑师还是当政治家的犹豫结束了。他在《我的奋斗》中激昂而又简炼地写道：“我终于决定——当一个政治家。”

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对整个世界来说，则是一个可怕的决定。

2. 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天才演说家

一个早年的街头流浪汉，一个奥地利下士，在德国一无后台，二无钱财，何以能爬上权力顶峰。希特勒的政治资本是什么？希特勒并非等闲之辈，他靠的是坚韧的意志，复兴德意志帝国的炽热的使命感，狡诈的组织才能以及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希特勒被称之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有演说天才的政治人物之一，与林肯、列宁、邱吉尔并驾齐驱，这并不夸张。

正是靠这一演说天才，希特勒极尽煽动之能事，象一个布道的祭师滔滔不绝，唤起大众盲目的热情，慢慢地把整个民族拖向法西斯的深渊。早在维也纳的流浪的年代里，希特勒就已经注意到演讲术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写道：

“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他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就从这引述的一小段文字里，我们也多少可领略到希特勒运用语言的能力。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能力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演讲术了。而且为了有内容可讲，据说年轻时吃了上顿可能没下顿的希特勒还经常象一个隐士一样，一头扎进从图书馆里借回的那摞厚厚的书堆中，读起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希特勒曾集中精力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一门“摧毁的学说”。除了马克思，他还阅读过荷马史诗、但丁《神曲》以及易卜生和左拉的作品，德国经典作家中，他读过赫尔德尔、歌德、席勒、荷尔德林等，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印第安人小说和东方冒险故事。这些对训练他的语言艺术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他看得最多的倒不是什么世界名著，而是那些流传民间的大肆鼓吹极端种族主义的小册子和反犹刊物。

离开维也纳后，他仍然念念不忘练习他的演讲术，在兵团里，他由于能够大段地朗诵叔本华的著作并能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艺术和政治，因此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常常口出惊人之语，说什么“我将肩负天下大任，”“我尚未鸣，只是在等待着，直到我的时辰降临。”他的这些天赋般的话使他的战友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就这样，希特勒的演讲才能慢慢地发展为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人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才能，对他在政治上的惊人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希特勒的演讲很有特色，他善于把握听众的情绪，他明白他的听众想要什么，于是就投其所好，毫无节制地向他们许诺，等到一旦把听众的情绪调动起来后，就开始传达他真正想要传给他的听众的那些东西。

听过希特勒演讲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希特勒为了吸引听众，开始时讲得很慢，而且不时地停顿，以后随着听众感受力的升高而渐渐加快起来，当他演说到高潮时，他的速度越来越快，音量越来越高，以至于到最后完全变成了一种歇斯底里似的吼叫，此时全场的听众在情绪上也不由自主地和他打成一片。而在最高潮时，他却突然停止，这时场上也突然鸦雀无声，然后，

他又以极慢的速度说出几个关键性的词，于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起。

正是靠这种演说天才，希特勒在战争结束后被上司赏识，参加了一个巡回演讲团前往慕尼黑讲演，也是靠这种演说天才，他逐渐进入了纳粹党的核心圈子，进而成为党的“元首”。

任何企图有所作为的野心家都必须有种种笼络民众的才干和魅力，希特勒是这方面的一个出众代表。

3. 冲锋队向谁开火

锋队是什么？

它不是战场上冲在最前列的敢死队，也不是任何正规的军队组织，它是一个由打手和流氓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它专门为“元首”的利益服务，它是希特勒的“御林军”。

早在维也纳的流浪时期，希特勒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精神恐怖”和“肉体恐怖”的理论，他认为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实行种种“恐怖手段”极其重要，希特勒的想法很明确：当他不能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时，就用恐怖的手段来实行。

希特勒最初就是用冲锋队来对付党内的反对派而使自己爬上纳粹党领袖的交椅的。当然，那时，还不叫冲锋队，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纠集了一批忠于自己的退伍军队，在他集合演讲时保护会场，压制不满的人和捣乱分子，必要的话，就把他们轰出去。这样的确很有效果，每当希特勒演讲时，台下不满的人涉于淫威，不敢吭声，或者早被清除，因此给人一种一致同意的假象，从而使希特勒的威信越来越高。

后来，希特勒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和街头流氓组成“纠察队”，由一个蹲过大牢的钟表匠指挥，为了逃避柏林政府的镇压，他给纠察队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体育运动部”，当然，这体育运动部是从不搞体育的，隔了不久，在1921年10月5日，他们正式定名为冲锋队。

冲锋队员们身着褐色制服，他们大多是一些冒险分子，一个个身强力壮，胆大妄为，一律佩带纳粹党党徽“卐”字臂章。在希特勒的“精心栽培”下，冲锋队很快发展成了一支庞大的令人恐怖的武装力量。

冲锋队的行动纲领表面上似乎慷慨激昂：

“冲锋队要把我们的青年党员团结起来，作为一支钢铁队伍，为我们为之冲锋陷阵的整个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冲锋队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民族的国防意志的体现者，应该成为领袖所领导的开拓工作的一面盾牌。”

在这如此激昂的口号后面的则是忠于领导希特勒这样的潜台词。希特勒说得很干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报名参加冲锋队；他们甘愿服从元首并有精神准备在必要时去死！”。

冲锋队对青年有着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在夜晚粉刷标语口号或张贴广告，与不同政见者厮打殴斗，在慕尼黑制造恐怖气氛；他们经常迈着整齐的步伐，吹奏着乐器招摇过市，或者乘坐敞篷车到处驰骋，出尽风头；他们还经常在集会、游行时以旌旗密布和火炬林立的盛大场面来显示纳粹党威严。他们高声唱着自己的队歌：

钢盔上印着带钩十字，
袖章上印着黑白红，
希特勒的冲锋队，
就是我们的名字。

“看，希特勒的冲锋队来了”！有人呐喊，有人恐惧，有人羡慕，更多的人是避而远之。

冲锋队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冲锋队还不断地刺激自己的政治对手，以期引起舆论界的轰动。他们参与了希特勒策划的多起政治阴谋，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国会纵火案，都有冲锋队的直接插手。总之，冲锋队为希特勒夺

取帝国最高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过，这些身穿褐衫的冲锋队自始至终不过是些杂七杂八的打手，它的许多高级领袖，以冲锋队头子罗姆为首，都是臭名远扬的有相公癖的人。慕尼黑冲锋队长海因斯中尉不单是个有相公癖的人，而且是个被判过刑的杀人凶犯，这两个人同其他几十个人一直在发生争吵和内讧，其恶劣程度，只有患性变态病的人才做得出来。

为了要一个更为可靠的武装团体，希特勒又建立了党卫队，简称 S.S，队员身穿黑色制服，并且要特别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起初，党卫军不过是“元首”的卫队。后来，希特勒物色到了一个理想的党卫队头子，这是一个在慕尼黑郊区以养鸡为生的农民，此人表面上温文尔雅，其实性情古怪，令人难以捉摸。他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刚接手时，一共只有 200 名左右的队员，而到他结束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而在整个德占区，党卫队则成了一个令人谈虎变色的可怕组织，他们杀人、捕人无所不干，无恶不作。

总之，为了实行元首确定的目标，他们不惜采取任何罪恶手段。

用“肉体恐怖”来消灭对手和压制民众，这并非希特勒的发明，但他无疑是把这些法西斯原则运用得最淋漓尽致的一个人。

4. 天下大乱好夺权

中国有句古话：“乱世同英雄”。

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乱世出魔王”。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德国人依靠美国提供的大量外债，逐渐地繁荣起来，当时的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中。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茵河上的汽船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艺术和爱情。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从前压制的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碰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

当时的希特勒尽管已成为纳粹党领袖，尽管他的如簧之舌不断鼓噪，尽管他采取了种种“精神恐怖”和“肉体恐怖”的手段。但他的时运似乎还没有到。人们很少谈到希特勒和纳粹党。

这个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的希特勒，加上他的无赖作风，他的强暴粗野的极端行为，大多数德国人都把他当作笑话看待。

没有几个拥护他的人。

希特勒厌恶和平、厌恶繁荣、厌恶这歌舞升平的一切。

他等待着时机，等待着混乱的到来。凭着他的直觉，希特勒认为目前德国的繁荣是虚假的，是靠从美国借来的大量贷款维持的。于是，他决定耐心等待，加紧积蓄力量，重建纳粹党，准备重新崛起。

果然，好景不长。1929年快结束时，像一场大火一般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终于给阿道夫·希特勒送来了机会，他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只有在时势困难的时候方能够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众陷入失业、饥饿和绝望之中，后来是他们被战争冲昏了头脑的时候。但是和历史上的那些革命家不同的是，他的革命是在取得政治权力以后才实行，他不是为了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而实行革命。总而言之，他打算靠合乎宪法的方式，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国家统治权。

为了取得选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时势才行，而时势在三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又使德国人民陷于绝望之中，为了取得当权者的支持，他必须使他们相信，只有他才能够把德国从多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30年到1933年那些动乱的年代里，这个狡猾而大胆的纳粹党领袖开始重整旗鼓，着手实行这双重的目标。

1929年10月24日是一个“黑色星期五”，这一天，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一场波及全球的民办性的经济危机开始了，而德国所受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德国繁荣的基础是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一旦新债断绝，旧债到期，德国的金融就完全垮了。于是，在可怕的“黑色星期五”之后，德国各大银行纷纷倒闭，工厂停业，工人失业，昔日的繁荣顿成烟云，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恐慌之中。

这是德国人民的苦难，可不是希特勒的苦难。对希特勒来说，这苦难犹如天意带给他的福者，他知道他的“时辰”到了。

在德意志最黯淡的日子里，当工厂停工，当失业登记人数超过六百万大关，当各大城市排队等候配给面包的人长达好几条街时，希特勒却欣欣然地在纳粹党的报纸上写道：

“我一生中从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

凡是有助于促成危机的……对于我们和我们德国革命来说，都是好的，都是极好的。”

阿道夫·希特勒开始行动了。他的同胞的苦难，不是他要浪费时间来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在政治上变成支持自己的野心的力量。

搅混河水好摸鱼，天下大乱好夺权。这位奥地利下士将用他的残酷和狡诈来谱写这政坛“厚黑学”中最“出色”的一章。

5. 谁支持希特勒

搞政治是一件花钱的事，且不说一次竞选就要耗资百万，就是这些专业政客们的日常生活的消费也需要一笔为数可观的经费。

那么，到底是谁在支持希特勒？是谁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金钱从而使他一步一步地登上权力的顶峰。

希特勒自从结束了他奥地利下士的军旅生活后，他全部时间都用在纳粹党上，奇怪的是，不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这个没有任何积蓄的人从来都不从党里支取薪水。

我们可能会问，他靠什么生活，他的吃饭、穿衣由谁负担。党内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时也不免纳闷。1921年有一些不满的纳粹党员就提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任何党员问他靠什么为生，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就不免狂怒起来。迄今为止，他没有提出过答复。因此他的良心不能是无愧的，特别是鉴于他同女人们来往频繁，花费不少。他在女人面前还自称是慕尼黑之王。

希特勒后来控告这些人犯了诽谤罪，当法院问他靠什么为生时，他回答说：“我为国家社会主义党讲演时，分文不取。但是我为其他团体讲演时，我当然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我的午饭是轮流同党内同志一起吃的，此外，还有一些党内同志给我一些为数不大的帮助。”

希特勒也许并没有完全撒谎，确实有他的一些“同志”给他付房租、买衣服、备膳食。其实，希特勒这个人对物质的需要并不多，1929年以前，他一直住在下层中产阶级区一套共有两间房的公寓里，冬天他多一件旧大衣，夏天就穿一条皮短裤。

在当上纳粹党领袖后，希特勒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他在萨尔斯堡弄了一所别墅，在慕尼黑租了一套豪华的公寓，出门总是以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崭新的汽车代步，这辆汽车花了他两万马克，约折合五千美元。

这些钱都是哪里来的，他在这些年代里的收入来源一直没弄清楚。当慕尼黑财政局在1925年通知他填报第一季度收入时，希特勒答复说：“我第一季度没有任何收入，我是靠银行贷款维持个人生活开支的。”

“那么你的五千美元的汽车呢？”税收官员反驳道。

“这也是借银行贷款买的，”希特勒回答。

希特勒在申报收入时，把自己的职业填为“作家”，因为他知道作家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免税的。

我们可以把希特勒对财政局的答复理解为他想“逃税”或“免税”。那么，他的这笔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希特勒称自己为“作家”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他曾经为一些一筹莫展的纳粹党报纸写过许多文章，他要求很高的稿酬，结果如愿以偿。另外，他的《我的奋斗》一书出版后，也使他得到了一大笔稿费收入。

但是，他也确实欠了不少债，当财政局向他催交迟迟拖欠的所得税时，他写信给财政局“目前我没有能力缴付税款，为了维持生活，我不得不举债”。他称那个时期不得不靠吃苹果充饥，而把省下的每一个马克都献给党。

然而，仿佛出现了奇迹一样，在1929年时，虽然他申报的收入低于1925年很多，但他的债务却全部消失了。已经有大工业家们的金钱开始流入纳粹党内了。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使纳粹党在德国开始得势，1930年的选举结果使希特勒本人都感到意外，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了六百四十万九千六百张，

可以取得国会中一百零七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上位居第九的最小党一跃而为第二大党。

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开始注意希特勒了，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的愚蠢并不亚于那些盲目的选民们，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付给希特勒足够的金钱就能把他笼络住，一旦他当权后，就会按他们的命令办事。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二十年代还把他看成是个奥地利暴发户，但现在他们意识到，这个暴发户很可能接管德国的控制权。

丰克是个油光满面、目无定睛，大腹便便的矮胖子，他的脸让人想起一只青蛙。他在 1931 年当了纳粹党和一些企业界重要人物之间的牵线人。

于是，希特勒开始会见德国国内掌握经济命脉的一些人物，并且向他们说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话。党需要巨额经费来从事竞选，支付大规模的频繁的宣传费用，发给成千上百的专职人员薪水和维持冲锋队和党卫队这些私人军队。为了所有这些，“元首”必须努力讨好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

这些巨头是谁呢？

他们姓名是个秘密，除了元首周围的核心圈子以外，对谁都要保守秘密。

据说在 1931 年下半年，希特勒走遍了整个德国，同重要的企业界人士私下会谈，为了保守秘密起见，这些会谈甚至要到一些人迹不到的森林中去举行，这种在原始森林中所进行的会谈一定是十分有趣的，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据说这样做是为了绝对保守秘密，绝不能让报界有捣蛋的机会，否则就会影响到会谈的成功。

从战后在纽伦堡监狱中对牵线人丰克的讯问中知道，为希特勒出钱的这些“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谁。

首先是钢铁大王弗里茨·蒂森，他在 1923 年在慕尼黑遇见希特勒时，初次见面被这位纳粹党领袖口若悬河的辩才所征服，于是第一次向当时还不大为人们所知的纳粹党捐了十万金马克（合二万五千美元）。继蒂森之后是艾伯特·伏格勒，他也是联合钢铁公司的一个巨头。还有化学工具巨头施尼茨勒，橡胶工业董事长，以及一些银行家，出版商等。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企业家在纳粹党于 1930 年选举中得势后就马上支持希特勒的。军火大王克虏伯就是如此，克虏伯是希特勒的激烈的反对者，到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之前，克虏伯还向老元帅提出紧急警告，叫他不要犯这种错误。但是，不久以后，克虏伯却成了一个超级纳粹党人，成了希特勒重要的经济支柱。

这些捐赠对于这些政治上幼稚无知的企业家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历史往往充满了各种各样意外的嘲弄，对纳粹运动的所谓“真理”有一点希特勒是从不保密的，那就是一旦党控制了德国，它将扼杀德国人的个人自由，包括希特勒那些企业界朋友的个人自由在内。一位曾给予希特勒大量资助的银行家在希特勒上台后发现自己被关进了集中营的命令正是他的“忠诚拥护者”元首本人下的。

这就是企业家们无知的代价，他们支持了一个魔鬼，而这个魔鬼最终也毁灭了他们。

6. 群妖乱舞

希特勒的搭当和左右手是些什么人？是谁在为希特勒卖命？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幅“群妖”的画像，让我们来领略领略他们的“风采”：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被称之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他也是个的确是纳粹党的“哲学家”，但是个才力平庸的人。

他是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人的后裔，一个鞋匠的儿子，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得到了一张建筑学毕业证书，1919年底加入纳粹党。这个人曾经对希特勒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据说是因为他拥有一张希特勒年轻时代曾经梦寐以求的建筑学毕业证。罗森堡的“学识”也深为希特勒赏识。他是希特勒的早期导师之一，曾写过大量书籍和小册子，内容和文风极其混乱，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是长达700页的著作，书名是《二十世纪的神话》，这是集其关于北欧人优越性的半瓶子醋思想之大成的荒谬绝伦之作，而他的这种荒诞不经的思想却在纳粹党圈子里被当作是学识渊博的东西。

然而，希特勒却不断地吹捧这个头脑完全糊涂的人，这个思想混乱浅薄的“哲学家”，把他当做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之一。

后来成为希特勒重要帮手之一的赫尔曼·戈林最初是慕尼黑大学学经济的，后来拜倒在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之下。戈林1921年认识希特勒，用他过人的精力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后来，他又亲自担任冲锋队队长。这个人早年曾经吸过毒，后来为了纳粹党的“革命”而发誓戒掉了。

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在国会中代表纳粹党的十二名议员之一，1932年任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的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后终于导致纳粹党的最后胜利。

赫尔曼·埃塞，据说他是靠几个情妇倒贴着过日子的，他是个出名的敲诈能手，甚至他自己党内的“同志”如果触犯了他，他也会“揭露”他们。可对于这样一个人，希特勒却说：“我知道埃塞是个无赖，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留他一天。”这就是希特勒的标准，他不问他的亲信的来历，不管他们是杀人凶手、拉皮条的、性欲倒错的、吸毒犯，还是其他什么无赖，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对他有用。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个原本是小学教员的人是一个道德败坏的虐待狂者。1922年起，他是希特勒周围声名最为不堪的人之一。他自己吹嘘是个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诈他情妇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热的反犹活动，不仅使他臭名远扬，而且还搜刮到大批钱财。他办的一份著名黄色周刊《冲锋队员》专门靠刊载关于犹太人的性罪行和恐怖故事卖钱，其内容之淫秽猥亵，甚至使许多纳粹党人也感到恶心。施特莱彻也是个著名的色情文学提倡者。他的外号叫“无冕国王”，老巢设在纽伦堡，在这里，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人得罪了他，就免不了下监牢或者受酷刑。他总是有一根皮鞭执在手中或者插在腰带上，他常常大笑着自夸给人抽过无数鞭子。

后来成为希特勒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一个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条腿的人。他思想敏捷、心理复杂而有点神经质。当他第一次在慕尼黑听到希特勒的讲话，就从此信仰国家社会主义，参加了纳粹党。

戈培尔是一个激烈的演说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有一支锋利的文笔，而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真可谓凤毛麟角。他早年的志愿是要当作家，得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但没

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后来又写了两部剧本，但也没有哪个剧团愿意演出。

他的个人生活充满了挫折和失意，由于他瘸了一条腿，不能参军作战，这使他饮恨终身。他在恋爱方面的运气不好，虽然他一生之中都把乱搞女人当作人间至情。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我渴望一个甜美的女人！唉！真教人难熬！”

戈培尔至死都是希特勒最忠实的信徒，他曾写道：“阿道夫·希特勒，我所以敬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这两者就是天才的特点。”

这就是聚集在纳粹党领袖周围的人物。这些各种各样的乌龟、马屁精、杀人凶手、虐待狂、性倒错者、吸毒者、酗酒滋事之徒都象飞鸟投林和苍蝇逐臭一般很自然地投奔希特勒而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们使人看来无疑是一批乱七八糟的怪物。但是在德意志共和国最后的混乱日子里，他们在千百万迷惑混乱的德国人的心目中逐渐成了救星。他们有两个条件胜过他们的对手：一是他们是由一个目标明确的人领导的；其次是他们为了帮助他实现他的目标，是完全愿意不择手段和投机取巧的。

7. 奥地利人竞选德国总统

纳粹党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后，希特勒现在开始向总统的宝座进发了。

兴登堡总统七年任期在 1932 年春天届满。届时这位较得人心的陆军元帅将达八十五岁高龄，而他的头脑清醒的时候却越来越少了。但是人人都很清楚，如果他不竞选连任的话，希特勒虽然从法律上来说不是德国公民，却很可能取得德国国籍，参加竞选，获得胜利，成为总统。而这正是那些在这动荡的时势中拼命想拯救共和国的人不愿意看到了。

为了阻止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统，总理布鲁宁有一个如意算盘：取消 1932 年的选举，由议会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将兴登堡的任期延长，在这一点做到后，他就建议议会宣布实行君主政体，由总统摄政。总统死后，就由皇太子的一个儿子重登霍亨索伦王室的宝座。布鲁宁相信，这个行动能够使希特勒和纳粹党人无计可施。

但是年迈的总统对此不感兴趣。当初在 1918 年 11 月那个秋天的暗淡的日子里，正是他作为帝国军队司令，通知德皇必须下台，君主政体必须结束。尽管布鲁宁向总统晓之以义，说这是防止希特勒上台的最后一个孤注一掷的机会了。并说如果要复辟的话，可以仿效英国的榜样，实行立宪的民主的君主政体。

然而白发苍苍的老元帅听到这些大为震怒，立即下逐客令，不愿再见这位总理，一个星期后，又把布鲁宁叫来，告诉他，说他自己不愿意竞选连任。

而此时的希特勒也正在犹豫：究竟竞选总统，还是不竞选总统？

在希特勒看来，如果兴登堡竞选连任，他自己肯定会被击败，因为兴登堡这个神话式的英雄不但受到许多右翼势力的支持，而且也受到民主党派的支持。这样一来，不是要把纳粹党在历次选举中不可战胜的名誉付诸东流吗？然而，要是不参加竞选的话，那岂不是自认软弱，岂不是表明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快要取得政权缺乏信心吗？除此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希特勒当时甚至还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因为他不是德国的公民。

戈培尔极力劝希特勒参加竞选，终于，当兴登堡正式宣布参加竞选时，希特勒也决定作为兴登堡的对手参加。

希特勒首先必须解决他的国籍问题。1932 年 2 月，不伦瑞克邦内政部长，一个纳粹党人，任命了希特勒先生为该邦驻柏林公使馆的随员，通过这种滑稽戏式的手段，这个纳粹党领袖就当然地成了不伦瑞克的公民，因而也是德国的公民，因而也就有资格竞选德国总统。

于是，竞选开始了。

这真是一场激烈而又混乱的竞选运动。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又一次全力以赴地开动起来了。希特勒周游全国，在好几十个群众大会上向大批群众演讲，把他们驱入狂热的状态。他乘飞机，坐汽车，从一个竞选会场赶往另一个竞选会场，每到一处都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一种姿态：摇唇鼓舌，滔滔雄辩，千百次地挥手致意，把孩子搂到胸前，吻着妇人们的手背。他的信徒们经常要等上好几个钟头，望眼欲穿地恭候他的到来。希特勒的演讲被冲锋队员们排列出来的仪仗队、吹奏乐队以及颇具风格的元首旗装点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和军事化的浓郁气氛。冲锋队和纳粹党的竞选仪仗队以声威和力量表现得十分令人瞩目。

希特勒也充分施展了他的演说才能，他凭着自己的煽动天才毫不费力地比那些只会批评和许诺的保守党的演说家们高出一筹。他的群众大会安排布

置得老幼皆宜、十分巧妙，既能够引起老一代人的兴趣，也很合乎青年人的胃口。他所提出来的竞选口号在农民、工业中产阶级、小商业者、职员、大学生和青年人中间被证明颇有市场。

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了一次德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宣传运动。他们在大小城市的墙上贴了一百万张彩色的大字招贴画，散发了八百万本小册子和一千二百万份党报特刊，一天之内举行了三千个大会，而且在选举中第一次充分利用了电影和唱片，唱片是在安了扩音器和喇叭的卡车上巡回放送的。

总理布鲁宁也在日夜地工作，争取年迈的总统当选。这个一向待人公平的人这一次也毫不客气，把政府控制的电台和全部广播时间都保留给自己的一方使用，这一着可气坏了希特勒。不过，兴登堡只讲了一次话，这次讲话颇有尊严。他说：

“如果选举一个代表片面的极端派观点的党人，这将使祖国发生严重混乱和不安，其后果是无法估计的。我为责任所驱使，必须防止这种人当选……如果我竞选失败，我至少可以免于这种指责：在危机时刻，我自动懈怠了职责……凡是不愿投我票的人，我并不要求他们的选票。”

事实证明，这次讲话很有作用，到3月13日选举结束时，结果是：

兴登堡	18651493	49.6%
希特勒	11339446	30.1%
台尔曼	04983341	13.2%
杜施特堡	02557729	6.80%

对于双方来说，票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老总统比纳粹党煽动家多了七百多万张选票，但是尚差一点而没有能够赢得必要的绝对多数。这就必须举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就可以当选。

揭晓的那天晚上，许多纳粹党领袖聚集在戈培尔的寓所中收听关于选举结果的报道。“我们被打败了；多么可怕的前途，”戈培尔在听到消息的那天晚上在日记中写道，“党内的人都极感失望和沮丧……只有靠出奇的办法，我们才能拯救自己。”

但是，第二天，希特勒仍然锐气不减地宣布：“第一次竞选运动结束了。第二次在今天开始。在这次竞选中，我必将领先。”

果然，希特勒不知疲倦地投入了第二次竞选。这一次，他租了一架容克式客机，从德国这一头飞到那一头，一天在三四个城市中的大会上讲话，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花样。在第一次竞选中，他大谈其人民的苦难，共和国的无能。现在，他开始谈他们的未来了。他描绘了一幅如果他当选每个德国人将能享有的幸福的图景：工人有工做，农民的农产品可售得高价，工商业者有更多的生意，军国主义者可以建立一支大军队。在柏林游乐场的一次演说中，他竟保证：“在第三帝国中，每一个德国女郎都可以找到丈夫！”

这一次，民族党的杜施特堡退出了竞选，要求支持者投希特勒的票，甚至放荡不羁的前皇太子腓德烈·威廉也表示支持，他宣布：“我将投票赞成希特勒”。

1932年4月10日是个阴沉多雨的日子，那天投票的选民少了一百万人。当天深夜宣布的结果是：

兴登堡	19359983	53.0%
希特勒	13418547	36.8%
台尔曼	03706359	10.2%

虽然希特勒的票数增加了二百万，而兴登堡只增加了一百万，但总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绝对多数。希特勒的竞选失败了。

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德国人仍然是拥护民主共和国的。他们对希特勒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结果令希特勒大为沮丧，同时也很值得他本人玩味。他确实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在两年之内使纳粹党的选票翻了一番。但是他仍旧没有取得多数，他仍然没有获得他所追求的最高权力。

他现在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他在这条路上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了？

然而，希特勒是一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力。他思考的结果是他重新回忆起了早在维也纳时代就取得的一个教训：要取得政权，你必须赢得一些既有的“有势力机构”的支持。

希特勒决心重整旗鼓，改弦更张，寻找另一条通向权力之路。

8. 老总统教训希特勒

总统既不可得，希特勒必须寻找其他的途径了，他开始接近那些“有势力的机构”。

兴登堡总统无疑是希特勒获得权力的一个关键人物。

早在总统选举之前，希特勒就与兴登堡打过交道，但这次会谈的结果，对这位纳粹领袖很不利。当时，希特勒正受着他的情人吉莉·拉包尔自杀的打击，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的思想常常开小差，心神也不由自主。

在会见兴登堡时，他想以长篇大论的说辞来打动这位老先生，可是却完全失败了，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他那出色的辩才。就这样，总统在第一次会见时，对这位“波希米亚下士”（兴登堡是这么叫希特勒的）印象一点也不好，他后来说，这样一个人也许可以当邮政部长，但是决当不了总理。

选举之后，总统尽管还是兴登堡，但德国的权力结构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现在集中在一个年达 85 岁高龄的衰老的总统和他周围一些思想浅薄、野心勃勃的人的手里，而这些人却左右着他那衰朽倦怠、神思恍惚的精神。这一点，希特勒看得很清楚，这也很适合他的目标。

总理布鲁宁已经倒台了。现在登上舞台中心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和滑稽可笑的人物。这是由阴谋家施莱彻尔将军推荐给八十多岁的总统出任德国总理的弗朗兹·巴本。

对于选择巴本任总理，当时的法国驻柏林大使写道：“总统的选择使人感到不可置信，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莫不感到好笑，有的吃吃偷笑，有的捧腹大笑，因为巴本的特色是，不论友与敌，无人把他当作一会事……他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爱好虚荣、野心勃勃的一个阴谋家著称。”而兴登堡却在施莱彻尔的唆使下竟然把在挣扎中的共和国的命运交托给这样一个人。

巴本在上台以后进行的第一个行动是解散国会，进行新的国会选举，而这正是希特勒所盼望的。

选举一开始，希特勒的冲锋队员就行动了，他们掀起了一阵甚至德国在过去也从未有过的政治暴行和谋杀的浪潮。冲锋队员们涌到街上去寻衅闹事，仅仅在普鲁士一邦，二十多天的时间就在街头发生了 461 起斗殴，死了 82 人，重伤 400 人。此外，各州都有死伤的人。

这次选举，纳粹党获得了大胜，在国会中占 230 个席，轻而易举地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而且在这个时候，据说冲锋队已处于“一种武装准备状态”，冲锋队似乎要包围柏林，政府开始担心纳粹党人发动政变。

此时，希特勒提出了条件，说他非当总理不可，否则就不参加政府。巴本说，这得经总统来作“最后决定。”

老元帅在他的书房中一手拄着拐杖，站着接见希特勒，这样一个姿态事先就为这次接见决定了冷淡的调子。就一个年达 85 岁高龄，仅仅在十个月以前还发过一次病，神志完全昏迷达一个多星期的人来说，兴登堡现在的神志却惊人的清醒。

他耐心地听着希特勒重申他对总理职位和全部权力的要求。然后回答说：

“由于局势紧张我不能于心无愧地贸然将政府的权力交给像国家社会党那样一个新党，这个新党没有多数的拥护，而且就我看来，有些人心胸偏狭，

嚣张闹事，不守纪律。”

讲着讲着，总统开始激动起来，他提到了最近发生的好几起事件：纳粹党人同警察的冲突、希特勒党徒攻击意见不同的人的暴行、对犹太人的殴辱以及其他非法行为。他认为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纳粹党内有许多不受驾驭的野性难驯的分子。

然后，兴登堡说，他愿意接受希特勒和他的运动的代表参加联合政府，至于这个政府的具体组成可以以后再谈，但是，他不能承担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的责任。

但是，希特勒坚决拒绝了这一邀请，他不愿意把自己摆在跟其他政党领袖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会谈没有结果，而且直到会谈结束，老总统仍然站着，并且严厉地教训了纳粹党领袖一番。后来发表的官方公报说：“总统严重地告诫希特勒先生，他要以骑士的风度来领导国会党作为反对党的活动，要记住他对祖国和德国人民的责任。”

希特勒费力地敲了敲总理府的大门，大门虽然开了一个缝，结果却又砰地关上了，教他碰了一鼻子灰。

9. 靠走“后门”当上总理

门”不能，就走“后门”吧！

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领，无情的冷酷和惊人的判断力的人，只要能达到目的，他并不在乎采取什么手段。

而此时，德意志共和国正在风雨飘摇中接近自己的末日，政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上台没有几天的总理巴本又辞职了，阴谋家施莱彻尔任总理，但他没能在国会争取到多数的支持。

希特勒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

他找到了兴登堡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兴登堡，坚持要与他进行一次“单独”的会谈，那个从来不与纳粹党人有来往的小兴登堡居然同意了。

希特勒与他在一个房间里，密谈了一小时。总统的儿子既不以头脑灵敏闻名，也不以性格坚强著称，希特勒究竟同他谈了一些什么，这一点从来没有人透露过。不过，人们认为希特勒采取了既威胁又利诱的手段，威胁方面包括要向公众揭露奥斯卡与一些救济丑闻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兴登堡产业上的逃税行为。至于利诱，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几个月后，兴登堡一家的产业增加五千英亩免税土地，奥斯卡从上校擢升为陆军少将。

毫无疑问，希特勒对总统的儿子起了很大影响。在小兴登堡坐出租汽车回总统府时，他特别沉默，他所说的唯一一句话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

现在只待牵住做父亲的了，这的确比较困难！因为总统的花岗石般的性格并没有因年老而有所软化，但是，虽然困难却并不是不可办到的。希特勒与失了意的前总理巴本勾上了，让巴本去做老总统的工作。

1933年1月29日是个星期天，这是关键性的一天，各个阴谋家都在拼命地玩弄最后一手，使得首都充满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惊人谣言。有谣言说，施莱彻尔同陆军总司令相勾结，准备逮捕总统，建立军人独裁政权。有谣言说纳粹党人要举行政变，冲锋队已经占领了总统府；还有说希特勒已经被捕。这一天，还有十万名工人涌进柏林市中心的游乐园举行示威，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从星期日到星期一的那天夜里，希特勒几乎通宵不寐，在距总统府不远的总理广场上的饭店房间中来回踱步。他尽管神经紧张，但极有自信，深知他的时辰已经来到。将近一个月来，他一直在同巴本和其他政客们在进行秘密谈判，已经取得了满意的结果，现在似乎只有年迈固执的总统还在作梗，因为还在1月26日，这位老态龙钟的总统还在说，他“丝毫无意任命那个奥地利下士担任国防部长或国家总理。”

但是，在他儿子奥斯卡·兴登堡少校、巴本和总统府其他亲信的影响下，总统终于软化了。他年达86岁高龄，精力日益衰退，但历史将注定了由这个从不喜欢希特勒，曾经努力阻止希特勒上台的人来亲自任命他为德国总理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驱车前往总理府晋见兴登堡，这次晋见对他本人，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后来都证明是一件命运攸关的事情。

戈培尔、罗姆和纳粹党的其他头子在饭店的窗口，焦急地翘望着总理府的大门，他们的元首不久就要从这扇大门里出来。戈培尔当时说下这样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此起彼

伏，有时感到怀疑，有时感到希望，有时欢欣，有时失望。我们过去失望的次数太多了，这使我们不敢真的相信会发生伟大的奇迹。”

几分钟后，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留着查理·卓别林式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过问的倒霉蛋、那个善于夸夸其谈的乌合之众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这样，通过走后门的方式，通过同他私下讨厌的老派分子们在政治上作了一笔不能见人的交易的办法，通过找总统的儿子拉关系，这个从维也纳来的流浪汉，第一次大战的弃儿就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总理。

这的确是令人奇怪的事，希特勒登上权力宝座既非命中注定，也不是不可阻止。直到1933年为止，尽管希特勒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竞选成果，但他却从未拥有过德国选民的多数选票，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喜欢他。然而正是政客们的阴谋，经济巨头们的短视和无知，使他们双眼迷朦，把一个“盗猎者”误当成了“守林人”。

1月30日那天晚上，从黄昏直到午夜，乐极忘形的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胜利。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排成整齐的队形，他们的乐队在震天的鼓声伴奏下吹奏着军乐，他们嘴里唱着新编的纳粹党党歌和其他一些古老的德国民歌，他们的长统皮靴在马路上喀嚓喀嚓踩出了有力的节奏，他们的火炬高举着，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观看的人们的欢呼声变得分外热烈。

兴登堡总统站在他的府邸的一个窗台前，看着下面游行的人群过去，他的手杖随着军事进行曲的拍子击着地板，他显得很高兴，似乎觉得终于选了一个能够按德国传统方式唤起人民的总理。这位老人，在他年老昏愤之中，对于他在那一天放出了什么样的凶神恶煞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感觉呢？

在威廉街另一头，阿道夫·希特勒站在总理府的一扇打开的窗户前，得意忘形，手舞足蹈，不断地举起手臂致纳粹党的敬礼，他时而微笑，时而大笑，高兴得眼睛里又充满了泪水。

那天晚上戈培尔写道：“这几乎如同梦境一般，如同童话故事一般，新帝国诞生了！14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结果。德国革命已经开始了！”

然而，有一位外国观察家怀着另一种感情观看着游行。这位法国大使写道：“火海流过了法国大使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不详的预感看着它过去”。

魔鬼已经放出，世界将从此天翻地覆！

第七章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被人纵火焚烧。这个案件发生在希特勒政权诞生后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巨案是谁策划的？背后的指示者是谁？六十年来一直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政治大谜。

被推上审判席的一共有五人，他们分别是二十四岁的荷兰青年工人范·德·卢贝，此人曾经是荷兰的共产党员，后脱党到处流浪；德国共产党的议员团长恩斯特·托格勒；另外三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及二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

审判的结果是：卢贝被处死，其余被判无罪释放。但德国共产党领袖托格勒被“保护性拘留”，第二次大战时死在狱中。

希特勒的纳粹正权宣布纵火犯的背后指使者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则反驳说，纵火是纳粹头子希特勒为镇压共产党而制造的阴谋。无论谁是谁非，但希特勒却利用这个机会制定了“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措施。

唯一能够说出真相的卢贝一直缄默不语，或者语无伦次，直到处死也只字未吐。

悬案至今未得披露。

1. “格拉菲理发店”的密谋

来！已经七点半了”！

瓦钦斯基唤醒了还在沉睡的范·德·卢贝。

卢贝起床后，洗过脸，穿上衬衣，系上领带，套上西装背心，又穿上裤子、夹克，再在外面套上一件大衣，最后戴上了一顶鸭舌帽。

瓦钦斯基看到卢贝那一身皱巴巴的肮脏的衣服，不由皱起了眉头。

“你不刮刮胡子吗？”

“没有刮胡刀”

瓦钦斯基从箱子里摸出刮胡刀，递给了卢贝：“还是刮一下吧，今天可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还是刮一下，留作纪念。”

卢贝刮好胡子，跟着瓦钦斯基走出了汉宁斯道夫一间由警察管理的，专门收容无处过夜的流浪汉的简易免费旅馆。

旅馆的入口处，一个名叫施密斯的警察，以挑剔的目光瞅了一眼从房间里走出来的卢贝和瓦钦斯基。

“要出去吗？”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瓦钦斯基。弗良兹·瓦钦斯基”。

施密特在住宿登记册上填上了瓦钦斯基的名字。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七点四十五分。”将时间填在了名字的后头。

“那一个叫什么名字？”

“玛丽努斯·范·德·卢贝”。卢贝从瓦钦斯基的身后探出头来回答道。

施密特填上卢贝的名字和时间后，用粗暴的语言，挥动手臂，象赶苍蝇一样说：“走吧！你们可不要在这一带惹麻烦！”

瓦钦斯基把卢贝带到一条胡同里的红砖房前，对卢贝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朋友领来。”

不一会儿，瓦钦斯基带着一男一女从房里走了出来。

瓦钦斯基告诉卢贝说：“他俩都是共产党，决定跟我们一块干。”但值得注意的是瓦钦斯基并未将两人的名字介绍给卢贝。

女人有些不放心地问：“这个人也能参加吗？那可是一件大事”。

“没问题，这小子信得过”。

“叫什么名字？”

“卢贝。玛丽努斯·范·德·卢贝”。

“不是德国人吧？”

“对，是从荷兰的莱登来的。”

瓦钦斯基提醒女人：“不要多管闲事，彼此间什么都不知道为好。”

女人带着三个男人来到了“格拉菲理发店”，敲开门，见一个枯瘦的青年男子从发黑的门缝里探出了头。

女人说道：“是我，我领着朋友们来了。让他们进去吧。”

房间又窄又暗，冷冰冰的，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房中间一张木桌上放着肮脏的餐具和一堆乱糟糟的书。

这间房子的主人是女人的小叔子。

男人们随意坐在椅子和床上。

“巴尔奇怎么样？”跟女人一起来的男人问她的小叔子道。

“还在找工作，我去把他叫来吧。”

不一会儿，那个名叫巴尔奇的年青人被带进了屋内，女人的小叔子和巴尔奇都是共产党员。

“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这么多人聚会在这儿。”

瓦钦斯基转过身子对巴尔奇说：

“3月5日国会搞选举。我们完全不是纳粹的对手。我们正在谈论这个问题。”

巴尔奇说：“我们应该给纳粹一点颜色看看，否则，将会重蹈意大利的覆辙。”

瓦钦斯基有力地说：“如果有人想对纳粹发难，你们都愿响应吗？”

“当然！如果有人出来点一把火，整个火药库就会来个大爆炸！”跟女人一起来的男人接过瓦钦斯基的话头激动地叫了起来。

“好！这个人已经有了！就是他”。瓦钦斯基用下巴指了指卢贝：“他今天晚上就要动手去烧国会大厦。到时大家跟他一起干吧！”

卢贝无不得意地向在座的人环视了一眼。

卢贝是一个国际流浪汉。1909年2月13日生于荷兰莱登市一个贫民家庭。和希特勒一样都有同父异母兄妹而且他们的父亲都是一个好吃懒做的酒鬼，不同的是卢贝的父亲在他四岁那年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卢贝十二岁时，他的母亲因劳累成疾而去世。从此，卢贝便成为流浪四乡的孤儿。

卢贝十八岁时，参加了荷兰地下党的组织“德·扎伊尔”，即“革命的播种者”。当时的卢贝是一个对社会极度不满，但又希望靠冒险成功的好吃懒惰的青年。

从1928年开始，二十岁的卢贝开始到处流浪，先后到比利时、德国、法国及巴尔干半岛进行流浪性旅行。这位共产党员每到一处，都要干些鸡鸣狗盗的事。其罪状是私卖明信片，非法入境，或者弄坏别人的东西，或者调戏当地妇女。总之，都是些轻微的罪过。也许是出于放荡流浪生活的冒险，其结果是欧洲各个国家警察局的登记本上都有这个共产党的名字。

1931年春天，卢贝在德国被普鲁士警察逮捕，被拘留十天。从拘留所出来后，身无一文的卢贝退出了荷兰共产党，但却参加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极左组织。这是一个仅有二十名党员、近似于流氓无产者的小团体。卢贝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主要是不满意奉行合法路线斗争的共产党组织，他认为只有砸碎一切旧有体制，无产者和工人才能有饭吃。

1933年1月，卢贝因眼伤住进了医院。2月，当他听说德国工人因为纳粹上台而罢工时，心情无比激动，认为“工人当家的时代到了”。不久，卢贝悄悄离开了医院。

1933年2月27日中午，卢贝离开了“格拉菲”理发店，与瓦钦斯基约好相会的时间，独自来到柏林城慕尼黑街一家名叫“海曼·舒特尔商店”的杂货铺。向老板购买了焚烧国会大厦的物品：四根炭精棒和一盒火柴。

卢贝把购买的东西装入大衣口袋，离开杂货铺，来到了大街上。

几个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员，脚穿高统皮靴，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地与卢贝迎面擦身而过。

卢贝心里恨恨地骂道：“等着瞧吧！法西斯！走狗！”

下午二时许，流浪汉卢贝来到了国会大厦前的国会广场。

卢贝走到国会大厦后面的大门前，抬头望着这座此时正被萧萧细雨淋湿

了的古式建筑物——耗时十年才修成的大厦。

“在今天晚上，我就要放火把它烧掉！”想到这里，卢贝不由得浑身一阵颤抖。

“等着看吧！明天！这里将变成另一个世界。而这个改变世界的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我——卢贝！”

2. “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2月27日夜九点左右，二十一岁的排字工人维尔纳·塔拉从西姆街转过国会大厦的西南角时，突然听到前方发出了一阵玻璃被撞碎的清脆的响声。

塔拉抬起头，朝响声发出的方向看了一会儿，由于天黑，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塔拉大步流星地向声音响起的地方走过去，只见一个人手扶着窗框，另一个人正往里钻。

“有人想进入大厦！”塔拉惊慌地往回走时，看到一位警察正好从南侧走过来。

塔拉便向警察喊到：“喂！有人钻进国会大厦里去了！”

警察如若无闻，毫无表情地走开了。

塔拉折回身又往北面跑去，迎面碰上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带着一个警察正好跑过来。

这位学生模样的人，名字叫汉斯福列达，是神学院的学生。

福列达从国会图书馆回家，经过国会大厦时，同样听到了玻璃被撞碎的声音，汉斯福列达看到一个男人手里举着燃烧物正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爬，汉斯福列达于是赶紧跑到西南角向一位名叫布柏特的警察作了报告。

布伯特、福列达和塔拉三人来到出事地点。透过被敲掉玻璃的窗框，看到窗内有一人正点着火在里面走动。

布伯特向一位正在路过的国防士兵喊道：“有人正在放火烧国会大厦，快去报告派出所，让消防队来灭火！”

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在接到这个士兵的报告前五分钟就已经接一个民间人士的报告。

“二十一时十七分，国会大厦火灾。请求立即支援！”拉泰特让身边的随身警察带着这个报告走出派出所。

布伯特在请国防军士兵去向派出所报告后，朝食堂正下方房间里的人影开了一枪，但未击中目标。

此时是夜九时十三分左右。

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早于拉泰特报告之前，就接到了另外的人送来的火警报告。时间是在九时十三、四分左右。

消防总署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利尼恩街第六消防队和莫特凯街第七消防队出动。

拉泰特掏出手枪，推上子弹，带上身边的两个警察，疾步来到了国会大厦的北部左边的楼道。隔着通向议会厅的门，看到厅内正在冒着火焰。

议会厅的西门上并没有上锁。拉泰特推开门和随身警察进入了会议厅内。

厅里鸦雀无声，四周一片漆黑，拉泰特用手电筒向四周扫视了一遍，并未见到一个人影。只有正前方的議長席和議員席周围的帘布正在燃着火。

“厅里一定还有人！”

拉泰特和随身警察正跑出议会厅，跳上警车，直开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给林登警察总署打电话。

林登警察总署接到拉泰特的电话已是九时二十五分。此时警察总署的消防车早已赶到国会大厦。

拉泰特走后不久，国会大厦的守卫长舒克拉维支带着巡查佩歇尔，偷偷打开了拉泰特走时随手关上的议会厅西门，然后往里窥了一眼。

舒克拉诺维支和佩歇尔来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

“站住！举起手来！”佩歇尔举着枪冲了过去。

逃跑的人站住了。

佩歇尔扭住了这个人的右腕，只见此人光着膀子，一身大汗淋漓。

这时已是九时二十七分。

“为什么要到大厦里放火？”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问被抓获的人道。

那人情绪激动地脱口高喊：

“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佩歇尔从被抓获者的身上搜出了传单和护照。

佩歇尔借着手电的光亮，打开了男人的护照。上面贴着一张戴冠照片，写有持照者的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日：

“玛丽努斯·范·德·卢贝。一九零九年一月十三日生。荷兰。莱登。”

由队长普列指挥的第六消防队的四辆消防车正在灭火。

普列打开食堂的一扇门往大厅走去。

普列从大厅走进有成廉皇帝纪念像的大厅时，碰上了第七消防队队长克罗兹。

克罗兹对普列说：“整个会议厅变成一片火海！”

除第六消防队和第七消防队的八辆消防车，先后又有另外的十多辆消防车赶来参加扑救会议厅的大火。

拉泰特巡查部长从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回来后，从二号便门进入了国会大厦。

拉泰特在搜寻着火的起源处。他走进二号便门左面的洗手间，在那儿，他发现了一条公用毛巾正在燃烧。

拉泰特来到了第一层楼房。在南门旁边的楼梯上，拉泰特发现了作案者帽子、领带、还有肥皂头。

这时已是九点三十分左右。

当第六消防队队员伏利兹·波尔晓夫和谈利比·尼斯特从餐厅进入配膳室，顺着西门口的楼梯往下走了三步时，一道手电光从下面照上来。“停住！不准往这边来！我们是警察！”波尔晓夫和尼斯特吓得转身往回走。

除议会之外，其他地方的火，到九点半至九点四十五分，火势达到了最高潮。站在四十里外，也能看清从房顶上升起来的巨大烟柱。快到十一点，整座大厦的火才被扑灭。

在大火扑灭后，在政治警察部队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刑事警察们立即开始了现场侦查。

刑事警察向守卫的温特问道：“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

温特回答：“共产党的议员托格勒和凯念”。

狄尔斯兴奋地对他的部下说：“纵火就是共产党暴动的开始！”

狄尔斯立即给纳粹冲锋队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负责人哈因里·海尔道夫写了一封信，声称共产党的暴动已迫在眉睫。

海尔道夫接到狄尔斯的信后，立即向冲锋队员发出了逮捕德国共产党活动家的命令。

海尔道夫在向冲锋队员下命令时说：“共产党要趁混乱之机搞暴动。要马上动员全体冲锋队员，防患于未然！”

一夜之间，共产党的大半活动家被逮捕。

对共产党抓捕活动，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夜开始，一直延续到四月末。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写道：

“其规模仅次于俄国共产党的德国共产党，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了。”

卢贝这个有着幻想狂的“共产党员”断送了德国的共产党组织，为希特勒的阴谋铺平了道路。而与卢贝一起密谋的三男一女却不知去向，甚至卢贝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会不会是纳粹的冲锋队员化妆成所谓的“共产党员”煽动这个早就脱党的卢贝？这是一个悬而又悬的秘密。

卢贝是一个对纵火有特殊癖好，而头脑却十分愚钝的共产党人，这个没有头脑的纵火狂是上天送给纳粹党的好礼物。

其实他在小酒馆吹牛说要烧几所政府大厦，还要烧国会时，冲锋队的便衣早就暗中注意到了。而这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人所要干的正是希特勒准备干的勾当，难道纳粹就不会暗中用钱培养一下这个一文不值的共产党流浪汉？

3. “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时刻到来了！”

1933年2月27日夜九时十五分，威廉普鲁士内务大楼。

身兼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赫尔曼，戈林正在加班。

突然，戈林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戈林接过电话，电话传来了当夜国会议长官邸值班守卫惊慌的报告声：

“我是保尔·阿德曼，国会大厦被人放火了！”

“什么！”戈林立即惊叫起来。

戈林放下话筒，向副官W·雅科比发出命令：“把格劳埃尔特叫来！”

路特维希·格劳埃尔特在五天前刚刚被任命为内务部的警务局长。

格劳埃尔特接到戈林的电话后，马上赶到了内务部办公室。

戈林告诉格劳埃尔特：“听说国会大厦被人放火了”。

“我们现在就到国会大厦去吧。”戈林接着说。

戈林和格劳埃尔特于九点半乘车来到了国会大厦。

戈林一下车，除了对消防队队长瓦尔塔·盖姆作了消防指示，还及时听取了国会事务局长莱因霍尔特·加来汇报国会大厦的有关情况。

“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戈林问道。

“共产党的议员恩斯特·托格勒和威廉·凯念两人。”加来问答说。

戈林转过身对格劳埃尔特说：“这最后离开的两个人是重要的嫌疑分子，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几分钟后，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向戈林报告：

“犯人已被抓住，是个二十四岁的荷兰工人，好象是共产党员，托格勒和凯念直到晚上十时才离开国会大厦。”

戈林狂叫道：

“够了！那不正是起火后的时间吗？”

狄尔斯接着说：

“据下面报告说，犯人在被抓获时，口中高喊着‘这是革命的信号’，‘是为了抗议’。”

戈林：“信号”他说是‘革命的信号’了吗？”

“是的。”

戈林立刻发出命令：“狄尔斯，这是共产党要通过纵火，制造混乱，乘机搞武装暴动，刻不容缓，全体警察马上进入戒备状态！”

“明白！”

狄尔斯应命而去。

国会起火时，希特勒正在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家里吃晚饭。

希特勒和戈培尔接到国会大厦被烧的报告以后，急忙乘车赶到了国会大厦。

戈林向希特勒汇报说：

“是纵火。犯人已经被逮捕。是荷兰人，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议员托格勒和凯念是最后离开国会的。我已下命令派人去抓捕。”

希特勒边点头，边对在场的人说：“这是暴动预兆！懂吗？共产党将要发生爆动！”

戈林和戈培尔与希特勒一起从二号门进入了国会大厦。

希特勒窥视着火势已消的议会厅挥动着双手，激动地说：“该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了！谁敢反对我们，就把谁统统干掉！共产党的活动家全部都要枪

毙！今天夜里要把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绞死！同情共产党的，要把他们关进监狱里！对社会民主党和国旗团也如法炮制！”

十点半，希特勒召集了政府首脑会议。希特勒在会上的讲话中断言纵火案是共产党预谋的犯罪所为。

希特勒情绪激昂地说：“说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这是天佑！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到来了！诸位，你们将马上会看到结果的！”

纳粹党人居然发现了一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人为他们放了火，这种巧合只有天知道了。而希特勒在会上的激动无比，好象烧了国会他更兴奋，比当年夺取总理还激动。

事实上，放火烧国会这个主意是戈培尔提出并经元首希特勒首肯的。当时在普鲁士政府内政部供职的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作证时就说过：“最初想到放火的是戈培尔。”而纳粹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则在后来的供词中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了。因此他命令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在大火燃起之后立即逮捕一批共产党人的名单”。从这个供词中，可以完全知道，放火者的一切行动都掌握在纳粹头子们的手中。

第二次大战初期，“国会纵火案”已经过去八年，当时任总参谋长的哈尔德有这么一段日记：“在1942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话题转到了国会大厦，戈林大声打断大家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

一切都非常清楚，卢贝是受纳粹党人利用的，而且主要放火的工作是由冲锋队干的。这个荷兰人不可能在两分钟就把这么大的建筑物烧掉。事实上，卢贝潜入大厦两分钟前，中央大厅就燃烧起来了。卢贝只做了一个替死鬼的角色。

4. 天佑？还是预谋？

1933年1月30日成立的希特勒内阁原是“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和保守的“国家人民党”的联合政权。

当时，纳粹党还未在议会占多数，就是和人民党联合起来也未超过半数。

如果能把共产党的议席排除，政府执政党就有希望在3月5日的大选中超过半数，甚至就是纳粹一党也有过半数的可能。

根据当时德国现有的宪法规定：只要获得国会中三分之二的议员的支持，总理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掌握全权。即所谓的授权法。希特勒最想获得授权法。

早在纵火案发生前的几个月的1932年10月29日，希特勒在回答兴登堡总统关于对未来政权的设想的对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国会应该通过授权法，我和新政府要以它作为基础。除了我而外，国会不能给其它任何人授权法，有了授权法，问题就可以解决。”

当时的希特勒内阁，除希特勒本人，外加弗利克和戈林外，其它的内阁成员全都属于保守派人士。总统兴登堡和保守界人士为了抑制希特勒的独裁和激进，决定先利用希特勒，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就将希特勒踢出内阁。

宪法规定：总统拥有不经国会同意就可以任免总理的特权。

在总统拥有的特权中，除了随时可以解除希特勒的总理职务，还有一条，就是可以拒绝在违背自己意愿的国会所制作的法案上签字，使之不能生效而成为一张废纸。

在3月27日夜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后，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上，希特勒认为这是给了执政党在新议会中能获取半数以上的议票和能够使授权法通过的“天佑”良机。

一旦上述两点获得成功，希特勒就可以完全摆脱总统的节制，成为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名符其实的独裁者。

所以，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迫不及待地上了“奔驰”，在戈培尔的陪同下，直驶纳粹党的机关报《民族观察家》编辑部。

希特勒和戈培尔到达编辑部，已经快到零点。

《民族观察家》的晨报已经排版完毕，编辑们都已回家休息。编辑部只有几个工人围着火炉在闲谈。

戈培尔下车后，便去敲编辑部的门，工人们对于敲门之声不予理睬。

当戈培尔好不容易将门敲开时，来开门的工人满肚子不高兴地说：“找谁？明天上班再来！”

“混蛋！”希特勒一声怒吼。

当排字工人看清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希特勒和戈培尔，顿时惊呆了！

希特勒派人叫来值班的副总编辑，对他发出命令：

“国会大厦被共产主义者纵火烧了。《民族观察家》明天的晨报要改版！”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纳粹的新闻媒介发表了戈林起草的一份公报说：

“通过已经侦查得出的结果表明，2月27日二十一时十五分，国会大厦内数处发生火灾系属纵火。

“这次纵火，从其胆量和规模来说，是共产党所为。

“在对冠名为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共产党总部进行查抄后……发现了共产党大量的绝密材料。其中包括有共产党已经策划好的阴谋铁证。

“对国会大厦纵火，本来会成为共产党发动血腥叛乱，以这次纵火为导火线，造成内乱局面。

“由于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这个肮脏的预谋失败了。纵火犯已当场被捕，他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贝……”

公报发出后不久，希特勒便在威廉街的总理官邸召开了内阁会议。

希特勒在会上向各到会官员介绍了国会纵火案的经过情况，然后接着说：

“我要对共产党采取最坚决而严厉的手段！”

希特勒还宣称，按原计划举行3月5日的国会选举。

希特勒讲话结束后，戈林说明了关于案件的侦察经过，其内容和所发公报完全一样。内阁会议结束后，希特勒直奔总统府官邸，请总统签署内务部制定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

这项法令是以“对付共产党暴力活动的自卫措施”的理由颁布的。对此，内务部长戈林曾宣称：

“这个赋予空前广泛侦察权的法令，虽主要以共产党为对象，但间接地也跟共产党一起活动或支持、帮助共产党犯罪的人为对象。”

这个法令的第一项废除了魏玛宪法的基本人权规定，为后来希特勒把德国变成警察国家奠定了基础。

希特勒从纵火案件得到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按自己的全部意志制定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得到通过和实施。

3月5日的国会选举如期举行。纳粹党和国家人民党的票数终于超过了半数。

大选之后，纳粹对仍保持独立性的地方政府，直到市镇村，实行了彻底夺权。希特勒政府因此而奠定了在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的基础。这是希特勒利用纵火案作文章捞到的第二个好处。

国会纵火案的侦察，由国家秘密警察负责，仍在进一步地进行。

希特勒利用纵火案获得了镇压异党和反对自己的社会的特权。以及掌握了德国全境的地方自治政府，与国家人民党等保守势力相比已占了优势以后，于3月21日提前召开了国会议会。预定将授权法提交国会审议。

会议选择在波茨坦的忠烈祠举行。

3月21日是俾斯麦在1871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忠烈祠有皇室的墓地，是帝国主义者的圣地。

希特勒选择这样的日子和地点是有所用心的，目的是要唤起保守派们对帝政时代的怀念。

会议的开幕纪念仪式在腓德烈大帝的墓前举行。身穿旧普鲁士军队元帅服的兴登堡总统、前王太子和旧普鲁士军队的将军们应邀与新议员一起出席了纪念仪式。

这个使梦想复辟帝政的保守主义者们拜倒在希特勒独裁者脚下的日子。后来被人们称为“波茨坦日”。

纪念仪式向整个德国人表明了谁是德国的统治者。在这次国会上，由于纵火案，共产党的议员或遭监禁，或隐蔽起来，或逃往国外，没有一个人出席会议。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因遭到同样的排挤和打击而未能出席会议。

3月23日，新国会改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举行。

整个歌剧院被纳粹冲锋队包围起来，到会的议员受到了无声的压力。

下午二时十五分，希特勒发表了施政演说。

希特勒演说结束，开始了长达三小时的休息。

休息过后，对授权法进行投票。

投票结果：出席会议的五百三十名议员中，赞成的四百四十票，反对的九十四票。

授权法通过投票得以通过实施后，希特勒所梦寐的夙愿得到实现，不再是兴登堡总统的傀儡，而是一手独揽大权。

授权法的实施是希特勒利用纵火案得出的第三个好处。

希特勒紧接着解散了德国的工会组织，废除了政党制度，建立了纳粹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

由希特勒导演的这场“贼喊捉贼”的国会纵火案，为纳粹党的独裁统治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尽管法庭屈从于希特勒的淫威，但是在后来审讯中，戈林、戈培尔，包括希特勒本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只是为时已晚，因为希特勒借此威胁兴登堡总统，不仅残杀了大批德国共产分子，还制定了许多保证纳粹党顺利夺权的法律。希特勒开始成为德国法律的象征。

事实上，在后来不久的莱比锡举行的审讯时，就确定卢贝这位昔日的荷兰共产党傻瓜根本没有足够的引火物，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可以把这么规模宏大的建筑烧掉。他的四根炭精棒和一盒火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根据专家提供的证词，几处大火都是由化学物和汽油引起的，而卢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带进去。

那么谁是卢贝的同谋呢？

5. 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

3月3日，波茨坦街“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约汉涅斯·赫尔玛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柏林警察局。

赫尔玛向警官瓦尔塔·霍尔茨豪萨报告说：“范·德·卢贝在纵火案发生以前，曾经常到我们的饭馆里来跟一个俄国人坐在饭馆的角落里嘀咕。”

瓦尔塔·霍尔茨豪萨对赫尔玛所提到“俄国人”的证据感到振奋。因为一提到俄国人，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共产党。这不就是共产党纵火国会大厦的证据吗？

霍尔茨豪萨告诉赫尔玛：“如果再见到俄国人到店里来，你就马上来报告。明白吗？”

虽说卢贝纵火国会大厦的人根据调查的推理有“六、七个人”。但现在逮住的只有卢贝和恩斯特·托格勒。其余的至今一直找不到线索。赫尔玛的报告使霍尔茨豪萨心中充满了希望：“要是能逮住一个俄国同案犯，不是一切调查都可以打上句号了吗？”

3月9日，瑞士作家鲁道夫·赫迪加去波茨坦大街的“巴伐利亚饭馆”等两个保加利亚人。其中一个是他的老相识布莱戈伊·波波夫，另一位是他未曾见过的年青人。

为了甩掉纳粹的盯梢，赫迪加自早上走出所居住的库林卓尔大街九十六号公寓之后连续换乘了几次公共汽车和电车，兜了不少圈子后，于上午十一点钟才到达“巴伐利亚饭馆”。

那两个人已先于赫迪加到达了饭馆。

身材修长的波波夫和赫迪加打过招呼后，便把身边的青年人介绍给他。

赫迪加用保加利亚语向年青人作了自我介绍：

“我是鲁道夫·赫迪加”。

这位自称为“鲁道夫·赫迪加”的人就是正在流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鲁道夫·赫迪加”是他使用的化名。

三人的谈话还未进入正题，两个便衣警察就出现在“巴伐利亚饭馆”的门口，其中一个便是警官瓦尔塔·霍尔茨豪萨。

这显然是饭馆跑堂告的密。

两个便衣警察来到紧挨赫迪加三人的饭桌旁的桌子跟前坐了下来。

赫迪加觉得气氛不对，给另外两人作了示意，借故站起来要走。

霍尔茨豪萨突然站起来拦住三人的去路说：“对不起，我是警察，要看看你们的护照。”

鲁道夫·赫迪加很从容镇定地掏出护照递了过去，年青人也不慌不忙掏出了护照。

三人的护照都制作得很规范和精致。精明的霍尔茨豪萨马上便判断出它们都是假护照。正当霍尔茨豪萨要对赫迪加进行盘问的时候，没有护照的波波夫想乘机逃走，但一下子就被跟随霍尔茨豪萨一起来的另一便衣警察按倒了。

“跟我们走一趟！”三人被警察押上了警车。

在车上，赫迪加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进嘴中，未得嚼咽，就马上被霍尔茨豪萨扭住手，撬开嘴取出了纸团。这是一张由共产国际印发的一张传单。传单的标题是：“全德国的工人们，消灭法西斯！”

赫迪加等三人被带到国会大厦“俾斯麦厅”的侦察总部。

警官布莱舒维茨问赫迪加：

“你们到德国来干什么？”

鲁道夫·赫迪加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迟早都要暴露，干脆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了免遭国内敌人的迫害，我化名为鲁道夫·赫迪加。”

审查的结果，没有一个是侦察当局所希望得到的俄国人。

为了证实饭馆跑堂赫尔玛所作的证言，第二天德国警察便把“巴伐利亚饭馆”的工作人员和常客叫来辨认，有没有见过卢贝和季米特洛夫在一起。结果除赫尔玛以外，其他人都说没有卢贝和季米特洛夫在一起的印象。

由于在一年前，柏林警察局的政治警察部得到情报，有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经常到柏林的有关公共场所进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侦察总署把曾经目击过这个外国人的一位警察唤来辨认，季米特洛夫是不是他所见到的那个人。

这个警察一见季米特洛夫后便马上断言：

“没错！就是他！”

这样，侦察总部以卢贝同案犯的嫌疑把三个保加利亚人拘留。

政治警察搜查了季米特洛夫下榻的库林卓尔大街九十六号的房间，抄走了季米特洛夫的书籍，笔记本和记录之类的东西，并进行了仔细的查阅，但从中并未找到有关要在德国搞武装暴动和纵火的物证。

为了从政治的需要作出判断，证明三个保加利亚人是卢贝纵火的同案犯，希特勒指令政治警察必须找出一些事实作为证据。于是，侦察总部印刷了大批标明季米特洛夫三人相貌、特征的通缉令，四处张贴。

通缉令写道：

“1933年3月9日被捕的国事犯的名字、相貌和特征：

一、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七四。体胖。头发浓金色杂以灰色。胡子刮得很干净。脸呈蛋圆形。眼睛黄中带灰。金黄色的眉毛，呈月形。宽鼻梁。耳朵长。嘴大唇厚。上下牙均有缺损。会讲保加利亚语、德语和俄语。

二、瓦西里·康士坦丁·泰涅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六二。体胖。头发呈浓褐色。胡子刮得很干净。脸呈蛋圆形。眼睛暗褐色。眉毛金黄色，且左右相连。弯钩鼻子，耳朵椭圆形。会讲保加利亚语、土耳其语、德语和俄语。

三、莱戈伊·基米诺夫·波波夫。保加利亚人。身高一米八。削瘦。暗褐头发。胡子刮得很干净。长脸高额。眼睛呈暗褐色。月牙形眉毛。鼻子上翘。耳朵呈卵形。

上述三人长期逗留在德国进行政治活动，与国会纵火案有关系。知其居住、隐蔽场所及活动情况者，从速报告警察部门。有发现纵火案有关的活动证据者，政府给予重奖。”

通缉令提出，为了得奖，大量的“目击者”提供的情报象雪花样飞往侦察总部。

虽然侦察总部发现这些情报统统都是假的，但为了证明三名保加利亚人是卢贝的同伙。侦察部仍凭“目击者”们提供的证言，将三名保加利亚人判成了是国会纵火案的同犯。

季米特洛夫拒绝在审讯录上签字。他一直申明国会纵火时自己并不在柏

林。季米特洛夫坚决否定赫尔玛证明的他曾在“巴伐利亚饭馆”与卢贝见面的事实。因为跑堂赫尔玛证词中所说的日期，季米特洛夫正在生病卧床，从未离开过库林卓大街九十六号公寓。

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真的是卢贝的同伙吗？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通人。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正在日夜不停地为他们的主子寻找各国共产党在德国的蛛丝马迹。其用意昭然若揭。

6. 季米特洛夫的推理

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 1882 年 6 月 18 日生于保加利亚多米尔乡一个农民家庭。十全岁的，因父亲逝世，不得不中断学业，当了排字工人。

同希特勒一样，季米特洛夫也在未接受过系统的正式教育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人生的旅途。二十岁加入保加利亚民主党。

1904 年，十五岁的希特勒因成绩太差在奥地利的林吕匀中学被校方勒令退学时，二十二岁的季米特洛夫却由印刷厂工人工会负责人当选为保加利亚总工会书记。

1932 年 9 月下旬，季米特洛夫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领导了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保加利亚昌科夫政府下令逮捕所有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彻底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的起义领袖先后逃往南斯拉夫和维也纳城，建立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保共流亡委员会。

由于共产国际发现季米特洛夫是一个能坚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最后，为最忠实的执行者，只要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使是错误的，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所以，1924 年春，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季米特洛夫从维也纳召去，让他专门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

在 1926 年以前，季米特洛夫作为一个忠实的共产国际的办事员，勤勤恳恳地在莫斯科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这期间，他至于做了哪些具体事情，却是不为外人所知。

1926 年起，季米特洛夫被任命为巴尔干共产党联合事务局的负责人，以各种化名，在维也纳从事了三年的秘密活动。

1929 年秋，共产国际调季米特洛夫在柏林从事宣传和搜集情报的工作。这时的季米特洛夫，其头衔是共产国际西欧负责人。不过，他并不与德共直接发生任何关系。

从 1929 年秋带着共产国际的国际统治委员会伪造的身份证和护照潜入柏林，到 1933 年春被德国希特勒手下的警察逮捕，三年多时间里，季米特洛夫以柏林为据点，频繁地来往于巴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之间。

为了甩掉盯梢者，季米特洛夫在往返往地，到达秘密会客点和跨国活动时，总是不断进行巧妙的化妆或多次换乘不同车辆。虽然柏林警察早发现有个频繁活动的外国人“是共产国际活动家”，但总是抓不到这个人。

直到被逮捕前，季米特洛夫自信自己的秘密活动干得很漂亮。

从被拘留后受审的情况看，季米特洛夫发现，德国警察并不知道自己在柏林活动的具体内容。

“我被拘留，主要是持假护照和随身带有共产党的传单的缘故。即使被判有罪，大致在拘留几个月后驱逐出境吧？”季米特洛夫显得很乐观。至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天，他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人都不在现场。相信纵火案对他怀疑不久将会因调查清楚而消除。

4 月 3 日预审开始，德国警车把三个保加利亚人从莫阿比特送到了柏林地方检察厅。从预审时的警戒森严的气氛中，季米特洛夫感觉到了不详之兆，事情并不会象他预先想到的那样结束。

不出季米特洛夫所料，在第二天的审讯中，预审员申明了拘留他们三人的理由是：“一、企图以暴力颠覆德意志共和国政府。二、与卢贝共同策划向国会纵火，并企图在这以后发起暴动。”

预审官向季米特洛夫等三位保加利亚人出示逮捕证。

“你们搞错了吧？”季米特洛夫见到逮捕证后，先是目瞪口呆，但马上镇静下来，向预审员反问道

“‘巴伐利亚饭馆’的跑堂一定把奥地利作家雅科布·罗斯纳错当成卢贝了。我常跟罗斯纳在‘巴伐利亚饭馆’见面。”

“罗纳斯住在什么地方？”

“……”季米特洛夫不愿给朋友带来危险。

“2月26日，我还在慕尼黑，我是28日早晨才回到柏林的”。

“……”季米特洛夫在慕尼黑会见的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甭说公开他们的名字，就是请他提供证词都不行。

季米特洛夫虽然坚信自己无辜，但却找不出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他坚信，自己不仅与国会纵火案无关，而且与德国共产党也毫无关系。

季米特洛夫在被捕前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纵火案的消息时，首先得出的第一判断是：“只有疯子才干这种事情！”

而其后当共产党的活动家遭到大逮捕，他自己也被当做国会纵火案的嫌疑而被捕时，他不得不重新作出了这样的推理：

“也许是共产主义的仇敌搞的，他们企图以纵火来制造有利破坏工人运动和德国共产党的空气。”

“这些家伙，明知我与纵火案无关，却硬要把我搞成同犯，这是一个圈套！”季米特洛夫在作进一步的推理。

“法西斯政府为便其对共产党的镇压合法化，必须从共产主义者阵营中制造出‘犯人’来，于是，我被他们选中了。”季米特洛夫这样想到。“国会纵火案与其说它是共产党要暴动的信号，还不如说它是纳粹预造的阴谋！未来的法庭审判目的并不是为了辨清真相，而是一场向世界表明共产党有罪的政治表演！”

“这样表演的结果，将是十分拙劣的，但它表演的脚本现在却已经写好了。”——季米特洛夫想。

7. “这是贪婪的豺狼和它啃不动的羊的斗争！”

1933年9月21日上午九时十五分，德国莱比锡市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宣布：开庭审判国会纵火案犯。

担任这次刑事审判的法庭庭长，是魏玛共和国时代就曾审判过许多政治案件的老手威廉·宾格尔。有趣的是：

十年前，因“慕尼黑起义”失败而被逮捕的希特勒，也曾经被送上莱比锡法庭的被告席，当时能言善辩的希特勒以他特有的演讲天才征服了所有的旁听者，使法庭的被告席成为了宣传政治主张的讲坛，赢得了众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十年后的今天，希特勒却把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送上了莱比锡法庭，而这被希特勒送上法庭的人当中，却有人创造出了胜过希特勒当年法庭论辩更加轰动的宣传效应——

“千百万工人知道了他，他们同他一起体验了莱比锡法庭的整个阶段。他在莱比锡审讯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回声。他成了从来不认识他的那些人们的亲人。他们为了他的命运而痛苦，为他所受的镣铐创伤而耽心，为他的不眠之夜而苦恼。他们像为宣传劳动人民潜在思想和希望的革命讲坛而斗争一样，来为他而斗争。……”（马努伊斯基这个使“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回声”的人就是季米特洛夫。

为阻隔旁听人和被告，警察在旁听席前列成一行。

从保加利亚远道而来的季米特洛夫的母亲和妹妹、泰涅夫的妻子，还有托格勒的妻子也坐在旁听席上。

五名被告中的卢贝和托格勒被排在律师席的下面，三个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背后排成一列。

被告每个人的左右两侧教有警察监视，不准他们相互交头接耳。

第一个被审讯的是卢贝。

卢贝全部肯定了起诉书上的内容。此时卢贝头发蓬乱，弓着腰坐在被告席上，目光呆滞，无神地望着前方，面对庭长的审讯，露出茫然若失的表情，说适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支离破碎，矛盾百出。使得庭长不得不一再进行重复的发问。

旁听者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卢贝象一个痴呆症患者。

当记者们如实地报导了卢贝的奇异情态后，便出现了这样的传闻：纳粹为了不让卢贝说出纵火案的真相，让他喝了渗有促使神经麻木的酒或吸了鸦片。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是，大约半年后，季米特洛夫对一家法国的报纸的记者作了这样披露：范·德·卢贝是被监禁者中唯一吃特餐的人。送食品时，卢贝的一份用纸包着，特注上卢贝的姓名，由此而论，在卢贝的食物中渗上麻醉剂是不无可能的。

9月23日，轮到季米特洛夫作陈述。

季米特洛夫从容地打开笔记本，用德语简略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柏林的活动情况。他说：他之所以用伪造的身份证在德国非法逗留，是为了逃避保加利亚政府的追捕；在德国的活动主要是从事救援保加利亚流亡共产党。他重申：国会起火的当晚，他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列车上。与纵火案毫无关系。

开庭时，庭长宾格尔一再宣称“公正审判”，面对其自欺欺人的一场令人嗤之以鼻的闹剧，季米特洛夫不无幽默地形容“这是贪婪的豺狼和它啃不

动的羊的斗争”。

从审判一开始，季米特洛夫便把这场审判视为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冲突上的斗争。因此，作为共产国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季米特洛夫早已抱定决心：即使被判处死刑，也要在审判席上斗争到底！

这确实是纳粹审判当局事先始料不及的。

因此，季米特洛夫一开始就采取了挑战态度。他站在被告席上，俯身面向在场的听众声明：

“是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的，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来说，我是一个负责的和领导的工作者。因为如此，我不是一个采取恐怖主义的冒险家，不是阴谋家，也不是纵火犯……”

“当我从报纸上得知国会失火时，便马上想到，此举的煽动者不是可卑的煽动者，就是精神或政治疯子……”

“我确实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热烈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因为这个党正在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国家，并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领导下，这样英勇地和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引证了马克思的名言：

“‘他们（共产党）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

整个审判过程中，庭长先后多次阻止季米特洛夫讲话，但季米特洛夫，决定完全无视法庭程序和日程，他要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强调自己的遭逮捕的无理，暗示纵火犯发生的真正背景。

庭长提醒季米特洛夫：“我不允许你在法庭上任意作共产主义宣传。你总是这样干。倘若你再这样放肆。我就不得不阻止你的发言。”

季米特洛夫毫不理会庭长的警告，仍滔滔不绝地辩论道：

“我必须绝对否认那种认为我是追求宣传目的的说法，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辩护已经产生某种的宣传效果。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行为可以作为其他被控的共产党人的榜样。但是那些都不是我的辩护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反驳这个说托尔格列尔·波波尔·汤尼夫和我自己与国会纵火有关的起诉书和控诉。……一定要提到宣传问题，那么我不妨公平地说，在这个法庭里有很多发言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戈培尔和戈林在这里出庭，起了对共产主义有利的间接宣传作用，但是没有人能以他们的行为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而责备他们。”

季米特洛夫说：

“不仅我自己被报纸肆意攻击——我对这种事是完全漠然视之的——而且我的民族也因我而被指控为残忍的、野蛮的。我被叫做巴尔干的可疑分子，一个野蛮的保加利亚人。我对这类事不能默而不言。

是的，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保加利亚的工人阶级、农民和文化是既不残忍、也不野蛮的。

是的，巴尔干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能同欧洲其它部分一样高，但是要说保加利亚民族在政治上或精神上比其它民族低，那就错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政治愿望与其它民族的斗争和愿望是同样的崇高。在外国奴役下生存

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及其民族性的一个民族，已经并正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的工人和农民构成的一个民族——这样的民族不会是残忍的、野蛮的”。

“挑拨和疯狂——有人对卢贝进行挑拨，驱使狂人卢贝去纵火”。

季米特洛夫的强有力的雄辩打动了在座的记者和一切旁听的人的心。

美国记者埃德加·甘萨后来写道：“谁也没有料到季米特洛夫会采取那般令人佩服的大气态度。岂止如此，这位保加利亚人是聪明绝顶的。”（《欧洲内幕》）

季米特洛夫的锋利辩护，使法庭和纳粹党人狼狈不堪。谁是卢贝的主子显然已经大白天下。然而，希特勒是一个不要法律的人。他自然希望季米特洛夫是放火的指使者。即使不是，只要这个保加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被推到被告席上，就对纳粹党有利。至于审判的结果如何，希特勒是并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这场大火总算烧起来了。

8. 整个审判的最大之谜

在莱比锡法庭审判前半年的3月3日对卢贝的预审中，谈到关于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动机时，卢贝当时曾有这样的供词：

“我认为，为了表示对现体制的抗议，必须得做点什么。如工人阶级按兵不动，我一个人也应采取行动。考虑的结果，认为纵火是最好的办法。但因我不想伤害普通的人，所以就选择了象征体制本身的国会大厦。”

当时，不管怎样审讯，卢贝都矢口否认有同犯存在。3月3日预审记录中写道：“关于是不是我一个人犯罪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地说：是的！我未曾借助于任何人的帮助，在国会大厦里纵火是我一个人干的。”

事过半年，卢贝在审判庭上的表现和言词又是如何呢？9月24日至26日三天内，莱比锡法庭对卢贝离开荷兰莱登到柏林来的过程及其在柏林的活动重新作了审议。

当庭长按照卢贝预审时的自供书对卢贝进行提问时，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卢贝一律不再作出肯定的答复，只是作了“记不清”或“也许是那样”的模棱两可的回答。

从回答的方式和卢贝的痴呆状，使人们不由得产生了“所谓卢贝的自供是检察方面的捏造的”的印象。

为此，法院决定于27日对卢贝进行公审。就卢贝的作证能力进行审议。

27日下午，法庭审议卢贝在国会大厦里纵火过程时，卢贝对此的陈述含混不清。

庭长问卢贝：“你往会议厅西口放了三处火，准备干什么？”

卢贝：“不知道，什么没有想就放了火。”

庭长：“不说放火是信号？‘是革命的烽火’？是为了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吗？”

卢贝沉默不语。

季米特洛夫未经许可，突然站起来说：

“据说卢贝在预审时作了详细供述。可是他在这里却保持沉默，这实在令人费解。”

庭长举起手制止季米特洛夫再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不理睬庭长的制止，转身质问卢贝：“你以前是否听说过我的名字？”

卢贝沉默不语。

宾格尔庭长喝斥道：“不许提这个问题”！

季米特洛夫无视庭长的警告，提高嗓门向卢贝喊道：“哪怕是听到过一次也好，你说！纵火案的真情如何？你说！！”

卢贝仍不作声。

庭长再一次制止季米特洛夫：“你没有提问的权利！”

季米特洛夫并未收敛：“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范·德·卢贝。”

庭长问：“什么问题？”

季米特洛夫：“卢贝为什么在这里采取含糊其辞的态度？他先是肯定，接着又否定，后来又是肯定了再否定，然后，又沉默起来，这是为什么？卢贝对所提的问题到底理不理解！？”

庭长：“季米特洛夫！不许你对审讯插嘴！审判必须按规则进行，你无视规则，并肆意扰乱审议程序，我驳回你所提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仍然无视这一警告说：

“ 第三个问题，关于纵火一事，卢贝事前与什么人商量过吗？ ”

庭长：“ 你提这样的问题，想干什么？ ”

季米特洛夫：“ 我想问的是：卢贝事前是否跟人策划过。 ”

庭长：“ 这个问题也驳回。 ”

季米特洛夫：“ 最后一个问题，卢贝为什么采取这样大的活动？又是跟谁干的？ ”

庭长：“ 这个问题也驳回，关于这个问题，卢贝的自述你应该已听说过，他说是单独放火。 ”

卢贝的沉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始终是最大的谜。

卢贝为什么沉默寡言？是觉得自己了不得，是个英雄？还是有人从中指使，或者利用特殊手段使他不能开口，这一切都是尚等揭开的谜。

9. 一个等揭的谜

月 10 日，法庭移至柏林，开始了证据审理的第一次公审。

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就当晚的警备情况作证说：国会大厦二号门六点上锁，五号门在托格勒和凯念两位议员离开国会大厦之后，于晚八点四十分已经锁上。

这个证言十分重要。因为在九点十八分五号门重新打开之前，国会大厦的进出口全部锁上了，除非有万能钥匙，是不能从国会大厦里出去的。

拉泰特巡查部长说：当他接到警察布柏特委托从现场经过的国防军战士的报警之前，就从一个民间人士那里接到了火警报告。

庭长：“那个民间人士叫什么名字？”

拉泰特：“……”

庭长：“你接到民间人士的报告马上赶到了现场了吗？”

拉泰特：“是的”。

法庭庭长关于第一个报警的“民间人士”是谁的问题，只是蜻蜓点水似的一问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人的名字是谁呢？这是一揭不开的谜。

一直专心静听审讯的季米特洛夫发现当拉泰特提到不明姓名的民间人士时，却没有任何一个律师对此提出疑问？这是疏忽，还是默契？报警人为什么不出来作证？这难道不是当局有意隐瞒吗？

“庭长，我要提个问题。”把柄终于被季米特洛夫抓住了！季米特洛夫指出：假设是不知姓名的“民间人士”唆使卢贝纵火后，并向警方报告的话。那么欲嫁祸于共产党，就不必非要将国会烧光而只要轻轻地放上一把火后，便立即将卢贝抓捕起来就行了。因为一去报告，卢贝不容易跑掉了。

庭长听了季米特洛夫的推论立即制止：

“不要再讲下去！我已说过多次，此时你没有发言权！”

季米特洛夫还要辩论：“可是庭长……”

“不准你再浪费时间了！”

“请让我把话讲完。……”

“不行，禁止你再讲，再不听就要惩处！”

季米特洛夫：“我不是作为被告季米特洛夫讲话，我是要作为律师季米特洛夫讲话。”

庭长宾格尔和其他法官商量后宣布了惩处季米特洛夫的决定：“现今其退庭，并加以监禁。”

“这是剥夺我的辩护权！”季米特洛夫在两个警察的押送下出了法庭。

季米特洛夫终于第一次得出最圆满的结论：卢贝背后还有后台！而这人就是最早报答的“民间人士”！范·德·卢贝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浮士德，而唆使浮士德纵火的靡菲斯特——“民间人士”却溜掉了。靡菲斯特的目的并不在于烧掉国会大厦，而是要把卢贝作为纵火狂逮捕起来。他的任务是在确认卢贝纵火后，向警方及时作出报告。为了嫁祸于共产党，必须要有“证据”——逮捕卢贝。而假如那不明姓名的报警者的任务是要确认卢贝已经带着火种钻进国会大厦并开始放火的话，那么他就应当置身于国会大厦的附近。这样，他就有可能被人看见。但是为什么所有的目击国会大厦起火者都没有见到这个最选跑去报警的“民间人士”？

“这完全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季米特洛夫几乎惊叫起来。

道理很简单：“民间人士”之所在现场没有人看见过他，是因为国会大

厦失火时，他已经离开了现场。而一个没有在现场看见失火的人所报的警情又是如此的准确，不就因为是事先他已得到了纵火的准确信息吗？而这位第一报警者，不正是唆使卢贝纵火的恶魔摩菲斯特吗？

季米特洛夫兴奋得用两只拳头使劲地敲打囚牢的墙壁。

案情的轮廓终于清楚了！

可是清楚了又怎么样，希特勒早先声夺人，把他要做的事全部干了。不管是谁放的火，希特勒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0. 永远解不开的谜

判庭于 10 月 12 日晚间对国会大厦进行了现场检证。

10 月 13 日，法庭传唤纵火的当晚负责守卫五号便门的守卫阿尔伯特·温特出庭作证。

庭长：“被告托格勒和凯念是 2 月 27 日晚八点半走出五号便门的吗？”

温特：“是的。”

庭长：“他俩当时是什么样子？”

温特：“两人手里都提着沉甸甸的包，神情十分紧张。”

庭长：“他俩是最后离开大厦的吗？”

温特：“不，庭长。”

法庭顿时哗然！因为在这以前的所有审讯的证词中，都是说托格勒和凯念两人最后离开大厦。

季米特洛夫集中精力听着。

庭长：“就是说，还有另外的人在最后离开？”

温特：“是的，晚上十点多，一个没有戴帽子的也未围围巾的人走来，要求放他过去，我一问，知道他是议员，就让他通过了。”

庭长：“记得那个议员是谁吗？”

温特：“不知名字，只知他是民族社会主义党（纳粹）的议员。”

法庭内又是一片哗然……这个证员说明怀疑托格勒和凯念是纵火犯的一部分根据已不成立了。

检察官问温特：“你不是对侦查员玛劳斯基说过，托格勒和凯念是晚上十点离开的吗？”

温特：“我没有那么说，因为他问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人是几点，我告诉他是十点，”

庭内一片嘈杂声……

两天后，终于调查清楚，当晚最后一个离开大厦的纳粹议员，名叫赫伯特·阿尔普列希特。

“原来还有第二个库菲斯特！”季米特洛夫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共产党的托格勒和凯念之所以最先被当作嫌疑犯通缉，是因为有人证言说，他俩是在纵火案发生那天晚上十点钟才从国会大厦出来。而现在，除了托格勒和凯念的涉嫌开始减轻，而又冒出了一个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纳粹议员。

阿尔普列希特议员与国会纵火案有联系吗？这又是一个等揭的谜。

这个纳粹议员赫伯特·阿尔普列希特为什么会最后一个离开当天的国会大厦？他是不是受到元首的指示？或者趁人去楼空之时做了些手脚？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纳粹本来是准备向最后离开国会的两个德国共产党议员开刀，结果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法庭的否决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希特勒并不关心国会是怎样起火的，他所要做的是借“大火”将德国的第二大党派——德国共产党消灭掉，从而达到德国纳粹党一党专政的目的，因此，不管谁放的火，都对希特勒有利可图。

11. 其他犯人是怎样逃出去的呢？

火案中的纵火者是如警方所言的只是卢贝一人呢？还是如季米特洛夫推论的那样是多人作案？结论得等待专门委员会科学调查的结果来证明。

12月23日上午的证人是专门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埃米尔·约瑟教授。

约瑟教授首先在法庭上就议会厅里发生的火灾情况，向法庭和听众作了报告，约瑟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议会厅的火灾与其他场所相比，火势蔓延快，火灾规模大，不使用燃料是不可能的，而卢贝的炭精棒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燃烧效果的，（事实上，在前面的调查中已发现了使用燃料的痕迹）

季米特洛夫问：“有人作证说范·德·卢贝从‘侵入’到被舒克拉诺维支等发现，前后十五分钟内能否向那么多的地方放火？”

约瑟：“关于这一点，我作过反复推论，认为是不可能的。联想到食堂的玻璃是被某种硬东西打碎和卢贝被捕时浑身大汗淋漓这一情况看，我认为，对这次纵火是作了必要的准备的。且不论他是否只是用炭精棒放的火。”

庭长：“你所说的‘必要的准备’是什么意思？”

约瑟：“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但如果说是一个人纵的火，时间上显然是不够的。”

庭长：“那么，你认为如果有必要的准备，卢贝把引火物点着，在十五分钟内向那么多地方是有可能的，是吗？”

约瑟：“这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请你问消防队长。”

约瑟教授的证词否定了纵火只是一个人干的，他在证言中指出，这或许是几个人干的，或许是有人事先已向议会厅内撒了燃料，然后由卢贝一个人去点火。而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专门委员会对此是不能作出具体的回答。

约瑟教授还作证说：“犯人纵火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整个国会大厦烧掉，而仅仅只是想烧掉议会厅。向其他地方放火，是施用声东击西术，分散别的注意力，以延误人们扑灭议会厅里火的时间。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一点上：是几个人同时“侵入”国会大厦，同时放火呢？还是卢贝的同犯事先向议会厅撒了燃料，然后由卢贝一人去分别点火？”

如果是后者，当晚最后离开大厦人涉嫌的可能性就大了。

究竟属哪种情况，知情人卢贝在法庭上听人们辩来辩去而始终不谈。当人们反复问他，他都回答说：“是我一个人干的。”

季米特洛夫：

“……有一次我说到我同意起诉书的某一点，现在我必须再肯定我的同意，我指的是这个问题：对国会放火是卢贝一个人干的呢？还是他有同谋？……我自己的推论是，卢贝不是一个人单独放火烧国会的。依据专家的意见及所提供的证据，我断定议会厅的放火是与饭厅、展层楼等处放火有性质上差别，议会厅是由其他人用其他方法放的火。虽然在时间上，与卢贝的放火偶合，但是议会厅的火根本是有所不同的。卢贝从未在法庭上说出实话，现在他依然坚不开口。卢贝确有同谋，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决定其他被告人的命运。是的，卢贝不是单独一个人，但是季米特洛夫、托尔格列夫、波彼尔、汤尼夫并不是他的同伙。”

季米特洛夫的推理是：议会厅的火是别人放的，卢贝并不知道。当卢贝在食堂、盥洗室和大厅放火时，别的犯人向议会厅撒了燃料后点起了火。这个犯人知道卢贝“侵入”国会大厦放火的时间，而卢贝并不知道这个人已先

于他而存在。

但卢贝以外的犯人是怎样逃离现场的呢？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是无法从国会的门口逃出的。

“其他犯人是怎样逃出去的呢？季米特洛夫在苦苦思索着

12. 戈林在地庭上哑口无言

11月4日进行第三十一次公审时，侦破此案的最高负责人纳粹党的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亲自出庭作证。使纵火一案的审判达到了最高潮。

在审判之中，季米特洛夫和戈林针锋相对，唇枪舌战……激烈的法庭辩论，最后惨败的戈林恼羞成怒……

除希特勒外，戈林是德国当时最有权力的人。

在卫队的护卫下，戈林步入了法庭。

戈林带着藐视一切的笑容，摇着魁梧的身子，走到证人席。在戈林冗长的控诉词结束后，法庭让季米特洛夫对于戈林的证词进行答辩。

季米特洛夫一开始便反问戈林：“作为内政部长，戈林在2月28日和29日两天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查明火是怎样起的和卢贝是怎样潜入国会的情形。因为在这以前的一系列调查和审讯中已确定：起火前夕，卢贝曾在亨尼斯多夫的警察简易旅馆过夜。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不知姓名的人。”季米特洛夫用这种问题来强调自己控诉戈林曾直接操纵纵火案，因为亨尼斯多夫作为警察控制区，可以在那里从警察和警察有关的人中间去寻找纵火犯的原始踪迹。

季米特洛夫还质问戈林：“2月28日就国会纵火案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说卢贝身上除了带护照外，还带着荷兰共产党党证，你当时是从何处知道卢贝身上有党证的？”

戈林：“老实说，我并没有把审判放在心上。送到我身边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看过。只有一份报告说，你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这份报告我倒看了。因此，我猜想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你一定早就搞清楚了。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从我的部下的口袋里掏出成问题的东西，假如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有警察，警察会侦察一切。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警察会把他们查到的一切东西都全部报告给我。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季米特洛夫：“是这样吗？部长先生？”

季米特洛夫和戈林经长时间论辩，在季米特洛夫无懈可击的逼问下，戈林只有招架之功，且答词时常强词夺理，漏洞百出。

戈林很快失去控制力，紧握拳头，当着所有的听众向被告季米特洛夫大肆咆哮：“共产党就是罪犯，要把共产党消灭掉！”

当季米特洛夫以严密的逻辑论证驳斥戈林时，戈林高声暴喊：“季米特洛夫，你在我的眼里，只不过是是个无赖，是一个早该上绞架的流氓！”

季米特洛夫：“好极了！我非常满意部长先生的这种回答！”

戈林不顾自己是部长，到法庭的身份是证人，开口大声斥骂季米特洛夫：“滚出去，骗子！”

季米特洛夫用沉着的、意味深长的语调一字一字地说：

“你害怕我的质问，部长先生！”

戈林：“你是骗子，我不怕你，但是你要小心，你离开这个法庭，还会落到我的手中！等着吧！流氓！”

庭长宣布：“三天之内不准季米特洛夫出庭。把他带出法庭。”

季米特洛夫被强行拉出法庭。

作为一国部长的戈林，以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上理屈词穷，公然横蛮不讲理地辱骂和威吓被告，并把被告撵出法庭，这种场面，引起了全世界的公

愤。

全世界的报纸，除了共产党许多资产阶级的报纸也都从公正的角度对德国法西斯的野蛮行动作出了否定的评价。

英国《观察家报》：“必须指出，戈林先生，即第三帝国的将军和普鲁士的总理，在这个时候作了一次不体面的表演……戈林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以求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戈林将军丝毫不能说出反驳‘褐色书’的论证来。他不能提出任何一种反被告的论据，也不能提出任何一种足以消除对国社党人怀疑的论据”

伦敦《每日电讯》：

“当戈林侮辱被告季米特洛夫时，法官没有勇气把戈林撵出法庭，这就等于切腹自杀。在审讯中总是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我们现在还是想知道：国会纵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瑞士《新苏黎世新闻》则发表了更加尖锐的评论：

“戈林在其荒谬的狂怒中，对季米特洛夫所施的种种威胁，立刻就使整个法庭的审讯变得毫无价值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甘萨旁听后发往国内的消息中写道：

“季米特洛夫使戈林大发雷霆，面红耳赤，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载入史册了。”

季米特洛夫与戈林的交锋，虽然将国会纵火案中的审判推向了高峰，但对于查明纵火案的真相依然未起到什么作用？那么纵火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3. 纳粹议员的证词

进行国会纵火案的第三十七次公审时，当天下午，在季米特洛夫强烈的要求下，纵火当晚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纳粹议员赫特·阿尔普列希特被传唤出庭对证。

阿尔普列希特是晚上十点左右从国会来到五号便门，当时大厦的议会厅火烧得正是猛烈的时候，那么，在这以前阿尔普列希特是否会往会议厅中撒了燃料？这是季米特洛夫希望搞清的问题。

阿尔普列希特被传唤到庭后，在陈述他当晚在国会大厦的理由时说到：

“那天晚上，我因患感冒，提前回家休息了。晚上九点二十分左右，家里的女佣喊叫：

‘国会起火啦！’

我使吃惊地跳下床，跑到国会去。因为议员团房间里的保险柜里有文件，我想把它们抢出来。”

阿尔普列希特的家离国会大厦只有大约五十码左右，他急忙地赶到五号便门口向守卫温特说明了情况，便进大厦内把文件拿了出来。

季米特洛夫对纵火案发生后的一系列审讯中，不对阿尔普列希特进行调查的做法抱有怀疑，便进行如下的反问：

“证人到过国会内的什么地方？请明确地说出到什么地方？”

庭长：“证人在案件预审时，由福库特法官对此已作过调查，证人当时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进过会议厅了，是吗？”

季米特洛夫：“那么，你目击厅内起火了？当纵火发生后，调查专门委员会作关于案情的大规模调查时，你为什么不去报告？这是为什么？是认为没有必要吗？”

庭长：“你这不成其为质询，温特的供词是另一回事，警方已掌握了所有当时有关阿尔普列希特的情况。”

季米特洛夫：“如此重大的细节，警察却不对之作出系统的调查，这作何解释？”

检查员帕利修斯：“大概在2月27日、8日我们已传讯了女佣。这一点，我们可以告诉季米特洛夫，警察对此是做过调查的。”

季米特洛夫：“过人回答说警察未做过调查，检查员竞还要硬说调查过吗？”

检察员帕利修斯：“证人因在纵火的当晚进入大厦时已向守卫报过名字，情况属实，就没有再做进一步调查，不过，在当天夜里，警察已经搜查过阿尔普列希特的住所。”

从对纳粹议员阿尔普列希特的传讯证词和负责这一情况调查的检察员的证词中，找不出说谎的破绽。

“阿尔普列希特的证词真实的吗？”

季米特洛夫的心头上，仍然还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阿尔普列希特的证词几乎是凭空捏造的，因为他在家里听到“起火”的消息才回国会取文件。国会离他住处虽然不远，但既然女佣都知道了，这个议员还能冲进熊熊燃烧的国会吗？

14. “地球仍在转动”

12月23日，季米特洛夫作了最后的辩论。

在法庭辩论中，季米特洛夫嬉笑怒骂，雄辩滔滔。

在这之前，检察官维尔纳已经提议：

“三个保加利亚人，因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予以释放。”

季米特洛夫抓住最后辩论的机会说：“不仅包括托格勒在内的四名被告与国会纵火案毫无关系，而且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都与之毫无关系。”季米特洛夫还声称：“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三个保加利亚人，不是因证据不足而无罪，而是本来就无罪。”

季米特洛夫按照自己的推理指出了纵火案的真相：不是卢贝一人放火，而是还有同伙。

季米特洛夫推理说：卢贝在向市参事会、柏林城堡和福利局大楼放火后，在亨尼斯多夫的简易免费旅馆里，正好碰上弗朗兹·瓦钦斯基。卢贝向瓦钦斯基披露了自己的纵火计划，瓦钦斯基便按纳粹预先交给他的任务，煽动纵火者在国会大选前去烧国会大厦，破坏国会的按时选举。而单纯的卢贝并不知道这是纳粹精心策划的阴谋，而上当了，充当了浮士德。

瓦钦斯基在“格拉菲理发店”与卢贝分手后，便及时向纳粹上层人物报告了卢贝将纵火国会大厦的情况。纳粹按预谋决定利用这一“天佑”的时机——制造出一个彻底消灭德国共产党的借口。于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纵火阴谋便在卢贝到达国会大厦之前作了精心的策划。

对此，季米特洛夫在辩词中讲到：

“卢贝于2月26日在汉宁斯道夫遇到某一个人，于是告诉他说：打算去烧市政厅和皇宫，这不是可能的吗？这个人这样答复他：像这样的事简直是儿戏，在选举中烧了国会不是更有意义吗？”

经过政治煽动者和政治疯人之间的勾结，放火烧国会就设计出来了，这不是可能有的做法吗？

政治疯人今天坐在被告席上，而煽动者倒反而不见了！

当这个傻子卢贝正在笨拙地企图烧毁走廊和储衣室的时候，另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人不是正在放火烧议会厅，并使用如夏兹博士在这里说到的那种秘密的易燃的液体吗？

卢贝这时抿着嘴笑。由于一阵一阵的发笑而周身颤动起来了。所有的人，包括法官和被告在内的注意都集中在他身上。

季米特洛夫指着卢贝继续说：

这些知名的同谋者作了放火的一切准备后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士德，现在在被告席上而魔鬼却不见了。卢贝与政治煽动者的代表，工人队级的敌人是在汉林斯道夫形成起来的。”（《在国会纵火案审讯的演说》《中外演说词大观》）

对于卢贝的笑声，人们一时难于作出判断，是被季米特洛夫击中了要害而发出的悲叹的自嘲？还是认为季米特洛夫推理的荒唐可笑？

季米特洛夫加重语气，指着卢贝继续说：

“虽不知具体是什么人，但可以说，挑衅者是做了周密的纵火准备的。这个‘靡菲斯特’不留踪迹地消失了，只是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士德’留了下来。”

检查官声称：“卢贝是个共产党员，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他也是为着共

产党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勾当。”

季米特洛夫立即驳斥道：

“这种说法是绝对荒谬的！卢贝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共产党？不可想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的！他是一个不齿于本阶级的工人、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渣滓！他是一个被滥用的畜生，人们使他反对工人阶级，以及渔人之利的。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庭上的作为会像卢贝那个样子。无政府主义常常做些无聊的事，但是当他们在被拖到法院时，他们总是勇敢地站起来，说明他们的目的。倘若一个共产党员做了这类的事，明知四个无辜者与他在被告席上并肩而立，他不会默默无语的。卢贝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是法西斯滥用的工具！”

“与他一同被控的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团和我们三个保加利亚人，同他这个畜生、这个无聊的被滥用的替死鬼毫无共同之点，也没有任何联系。”

“让我提醒法庭，戈林于2月28日对纵火案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托尔格列尔和凯恩在昨夜十时从国会一块逃走。这个声明广播到全国。戈林在同一声明中宣称：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但是从来没有人打算调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的行动。也没有人搜寻与卢贝在那里一块过夜的人。”

庭长：“季米特洛夫！你打算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你的发言呢？”

“我还要再说半个钟头！”

“你不能永远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不慌不忙的说：“庭长先生：在这个审讯所经历的三个月期间，我曾有很多次不让我开口，对我保证说，在审讯结束时，我在答辩中将能畅所欲言。现在这个审讯即将结束时，但是恰与你的诺言相反，你又限制我对法庭的发言了。在汉宁斯道夫发生了什么事，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卢贝在那里过夜的人，瓦钦斯基还没有被发现，我请警察局搜寻他的建议，也被认为无用而遭到拒绝。倘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遇到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很早就要详加研究了，庭长先生！但是谁也没有兴趣去寻找瓦钦斯基，送起火的第一个消息给布兰登堡门警察局的那个青年也没有去搜寻；他的身份依然不明，他依然是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初步调查就错了方向。阿布雷希特博士，国社党议员，在刚起火后即逃出国会，也未受到讯问。在搜查不出来的地方，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搜查放火犯，而不在可以早就搜查出来的地方搜查放火犯。这样，就让真的罪犯们隐藏起来了。由于不能也不敢找出真的放火犯，就把别人捉来当替身。”

庭长：“我不允许你说这样的话。我再给你十分钟。”

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形势看，需要纵火的，与其说是共产党，不如说是纳粹。这一点已早就众所明了。

纳粹策划纵火案的目的是：

- 一、转移人们关注的纳粹同国家民主党联合夺取国会领导权的视线。
- 二、粉碎正在形成的工人队级的统一阵线。
- 三、为镇压德国共产党制造借口。
- 四、证明纳粹是使德国摆脱共产主义危险的救世主。

为此，纳粹策划了纵火案是个大阴谋。

戈林在案发的第二天早晨发表声明，规定了警察侦查的方向。警察不去侦查有犯人的地方，倒是去侦查没有犯人的地方。因此，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的同宿者——瓦钦斯基；火警的第一个报告者——“民间人士”；纳粹议员

阿尔普列希特，都被排除在侦察之外，而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保加利亚人却被置身于没完没了的审讯之中。

“这就给了真正的罪犯以隐遁的机会。于是侦查当局决定：如果不逮捕真正的犯人或者明知是谁而不能逮捕，那就必须抓到另外的人，也就是抓个替身。”季米特洛夫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检察方面在这场审判中是如何使证人作了许多伪证。

季米特洛夫从被告席上向审讯的组织者提出了一篇可怕的帐单。

“控告我们共产党人犯了像纵火焚烧国会那样卑劣案件的人，应支付法庭来审判！”

法庭一片喧闹。旁听席上的纳粹人员开始喝倒采。

庭长多次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制止他讲有关涉及到攻击纳粹和宣传共产党的言论。

季米特洛夫以傲岸的态度，无所畏惧的继续说：“当然，至于德国资产阶级法庭所不可能完成的，这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后才能完成。”

法庭又一次喧闹起来，出现了嘘声和怒骂声。

庭长：“我禁止你说这样恶意的话。”

季米特洛夫：

“警官海勒在法庭里宣读 1925 年出版的一本书上的一首共产党员所作的诗，来证明共产党于 1933 年放火烧国会。请允许我也来引证一首诗，德国最伟大的诗人的一首诗：

要及早学得聪明些，
在命运的伟大天平上，
天平很少不动，
或者是上升，
或者是下降，
不是统治，便是屈服。
不是庆幸，便是苦痛，
或者抡起沉重的铁锤，
不然就处于铁砧的地位。

的确，谁不愿做铁砧，就必须做铁锤！”

庭长：“无疑问他！你现在应该提出你最后的建议了。”

季米特洛夫：“我建议作如下的判决：

一、托格勒、波波夫、汤尼夫和我自己应予宣判无罪，起诉由于无根无据应予取消；

二、卢贝应予宣布为工人队级的敌人所滥用的工具；

三、对我们负诬告责任的人应受刑事处分；

四、我们在审讯中所受到的损失，我们浪费了的时间，我们被损害了健康，以及所遭遇着的一切苦难应予赔偿。

加上利息，来清算这笔帐的时间终会到来”！

“十七世纪，科学物理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曾受过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宗教裁判所认为他是一个异教徒，判处他死刑；而他却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叫道：

‘地球仍在转动！’后来这个科学原理成了全人类的财产今天，具有与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宣布：‘它仍然在转动！’

历史的车轮正在向前转动，现在在转动，将来还要转动——向着共产主

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

法警将季米特洛夫按坐到被告席的座位上。法庭里的纳粹党纷纷站起来，朝季米特洛夫挥动着拳头，怒骂起来。

宾格尔庭长宣布：“被告的发言超出了最后辩论的范围，他利用法庭进行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所以，禁止他再作发言。”

季米特洛夫面带揶揄的微笑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坐回原位。

法庭在十天后的 12 月 23 日作出最后一次开庭，庭长宾格尔宣布判决结果：

“被告托格勒、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汤尼夫无罪。被告范·德·卢贝因犯叛逆罪和纵火罪，处以死刑。”

接着，宾格尔庭长宣读了冗长的判决书。

判决书中未提及的有下述诸多的重要问题：

- 一、液体燃料是谁在何时、如何带进会议厅的？
 - 二、议会厅的纵火犯是如何逃离的？
 - 三、卢贝跟准备了燃料的人和其他纵火犯是何时何地认识，并制定纵火计划的？
 - 四、打开二号便门将议会厅的纵火犯放进去的人，是如何弄到二号门钥匙的？
 - 五、第一个报警的是谁？
 - 六、卢贝同宿于汉宁道夫的瓦钦斯基到底是什么人？
- 预审花了五个月，公审花了三个月的国会纵火案审判案最后留下了许多难解的谜……

15. “奥柏福伦备忘录”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在奥地利的杜尔希霍尔岑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一具德国男尸。

据奥地利警方调查后得出结论；被害者是家住慕尼黑的戈奥尔格·贝尔。

杀害戈奥尔格·贝尔的凶犯是约瑟夫·狄特利希和米卡埃尔·利佩年特，二人被捕受审，当时都是慕尼黑管区的冲锋队员。他们是奉冲锋从总警备长尤利乌斯·乌尔之命杀死贝尔的。在贝尔被杀后，案子一出来，当时流亡巴黎和伦敦的德国人中间盛传，贝尔是因为他口头和写信给朋友时暴露了国会纵火案的真相而被干掉。

在贝尔被杀后一、二个星期以后，在柏林的巫师艾利克·扬·哈奴森被枪杀。哈奴森是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冲锋队员负责人海尔道夫的知音。经海尔道夫的介绍，博得了迷信神灵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信任。

据说哈奴森在发生纵火案那天中午，曾在由慕尼黑来柏林的希姆莱面前施降灵术，预言会发生国会纵火案。

纵火案发生后，海因里希·希姆莱曾洋洋得意地声称“案子发生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而预知这一案件会产生是因为哈奴森施了降灵术。这就说明哈奴森在纵火案未发生之前就从海尔道夫的口中得知了纵火案的预谋。从纵火案发生后不久，狄尔斯写信给海尔道夫，海尔道夫未向任何上级请示，便出动冲锋队连夜抓捕共产党来看，说明纳粹当时设计了纵火案阴谋是站得住脚的。

而杀死哈奴森的是因露了机密而怕遭受追查的海尔道夫。杀了哈奴森，切断了追查线索，同时还起到一石击鸟的敲山镇虎的作用。

在哈奴森被杀的不久的5月7日，德北部的基尔市的警察署接到国家人民党议员团前团长恩斯特·奥柏福伦夫人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已经自杀了。

第二天，《汉诺威江报》迅速地报导他死亡的消息中说到：“自杀的原因似乎是由于他与他的党之间冲突”。

第三天，德国国家通信社发表了奥柏福伦4月12日写给国家人民党党魁胡根伯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近几周来，我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在这以前，政治潮流就会吞没了我”。从中得知奥柏福伦似乎预感到他将会遭到不测。

而在奥柏福伦自杀前的几天，即4月27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国会纵火案真相》的文章。

文中断言：国会纵火案的策划者是戈林和戈培尔。而纵火的队员是从纳粹的冲锋队和党卫军中挑选出来的，负责执行纵火任务的是埃德蒙特·海涅斯。

文中还指出：卢贝原来是为嫁祸于共产党而弄来的一个牺牲品。真正的罪犯们则把共产党的传单塞进了卢贝的裤兜里。

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揭露了国会大厦与国会议长官邸之间横隔着一条西姆逊大街。前者在街西，后者在街东。地面下有一条运送取暖用煤的地道贯穿东西。纵火队就是从这条地道由国会官邸钻进国会大厦。作案后又顺着地道回到了国会官邸的。

奥柏福伦死后不久，有消息传说《曼彻斯特卫报》的这篇文章的投稿者就是奥柏福伦。于是人们便把《国会纵火案真相》称之为《奥柏福伦备忘录》

在奥柏福伦自杀不久，纵火案发生时任柏林消防局局长的瓦尔塔·盖姆普被人谋杀。盖姆普在纵火案发生后一个月之后被解除了消防队的职务。

解雇的公开理由是：一是放任了共产党在消防局内部的地下活动；二是说他从社会民主党人手中买了一辆小轿车。但真正的要害恐怕还在于，纵火案发生后不久，瓦尔塔·盖姆普在对记者谈话中，暗示了纵火犯不只是一个人。盖姆普谈话的要点：

一、国会议会厅里扔有点火竿和炭精棒。有几处起火点，地板下撒上了汽油。

二、从竖立着威廉皇帝纪念像的大厦的沙发下面发现了燃烧过的火把。

三、燃料通过议长官邸的地下通道，运到了议会厅的速记员席。

四、消防员在国会大厦里碰到了一个人。

五、起火后，盖姆普欲命令柏林消防队全体出动时，戈林马上制止。

瓦尔塔·盖姆后来被以行贿案抓捕入狱，入狱后不久便死去了。当局发表声明，属于自杀。而外界则传说他是因知道了纵火案的真相后被抓捕而遭杀害。

把地下通道这个事实公诸于众。是奥柏福伦的一大功劳。

1969年5月，即纵火案发生三十六年后，国会大厦锅炉工海因里希·格留瓦尔特主动露面作证说：在纵火案发生前，他就在国会大厦工作过十三年，纵火案发生前接到向接见厅供暖还是第一次。

当时格留瓦尔特和他在一起工作的维托柯夫斯基，都认为接见厅里有人居住。但并没有看到里面住的是什么人。

当时格留瓦尔特为里面的人烧暖气，维托柯夫斯基则去接见厅看里面是否住人。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早晨，维托柯夫斯基以是共产党为由而被纳粹逮捕。从此杳无音讯。格留瓦尔特在纵火案发生后，受到盖世太保的审问，由于自己始终坚持说什么也不知道而免遭逮捕。

从纵火案发生三十六年后格留瓦尔特的证词中得知纵火案发生前夕国会大厦的接见厅第一次住了人，而这是些什么人呢？

由于盖世太保逮捕了维托柯夫斯基，使得议长官邸的职员们大受震惊，对纵火一事从来不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几个职员作证说：他们当时看见有几个冲锋队员和党卫军军人出入议长官邸。职员们称他们为“警备队。”

据格留瓦尔特的证词说，案发后，议长官邸的职员们曾交头接耳地说：“火是警备队从地下通道进去放的。”

2月26日和27日两天住在接见厅里的人，可以说就是自26日后到官邸接班的“警备队”。他们显然是带有明确的目的，住进接见厅的，就是说，他们要通过地下通道，“侵入”国会大厦，向议会厅放火，然后再从地下通道返回议长官邸。

梅因里希·格留瓦尔特的出现揭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

在纵火案发生的几天前，警卫保尔·阿德曼发现地下室和地下通道里有可疑的声音。

阿德曼以为是小偷，当时向上司作了报告。

1971年，戈特弗利特·特列维拉努斯作证说：“1933年2月25日或26日，舒克拉诺维支曾向我说过他听到地下通道里有声音一事。并说，当时舒克拉诺维支曾斩钉截铁地对特列维拉努斯说：地下一定有事！”

特列维拉努斯的证词证实了格留瓦尔特的证言。

经过几天的准备后，几个冲锋队员和党卫军人在案发的前天，以警备队来接班的名义，进入的接见厅并住了下来。

关于他们的举动，直到 1969 年 7 月 7 日，事隔三十六年后，当时曾在冲锋队参谋部政治科任职的知情人赫尔姆特·斯坦戈出来作证才让人真相大白！

一个历史上的大谜终于水落石出，但是这除了能对历史研究的增加一些趣闻，给后来的给凭添一些笑话外，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希特勒已经通过“国会纵火案”这个大阴谋而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国会纵火案”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勿须赘言的，因为希特勒政府正是根据这个案件任意钳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特别是希特勒当时捏造的共产党放火得到政府的“公认”，这样，千百万德国农民，无产者和一些中产阶级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希特勒靠“国会纵火案”加强了独裁统治，很快就走上了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因此有很多史学家把“国会纵火案”视二战的开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6. 谁是纵火犯的真正指挥者？

1933年2月25日夜，一辆卡车满载着折叠床、被褥、衣服和食品开进了通向国会议长官邸庭园的大门。

车上的东西卸下后，随即便被送进了国会大厦的接见厅。一切做得十分的神速和保密。

第二天，另一辆带篷的卡车运来了十五至二十五名冲锋队员和党卫军人，他们下车后，便进入了接见厅。

当时看到他们的人都认为这是警备队在换班，根据当时的目击者的证言，这些人进去后，原来在官邸里的冲锋队员和党卫军人都上车走了。

在这之前的2月25日早晨，普鲁士内务部新闻局宣布：前些日子，搜查共产党总部时查出了共产党策划武装起义的文件。同时，在这之前，还以政府的各种渠道传出了“共产党正在策划武装起义”的消息，这些都使人感到，“警备队”换班加人只不过是“加强议长官邸的警备”。

因此谁也不知道，这是由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冲锋队负责人海尔道夫精心挑选的纵火队。

纵火案发后，“奥伯福伦备忘录”认为这次带领冲锋队负责执行任务的是埃德蒙特·海涅斯。

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直接负责人不是海涅斯，而是柏林地区冲锋队负责人卡尔·恩特斯。

而恩特斯和海涅斯都在希特勒清洗冲锋队时杀掉了。

那么，指挥国会纵火案的直接负责人到底是谁呢？这一直是个难解的谜。

1969年7月7日，国会纵火案发生时任职冲锋队参谋部政治科的赫尔姆特·斯坦戈出来作证。才使人们知道真正的直接指挥冲锋队纵火国会大厦的不是海涅斯，也不是恩特斯，而是埃尔文·维拉因。

维拉因是冲锋队队员，在1934年5月4日，因“暴力伤害罪”被判八个月徒刑。维拉因后来又以叛变罪而被纳粹枪杀。斯坦戈当时在名岑法院里，是专门负责拟写审查维拉因案的材料之人。因此在纳粹清洗冲锋队之前，斯坦戈曾有机会跟维拉因直接面谈。并看过维拉因被判刑的有关材料。结果，斯坦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纵火案当中，维拉因就是率领冲锋队员钻进议长官邸的地下通道，并且是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直接指挥者！

维拉因的上司是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恩斯特的直接上司是戈林，戈林只对元首负责。把这些人物的社会关系串连起来，“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世上没有解不开的谜，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

第八章希特勒独裁

1. “我就是超人”

特勒是尼采哲学的信徒吗？

希特勒从未系统地学过什么哲学，他的思想是一些不责任和狂妄自大的乱七八糟观点的大杂烩。但是，希特勒却对尼采情有独钟，他常常到魏玛去参观尼采博物馆。大肆宣传他对这个哲学家的尊敬，还让记者拍他出神地瞻仰这个伟人胸像的照片。

尼采 1844 年 10 月 15 日生于德国勒肯，1900 年 8 月 25 日死于魏玛。他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造诣很高的诗人，他的著作大多用格言和警句写成，充满了譬喻和象征，把哲学和诗融成了一体。他的思想既有不少反对基督教虚伪道德的真知灼见，同时也包含着相当有危害性的毒素。

把尼采当作纳粹世界观的创始者之一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这个哲学家确实曾用其精辟的警句格言，来大力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度。宣传权力和意志，大肆赞美战争，宣扬主宰种族和超人的来临。几乎在任何想象得到的问题上，一个纳粹党人都可以得意地引用他的话，而且事实的确如此。

比如关于国家、权力和道德，尼采说：“社会一向认为美德不过是取得力量、权力和秩序的手段。国家是有组织的不道德……所谓生活权利、工作权利、幸福权利这种东西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人类同最低等的蛆虫没有区别”

比如战争，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模仿旧约的语调写道：“你们爱和平应以它作为新战争的手段，爱短期和平应胜过长期和平。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我劝告你们不要和平，而要胜利，你们说，和平是甚至使战争也变成神圣的事业？我劝你们说：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成神圣。战争与勇气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慈悲。”

我们还从来未见过有哪一个哲学家曾经如此露骨地歌颂战争。这不正是希特勒所需要的吗？

关于女人，尽管尼采从未接触过女人，但他极端蔑视女人，他说，“男子应受战争的训练，女子应受再创造战士的训练。其他一切都是愚蠢的行为。”他甚至禁不住地说：“你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带你的鞭子！”

这与希特勒的纳粹党对女人的态度多么相似，他们规定女人应该回到厨房去，她们在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是为德国战士生男育女。

尼采还预言未来的社会精华人物将统治世界，超人将由此诞生。尼采在《权力的意志》中写道：“一个大胆的统治者种族正在加强自己……目的应该是为在智力和意志方面天赋最厚的一种特别强壮的人准备根据新的原则估计价值标准。这种人和他周围的精华人物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

也许这种绕来绕去的话比较难懂，但他也有说得明白的时候：

“超人是肉食猛兽，杰出的金发碧眼野兽，虎视眈眈地等待扑向猎获物和胜利”。

这些话在希特勒混乱的头脑中一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常常提到“地球的主人”。毫无疑问，希特勒最后认为自己就是尼采所预言的超人。

既是“超人”，发动战争就是他的本性，残酷无情就是他的特征，而使渺小的芸芸众生们绝对地服从“超人”也就是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2. 枪口下的“民主”

特勒对民主没有任何好感，他曾把“民主”和“共产主义”一样认为是极“肮脏”的东西。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没敢把它彻底抛掉。而是假惺惺弄了弄所谓的“民主”，目的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我们来看看希特勒玩的什么民主把戏，我们来领略纳粹历史上这一“民主”的奇观——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民主”。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但此时希特勒并没有掌握绝对权力，上有总统，尽管已经老态龙钟，下有国会，这仍然是一块必须铲除的绊脚石。

首先希特勒搞了一次国会选举，这是纳粹党第一次也是德国最后一次比较自由的选举。对于这一次选举，戈培尔兴高采烈。他说：“现在继续斗争就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电台和报纸都可以借我们使用。我们要给大家看看一个宣传杰作。而且这一次当然不悉没有经费了。”

于是，希特勒和戈林召集二、三十个德国工业巨头聚会。在会上，首先由希特勒发表长篇讲话，恩威并施，先给他们一点甜头，然后说：“即使我不能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我也要以其他武器继续执政。”

接着，戈林开始谈要害问题，那就是要这些老板们掏腰包，戈林说，为了实现总理许诺的种种好处，你们必须作一些“钱财上的牺牲。”“如果企业界认识到，这次选举将肯定地是今后十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也很可能甚至是今后一百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他们承担这种牺牲一定会容易得多！”

果然，这一招真灵，据说这一次募集到了三百万马克。

在竞选运动逐步展开的时候，希特勒决定先给他的对手们一点颜色看看。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车满车的冲锋队员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去，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报纸和政治集会已遭到了取缔，社会民主党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报刊也被勒令停刊，民主党派的集会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只有纳粹党人和他们的民族党盟友可以毫无阻挡地竞选。

现在纳粹党人有了政府的充足经费，因此他们这次竞选宣传是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国营电台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声音传送到全国每一个角落。装饰着卐字旗的街道上，冲锋队员列队而过的皮靴声不绝于耳，还有数不尽的群众大会，火炬游行。对选民进行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国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的褐色恐怖来威胁，一会儿又以揭露共产党“革命”来恐吓。

尽管这种种恐怖和威胁，大多数人仍然反对希特勒，选举的结果表明，希特勒仍旧没有能获得绝对多数。

狡猾的希特勒总是有办法的，于是，他又设计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极其简单，而且有着用合法的外衣掩盖攫夺绝对权力的好处。

它的办法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在四年之内授予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也就是要求德国国会把宪法规定的职责移交给希特勒，而国会则开始长期休会。但是，这需要修改宪法，因此，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才通过。

怎样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呢？这也难不倒希特勒。他决定用逮捕那些可

能投反对派的议员的方式使他们“缺席”，从而保证三分之二的多数。

议会是在华丽的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开会的，这所歌剧院一向专门演出轻松歌剧，但现在它的旁听席上却坐满了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他们的满脸横肉和伤疤向人表明，不能允许人民代表在这里胡闹。

希特勒开始向聚集在歌剧院中的议员们发表演说，这个脾气暴躁的纳粹党领袖这次的讲话听起来相当温和而有节制，几乎到了谦恭的程度，以致于使有些反对党议员——说实话，这些人已经不多了——甚至开始怀疑是否不该反对希特勒。

尽管如此，面对外面的冲锋队员“交出全部权力！”的鼓噪声和他们凶神恶煞的面孔，还是有一位勇敢的反对党议员站了起来，反对这个未来的独裁者。

这位议员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威尔斯，他的十几位同僚已被警方“拘留”。他态度镇静，昂然不屈地宣称，政府可以剥夺社会党人的权力，但是剥夺不了他们的荣誉。

他义正辞严地说道：

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希特勒一下子扯下了他先前那副温文尔雅的面纱，狂怒得跳了起来，现在议员们终于真正看到了这个人的颜色。

暴跳如雷的希特勒叫道：“你们来得晚了，但是你们还是来了！你们已不再有什么用了，德国的命运将会上升，而你们的命运将会下降。你们的丧钟已经响了……我不需要你们的投票。德国会得到自由，但不是靠你们！”

这就希特勒对待反对党的“民主”方式，这就是希特勒在猎取绝对权力之前的最后一幕！

对共和国的削弱负有沉重责任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将要失败，但是至少这一次，愿意坚持原则并且坚持到底。但是其它派却没有勇气这样做，就这样，授权法案以四百四十一票对八十四票（全部是社会党人，因为共产党议员早已被全部清洗）获得通过。

就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产党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以外，一切都在相当合法的情况下做到了，虽然同时也存在着恐怖和威胁。

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然而它的尸体将一直摆到那里直到第三帝国的末日。偶然，反方被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出来的。因为以后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

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从1933年3月23日起，希特勒就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实际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总统的任何约束。

当时驻德国的法国大使目睹了这一幕，他写道：“一个街头流氓，攫夺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力量的控制权，流浪汉上台执了政。”

但是，这能怪谁呢？希特勒常常夸口他是用议会的压倒多数来“合法”地达到目的的，德国人只能怪自己。

3. 唯我纳粹党

同伐异，是任何独裁者要干的勾当，希特勒在独裁大权后，就开始一个又一个地收拾各个党派和非纳粹组织了。

首先收拾的是共产党，希特勒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事件，然后，无耻地栽赃给共产党人，利用这个借口将共产党人一一逮捕。

然后是社会民主党，这也是一块硬骨头。戈林派警察干脆占领了该党的办公室，没收了它的报纸和财产，尽管最后社会党人还想用依顺希特勒的方式保存自己，但历史又一次证明，与狼讲交易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

其它的政党，如天主教的政党，尽管他们在过去曾经坚决地反对过铁血宰相俾斯麦，一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但是这一次他们也不得不宣布解散。

那么，曾是希特勒政治盟友的德国民族党的命运又怎样呢？没有民族党的支持，这个前奥地利下士是决不可能合法地掌握政权的。但是感恩戴德不是希特勒的本性，尽管民族党对希特勒上台有功，最后还是同样乖乖地走上了所有其他政党走过的道路。1933年6月21日，警察和冲锋队占领了民族党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6月29日，该党在六个月以前还曾经帮助希特勒进入总统府的态度强硬的领袖休根堡退出政府，他的手下人员“自动地”解散了民族党。

剩下的就只有自由的工会了。工会曾经用一个宣布总罢工的简单方式，击溃过法西斯卡普政变，这对希特勒无疑是一个威胁，于是，希特勒施了一个巧妙的诡计来对付工会。

半个世纪以来，“五一节”一直是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的传统纪念日。纳粹政府在下手之前为了麻痹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宣布1933年“五一节”为全国性的纪念日，正式命名为“全国劳动节”，准备空前地大肆庆祝。

纳粹党的这次对工人阶级表示特别友好的行动，使工会领袖们上了钩，他们热情地同政府和纳粹党合作来筹备庆祝。各地劳工界领袖都坐飞机到柏林来，成千上万的旗帜上写着纳粹政权同工人团结一致的口号，在柏林郊外的飞机场，戈培尔准备举行德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群众示威。

在群众大会之前，希特勒亲自接见工人代表，他宣称：“你们可以看到，说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工人的说法是多么不真实和不公正，情况恰好相反。”后来在飞机场对十万工人发表演说时，希特勒宣布了这句口号：“尊重工人，尊重劳动！”并且保证，要世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德国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里，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最华丽的辞藻描述了工人们参加他筹备得极其出色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热情后，加上了这么一句古怪的话：“明天我们将要占领工会办公处，他们将不会有什么抵抗”。

事情果然如此。第二天，5月2日，在那场盛大的对工人表示友好的仪式结束之后，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处都被占领，工会经费被没收，工会被勒令解散，领袖被逮捕，许多人遭到了毒打，关进了集中营。希特勒对工人的“友好”充分表现出来了。

工会联合会两位主席莱巴特和格拉斯曾经公开保证同纳粹政权合作，然而也不能幸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人和德国劳工阵线的纳粹党徒、嗜酒如命的莱伊博士这么说：“莱巴特和格拉斯之流可以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虚伪地宣布他们忠于元首，但是，他们最好还是去坐监牢。”这就是他们被送去的地方。

现在，一切党派和民众团体都解决了，剩下的只有纳粹党，7月14日，一项法律规定：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及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个月到三年的拘禁。”也就是说：在德国，除了纳粹党，任何人也无权维持和组织一个政党了。德国从此就成了一个党极权的国家。

没有了反对的声音，法西斯分子们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狂热的身着褐衫的冲锋队员们在街上横冲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杀人，警察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街头恐怖，并不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垮台的结果，相反，它是在国家鼓励、甚至常常是在国家的命令下进行的，而这种国家的权威在德国从未达到过这么强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敢判处一个冲锋队员，即使他犯了杀人罪行，因为这样做，

自己的性命也就难保。

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1933年5~6月间，元首还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国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后才会胜利完成。”在纳粹党的辞典里，“教育”意即“恫吓”——一直到人人都驯服地接受纳粹党独裁和它的野蛮暴行的制度。

不受限制的权力往往导致邪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邪恶。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

4. 党政台二为一

1933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国的人支持。资产

阶级和工人，军界和政界，种族主义者以及国内某些最有头脑的人物，纷纷加入纳粹党，使它庞大起来。一年前还是暴徒的希特勒，却被他的职务带来的权力变得受人尊敬。更多的人却是被理想主义吸引，改革在席卷全国，经济业已好转，大城市的街头巷角已不再充斥乞丐。

那年夏季，希特勒大部分时间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消夏。他邀请汉夫施坦格尔一家前往瓦申弗尔德度假。汉夫施坦格尔脱不开身，赫仑纳和埃贡一起前往。他们从慕尼黑乘车出发，希特勒坐在司机身旁。车抵罗森海姆附近一偏僻路段时，突然发出急剧的爆裂声，汽车停了下来，7名卫兵，端着自动步枪，立时将抛锚的车团团围住。司机凯姆卡连忙检查发动机，希特勒打手电。

在乡村别墅里，他经常完全与普通的主人一样，举止得宜，是个普通人。他谈得很多的是汽车，发动机，不同型号的船只的性能，以及诸如此类有关技术的事情。

元首在瓦申弗尔德别墅的消息已传了出去，全国的旅游者便涌向上萨尔茨堡。他闭门不出，以免被人看见。一天，一群人将埃贡叫来，问他希特勒是否有可能出来。12岁的埃贡跑到元首跟前，很不自然地说：“希特勒先生，一群虔诚的人在门廊里等您，等得很急。”希特勒放声大笑，跟着埃贡走出去与众人打招呼。

希特勒下山返回柏林后，批准埃贡的父亲出版一本反对希特勒的漫画集，这些漫画系集自德国国内外的报刊杂志。画集书名叫《白纸黑字》，封皮上画着希特勒，他善意地对他的批评家放声大笑。这些漫画是经汉夫施坦格尔精心挑选出来的，有些是讽刺画，有些是恶意中伤的画。

这种宣传吓破了戈培尔的胆。希特勒和汉夫施坦格尔的理由是，这样才能使英美人获得良好印象。这便改变了希特勒的形象，使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觉得，希特勒是寻开心的对象，而不是惧怕的对象。对斗争中处于劣势者历来深表同情的英国人，在元首就赔款与边境问题与法国人打交道中，帮了希特勒的忙。

希特勒带着这种和善的面孔开始修订其对外政策。统治对外政策的是他的双重理论，即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偶尔他也会拐弯抹角，但最终总离不了归结到东方生存空间问题上。希特勒总想诱使英国作为一个沉默的伙伴加入其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为此，他必须使英国人相信，帝国已放弃了世界贸易和建立全球海上霸权的野心。德国将控制欧洲大陆，成为反共的堡垒，海洋则由英国去统治。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希特勒向意大利求援，意大利同情纳粹之原则，又由于墨索里尼对地中海存有野心，与德国同样敌视法国。

希特勒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得来的外交人员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对他的外交政策心存恐惧，但是，大多数外交人员同意其基本目标，他们可利用他和他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希特勒在操纵外交事务方面，与操纵工业家和军方人士一样狡猾。他允许所有官员留任原职，包括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与犹太人结婚的官员在内。他并宣布，帝国希望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只要他们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他之反对土生土长的共产运动并不表明他们敌视俄国，同时，为了表示诚实可靠，他秘密地允许苏联根据在他上台前达成的长期贷款协议，延期付款。

到 1933 年秋，希特勒觉得，小心翼翼的国际游戏已玩到头了。他决心退出国联，国联对重新武装所采取的政策是混乱的。我们必须退出，其它考虑均完全无关紧要。当兴登堡询问退出国联是否明智时，希特勒辩解说，为求得德国之完全平等，这势在必行。老头子违心，勉强同意。两块大地产的礼物可能影响了他。

10 月 14 日，希特勒通过电台正式向世界宣布，德国不参加会议并退出国联。“在一个没有平等权利的组织内写下自己的名字，作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对一个有 6500 万人民、热爱荣誉的国家和热爱荣誉的政府来说，是个不能容忍的耻辱。”

这个攻击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退出一个歧视战败国的组织，是拒绝凡尔赛条约的象征，而不是对西方的挑战。他破例向法国人重申其和平愿望，并希望德国与法国和解。

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是赌博，由于声言和平，是包赢不输的。英国人同情多于谴责。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在上议院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 15 年来，我们和其它国家均未将明智的公平正当手段交给德国，而这种手段，当德国从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将发动战争的政权交出去时，德国是理应得到的。”

希特勒宣布，他将把自决的决定交给订于在月底举行的公民投票。这是希特勒处理问题，在国内争取广泛支持的典型方法。宣布后几小时，祝贺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办公室涌来。“天主教行动”组织还拍来电报，一致支持他们的元首。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对他的学生们说，“元首退出国联并非野心”，“也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盲目的固执，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欲望。它不外于是无条件地为掌握我国人民的命运负责。”

希特勒从未放弃两面外交政策。10 月 18 日，在会见《每日邮报》记者华德·普顿斯时，他的讲话温和、合情理，“决不再容忍继续歧视德国之举，但绝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仍集中全力，为将到来的公民投票中获得令人信服的授权而奔波。他利用党的财力人力，说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国联。教会再次给予热情支持。巴优利亚的每个主教均批准红衣主教投赞成票的声明：“这样，民主教徒们便重新表明他们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表明他们赞成元首为使德国人民从战争恐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下解救出来，使公共秩序得以巩固，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所采取的卓有远见而强有力的行动。”它反映了公众对失败的战争和压抑人心的凡尔赛条约的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选择在 12 月 12 日，即停战协定签字日的后一天，其原因就在于此。

他向各阶级发出呼吁，似乎他们亲如一家似的。“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获得你们的地位而斗争之际，内部再闹矛盾，你们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他在西门子公司工厂里对工人们说，“要使德国不再甘心做个流浪汉，它就必须坚持权利平等。要做到这点，全体德国人民就必须团结一致。接受我为你们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领导，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只属于你们。”

在投票前夕，兴登堡与希特勒结成一体，他曾从希特勒处得到巨额报酬。兴登堡总统说：“明天，请拿出你们的民族荣誉感来，与帝国政府结为一体”，在广播讲话中，他告诫全国人民说，“为了平等原则，为了荣誉的和平，请与我和总理一起，发表意见。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已恢

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将维护它。”

这个祈求是爱国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点后的票数表明，95.1%的人投票赞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议会的选举中，92.2%的选票支持国社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赌赢了，而且还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权压倒了一切。在尔后数星期内，他便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党和国家合二为一。该项法律说，国社党“是德国国家意志的代表，与国家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在把德国全人口置于新政权的统治下之后，希特勒的一体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元首取得了相当大权力，但仍不是个真正的独裁者。

5. “长刀之夜”大屠杀

决了党外的反对派的问题，希特勒又开始收拾那些党内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了。

希特勒同冲锋队头子罗姆过去在冲锋队的地位和宗旨的问题上一直有争吵，现在又爆发了。纳粹运动一开始，希特勒就

主张，冲锋队队员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他们应该提供纳粹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罗姆看来，冲锋队不仅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是未来革命军的核心，因此，必须以冲锋队为基础组织一支革命的军队，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国街道的强悍的助手们来领导。

这种想法同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比罗姆更清楚，没有陆军将领们的支持，或者他们的默许，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目前他要继续执政，也必须依靠这些将领们，因为这些将领们手下的军队随时都可以把他赶走。此外，他还相信，只有军官团才能帮助他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军队，因为军官团有着它自己的军事传统和人才，而冲锋队只不过是一群乱哄哄的暴徒，只能在街头殴打闹事，很少有现代军队的价值。况且，它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从今以后，必须使它很有策略地退出舞台。

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罗姆的看法是不可调和的，从 1933 年夏到第二年 6 月 30 日，这两个又是纳粹运动的元老又是亲密的朋友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简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 1934 年 6 月初，希特勒同罗姆摊了牌，据说这次摊牌持续了近五个小时，那结果如何呢？

据希特勒自己说，罗姆只是表面上与他达成了谅解，但骨子里却已经在准备“从肉体上消灭我”。这种说法是否确实，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了。因为与国会纵火案一样，这次事情的所有文件都早已奉戈林之命给销毁了。但是还是有些证据表明，这个冲锋队的头子，元首的最亲密战友似乎从来就没有策划要除掉希特勒。

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未解之谜。在罗姆与希特勒会晤后离开柏林之前，他邀请希特勒在 6 月 30 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维西避暑小城会见冲锋队领袖们，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确如约前往，然而其方式却不是罗姆所能预料到的。希特勒后来说，他事先已经知道罗姆和他的同谋者作了占据柏林和扣押他的准备。但是既然情况如此严重，为什么所有的冲锋队队长都在 6 月初离开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这个紧要时刻偏偏离开柏林，从而向冲锋队领袖们提供乘他不在的时候夺取国家控制权的机会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陆军已经越来越对冲锋队不满。希特勒很清楚，如果陆军接管国家的话，他自己和纳粹党政府都将完蛋。因此，如果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镇压冲锋队，以取悦陆军。

在关系重大的 6 月的最后一星期，希特勒不考虑：究竟对那些帮了他很大忙的冲锋队头子们采取怎样激烈的措施呢？

正在这个时候，戈林与希姆莱给总统一份关于冲锋队状况的材料，这份材料使希特勒认为冲锋队头子们要“谋反”，于是，希特勒决定下手了。

6 月 29 日夜，希特勒飞往慕尼黑，在飞机上，希特勒一言不发，两颊凹陷，眼睛充血。30 日凌晨，希特勒一行在慕尼黑机场降落。

此时，在维西小城的双斯巴尔饭馆里，光着身的罗姆，正在度过他生命

中的最后一夜，对即将来临的杀身之祸全然不知。

前一天晚上，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军官们一起围桌痛饮，他们举杯把盏，还高唱赞歌和进行曲，一阵狂饮之后，这位冲锋队统帅回到自己的房间，还想着他的老朋友阿道夫·希特勒给他打的电话，他从未对元首产生过怀疑，他刚才还在饭店里预定了晚餐，他要为“元首”洗尘，并打算明天与“元首”达成关于解决冲锋队和陆军冲突的决议。

正当罗姆坠入梦乡酣睡时，希特勒在戈培尔陪同下来到内政部，他们和该州纳粹党头目一起拟定了逮捕人员名单。30日早晨，“元首”来到维西，代号为“长刀之夜”的行动开始了，党卫军先将汉斯巴尔旅馆包围。随后大门被猛地踢开。

党卫军首先闯进的是慕尼黑冲锋队上校施普雷蒂伯爵的房间，施普雷蒂半裸身子，还没起来，就被连推带揉地押走。睡在他隔壁的是西西里亚冲锋队长海因斯，此时他正光着身子搂着他的年轻的司机睡觉，结果，这对同性恋者被当场抓获。这些人被押到旅馆外当即被枪毙了。

希特勒单独走到罗姆的房门口，用拳头使劲地捶罗姆的房门，大声嚷道：“开门！罗姆！”这位冲锋队首领光着身子，头发蓬乱，拉开门栓，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望着这群贸然闯进的不速之客。希特勒对罗姆大发脾气，罗姆想抗议，希特勒越发暴怒，吼叫着：“这猪猡对我不尊重。立即将他逮捕！”

就这样，希特勒和罗姆，在历经十四年的艰辛患难之后，现在他们终于彻底地分手了。这个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效劳的满脸伤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这样结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为了表示自己够朋友，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枪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但是罗姆不愿用这支手枪。据说他这么说：“如果要杀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

希特勒当然没有来，来的是两个党卫军，他们对准罗姆开枪，罗姆上身被脱光了，但笔直的站着，露出满脸轻蔑的神色，并大声地叫道：“各位先生，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请对准开枪吧。”

他确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发生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这是一桩背叛朋友的行为，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居然是他的患难“战友”阿道夫·希特勒干的，虽然他一生中一直是生活在这种行为中间，而且自己也经常干这种勾当。

与此同时，在柏林、戈林与希姆莱也忙得够呛。他们一共搜捕了一百五十名左右冲锋队队长，排在一个学校操场的一堵墙前，由希姆莱党卫队和戈林特别警察队所组成的行刑队枪决。

在这个血腥的周末遭到清洗的不仅仅有冲锋队队员。6月30日晨，在柏林郊外施莱彻尔将军的别墅门口，有一小队穿便衣的党卫队人员在按门铃。当这位前总理闻声前来开门时，就当场被击毙了。他身后的新婚只有十八个月的妻子也当场被杀。

在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这个数字一直没有确定过。希特勒7月13日在国会发言时宣布枪决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九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十三人因“拒捕”被杀，三人“自杀”，总共七十六人。但是，在1957年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一千多人”。

这次被清洗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是由于过去反对过希特勒因而受到报复被害的，还有人则显然是因为知道内幕情况太多而被杀人灭口的。

比如在 1923 年镇压过啤酒馆政变的古斯塔夫·卡尔，尽管他此后一直退隐不问政治，但是他的尸体却被发现在达豪附近的一个沼泽中，显然是利用斧砍死的，希特勒没有忘记他，也没有原谅他。

另外一个叫伯思德·施丹佛尔的神父，曾经帮助希特勒编写《我的奋斗》。后来大概把他所知道的希特勒情妇吉莉·拉包尔如何自杀的内情传布得太广了，他的尸体出现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里，脖子折断，心房中了三颗子弹。其他“知道内情太多”的人，还包括三个冲锋队员，据说他们是恩斯特火烧国会案中的同谋犯，他们同恩斯特一起被杀。

还有一个因为被弄错而冤枉死去的人也值得一提，这个人是慕尼黑一家大报的著名音乐批评家维利·施密德博士，6月30日晚七点多钟，正在他的寓所书房中拉大提琴，他的妻子在准备晚餐，他们的九岁、八岁和两岁的三个孩子在客厅里玩着。门铃刚响，就有四个党卫队员出现，他们不问情由就把施密德博士架走了，四天后，他的尸体放在棺材中抬回来了，同时还带来了秘密警察头子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打开棺材。原来党卫队暴徒把从来不过问政治的施密德博士误认为当地一个冲锋队队长，而后者也由另一队党卫队逮捕枪决了。

究竟有没有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活动？谁也不知道，希特勒本人也从未提出过任何证据，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消灭异己的鬼把戏，而且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的确，希特勒自己说道：“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

我们明白，希特勒所说的“国家”就是他自己。

希特勒的这个警告在以后整整十年中将一直伴随着他身边的人，直到他们中终于有人奋不顾身，胆敢举起手来打击他们的“国家”和“最高法官”。

6. 兴登堡总统没有遗嘱

乎长生不老的兴登堡终于在 1934 年 2 月去世了，他活了八十六岁。三个小时后，根据内阁先前制订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尽管还需要投票来认可。阿道夫·希特勒已接受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取消，希特勒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基本实现了。

为了堵塞漏洞，他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德国，不是对宪法，而有人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誓词如下：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作为一个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到 1934 年 8 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希特勒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承认他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使他们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都不光彩，他们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遵守的。

兴登堡死后，人们关心的问题是老总统的遗嘱。

宣传部长戈培尔正式宣布，没有发现总统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留下遗嘱。但是在 8 月 15 日，巴本说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去给了希特勒。

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正好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的宣传运动中提供很好的帮助。而在投票前夕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

“我父亲本人已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呈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

这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确实的。因为根据最可靠的现有材料，兴登堡建议在他死后让王室复辟，但是遗嘱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希特勒却没有公开。

战后在纽伦堡讯问巴本时，终于弄清楚了老总统遗嘱的部分真相。

据说，兴登堡的遗嘱是由巴本起草的，在遗嘱中，总统提到在他死后实行立宪君主政体，并且还特别提到将总统和总理二职合并是不适宜的。当然，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也说了一些嘉奖纳粹政权有成就的话。

巴本回忆说：“在兴登堡下葬后，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兴登堡有没有政治遗嘱，如果有的话，我是否知道在哪里。我说，我要问奥斯卡·兴登堡。希特勒说：‘要是你能够尽快把这个文件送到我这里来，我将十分感激你’。因此，我嘱咐我的私人秘书去问兴登堡的儿子，遗嘱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让我把它转交给希特勒。”

据说，当时小兴登堡并不费力地就找到了这个重要文件并且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看后不禁皱起了眉头，显然，兴登堡在那个表示他临终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议同希特勒的打算是矛盾的。于是，希特勒把其中嘉奖希特勒的那分文件发表了，而另一个建议由王室成员而不是由希特勒来担任国家元首的文件却压住了。

这个文件后来下落不明，在缴获的成千吨重的纳粹党秘密文件中并没有发掘出这个文件，估计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马上销毁了。

其实，如果当年希特勒大胆和正直地发表了这个文件，对他也可能没有影响，因为在当时，总统的遗嘱已算不上什么了，法律也算不上什么了。尽管在 8 月 19 日，还进行了一次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的公民投票，在那次投票中，合格选民中约有 95% 去投了票，其中有 90%（约三千八百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只有四百二十五万德国人有勇气投反对票。

现在希特勒已经成功了，没有任何阻碍了，他发表了元首文告：

“今后一千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十九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一千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

这个如同秦始皇般的独裁此时是多么狂妄！

然而，他是个凡人，不免一死，无法活到一千岁，但是只要他还活着，他将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无忌仰的专制魔王来统治他们。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已不在人世，没有人可以非议他的权威，陆军已处在他的手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国军人都敢轻易违背的誓言，唯他之命是从。的确可以这么说，现在整个德国和全体德国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为最后一批反抗者已经被消灭了，或者说永远消失了。

7. “盖世太保”的秘密

“盖世太保”是个令人生畏的名字，在“第三帝国”历史上，它几乎成了“恐怖的”的代名词。

盖世太保即秘密警察，它原是戈林 1933 年 4 月 26 日为普鲁士邦设立的，以代替普鲁士邦原来的政治警察。他起初打算只把它称为秘密警察处，后来一个不出名的邮局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机构设计一种免费递送的邮票图样，他提议把它叫做“秘密国家警察。”简 GESTAPO，中文音译即为“盖世太保”，从无意中创造一个先是在德国后来又在国外令人谈虎色变的名称。

开始时，秘密警察实际上还只不过是戈林用来逮捕和杀害反对政权者的一个私人恐怖工具。只是在 1934 年 4 月戈林任命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副首脑后，秘密警察才开始作为党卫队的一支力量而扩展起来。在这个态度温和然而具有虐待狂的养鸡农民出身的新首脑以及在党卫队保安队处长海德里希这个残忍成性的青年人的领导下，它成了一个恶阎王，对每个德国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

后来在纳粹党的压力下，秘密警成了一个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组织，法院绝对不得干涉它的活动。希姆莱就曾说过：“只要警察是在执行领导上的意志，它的行动就是合法的。”

任意逮捕和把受难者的拘禁在集中营里的做法被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并且还装模作样地称之为“保护性”看管。但是这里的所谓“保护性”看管绝不是在较为文明国家里那样保护一个人使他不受到可能的伤害。它是用把他关在铁丝网后面的办法来处罚他。

在希特勒当权的头一年，第一批集中营就像雨后春笋似地建立起来了。到 1933 年年底，就有了大约五十个集中营。它们主要是由冲锋队给它的受难者一顿饱打，然后再向他们的亲戚朋友勒索尽可能多的赎款，当然，这完全是强敲硬诈。

仅仅被打和勒索点钱财还算幸运的，还有些则是被杀害，而且这种杀害往往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和残忍，有的是用鞭子抽死的，有的则是被勒死的。

在罗姆遭到清洗后，希特勒把集中营完全交给了盖世太保控制，他们以不愧为精锐部队的效率和冷酷无情来组织集中营。守卫的任务专门交给骷髅队，单这名字叫起来就够吓人的，这个单位的成员是从最强悍的纳粹分子中召来的，服役十二年，在黑色军衣上佩着人所熟见的骷髅和骨头的肩章。

在战争发生之前，集中营主要安置在慕尼黑、魏玛附近，后来又设立了专门拘禁妇女的集中营。在大战爆发后，又在波兰设立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这些集中营里，千百万无辜的人被杀害，另有千百万人受到了简直令人无法想像的残忍的折磨和酷刑。在三十年代，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被拘禁者大约有二万到三万人。战争开始后，人数倍增，而且希姆莱和他手下人发明了很多新奇的恐怖措施，如灭绝营、奴隶劳动营、把被拘禁当作豚鼠供粹作“医药研究”等。

我们来看一看集中营的一些条例，就可以知道盖世太保的“法律”是多么残忍和不人道：

“犯有下一罪行以煽动者论处，一律绞死：

凡谈论政治，发表煽动言论，举行煽动集会，组织小集团，与人厮混；为了将暴行传闻供反动派宣传而收集集中营真假情报。”

“犯有下列罪行者以聚众闹事论处，当场格杀或以后绞死：凡袭击守卫或党卫队人员，奉派值勤时拒绝服从或工作……或在途中或工作时大声咆哮、嚣叫、煽动和发表演说者。”

在盖世太保的淫威下，人是没有自由的。

同盖世太保相联系的是保安处，它的名称编写是 S.D.。这也是使所有德国人，后来又使占领区人民望而生畏的缩写。保安处原是希姆莱设立的一个党卫队的情报组织，后来由海德里希领导，此人就是在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刽子手海德里希。”

保安处起初的任务是暗中监视党员和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在 1934 年它变成了盖世太保的情报单位，专门负责全国的情报工作。类似前苏联同样令人生畏的克格勃组织。

有必要对“刽子手海德里希”介绍得更详细点，因为正是在他的老练领导下，使盖世太保的保安处发展成一个遍布全国的严密组织，对每个德国人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海德里希以前也是一个情报官员，在海军部门任职，但那时，他确实没有显示出他在这方面“出色”的才华，倒是在寻花问柳方面颇有一手，他利用他的从事情报工作的特殊身份，常常把一些天真无知的女孩子俘虏，玩弄之后再抛弃。1931 年，他二十六岁，与一个造船商的女儿结识，没有多久，就将其占有，然后也想象以前一样将其甩掉，但没想到女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对婚姻看得相当严肃的清教徒，在知道海德里希不同意，这一下子激怒了造船商，老头子闹到情报处，海军部深知老头子在造船业尤其是军舰制造方面的地位，实在不敢得罪他，于是，将海德里希革职。

栽在子风月场上的倒霉的海德里希闲荡了一年，被希姆莱看中，让他来领导盖世太保的保安处。

这家伙一上任，就表现出了在这方面的才干，他采取的方法是在全国各地雇用大约十万名兼职告密者，他们都是被盖世太保秘密选好的。他们奉命窥察国内的每一个公民，只要发现有被认为是不利于纳粹统治的最轻微的言论和活动，他们就报上去。

这些告密者没有明显的特征，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或者是医生、教师、职员，他们只要经盖世太保选中就被委以这一秘密使命，他们互相保密，谁也不知晓对方是否为告密者。

这一手着实厉害，于是在德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气氛：除非你是一个笨蛋，没有人不首先看一看有没有隐藏的保安处录音器，或者有没有保安处特务在偷听，就贸然说一句可能被认为是“反纳粹”的话或者做这种事情。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亲朋、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书，所有那些和朝夕相处的人，你本来应该无比信任，并向他们倾诉衷肠的人，如今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组织的告密者。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对于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人都不不要轻易相信。

人与人之间被罩上一层无形的挡网，人们再也不能亲密交谈，人们开始互不信任，这确实是专制政权的一绝招。因为即使你内心存有反抗心理，但你既无法把他说出来，也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有类似的想法，因为谁也不会对你说真心话，谁知道你是不是告密者呢？于是，你发现你是孤独的，你将无法与你同样想法的人团结起来，构成一股反抗的声浪。人们都在一种表面的赞美声中虚假地生活，因为无法交流或不敢交流，你并不知道别人的赞美

是真是假，你只知道你自己的赞美声出之于口而并不来自于心。

这就是盖世太保的保安处在对人进行肉体摧残之外对人的精神摧残，而这种摧残也许是更可怕的。

除了这些业余密探以外，保安处还有专职密探，他们开始人数并不多，大概有几千人。他们大多数是从失意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招来的，他们是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或者在正常的社会中找不到着落的大学毕业生。因而，在这些专职密探中，老是有着一种奇怪的卖弄才学的风气。

这些失意后又得意的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似乎对研究日耳曼人考古学、劣等种族头颅骨和主宰种族优生学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有着本能的兴趣，这确实是一群怪人，而且他们的冷冰冰的面孔和阴险残忍的性格还赋予了他们某种不为外界所知的神秘色彩。

人们一般很难接触这些怪人，虽然海德里希本人是一个狂妄自大、冷若冰箱、残忍无情的人，但偶尔可以在柏林的夜总会里看到。而那些金色头发的年轻凶徒，则往往踪迹难寻。他们不愿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所致，而且是因为，至少在 1934 年和 1935 年，他们中间有若干人曾因暗中监视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党羽而被一个自称“为罗姆复仇者”的秘密集团所暗杀，这些暗杀者还把这个标签插在尸体上。

保安处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虽然是次要的任务，即查明谁在希特勒的公民投票中投了“不同意”的票。

这种办法是这样的：选举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把全部选票都标上号码。当然，这号码是用脱脂乳写在选票背后，一般是看不见的，但用特殊药水浸后或稍稍加热就能显出来。在投票时列了一个选民名单。选票是按号码发出去的，因此，投票后就有可能找出投了“不同意”票或者“弃权票”的人，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处理。

这大概是最可怕的世界民主“选举”，我们可以把这种方法推荐给世间的所有独裁者。

通过党卫军，通过盖世太保，通过保安处，通过这种种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所施加的压制和威胁，第三帝国已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这是一切极权独裁政权不可避免的发展。

8. 文化“刽子手”

人们曾经天真地以为，二十世纪不会再重演“焚书坑儒”的历史了。因为，人们都以为，历史在发展，二十世纪应该是一个文明的时代。

然而，人们错了！

1933年5月10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当总理后约四个半月，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

约莫半夜时分，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了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火炬扔在堆集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在烈焰焚烧中又丢了许多书进去，最后一共焚毁了大约两万册书。在另外几个城市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景象。

二十世纪的第一次大规模焚书开始了。

那个晚上，由兴高采烈的学生在戈培尔博士的赞许眼光下丢入柏林烈焰中的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著作。在这些作家中，德国作家有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雷马克·茨威格、爱因斯坦等，除了德国作家的作品遭到焚毁，许多外国作家也不能幸免，其中有杰克·伦敦、辛克莱、威尔斯、弗洛伊德、左拉等。用一份学生宣言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毁掉。”

从现在起，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将使德国文化不得越出纳粹思想的雷池一步。他站在焚烧的书籍的灰烬前，向那些狂热而无知的学生们讲到：“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的时代。”

在这火光下，希特勒忠实的跟随者，戈培尔开始挥舞利剑，向文化开刀了。

德国，一个有过那么悠久的极高的文化水准的民族，在戈培尔的利刃下，它的文化水准发生了令人恶心的退化。不用说，一经纳粹领袖们决定，艺术、文字、报刊、广播和电影都必须专门为新政权的宣传目的和野蛮哲学服务，这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

在希特勒宣传部长的利刃下，没有一个还在人世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曾在纳粹当政时期出版过。差不多所有这些作家，都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带头下移居国外，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地就是被迫保持缄默。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当然，绝大多数是得不到认可的。

除了文学，绘画在第三帝国的遭遇也颇为有趣。尽管早期在维也纳想当艺术家而遭到了失败的希特勒自以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可是这个真正的艺术家却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他在《我的奋斗》中曾就这个题目发过长篇大论，在他当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企图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艺术。

就这样，在这位曾经想当艺术家而未成的元首直接指挥下，约有六千九百幅现代绘画，如塞尚、凡·高、高更、毕加索等这些大师们的作品，都从德国名博物馆中拿掉了。

为了表现元首的艺术“天才”，或者说了圆元首早年想当建筑家的梦，希特勒还亲自出主意设计了一座“德国艺术馆”，并自诩为建筑史上“无与伦比和无法模仿的”。

在这座艺术馆里，举行了第一次纳粹艺术展览，陈列了从一万五千幅应征作品中选举来的九百幅作品。本来原来的评选团主席是阿道夫·齐格勒，这个人是一个平凡的画家，因画过希特勒的情人吉莉的肖像而幸运地获得了元首的赏识。但是，希特勒在看了齐格勒的选择后极为恼火，他不但命令把这些画剔掉，而且还用他的长统靴子在好几幅画上踢了一些洞。

最后，元首决定亲自作选择，并且在主持展览会开幕式的长篇讲演中说：“我早已下决心，如果命运给予我们权力的话，艺术鉴赏这类问题是不用讨论的，要做的只是作出决定。”那么，这位“内行”的艺术家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决定呢？

据一位当年曾有幸观赏过那次艺术展的外国记者说：“那是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看到过的最蹩脚的货色。”

报纸、电台、电影就不用说了，那是更应该严格控制的。

由于德国的各家报纸都受到戈培尔博士和他助手们的指示，知道该发表些什么以及如何写新闻和社论，结果全国报刊每天都大同小异，单调划一。人们的反抗是无声的，他们干脆不订这些报纸了。

电台和电影也很快被用来为纳粹政权宣传服务。德国的听众和观众们，从此就只能听到或看到内容空虚，空话连篇的广播节目和电影。于是，即使是最好说话的观众也开始反抗了。每当纳粹电影上映时门可罗雀，而经戈培尔许可在德国放映的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乙级好莱坞影片）则门庭若市。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一个时期，德国影片老是遭到嘘声，以至于后来纳粹政府对“电影观众的叛逆行为”发出严厉警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化的杀手们如戈培尔之流却经常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观赏美国和西方的最新影片，据说戈培尔就对好莱坞女明星梦露，英格丽·褒曼着迷。

民众不能没有娱乐，他们要消遣，他们要休息，然而在纳粹的文化“革命”下，人们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听呢？

第三帝国的领袖们很聪明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于是，他们搞了一个叫做“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但是，它所提供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管制化的娱乐。

在二十世纪的一个极权独裁政府中，或许是前无所有的，不仅有必要控制一个人的工作时间，还必须控制他的闲暇时间。这就是“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要做的事。

在纳粹党当政以前，德国有成千上万个俱乐部，从事于书画、下棋、踢足球到观赏飞禽的各种娱乐活动。在纳粹统治下，除了在“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导下的组织外，不准许其他有组织的社交性团体、运动团本和娱乐团体进行活动。

对第三帝国的一般德国人来说，既然连自己去想办法玩这种事都对你不放心，这个无所不包的娱乐组织无疑就聊胜于无了。

例如，它使参加劳工阵线的人能够花极便宜的代价作陆地和海上假期旅行。莱伊博士建造了两艘二万五千吨的船，一艘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还包了十艘般来供“通过欢乐获得力量”作海上游览。据说虽然船上生活被纳粹领袖们组织到了简直难以忍受的程度，但是那些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玩的德国人却玩得很快乐。而且收费便宜之至。例如，到马德拉去游览一次，连同到这个德国港口去的来回火车费在内一共只花二十五元，别的远足旅行也

都是很便宜的。

体育运动的每个部门也都由“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控制，它的组织规模也是庞大的，据官方数字表明，每年参加各种运动的有七百多万人。这个组织还以极低的票价安排看话剧、歌剧和听音乐，从而使一般人都得以欣赏比较高级的娱乐，这是纳粹官员们常常自夸的。

但是，千万别以为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实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庞大的娱乐费最终还是得普通德国人来分担。

就这样，在第三帝国的天幕下，纳粹党的领袖们为每一个德国人都规定好了他们应该怎样思想、怎样生活、怎样娱乐、甚至怎样做爱——为了培育出纳粹的雅利安人后代。

9. 德国人新的“上帝”

任何独裁者都需要在他们的头上罩上一轮神圣的光圈。好让他们代替宗教中的神，成为人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于是，一次现代的“造神”运动在第三帝国展开了。

1934年9月4日，在纽伦堡召开了纳粹党代会，希特勒任命一位年轻的建筑师施佩尔为大会组织者。

施佩尔让人在一个广场上建立一个长四百五十米，高二十七米的巨大巍峨的主席台。主席台用长方条石建成，上面依照出土的古希腊王国的浮雕进行了雕刻，顶巅上有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展开的翅膀竟达三十二米，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卐字旗迎风招展，在三十三米的鹰翅周围装满了空军的探照灯，灯柱冲天而起，高度可达八千米，这些探照灯在夜间所造成的效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使人觉得宛如在宗教的殿堂里一般神圣。

9月7日，二十万名纳粹党员排成密集的队伍聆听希特勒演讲，希特勒演讲结束后，赫斯宣布说：“从此以后，纳粹党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胜利——希特勒！！”狂热的人群一齐跟着振臂高呼，他们被这样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欢庆气氛所陶醉、所激动。这些没完没了的群众游行和宣誓效忠的盛大集会，是戈培尔为希特勒精心设计的元首个人崇拜的一个组成部分，希特勒本人对此也感到极为赏心悦目。

元首个人崇拜很快便涉及了整个国家，它的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希特勒式的致意，大街上的人们以“万岁——希特勒！”来作为落款，孩子们在校学习颂扬希特勒的诗文并为元首祈祷。

党的元首现在成了“德意志人民的元首”，或者被简洁地称之为“我们的元首”。对于希特勒的正式称呼并不是“国家总理先生”，而要称“我的元首”。

独裁者的特征之一就是完全掩盖自己的私生活，希特勒一点也不例外。

如今，元首成了一个神胎圣育的化身，他没有私生活，而是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为整个国家、各族民众造福的事业。元首不吸烟，元首不沽酒，元首三餐简单并且长斋戒荤，元首至今未婚，而且没有家室。

其实，元首即使有私生活，说到底那也是索然无味极其枯燥的。从1918年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希特勒便已不复存在。后来从1933年起才又重新脱颖而出作了政治家和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生活的全部含义对于他来说只有一个，这就是政治。希特勒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没有亲戚，因为他不需要这一切。至于谈话，他总是千篇一律，没有任何意义。

希特勒贴身的小圈子由下属、副官、司机和女秘书们组成，这就是他的“家庭”，在这个“小家庭”中他既不必担心会出现异议，也不必害怕会发生反抗。他事事随心所欲，象神一样独来独往，也象神一样独断专行。

1938年第三帝国正式成立“国家总教会”，总教会宣称，元首的《我的奋斗》是一切文件中最伟大的，应该清除供坛上的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德像，代之以元首的《我的奋斗》，在供坛左边则放一把剑。

从此，阿道夫·希特勒成了第三帝国的基督，德国人新的神灵，可是，这位手执利剑的神既不怜悯人民的苦难又不爱好和平，而是一位众神中的叛逆，专于世间邪恶的勾当。

第九章 第三帝国崛起

1. 权势与情妇

在公民投票取得总统之位的胜利后，正值夏末，希特勒隐

身于贝希特斯加登稍作休息。在他心爱的上萨尔茨堡，他常外出散步，一外出就是几小时。他并常与人谈话，这是他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此时，他也为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代表大会作准备，因为这次大会可能会被对罗姆事件的清洗的痛苦记忆所破坏。为了阻止这一情况，他决心不再采取通常的做法即威胁、许诺加和解。

大会开幕前一星期，莱尼·瑞芬斯塔电影女星、导演带了一个 120 人的摄制组（其中有 16 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美丽、性感得到了希特勒应给的一切帮助。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1934 年 9 月 4 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之后，下榻的旅馆被最少有 1 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急剧地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 1923 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 3 万名听众来说，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是地方长官瓦格纳宣读的希特勒的公报。“尔后 1000 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说来，动荡的 19 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 1000 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崇拜者几乎不间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他还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想到可能发生危险的场面，他就觉得紧张、有时连自己也悔恨起来。

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憎。这在 7 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20 万忠实的党员打着 20 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130 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来似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住围成的大厅，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风过，似是半透明的牡丹花在海上飘泊。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这既是许诺又是威胁。

莱妮·瑞芬斯塔及其摄影师们从 10 多个角度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那些爱管闲事的褐衣党徒，在戈培尔的唆使下，瞒着元首，对她进行干扰。他们不断骚扰摄影师，把他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推开，甚至拆除了几个摄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冲锋队有可能作出反应。两天后，5 万名冲锋队员在体育场内集合。希特勒对此是有所防备的。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元首的党卫军卫队也大规模集结在元首跟前，把他和冲锋队分开。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会有人在元首的讲话中拔出手枪来。在讲话中，元首赦免了所有与罗姆阴谋有关的冲锋队员。

大会在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结束了。这就保证 9 月 10 日最后一个节目

的成功。这天被定为建军节，为此，用最新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后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30万名观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尚武精神并不是霍亨佐仑家族的产物。它是深种于所有德国人头脑中的东西。

希特勒也像群众一样沉醉在欢乐中。在他结束最后的讲演后，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长时间静不下来。赫斯代表纳粹党向元首告别。“党就是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欢呼！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欢呼希特勒胜利！”疯狂的人群有节奏地“欢呼胜利！”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兴高采烈，令人欢欣鼓舞，令人热血沸腾。但对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们说来，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的咆吼。

当晚，在他下榻的旅馆前举行了壮观的军队游行，元首与军队最佳象征莫过于此了，而他也决定向高级将领们作出和解的姿态。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我知道，你们指责我们党内存在着不少错误的东西”，希特勒说，“我承认，你们是百分之百正确。你们也要记住，在斗争的时刻，知识阶层抛弃了我，所以，与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质量不高的人员。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个缺点。但是，如同新武装力量里军官团的建设需要花几年时间一样，党要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集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他的话是有效果的，用其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讲话适合听众的需要。

后来，希特勒参观了兵营。在那里，这位老下士与士兵们打得火热，又说笑话又回忆当年。回旅馆后，他轻松愉快，在与心腹们一起吃夜宵时，详细他讲述了与士兵们团聚的情况。一周来的劳累以此作为尾声，这是最合适不过了。

两天后，总统府举行招待会，欢迎希特勒。他神采飞扬。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员们，不得不向新总统表示正式的祝贺。他一一向各国代表致意。

他完成了原计划在纽伦堡要做的一切。党重新团结起来了，人民和军队站到了他的一边。尽管有戈培尔的干扰，党的纪念碑也未受到破坏。莱妮·瑞芬斯塔尔及其摄影师们拍摄了数以万计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辑期间，抗议像洪水一样朝她劈头盖脸打来。提抗议者都是那些未上镜头的党的官员和抱怨宣传不够的官员。她拒绝作出修改，希特勒提议把满腹牢骚的领导人的照片加进影片中。这是对莱芬斯塔尔的艺术原则的冒犯，她拒绝了。她的信念无比坚定，希特勒欣赏她的天才。结果，影片出来后，来作任何改动。她将影片命名为《意志的凯旋》。在首映式上，党的官员们对她很是冷漠，但是，就连她的最凶恶的批评家戈培尔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它宣传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影片都远为有力。它获得了当年为最佳影片而设的“五一文化成就奖”。该片也被一致认为是重要的纪录片。后来，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影片展览”会上，它以其艺术性而不是内容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希特勒的权势扩大，其与女人的私生活也在扩展。莱妮·瑞芬斯塔尔是希特勒的情妇。著名电影女演员奥尔加·奇卡娃、丽尔·达哥维尔和波拉·纳格里都和希特勒睡过觉。希特勒在这些娇艳的女人身上寻找不只是性行为，而是他被压抑的天生所追求的刺激。

英国的里德斯德尔勋爵的女儿尤妮卡·瓦尔凯丽从英国来到慕尼黑学艺

术，刚好碰上了新德国的激动时刻。从希特勒吻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的鼓吹者。她是个生性快活、放荡不羁、满头金发的姑娘有时会说出最粗鲁、最令人惊奇的话来。她对性生活的创见，以及活泼的幽默感对希特勒说来，都是个崭新的、清鲜悦人的。

希特勒权力上升后，越来越多的女人急于与他相伴，因为他对女人兴趣越来越广泛，使他的老情妇海伦·贝希斯但太太打翻了醋瓶。她公开批评他，对他的某些改革进行斥责。私下里破口大骂，令他无法招架。在凶恶的骂声中，希特勒羞愧地站立着。

希特勒对女人眼界的不断开阔，使爱娃悲愁。在他上台后几天，他给了她一个婚戒、一个耳环和一只镶室石镯子，作为她 21 岁生日的礼物。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意与他的情妇结婚。现在她更少与他见面了。他偶尔也会从柏林给她打来电话。

到了 1934 年秋，她常闷闷不乐，且时间很长。希特勒与她结婚的希望已成泡影。他告诉她，作为第三帝国的首脑，他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国家，他对魏德曼上尉直言不讳他说，“我也向往家庭生活，但是，他一旦结婚，便会失去许多女人的选票。”“我便在慕尼黑找三个姑娘，供我左右。”希特勒向他的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透露得更彻底。“爱娃非常好”，他说，“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只有吉莉才能真正激起我的情欲。我永远不想与爱娃结婚。唯一能使我将我的生命与她联结在一起的女人是吉莉。”

2. 和平外交与扩军

1934年纳粹党生日的庆祝大会之后，希特勒把许多时间和主要精力用在外交政策上。因为在外交领域内能否取得成功主要靠实力。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的烟幕后，他迅速地建立起了德国各级的武装力量。在纽伦堡举行的军事演习中，群众的反应令他受到鼓舞。密令将只有10万人的陆军扩充两倍。密令发出当天便有7万人入伍。国防预算增至6.54亿马克。

虽然有严格的保密措施，突然增设9个兵团司令部、14个步兵师和7个机械化营，也不能不引起传言。这些传言，加上英德关系的恶化，实在使希特勒关切。由于德国的军事扩充，英法两国的军事团结更加紧密了。英国不准备冒大的风险，英国不愿意为别国的利益出国打仗的。希特勒的全部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英国的容忍的基础上，他的外交活动就是要获得英国的同情。

12月19日举行的正式晚会就是取宠的一个步骤。在25名来宾中，4名是英国人，英德联谊会一著名成员，罗德米尔勋爵及其公子，罗德米尔办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每日邮报》的编辑华德·普赖斯。为这一晚会，希特勒特地穿一身晚礼服，而不是党的制服。当客人就座开始吃简单的饭菜时，他告诉人们，从兰茨贝格出狱至今已是十年了，狱中的几乎全体雇员，包括典狱长在内，都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者。

希特勒之所以接交罗德米尔，是因为他们同样仇恨布尔什维克主义。《每日邮报》为德英联合大声喝彩欢呼。1935年1月下旬，希特勒又接见了两位更加友好的英国人士：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他带来了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的问候信；另一位罗提安勋爵对希特勒和平愿望的印象十分深刻，情不自禁向英国外相约翰·西蒙爵士做说服工作，证明元首是真诚的。

约翰·西蒙爵士同意于3月初前来柏林。他之来访在柏林的外国人士中产生乐观的气氛。牛赖特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着了凉，要求西蒙推迟其德国之行。这是‘外交着凉’。原来是英国曾发五月白皮书，公开谴责德国加速军备，这便惹了元首。

3月10日，希特勒在他的外交棋盘上又走了一步。他单独向《每日邮报》的普赖斯透露，最近德国空军已正式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一个兵种。对此无论是英国或法国，官方均未正式发现谴责。约翰·西蒙爵士，通知下院说，一旦元首感冒痊愈，他仍计划出访柏林。法国所作的反应也仅是由国防部提议，延长部队的服役期。

这种弱不禁风的反应，希特勒未与其将领们磋商便将之击败了。3月15日上午，他令首席副官在慕尼黑的“四季旅馆”与他会面。他指示副官发布重新征兵和扩充武装力量的消息。当晚，国防委员会便举行会议，讨论希特勒令他们惊慌失措的征兵计划。

3月16日下午，约100名外国记者挤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谁也不明白为何突然把他们找来，所以室内空气有点儿紧张。戈培尔进来了，看上去煞有介事的严肃。他大声宣读了一份新的法令，宣布全面实行普遍兵役，将和平时期的兵力增至50万人，建立12个军。

就在那时，法国大使正在总理府元首的书房内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弗朗斯瓦·本塞抗议说，这份通知肆无忌惮地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事先不与法国接触或讨论便让法国接受既成事实表示遗憾。

希特勒庄严地、坚定地反驳说，他的意图纯粹是自卫性的。法国没什么可害怕的。他的主要敌人是共产主义，他破口大骂俄国人。这样，大使离去

时几乎相信，希特勒无意发动反对法国或英国的战争，只决心毁灭苏维埃政权。

法国对德国再次显示武力所作的回答，是向国联提出毫无意义的呼吁。3月25日上午，英国的官方代表团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见了希特勒。首次充任元首的翻译的包尔·施密特注意到，当元首向约翰·西蒙爵士、艾登和大使埃力克·菲普斯爵士问候时，他的微笑是特别友好的。他们在总理府矮桌旁坐着。德国在场的有牛赖特和里宾特洛甫。

西蒙宣布，英国政府和人民首先需要的是和平，真诚希望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合作，朝这一目标前进。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即英国的公众，对类似德国退出国联，奥地利及某些单方声明那样的事件非常不安。英国并不反对德国，但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危及和平的事情。

希特勒的回答特别巧妙，一方面是特意请求，另一方面字里行间又在威胁。他对他的行动一一作的解释，虽然可信却不能令人折服。例如，他矢口否认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理由是，他从未在上边签字。他的碧眼盯着约翰爵士补充说，他宁愿死，而不愿这样做。希特勒镇静而彬彬有礼地进行辩驳，这令英国人吃惊。当牵涉到立陶宛的东方公约被提出来时，他失去了平静。“我们与立陶宛毫不相干！”希特勒喊道。目前，那里正在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阴谋审判，他眼睛里射出怒火，声音粗哑。“他们在梅墨尔践踏德国少数民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决不与此类国家签订条约！”他怒斥道。片刻后，风暴平静了，他又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谈判者。他据意识形态之理进行辩驳。他平静而有力他说“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任何联系都绝不可能！”

在当晚的宴会上，希特勒心情愉快，热烈地与艾登交谈起战时各自的经历。他们曾在奥塞河两岸面对面厮杀。于是，两人便在菜单后面画起战地地图来。他们的谈话内容有些给弗朗斯瓦·本塞偷听到了。所以，吃完饭后他便问艾登，他是否真的与希特勒打过仗。艾登回答说好像是，法国大使便讽刺他说：“你想念他吗？你应该枪毙他。”

翌日上午10时，西蒙爵士建议讨论军备问题。他说，英国最近正与各大国单独进行磋商，为召开大型的海军会议作好准备，因为大会要修改现时的海军条约。他邀请德国到伦敦去参加类似的非正式的磋商。希特勒当场接受了，他又重新提出了先前已向菲普斯大使提出过的问题：把德国的吨位限制在英国舰队吨位的35%。

希特勒拿出一封电报，愤怒地读了起来。令人吃惊的是，温和的政治家顿时又变成了狂暴者。这封电报宣布了对那些被控叛国的立陶宛德国人的有罪判决。希特勒生气地问，如果凡尔赛条约将英国的一部分土地硬割给像立陶宛那样一个国家，英国会怎么样？如果英国人只因为像英国人那样行动便遭到严刑拷打和监禁，他们又会怎样？

他的怒容很快便消失了，他又恢复了温和的常态，只要求在军事上与英国和法国保持平衡。中午，他们是在英国使馆吃点心的。这也是元首第二次步入外国大使馆。午餐后，与会者又返回总理府。希特勒对俄国向西推进的企图进行抱怨，他又重申，在军备问题上，德国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西蒙和艾登都在耐心地、心平气和地倾听。

当晚，希特勒在总理府主持宴会。他原来穿的是褐色外衣，戴红色卐字章，现在却改穿燕尾服。他是个迷人的主人，在客人中来回穿梭。宴会后，

希特勒对一群朋友，包括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在内兴高采烈地大谈其外交成就。他像小学生似的，又是拍手，又是拍膝盖。“了不起的人物呀，那些英国人”，他说，“即使撒谎，他们也撒得漂亮，一点不像法国吝啬鬼。”

会谈结束后一天，希特勒把与英国海军之比是 35% 一事告诉了海军总司令，并指示他按计划建立海军，但不要大肆宣传，以免使英国对其它大国的困难处境复杂化。希特勒决心与英国和睦合作，并继续向对德国处境表示同情的有影响力的公民们献媚。4 月间，他在慕尼黑寓所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举行午餐会。莫斯雷退出了工党，当上了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主席。希特勒以朴实的态度招待，整个午餐过程中，他都以温柔得几乎像女性的魅力待他。

在伦敦，一位极为重要的德国事业的追随者，正在重申其先前的同情。他就是威尔士亲王。在与霍希大使进行的一次长谈中，这位王位继承人再次对德国的地位和期望表示完全理解。

3. 诡诈术的成功

柏林，由于赫尔曼·戈林和女演员埃美·松纳曼准备结婚，繁忙的国际事务也黯然失色了。4月10日举行的婚礼，可说是好莱坞的作品。电台一幕一幕地向全国广播。豪华的婚礼由元首本人当征婚人。当新娘新郎从教堂出来时，军乐队奏起了《罗安格林》的进行曲。教堂外，新郎新娘从伸出的剑搭成的拱门下走过，受到了震耳欲聋的欢呼。群众还集体行了罗马式的敬礼。

次日，戈林邀请罗希纳和另外5名记者前往总裁府参观礼品。“诸位先生”，他对他们说，我请你们来的目的，是要你们看看我的人民给我送来的礼品。戈林用不着挨饿。假使他有朝一日受穷，这些礼品起码能当出100万，或更多钱。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会议同一天在斯特莱萨召开。会议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谴责德国的重新武装为不合法，并重申忠实于罗加诺原则。赖伐尔、麦克唐纳和墨索里尼的出席又为公报增加了份量。原想孤立法国的希特勒，发现自己有受孤立的危险。数周后，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这样便加重了他的危险。由于苏法条约与元首的基本战略格格不入，希特勒又竭力向他的朋友罗德米尔勋爵保证，英国没有理由怕德国。5月3日，希特勒写道，从建党早期开始，他就计划要与英国合作。“英国与德国这样的条约，不但对和平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也代表了世界上1.2亿最宝贵的人民的愿望。英国历史上搞殖民活动的举世无双的天才及其海军力量，将与世界上第一批军国主义之一的国家的力量结合起来。”

罗德米尔是用不着说服的。在他的报纸中，他继续为德国描绘出一幅和蔼可亲的形象，但是英国总的反应是恐惧的。当麦克唐纳得悉希特勒将于5月中旬后发表重要讲话时，他表示关切，并决定在演讲发表后让下院辩论军备问题。

这篇令人害怕的演讲是在5月21日作的。希特勒再次让世界吃了一惊。当日早些时候，他颁布了一条秘密防务法律，让沙希特主管战争经济，并改组了武装部队。将国防军正式改组为武装力量，由希特勒任最高总司令。勃洛姆堡的头衔也由国防部长变为战争部长，且得到了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贝克军队首脑的头衔也改成了总参谋长。当希特勒于当晚站在麦克风前时，他轻松而自信，又成了温和的典范。他说，他的主要目标是和平，他也不抱征服的梦想。他宣布，战争所带来的，只是毁灭国家的花朵。

在重申“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后，他提出与各邻国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并保证遵守罗加诺公约。他所需要的无非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舰队而已。他保证，那将是他的最后要求。他发誓，这个要求是最后的，永远不变的。

在国外许多有影响的人士中，他的话被按其表面价值接受了。伦敦的《泰晤士报》说，他的讲话“合理、直率而全面”。只此一举，希特勒便扭转了孤立的局面。德英海军会议于两周后在英国外交部召开，由乔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任德国代表团团长。日本驻伦敦的海军武官曾给他提出了极好的咨询意见，海军武官告诉他，1921年日本前往华盛顿参加会议时，错以为可以与英国人搞一桩交易。“结果，当英国人挑拨我们的外交官员与海军专家的关系，使他们几乎成了死对头时，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建议，德国集中力量坚持一个明确的要求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即使有破坏会议的危险

也在所不惜。一旦英国人醒悟到德国矢志不渝，他们就会慢慢让步同时还会更加尊敬对手。

由西蒙主持会议，他与平常一样和蔼可亲。他指出，会议的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各海军大国会议铺平道路；否则，各国的军备竞赛就会加速进行。光限制吨数是不够的。

里宾特洛甫拒绝讨论其它问题一心要得到那 35%的比例。如果英国政府不准备立刻接受这一条件，那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谈判。他保证，英国一旦接受这个比例，关于建立海军之计划的技术问题便可立刻得到解决。

西蒙对谈判一开始便提出这样的条件，当然无可奉告。生硬地鞠了一躬，然后便离开了会场。罗伯特·克莱齐取代了西蒙的位置，代表英国表示坚决反对。但是顽强的里宾特洛甫也毫不止步。下午，他们再次会晤，但毫无进展。奇怪的是，英国人竟提议次日上午再次会晤。

次日克莱齐宣布，英国准备接受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要求。6月6日，约翰爵士返回会议，他红光满面，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德方便大获全胜，全面的协议友好地达成了，里宾特洛甫变得彬彬有礼了。英国不但同意德国拥有相当于英国舰队 35%的吨位，而且还作出让步，让德国拥有 45%的潜艇。里宾特洛甫回到德国后，成了一名征服英雄。用谈判方取得了德国海军的全部秘密目标，这便把希特勒从一个实力派变成了政治家。被一所谓盟国单方采取的行动（恰好又是在滑铁卢纪念日那天采取的）搞得目瞪口呆的法国，向伦敦发了一份愤怒的照会。但英国的公众舆论却几乎一致赞成这一协定。

对伦敦条约，苏联的反应几乎与法国的一样强烈。它证实了英国统治阶级内的某些分子，包括继位王子在内，正在帮助德国加强其波罗的海之海军力量以便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远东则支持日本的野心。尽管忧心忡忡，苏联还是与希特勒签订了贸易协定。希特勒将对苏贷款提高至 2 亿马克，并准备在 10 年内，将此数字增至 5 亿。这并不是放弃其生存空间之梦想，而是在国际外交游戏中另一着棋。在与西方谈和平、与东方做买卖的同时，德国的重新武装则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其速度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估计要快得多。

4. 取消犹太人的公民权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扩展，他的私生活也扩展了。在他周围形成了两个内层：一个是由像戈培尔、戈林、赫斯等组成；另一个则更具有私人性质，司机、秘书、仆人及其他亲近者。最内层包括一名建筑师施佩尔，一名飞机驾驶员波尔。同时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军事副官如海军中尉冯·普特卡默，陆军代表尼古拉斯·冯·贝罗等水平不同的人们。有些是属于两个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

希特勒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出没。他无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下班后处理。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规律，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结婚可能会成为我的灾难。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我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难得前来的情人那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她在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

“我在他身旁坐了3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他就是想不到。”

当听到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5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

“……如果到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3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瓦尔库莉姑娘，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讲演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日的恐惧又复活了。数月来，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他服药过度，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5月23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肉。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亲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地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弃后，爱娃于5月29日凌晨吞下了20粒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原因是演戏。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爱娃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935年8月19日，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3间一套的公寓房。该公寓房座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遥。

希特勒平时很少在那里。他若是来，也是在邻居们入睡以后。他与爱娃的约会也很难保密，因为秘密警察在大楼内外暗中保护。喉咙依旧在折磨他，希特勒向冯·埃肯教授表示，他怕里边长癌。

9月11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演说，呼吁要发展文化，他攻击犹太人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艺术。攻击是如此之温和，使外国观察家怀疑他的反犹纲领，是否真的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西方越来越激烈的抵制德货运动使他深信，将几乎刚好16年前他宣布要采取的某些法律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了。9月13日，他下令在24小时内拟就一项法律，叫《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

被分配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们刚起草一份禁止犹太人与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婚外性交的法令，希特勒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命令，要他们起草《帝国民法》。直到9月15日凌晨之时30分，众人才一致同意，只有具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人才能当公民。

其它条款未发生争执。于是，次日上午9时，希特勒便在纽伦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有利。这可能“为德国人与犹太人建立可容忍的关系铺平道路”。“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实现，犹太人在国内外的煽风点火得以继续，那么，我们的这种立场就得重新检讨。”

5. 德军开进莱茵兰

10月3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的蠢举，使世界的注意力一下子便从希特勒新近对犹太人的攻击及其扩军上移了开去。一个文明国家，迫使原始部落骑在马背上与战斗机和坦克作战，使全世界群情激愤。英国在国联牵头对意大利实行有限的经济制裁。尽管德国国内呼声四起，反对意大利而同情埃塞俄比亚，希特勒仍公开拒绝声援海尔·塞拉西皇帝，暗中则给予军援。与此同时，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运送原料，企图拖累意大利，使德国得到更多的行动自由。1936年2月，他作好了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准备。这个地区包括了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以及莱茵河东岸长达30英里的狭长地带，其中包括科隆、杜塞尔多夫和波恩三城。1月20日晚，英国国王逝世。令希特勒更野心勃勃。乔治死后，由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八世继位。此人善独立自主，对德国之众多要求均表同情。

英国的鼓励，加上国联对意大利之侵略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有气无力，加强了元首占领莱茵兰的决心。既然英国不通力阻止墨索里尼，那末，如他效法墨索里尼并步其后尘，英国充其量不过作作公开抗议罢了。

希特勒已经下决心采取行动，但却向法国人保证他是有和平意图的。“两国保持友好，此非明显地有利于两国吗？”2月21日，他对记者贝特兰·德·尤弗纳尔说，“我希望与法国缓和紧张局势……你仍认为德国有可能侵略，这太离奇了。”

元首下令开始“冬季训练行动”。3月2日，勃洛姆堡向三军司令下达预备令，将部队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定在3月7日，星期六。

那天下午，英国外相艾登回到伦敦。当晚，他便向内阁汇报说，法国人似求助于他们对莱茵兰的权力。“对英国人民来说，这是个值得怀疑的事业，”他在回忆录里评论说，“那时，为反对德国占领莱茵兰而主张与法国一道采取实际行动的人，在英国千里挑一也难。”

的确不错，对元首表示关切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而元首当晚也“彻夜难眠”。“我反复问自己”，他后来向霍夫曼私下透露，“同一个问题：法国会做些什么？会反对我几营小兵力的前进吗？如果我是法国人，我知道该怎么于：我会痛击之，不止一个德国兵越过莱茵河。”

希特勒一夜不能成眠，在简朴的小铁床上辗转反侧，脑中不停地在考虑法国将作何种反映。英国并不使他发愁。他之所以选择星期六这天，是因为这日没有一个官员上班。“他们要到星期一才上班”，他对魏德曼说，“到那时激动情绪已成过去！”

星期六一大早，一支特殊先遣队便向坦贝尔霍夫机场进发。那里已有一架运输机在等候。飞机起飞后仍不知他们飞向何方，连驾驶员也不知目的地在哪里。驾驶员要在规定的时间才能打开锦囊，那时他才知目的地在哪里。

同日上午10时，德国大使拜会了艾登。在讨论了一阵另一个英德协定后，霍希突然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攻击法苏条约违反了罗加诺公约。因此，德国便决定收回莱茵兰非军事区。霍希继续读道，希特勒提出与东西方国家分别签订互不侵犯协议，也愿意重返国联。

艾登对莱茵兰行动深表遗憾，他将慎重考虑德国的建议。他说，德国对国联的态度如何，这是最重要的。霍希说，德国返回国联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至于莱茵兰，德国过是派几支小先遣队到哪里去罢了。

上午11时，戴着先遣队的飞机在科隆着陆。半小时后，记者们便与数以

千计的德国爱国者站在横跨在莱茵河上的霍亨佐伦大桥上。18年前，被缴械的德军从法国后撤，垂头丧气地打这里走过。突然间，人群听到了脚步声，铁轮的隆隆声，以及马蹄声。当首批德军上桥时，人群中爆发了一阵又一阵欢呼声。在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其它部队也从其它5座桥上越过莱茵河。“冬季训练行动”共有19个营的兵力，但只有3个营越过莱茵河，即使如此，这一小部队带来的影响却是异常巨大的。

在克罗尔剧院内，希特勒正在对国会发表讲话。他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他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他长篇大论地论述凡尔赛条约如何不平等后，讲演的速度缓下来了。他用压抑的声调说：“此时此刻，德军正在前进。”剧院顿时成了疯人

院。

事实上，那3个营德军已跨过莱茵河，但有令在身，若遭法军挑战，便边打边退。

1936年3月7日，星期六，当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伦敦并未认真考虑是否采取行动。法国政府催促总参谋部采取行动。他们保守得几乎到了胆小的地步。甘末林将军警告说，一个战争行动，不管如何有限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如不发布战争总动员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动。他同意派遣十三个师至马奇诺防线。

胆怯的姿态吓坏了柏林对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撤军。他说，若法国发动进攻，德国势必不战而退，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到重大失败。尽管忧心忡忡，希特勒却纹丝不动。

星期一，2万5千名德军开进了莱茵兰。牧师们挥舞着香炉为他们祝福。法国人只不过是在动嘴皮子，希特勒却已焦急万分。他后来承认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如果法国作出报复，我们就得夹着尾巴后撤，因为我们兵力不足，连轻微抵抗也做不到。如果英法结成巩固阵线，德国便会不战而降。

3月12日国联在伦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德国破坏了条约。勃洛姆堡连忙去找元首。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协，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粗暴地对勃洛姆堡说，不准他将来干预政治事务。他说，政策出自帝国总理府，而不是出自战争部。在从莱茵兰撤军前，应看看外国官方有何反应。几小时后，里宾

特洛甫从伦敦传来话说，危机已过，艾登似乎只对谈判感兴趣。

希特勒成功地讹诈了英法两国，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胜利。希特勒狡猾地利用莱茵兰事件为进一步巩固权力服务。他解散了国会，并将这一政策交给公民投票作决。他对群众说：

“我按良心办事，也是为关心人民。我必须保持我国人民的荣誉，领导他们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一席。3月29日百分之九十八点八的选民投票选举希特勒。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如此受群众欢迎。他已把一个要央求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挑战者。”

6. 奥运会

莱茵兰事件之后，令希特勒特别难受。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车祸，而他自己则受失眠折磨。他向勃兰特医生诉

说，他左耳耳鸣，其音律甚高，有如上属声。勃兰特嘱咐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热水和凉水交替洗脚，然后吃几粒轻剂量的安眠药。他遵守更加严格的生活规律。一到晚间，他便将自己反锁在简朴的寝室内。室内的唯一装饰是他母亲的油画像——是按一张旧照片画的；床的右边放一张床头桌。早晨，他坚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帮助。只有他的早餐一般是两杯牛奶，十块左右的饼干和几块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饭他通常是站着吃的，且边吃边翻阅新闻局送来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钟吃早餐，之后，便直接进办公室。

1936年夏，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由于德国采取反犹政策，英美法三国曾极力进行抵制，但未能奏效。希特勒虽然有病魔之苦，还是急于将此次运动会变成宣传纳粹成就的橱窗，便作了不少让步，允许象征犹太人的花剑选手赫仑纳·梅耳、曲棍球明星卢迪·巴尔代表帝国参加此次运动会，让另一个犹太人乌尔夫岗·菲尔斯纳上尉负责兴建和组织奥运村。更重要的是，公路沿途的反犹标语牌以及禁止犹太人进入疗养地带的公告均被拆除。在柏林，施特莱彻的《前锋报》也从报摊上消失。事实上，反犹运动全部停止。他们对和解的标志进行了大肆国际宣传，致使许多外国人蜂涌至柏林，并受到热情接待。

8月1日举行开幕式时，天空万里无云。当日下午，希特勒领队通过凯旋大街，朝体育馆走去。车队，在4万名冲锋队员和其它卫队的保护下，沿着十里长街缓缓前行。队伍抵达体育馆后，身穿最朴素制服的希特勒，与两名奥林匹克官员一起，向前走去。跟在他后边的有保加利亚国王、瑞典继位王子、希腊继位王子、意大利继位王子，以及墨索里尼的儿子。他们沿着地道走进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受到了30支喇叭吹奏的铜管乐的欢迎。还有一支3000人的合唱队，他们演唱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维塞尔森林之歌》和《奥林匹克之歌》。希特勒正式就位时，11万观众同声欢呼。有些代表团行的是奥林匹克致敬，右手伸直至身旁，令观众大为开心，但奥地利代表团却改为纳粹抬臂礼。保加利亚人做得更甚，他们还操了正步。由250人组成的法国代表团进场时，掌声最响。他们行的致敬礼是罗马式的，而不是奥林匹克式的。头戴草帽英国人进场时仅来了个“向右看”，使许多观众大为不快。获得掌声最少的是美国队，有些观众还无礼地跺脚。经过主席台前时，他们只“向右看”，连旗子也未落而复升。

次日，由于德国人汉斯·沃尔克打破了奥林匹克铅球记录，希特勒前来祝贺，也对打破万米长跑记录的三个芬兰人和获得标枪冠亚军的德国女选手表示祝贺。待跳高项目中德国选手全部被淘汰时，天色已晚。希特勒与三名美国选手握手便离开了运动场。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通知希特勒，由于他是首席贵宾，应该对全体获胜者祝贺，希特勒接受了后一选择。所以未与获得四枚金牌的杰塞·欧文斯见面，便被人大肆渲染，说元首有意冷落这位伟大的黑人运动员，但欧文

斯本人却否认这一说法。他说，希特勒确曾向他祝贺，“我打总理跟前走过时，他站起身来，向我招手，我也朝他挥手回礼。我认为，作者这样批评德国引以为自豪的人物是卑鄙的。”

元首几乎观看了每一场田径赛，使他的左右惊讶不已。每当德国运动员竞技时，他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热情观看，脸部还在抽搐，在曲棍球比赛时，由于太紧张，不敢看下去，事后才让人向他报告比赛情况。运动会于8月16日结束，希特勒出席了闭幕式。当乐队奏起《运动会结束》之歌时，运动员们跟着乐曲的节拍欢快地起舞，观众则热情洋溢地与他们告别。场内有人向希特勒“欢呼胜利”，接着欢呼声四起，全场响起了“欢呼胜利！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欢呼胜利！”的欢呼声。

运动会是纳粹外交活动的胜利。德国人获得了大部份的金牌（33枚）和大多数的银牌和铜牌，德国人以57分的悬殊比分击败了获亚军美国人。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观众在离开德国时，对所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高兴，对自己所见之希特勒帝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奥运会上获得的成绩，由于莱妮·瑞芬斯塔尔拍了一部上下集的记录片而获进一步巩固。

在进行的自我祝贺的凯歌声中，却插上了一曲悲歌。负责建造奥运村的菲尔斯纳上尉，由于是犹太人，在最后一分钟被撤换。他悲愤的用手枪自杀了。

7. 外交成就

莱茵兰事件后，元首便埋头于对外政策。希特勒在谋求德国至上的征途上前进。1936年夏天，就战时经济问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一式三份，戈林和勃洛姆堡各执一份，另一份由他自己存查。在备忘录中，他写道，德国的潜力有多大，军事力量就应有多大。这是一项紧急任务，不允许优柔寡断。德国不但缺乏原料，且人口过剩，自己的土地不能养活自己。我们现在必须将措施付诸行动，才能在将来最终解决问题，在此之前则应暂时松弛一下。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生存空间，扩大我国人民的原料和食品的来源。他继续说，最终解决原料短缺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与其要等待到下一次大战，不如在和平时期便着手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虽然还有其它需要，也必须着手进行经济调查和试验。必须尽快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以达到下述目标：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的准备，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作好战争准备。

他又试图进一步巩固与英国的关系。在对付一位如此富有决心和如此狡猾的领导人时，英国人又一再表现出他们是何等的愚蠢。他们坚信，用让步和谅解的办法，他们定能让希特勒就范，而他则在去年一年利用了英国人的误解，与他们进行妥协谈判，并含混不清地提出签约。带希望和善意的英国要员继续涌向德国。

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的生日纪念，给英国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前首相劳埃德·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的纪念活动比先前的更加壮观，它仍以两大内容为标志：达到自给自足而实行的“四年计划”和以反对“混乱力量”为名，实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动。星期天上午，天气晴朗。在纽伦堡庞大的体育场上，希特勒对集结在该处的16万名褐衫党徒和党卫军发表讲话，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之后，他便乘敞篷小车回城，不时向拥挤在狭窄的道路两旁和站立在阳台上的朝他喝彩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英国合众社记者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小汽车紧跟其后。与赫尔姆斯同行的还有五六名各报记者，他们均应邀前往纽伦堡城堡与元首共进午餐。客人们被请到城堡的塔楼上。希特勒已不再神气十足了，而是平易近人的态度。一当某人提起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再次成了演说家。他说，莫斯科正在想方设法统治欧洲，但德国不答应。

赫尔姆斯走了。他觉得，希特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其计划也是合理的。大会的最后一天，人们观看了大型军事表演。在模拟空战表演和最近代化的高射机枪的效能表演后，在体育场上表演了一场真如实战的机械化战斗。党的生日纪念结束了，一方面保证实现和平，宣布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炫耀可怕的武力威胁。相信元首一贯正确的不但是党的忠实信徒，连英国前首相劳埃德·乔治对自己在德国之所见所闻也置信不疑。在《每日快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希特勒单枪匹马救德国于水深火热。他是天生的领袖，是具有坚强意志和英勇无畏性格的人物，既受老人的信任，也受年轻一代的崇拜。

希特勒极力与意大利谋求谅解。他派汉斯·弗兰克前往罗马，邀请他访问德国，不但以意大利独裁者的身分而且也以法西斯创始人的身分来访。墨索里尼真心实意要与德国联系，遂派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飞赴柏林，为他的出访作初步安排。

齐亚诺与牛赖特便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确立了新的关系，并规

定广泛地进行合作。在米兰的墨索里尼说：“……柏林与罗马联成一线，是一条轴心，凡有志于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洲国家，均可围绕这条轴心转动。”

在外交上，对希特勒而言，1936年是取得成功最大、付出代价最小的一年。英国已被弄得神魂颠倒，而意大利也即将就范，与德国进行不平等的合伙。他还说服了日本与之签订《反对共产国际条约》，该条约包含了一项秘密协定，即互相支援，反对苏联。这项协定双方虽然承认并非绝对必须，但就使德国之重新武装合理化的宣传策略而言，却是重要的。

8. 德国的巨大成就

36 年仍给希特勒带来巨大成功。尽管他害着严重的胃病，且又失眠和患着湿疹，圣诞节他过得很愉快。

1937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在议会发表演说，纪念他就任总理四周年。他神采奕奕，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重申了他的神圣的职责：“今天，本人必须感谢上苍。是上苍的恩典才使我一个战时的无名小卒，得以成功地为我们的荣誉和国家的权利进行斗争。”在执政的头四年里，希特勒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为收入较低的人们增加利益铺平了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和减少失业。希特勒还建起了高速公路网，将全国联成一体，战时有助于全国动员。为了使普通人能买得起汽车。他要费尔迪南·波尔希设计一种四座、每 40 英里耗油一加仑、发动机用空气冷却、冬天不致上冻的小汽车。他还为未来的其他革新作了设想。在大城市内，必须建造自动化的地下停车场、众多的自由贸易中心、公园、绿化区，严格控制污染。他鼓励工业界作出努力，以完全消除有毒气体。凡新建造的工厂，必须配有防止水源遭污染的装置。

他对城市规划的兴趣甚至延伸至小镇和乡村。他下定决心，使哪怕是最简陋的市镇都要多少有点文化和美感，然后一步一步地提高各市镇的舒适水平。

青年的福利及对青年的培养也享有优先权。教育制度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相当重视体育，重视种族生物学的必修课程，以及重视德国历史和文化，他说：“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形成性格，”锤炼性格过程的是将希特勒半神化。在进午餐前，孩子们必须背诵：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赐与我的元首，
保护我吧，只要我还活着！
您救德国于水火；
感谢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
长日佑我，万勿将我抛弃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万岁，我的元首！

德国的小学生，在智育和体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卫德国，保卫德国，他们将适合并准备在外国领土上前进或牺牲。“少年训练”对 10 至 14 岁的少年所作的训练，为“希特勒青年团”作准备。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鲜血和荣誉字样的匕首。他还被告知说，现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护它。1933 年前，“希特勒青年团”的目的不外乎是将各阶层的青年团结起来，用宣传和说服的办法，一方面让他们与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决裂；另方面向他们灌输为权力而斗争的思想。后来，它的任务却成了让他们练好体魄，接受政治教育，训练他们为元首和民族效劳。

为了在思想上和体格上让全国为未来作好准备，希特勒在四年内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连外国人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国之婴儿死亡率还低。希特勒当政后，肺结核和其它疾病大大减少。审判罪犯的法庭从未如此闲过，监狱也从未如此空过。看到德

国青年如此健壮，这确是件快事。连最穷苦的人们的衣着也有改善。他们的笑脸证明，他们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户多了，拥挤程度减少，洗手间也有改进。在“美化每个地方”的口号下，所有办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齐清洁。花草多了，使劳动者能欣赏自己的环境。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还为工人们听音乐会、上剧院观赏表演、参加展览、跳舞、看电影和参加成人班学习提供津贴。连最卑贱的劳工及其妻儿子女，均可坐上豪华的旅游船，欢度梦想不到的假日。

希特勒致力于团结各阶层的人们。他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产阶级。公共媒介宣传希特勒是个建筑工人、画家和学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普通人，他吃的饭菜也很简单。他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名誉学位。在工厂里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他总是使用“您们”，向他们吹嘘说，他是个没有地产、没有股票的人。

甚至在武装力量中，这种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觉出来。在常备军中，官兵之间的同志之情比先前要强烈得多，党卫军成了民主的典范。在这里，官阶之间的差别已不复存在，有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最能表现平等主义的是“青年劳动服务”，凡17岁至25岁的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和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或当农民，或当劳工。这种做法原是要减少失业、但却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众维持兵团”。在劳工营的墙壁上，常常挂着旗帜、元首和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以及诸如“德国需要你，你需要德国”、“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劳动服务是德国青年的光荣职责”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

没有一个研究德国问题的客观的观察家能抹煞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劳工虽然丧失了工会，资产阶级也丧失了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权利。每个人都丧失了权利和自由，国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荣。为希特勒的纲领所付出的代价却不限于公民自由的丧失，他用独创的方式使国家摆脱了经济衰退和结束了失业，但是，他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重新武装，这便强将潜在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加在德国头上。希特勒已下令将陆军扩大至36个师，国民经济被弄得失调。基本原因有两个：进口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九，而出口价格却下降了百分之九；由于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德国农业无力满足本国的需要。原料库存正在减少，市场上已出现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私有制的情况。由于俄国对这两种商品的出口进行封锁，罗马尼亚又索价甚高，此危机便进一步加剧。供取暖、照明、润滑用的燃料之供应，以及柴油的供应，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国之生产又无能给予取代。

就是这种紧急情况，促使希特勒于1936年中夏提出了实行战时经济的四年计划。他自然深知在德国现在的版图内，是无法生产足够的原料以达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坚持应尽力而为。他坚持说，只要德国向东扩展，绝对自足是可能达到的。

对他的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产的主张，工业界怨声四起，但他充耳不闻。假如他们敢于不参与实现自足而进行斗争的话，他将用国家权力进行干预对大企业进行反击。他宣布，“财政经济，以及所有理论，都是为人民自立的斗争服务的。”对希特勒而言，这不过是个意志力的问题。他要求实行“可与军事和政治动员相比”的经济动员。只要陆军在四年内可供作战，如何将经济动员起来，这他是不管的。

这就是他 1936 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宣布的四年计划。大会结束后一月，他挑选了戈林去主管这一计划。所有高级职务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担任。这就意味着，纳粹党已被排斥在为国民经济生活制订决策的范围外。

在一篇号召全国动员的演讲中，戈林宣布，工人和农民必须全力生产，发明家必须随时任由国家支配，商人不能考虑利润，只能为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德国经济着想。

假如希特勒死于 1937 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

希特勒还作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在比利时，自称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国“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以坚强的意志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之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都一致相信，无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

第十章大日曼帝国

1. “轴心”国

37年党代会是在9月6日开幕的。希特勒抵达纽伦堡，在

检阅了卫队后，乘车进城。城内到处旗帜飘扬；教堂的钟声齐鸣；到处是欢呼的人群。次日，在《巴登维勒进行曲》的乐声伴随下，他出现在会议大厅。瓦格纳宣读他的文告。在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和流血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和作一番对比后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虽然东方和西方散播共产主义一致的行动。但是令人欣慰“全世界可以在我们四周放火，但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将在大火中屹立，像白金一样。”德国已和平地、公平地解决了她的社会问题，而其它国家则在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掀起的罢工和恐怖主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这篇讲话的目的是要使民众自豪，不是点燃他们的好战精神，他自己则准备向一盟国献媚。本尼托·墨索里尼已同意出访德国，但有两个条件：他不带晚便服前来；给应予以与民众见面的机会。他穿一身崭新的特为此次出访裁制的法西斯民兵制服，于9月23日离开意大利，随员达100人。两天后，身穿简朴党服的主人在慕尼黑车站迎接了他。希特勒伸出双手向他表示欢迎。此时，鼓声大作，群众高喊“元首！”和“总理！”

墨索里尼一行，沿着铺在车站里的红地毯缓缓前行，然后隆重地乘车前往元首的住处。在这里，他们首次交谈。希特勒那撮头发不整，外表看来很不整齐。他的声音很粗，有时甚至沙哑。有时候，他双眼突然闪闪发亮，有时又突然变得暗淡无光，好像神不守舍似的。墨索里尼他身体笔直，坚定有力。他前额宽阔，嘴巴又大又阔，又方又大的下巴向前突出。当轮到他咒骂布尔什维克或国联时，他的语言比希特勒要生动得多。在他的富于表情的脸上，愤怒、鄙视、坚定和狡猾的神情交替出现。他亦富有拉丁人独有的装模作样感。他的话有恰到好处之妙，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希特勒的笑中含讥讽；墨索里尼笑得自如，发自心底。

在长达一小时的会晤中，他们在总体上同意向日本表示友好，支持佛朗哥，挫败英法之野心。墨索里尼紧张地进行一系列的参观活动，他还检阅了党卫军操正步前进的大规模游行，参观了陆军在梅克伦堡的演习，还视察了克虏伯设在埃森的大型工厂。9月28日下午，参观达到高潮。当两位独裁者分乘的两列火车快要抵达目的地即奥林匹克运动场附近的火车站时，希特勒的专列沿着另一条轨道，与墨索里尼的专列并排行驶了15分钟。两列火车的司机为此曾排练了多日。所以，这次行动进展非常顺利和成功，使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可通过敞开的窗户进行交谈。之后，希特勒的专列便开始加速，比墨索里尼的专列先行几秒钟抵达车站。这样，希特勒便有时间走过月台，待墨索里尼的专列一停，便向他伸出手去欢迎他。这是效率之最，加上士兵们的正步操练，产生了希特勒所预期的壮观。

更有甚者。从车站至柏林市中心，沿着凯旋大街的两旁，百万群众夹道欢迎。市中心挂满了法西斯和国社党的旗帜。长条幅从房顶垂到街上。在每个广场都架设了塔楼，交替着出现德国国徽和法西斯的国徽。下午4时停止所有工作，以便使当地群众加入欢迎队伍。当局出动了6万名党卫军以维持热情洋溢的群众的秩序。保安措施之严密，安插在群众中的便衣人数之多，在德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两位独裁者肩并肩站在敞篷车上。欢迎队伍自发地朝他们欢呼。此情此景确实令墨索里尼高兴不已。次日的接待尤其隆重热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

二人重返奥林匹克运动场，以便让墨索里尼与群众见面。希特勒让墨索里尼首先进场，好让他私下高兴一番。然后，希特勒向此时此刻正带着深情厚意分享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事件的两国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民发表简短的演说。他断言，他们的社会“不仅是个信念社会，而且也是个行动的社会。德国已再次成为世界强国。我们两国的力量是维护欧洲文明的最强大的保证，是反对破坏势力的武装力量。”

墨索里尼大步走到麦克风前。由于他坚持要讲德语，如此壮观的场面又令他激动万分，所以，他越讲越快，使听众只能听懂片言只语。“柏林——罗马轴心”，他喊道，“建立于1935年秋天。两年来，这个轴心为我们两国人民的更加团结，为欧洲的和平，起到了极好的作用。”他说，他之采访并非普通的外交或政治访问，而是具有同一目标的两个革命国家团结的表现。

猛然间，运动场上空下起了滂沱大雨。墨索里尼的讲稿被淋透了。他说：“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真正民主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满是雨水的麦克风和扩音器把他的声音歪曲了。他刚毅地继续讲演，听众一动不动地坐着，坚持到底。“我有个朋友，我将与他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直到最后。”大会结束后，情况更加混乱不堪。为使群众能再看上他一眼，他不得不独自乘敞篷车缓缓回柏林。他未穿雨衣，回城后，他成了个落汤鸡。

墨索里尼是带着对希特勒的轻视而来的。怎么能信任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甚至连一个情妇都没有的男人？然而，待他走时，他是带着对他看到的一切所产生的深刻印象离开的。他肯定看到了比他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得多的权力。从那以后，两个独裁者的作用便颠倒过来了：老大墨索里尼受老二希特勒的影响了。

在柏林，两国并未签订协定，也未发表最后公报。但是，德国外交部却通知其驻外使团称，两国领导人业已同意，两国之任何一方，若不得对方同意，不得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意大利将在地中海自由行动，德国则可在奥地利享受同等的特权。

对此安排，与墨索里尼一样，希特勒也感到高兴。他们在总理府宴会上的祝酒词要比发表公报有意义得多。希特勒再次断言，两国的政治目标相同，是真诚的友谊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他的客人则回答说，德国和意大利的团结一致是活生生的、积极的，两国“在将他们分开的企图面前，巍然不动。”“轴心”成为现实后，希特勒便可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2. 践踏艺术

完全独裁的希特勒，他依然是个“画家”。对他而言，艺术与政治是不可分的。为了推行纳粹的艺术与建筑，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散鲍豪斯建筑学派组织。这个组织始于世界大战结束，奠基人是建筑师瓦尔达·格罗皮埃斯，其目的在于通过综合利用绘画、雕刻、工业设计和建筑艺术，试行创立一种实用建筑学。这个学派是现代派的缩影。因此，对属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希特勒而言，这简直是十恶不赦。

最受他推崇的建筑师是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教授。希特勒对教授产生深刻的印象，曾对特鲁斯特的娇妻私下说过，“一旦我上台并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后”，他一定要去拜访她的丈夫，因为他的杰作明快、有力，高雅。

希特勒最关注工程是在慕尼黑建造的德国艺术馆，建筑费用是公众捐献的。希特勒本人曾于1933年秋参加该工程的奠基典礼。盛典开始前，数以万计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一直游行至建筑工地。泥水监工和工人们穿着中世纪的服装迎接元首。乐队奏完《诗乐会》序曲后，希特勒发表讲话，再次宣布其关于德国文化的理论，将“德国艺术首次府”的雅称赐给了慕尼黑。在他为艺术馆奠基时，用的是银锤，由于用力过猛，锤子断了。人们沉默了，按迷信的说法，奠基时锤子断裂，建筑师就会死去。戈培尔试图将此事搪塞过去：“元首抡锤时，锤得坚定有力。”在希特勒看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他相信这是个凶兆。特鲁斯特也心中害怕，不到几天他便因心绞痛而住院。几个月后，他死于肺炎。

特鲁斯特太太继承了丈夫的事业。每逢去慕尼黑，希特勒总要去她的工作室看她。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建筑学。她是个自信心很强的女人，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天，有人问她对斯佩尔有什么看法时，她转身对元首说，如果希特勒先生要她丈夫设计一座高100米的大楼，特鲁斯特教授就会想一想，次日便会向他回禀说，从建筑学和美学观点看，此楼只能高96米。但是如果你对施佩尔说，我需要一座高100米的大楼，他就会立刻回答说，‘我的元首，200米！’你会说，‘我看中你了’。”希特勒不但没有被触怒，反而与众人一起大笑。她回忆说，“他总是喜欢大笑，希特勒真有幽默感。”

1937年夏天，德国艺术馆落成了。为庆祝该馆的落成，他们准备在该馆搞一次大型的艺术展览。所用的展品由评判人（包括特鲁斯特太太在内）进行选择。一大批现代画入选了。希特勒认为这些都是堕落的作品，于是，在开幕前一天，他与特鲁斯特太太在展馆内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她争辩说，这些展品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代表了德国艺术的典型性。争吵越来越尖酸刻薄，随行人员都往后退缩。希特勒一直未提高嗓门，但态度却很冷淡，且一本正经。她置这些风暴信号予不顾，说她不能背叛自己的艺术信念。“既然您不批准我们的展品，又有不同看法，我立刻退出评判团。”元首冷冷地与她道了再见，把选择展品的任务交给了摄影师霍夫曼。然而，几个星期后，希特勒又前往特鲁斯特工作室，好像什么事未发生过似的。

展览开幕那天，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内都挤满了歌颂德国两千年文化史的游行队伍。与旧式展览相比，这次的展览并不怎么让人们唤醒过去。最现代派的画莫过于阿道夫·齐格勒等画家的作品。展品中虽然有不少好的作品，尤其是雕塑作品，但大部分却是异想天开或豪气冲天的作品，不是充满田园

诗意就是充满对农家生活的幻想，对战后德国生活之困苦描写得很少。

在当天发表的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德国艺术馆系为德国人民的艺术，不是为国际艺术而设计建造的。他说，画家的责任不是留恋过去，或进行歪曲或丑化。在今天新的时代里，应该创造新人。男人和女人都应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对生活应有新的感受，或有新的快乐。腐朽的现代派搞出了些什么呢？“是畸形的拐子或白痴；若画女人，她们则令人讨厌；若画男人，他们则更像是野兽。”假若这些“艺术家”果真如此看待事物，“那末，人们只好问一声，你这种视力缺陷从何而来？如果是遗传得来的，那末，内政部长就得负责，不准让这种严重的视力缺陷存在下去，如果你不相信现实，把自己的欺诈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那末，这便要由法庭来处理的犯罪案件了。”他发出威胁，既要剥夺有视力缺陷的现代派艺术家的工作，还要将其他艺术家当作危险的罪犯加以处置。这充分表明希特勒对艺术的信念。他把德国最有威望的艺术家列入这个范畴，连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表现派大师埃米尔·诺尔德也属此列。他已开始对这类画实行镇压。数以千计的诺尔德·巴尔拉赫、费宁格、科林特和格洛茨等人的作品已被没收；一些外国画家的作品也遭同样的厄运。约730幅这种作品同时在慕尼黑被作为“堕落的艺术”展出。这些画不但没有装上镜框，且被胡乱挂在墙上，旁边还被加上“病态心理就是如此看待自然”、“犹太人眼中的农民”之类的粗暴无理的按语。展览中有一部分是说明黑人艺术之影响的。还有一部分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再有一部分是展出犹太画家的作品。

展品还包括疯人画的作品，目的在于表明，现代派所创作的东西更加杂乱无章。科科斯卡创作的两幅肖像素描竟与一疯子画的印象派头像挂在一起。”这些画家应该与他们的作品捆在一起，好让每个德国人往他们脸上吐口水”，一位参观者怒气冲冲地说。虽然，类似的恶意攻击比比皆是，但这次堕落艺术展览还在全国巡回展出，吸引了两百万参观者。这个人数比列队进入德国艺术馆以领略希特勒的德国艺术上品的人数还多出四倍。应该承认，两百万人中，许多人是受到下流广告宣传的引诱而前往的。但是，毫无疑问，许多人是为了对遭查禁的伟大艺术的成果最后看上一眼才前往参观的。

3. 侵略蓝图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召见了军事头目，他的陆军副官霍斯巴赫，以及外交部长牛赖特。表面上，召见的原因是要解决勃洛姆堡和戈林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争夺原料的问题。战争部长勃洛姆堡对戈林利用其四年计划主任的职权偏袒空军大为恼火，曾不断央求元首禁止其之所为。

希特勒的特点是，当双方出现争吵时，他历来避免偏袒一方而去开罪另一方。下午4时，会议开始时，希特勒对争吵一事闭口不提，只大谈特谈其对外政策。从其清醒的态度看，很明显，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他要大家对此次会议保密。他要求与会者“为德国政策之长远利益考虑，万一他身故，将他的此次讲话作为他的遗嘱。”希特勒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要确保民族的安全，维护和扩展民族的生存空间。德国是否有前途，全看是否能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生存空间只能在欧洲找到。德国在何处才能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这当然不会没有风险。德国的力量将在六年左右时间内达到顶峰。打那儿以后，德国的军事装备将会过时。到那时，其它国家又会重新武装起来。当其它国家仍在准备防守时，德国就应采取攻势。最迟于1943—1945年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

希特勒几乎不看提纲。各种事件和数字从他口中出来，滔滔不绝，其记忆之清楚令人吃惊。他的这种天才只有凯撒、拿破仑和列宁可与之相比。他继续说，德国的第一个目标是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巩固其东南两翼。毫无疑问，英法两国已将捷克人暗中一笔勾销，英国本身问题多得难以胜数，无力发动对德战争。他警告说，捷克人之防御措施与日俱增，奥地利之陆军日渐强大。

一旦上述两国被并吞，大量粮食便可源源不断从两国运往帝国。消灭捷克人，意大利肯定不会反对，但对奥地利，它将采取何种态度，这他就无法估计了。波兰的态度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的行动的突袭程度和速度。背后是俄国的波兰将无意与取胜的德国开战，若俄国出面干预，德国将用闪电战予以反击。

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双双反对元首的征服计划。他们告诫他，切勿与英法两国树敌。法军与意大利交战也不会受大的牵制，依然是西德的强敌。捷克的防线与马奇诺防线一样稳固，要突破它的防线是极其困难。

希特勒让戈林去反驳这些论点，自己则在静听。讨论异常热烈，希特勒脸上的表情不断在变。勃洛姆堡和弗立契都明确地向希特勒表明，他的政策遇到的并不是同意和鼓掌，而是客观矛盾。牛赖特也同样冷淡，他警告说法国和意大利并不像元首想象的那样一定会开战。雷德尔海军元帅虽未参与论战，但很明显，他是持怀疑态度的。

希特勒在那次决定性会议上讲的那一番话虽然不就是战争的蓝图，但的确表明要冒大险，采用外交讹诈的手段也好，采取一系列的闪电战也好，他必须清除一些较小的、初步的障碍，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波兰和法国。他希望能争取英国中立，若做不到这点，他也要在军事上教训英国，强迫它不要过问大陆上的事情。这样，到1943年时，他便能扫清道路，发动大战将首要的敌人俄国打倒。不管如何，他决心走上好战之途。凭着他的赌徒天性，准备铤而走险。

希特勒扩展生存空间的侵略计划是建立第三帝国和消灭犹太人思想的必

然结果。年初的演讲是其最坦率的暴露。

希特勒于 1937 年 1 月 30 日演讲后，又在三个月后发表了一篇更加泄露天机的演讲。听众是做政治教育领导人，是最精锐的骨干分子。这是一篇坦率的内部讲话，他的演讲抱着双重目的：一是对这些党的骨干进行训导，教他们如何完成职责；另一方面是为庆祝对 3000 名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人进行政治教育的开典。

谆谆教导他们应如何玩弄政治和外交手腕，在实际中应如何左右群众。“一个组织只有在它能自然而然地压制个人的自由使全体受益时，它才会有前途。”不能容忍高于民族的权力的原因就在于此。把民主比作一个蚁窝，使人人各自四散奔逃。这些民主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个人。他们软弱，一文不值，毫无抵抗力。让他们去关心国家问题，这是多么荒谬可笑。把最后的决策，例如莱茵兰危机的决策，加在这些渺小的人虫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吧！假若把四年计划首先提交给一个民主议会，情况会怎样？只有犹太人才想得到这种蠢见。

他提出选择未来的领导人的问题。他说，地位和财富是无关紧要的。唯一需要的是才能。他们的父母是谁，这是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抽象思维是毫无价值的。必须有领导能力。他必须与贯彻执行他的计划的人们磋商，他能坚持自己的主意并作出决定。决定必须由他来做。

他突然把话题转向犹太人威胁问题。他的话虽然说得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但大厅内的每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就本人而言，常常是铤而走险的。厅内出现了笑声和掌声。希特勒说：我不准备立刻向我的对手提出决斗。我说‘决斗’，并不是单纯要打架。我要说，“我要消灭你。我要动脑筋将你逼入死角。除非一剑穿你心房，否则，我将不动你毫毛！”他最后说的那句话的意思，毫无疑问，是要用屠杀犹太人的方法将问题解决。听众自发的嗜血成性的尖声怪叫把他的话淹没了。

狂笑声沉寂后，希特勒又变得心平气和，又据理讲了一大堆实用可行的方法，好像刚才讲的话要秘密收藏起来似的。演讲结束时，他号召全国武装起来，我所要求的，是让德国人民振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不是第二等或第三等的民族！而是一等民族。厅内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除了对他的最亲近的追随着，希特勒从未如此坦率过。演讲方式随便，泄露其对犹太人的可怕的计划。若抛去其虚伪，这是一篇冷冰冰的、早有预谋的、享有绝对权威的演讲。

4. 英国的绥靖政策

1937 年在英国，新任首相对德国作出了更加妥协的姿态。“我们的目标”，上任前夕张伯伦首相说，“要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政治保证，将问题作一总的解决；如果商谈破裂，破裂的原因也应是德国拒绝我们在政治领域内提出的合理要求。”张伯伦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又很自信。一上任，他便立刻开始将其前任鲍尔温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温和。“我认为，既进行武装又与德国和意大利改善关系的双重政治，将引导我们安全地度过难关。”

张伯伦公开宣布愿与德国合作后，德国于那年秋天对其真诚程度作了一次试探。英国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一份烫金请帖，邀请他参加由帝国狩猎协会主席赫尔曼·戈林在柏林主办的狩猎展览。哈利法克斯是米德尔顿猎犬协会主席，有意应邀；张伯伦也完全赞成，因为德国许下诺言，让哈利法克斯会见希特勒。

他离开英国赴德，意在试试元首是否有可能与之取得谅解。作为使者，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哈利法克斯虽然为人正直、虔诚而古板，但对德国历史和性格知之甚少，连《我的奋斗》一书也未读过。他觉得戈林“既坦率又有吸引力，对自己之所为充满活力和自豪感……他是个现代的罗宾汉，给我们的印象是综合性的：是个电影明星、盗魁、对财产感兴趣的大地主、首相、党魁和狩猎场的看守人。”

这些印象，连同柏林人给予他的友好接待。为他于 11 月 9 日上午在贝格霍夫会见元首做了良好的思想准备。哈利法克斯朝车窗外一瞧，瞥见两条穿黑裤子的腿，误以为是侍者前来扶他上被大雪覆盖的台阶，直到有人在他耳边粗声说“元首，元首”时才明白过来。

这位身材瘦高、形容憔悴的英国人，连忙下车与面带友好笑容的希特勒相见。希特勒坚持要带哈利法克斯和驻柏林大使馆的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先参观房屋，然后才在书房内矮得很不方便的桌旁就座。“我并未从伦敦带有什么新的建议”，哈利法克斯说，“本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要摸清德国政府对目前的政治局势持何种观点，并看看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听到这些话，元首便生气地皱起眉头。他猛烈地攻击了英国报界，说他们将所谓的德国之要求公诸于世，企业破坏哈利法克斯之来访。哈利法克斯生硬地为英国的新闻自由辩护。希特勒对此公开表示厌烦。

哈利法克斯心平气和，异常客气地试图与脾气乖戾的希特勒和解。他称赞主人将共产主义逐出德国，希望两国能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起，为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犯了一个外交错误。艾登告诉他切勿提中欧和东欧的局势问题。他幼稚地泄漏了英国的意图。希特勒便开始暗自盘算说“西方国家反复在东南欧为我制造障碍”，他喊道，“并将本人从未抱有的政治野心强加给我！”

哈利法克斯机智地重申，英国历来乐于接受任何非武力的解决办法。接着，他又非常不策略地补充说：“这也适用于奥地利。”他的话好像是触动的警铃，希特勒激动地反驳说，关于奥地利，德国从未考虑动武；与德国合并是奥地利人民自己的要求。

他曾与戈林会晤。戈林向他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使用武力”。哈利法克斯加入了绥靖阵营，他对同事们说，元首“非常真诚”。他向议会汇报此行时说：“德国人没有立刻进行冒险的政策。他们忙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德国仍处在革命状态之中。”

关于说服哈利法克斯一事，希特勒的解释又大不相同，且完全是他所独有的：“我常常说，英国人会与我同穿一条裤子的。在他们的政治中，他们所执行的指导原则与我的完全相同。这就是，必须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

希特勒想在圣诞之夜好好庆祝一番，并要仆人作陪，像阴谋者一样，两人避开了党卫军卫兵，偷偷下了楼梯，上了等候在外边的出租汽车。出租汽车在城内转了两个小时，不断改变方向。最后，希特勒到了卢特波尔德饭馆。

由于不知道乘客是谁，收了车费后便很快地开走了。“他大概以为我们俩是怪人”，克劳塞回忆说，“这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自己就觉得此事相当怪。”希特勒没有进饭馆，而是朝科尼希广场走去。看到克劳塞紧张地左顾右盼，他说：“别怕。谁也不会相信阿道夫·希特勒会独自在慕尼黑街头散步。”他说是这样说，但当有人走近时，他还是低下了脑袋。天开始下雪了。由于皮鞋打滑，希特勒便挽起仆人的胳膊。他们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走回寓所。为能避开卫兵，又能在街上散步而不被人发觉，元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年底，英国首相张伯伦确信，只有采取绥靖政策，欧洲才会有持久和平。连外交大臣艾登也在自己的提案《解决德国问题的几项措施》中，表达了这种希望。

艾登的“具体方案”，其实是将比利时和葡萄牙所有的一大部分非洲领土拿来向希特勒行贿。希特勒并非如此廉价可买的。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会谈业已证实，英国将默许任何向东和东南扩张的行动，只要表面上看来合法就行。

5. 至高无尚的独裁者

立契、勃洛姆堡以及其他老军事领导人，害怕这一冒险政策将带来灾难，一想到以战争威胁作为外交武器，脸色就发白，与元首的分歧不断扩大。

这场危机又被埃纳·格卢安小姐加速了。她曾当过妓女，现在勃洛姆堡办公室当打字员。在与她短暂相识后，当了六年鳏夫的陆军元帅便决定娶她为妻。根据军官法典，娶妓女为妻都是违反法典的。

1月12日，陆军元帅与打字员，由戈林和希特勒当证婚人，在战争部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婚礼。然而，新婚夫妇刚外出度蜜月，有关年轻的勃洛姆堡夫人之往事的谣言便四起。从她的档案中，柏林警察局不但找到了她当过妓女的记载，而且还发现她曾照过裸体像。这些发现使希特勒狼狈不堪，又气又恼。他认为，勃洛姆堡诱使他当证婚人的目的，是要强迫他出来消除可能出现的任何谣言。他于是便令戈林将埃纳之往事告诉陆军元帅。如果他同意解除婚姻，避免将此丑闻公开的办法还是可以找到的。否则，勃洛姆堡将被开除。

弗立契更反对元首的政策。戈林便带着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给他提供的档案文件来到总理府，其目的是要证明，弗立契曾罪恶的鸡奸两名“希特勒青年”和一名以巴伐利亚大兵而闻名的男妓。这是雪中送炭，正好将它作为搞掉最不合作的总司令的借口。于是，希特勒无需劝说便当即用上了它。

戈林出房后，他肯定欢喜万分。只此一举，战争部长勃洛姆堡及其最好的继承人便被除掉了，使戈林成了最有希望的继承人。次日上午，他将元首的最后通牒告诉了勃洛姆堡，但元帅却强烈反对宣布他的婚姻无效。

在本德勒大街，将军们不断收到妓女们打来的恶作剧电话，她们为先前的姐妹能有此成功的感到开心。军官团对此有损他们荣誉之举是不能原谅的。众人一致的意见，是让勃洛姆堡立即辞职，并与他的妻子离婚。众人派弗立契前去向希特勒提出此项要求。

他把霍斯巴赫叫了进来，一同讨论人选问题。他的副官不反对弗立契，认为关于搞同性恋的证据肯定是假造的。而人相争不下，一直争至深夜。

魏德曼也找了希特勒，举荐戈林当战争部长。希特勒说：“绝对不行！戈林连视察都不会，我懂得还比他多呢！”“希特勒遗憾地通知勃洛姆堡，说他已被解职。出于礼貌，希特勒叫他推荐一个继任人。勃洛姆堡提名戈林。这次，希特勒更加直言不讳：戈林此人太没有耐性，又懒。勃洛姆堡说，元首本人何不把战争部长之职接过来？很明显，勃洛姆堡系出于恶意。若让希特勒掌管三军，他便可削弱曾将他出卖的军官团。

希特勒吱吱唔唔，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只问谁来掌管三军人员为好？勃洛姆堡提不出人选。希特勒便问，你的人员谁管？勃洛姆堡回答说，由威廉·凯特尔将军统管。接着他急忙补充说，他女儿未来的公公不适宜于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凯特尔被带进希特勒书房。元首抱怨说，他很孤单，凯特尔务必支持他。他有点激动地说，他对勃洛姆堡很尊敬，他上了当，被叫去作证婚人。这种不可能成立的婚姻，军官团能接受吗？凯特尔只好说，军官团接受不了。谁来继任，凯特尔提谁？他也提名戈林。希特勒再次拒绝。凯特尔的下一个人选是弗立契。元首走到办公台前，拿了一份由司法部长签署的起诉书回来。起诉书指控弗立契犯有鸡奸罪。希特勒承认，早些时候他曾将另一份类似的起诉书压了下来，因为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会有此事。现在，由于牵涉到继承

军内最高职位问题，他便不得不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

他与弗立契进行一次密谈，直接了当地问他是否有罪。

这次对垒于当晚在元首的阅书馆里进行。关于鸡奸两个“希特勒青年”和“巴伐利亚大兵”之详情，弗立契一无所知。他认为元首是在盘问他与另外两青年一起干的傻事，他解释说，他偶尔也会请这两位小青年吃晚饭，然后教他们看地图。谁若不专心，他就用尺轻轻地打谁的屁股。

希特勒从未听说过这两位小青年的事，武断地将弗立契开除了，弗立契被搞得目瞪口呆。他还未离开总理府，希特勒便向他的私人副官激动地讲述刚才的情景：“你想想，魏德曼，突然间与他搞在一起的不是两位而是四位小青年！这件事再也包不住了。”

次日下午，凯特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弗立契闭门不出。希特勒仍很不安，话题重又涉及继位人问题。这次，希特勒说，他已决定将最高指挥权自己拿过来，由凯特尔当他的参谋长。

希特勒致力于解决勃洛姆堡——弗立契丑闻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首先，他令盖世太保对弗立契的案子进行全面调查，然后便集中精力挑选总司令。他最终看中了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却假装说，他的第一选择是莱希瑙。陆军代表格德·冯·伦斯德将军强烈反对这一人选。在军官团看来，莱希瑙不仅是个狂热的纳粹，还是个军内的激进分子，不适宜提任重要职务。伦斯德提名贝克，希特勒不同意。他的下一个选择自然是勃劳希契了。勃劳希契透露，他有件急事，除非这件事获得解决，否则他不能接受此职。原来他正在闹离婚，他的老婆要一笔巨款，而他自己负债。希特勒不但给了他八万马克，而且还说服了冯·勃劳希契太太接受这一条件。对希特勒而言，这是一桩划得来的买卖。他不但得到了一位对他感恩戴德的陆军总司令，而且，勃劳希契计划娶回来的女人，“是个百分之二百狂热的纳粹”。由于希特勒的斡旋和决心，加上大部分老将军的动摇，这次危机终获得解决。

在职的将军们于1938年2月4日来到柏林开会时，大家都多少有点神秘感，他们是看了早报后才得知有这等事的。他们被召至总理府的大厅里，希特勒把弗立契的犯罪情形以及为何要将勃洛姆堡解职的原因一一告诉了众人。军官们虽然惊愕不已，却乖乖地接受希特勒对陆军进行改组。在内阁会议上，希特勒接管三军成为合法化。在将凯特尔和勃劳希契介绍给内阁后，他宣布武装力量将由他指挥。内阁阁僚们予以批准。

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被解职，16名高级军官被解职，44名高级军官被调任其它职务。为了对戈林未当上战争部长进行安慰，他被授予空军元帅的头衔。这次清洗波及至外交领域。外交部长牛赖特被里宾特洛甫取代。

这是德国历史上不能忘记的一天。德国陆军中两位最强大的人物已被清除，而另两位军事领导人，即凯特尔与勃劳希契，又对希特勒感恩不浅，成了希特勒的代表。

在对内阁讲演完毕后，希特勒与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和新任陆军副官格哈德恩格尔一道驱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次日上午，当看到《人民观察家报》的标题是：

一切权力已集中于元首之手！

他终于成了德意志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独裁者。他已作好了登上最后侵略之途的准备。

6. 威逼奥地利总理签约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德国公使馆，冯·巴本接到总理府秘书拉马斯打来的电话。“元首通知你”，他说，“你在维也纳的任务已经完结。”巴本几乎无言以对，是希特勒劝他接受这一微职，以收拾陶尔斐斯被杀害后带来的危险局势的。看来，我已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现在可以滚蛋了。为了“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他立即前往贝尔特斯加登。在那里，他发现元首既精疲力尽又忧愁满腹，双眼发呆，心不在焉，试图用空话作藉口，解释被解职的原因。起初，精神恍惚的元首对谈话内容不加注意。后来，巴本说，只有与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当面对谈，才能把引起两国分歧的诸多问题解决。这时，希特勒才注意起来。

“这个想法很好”，希特勒说。接着，他便让巴本立即赶回维也纳，安排他们尽快见面。他说：“我将高兴地邀请许士尼格先生前来，好把问题谈清楚。”

许士尼格接受了巴本的邀请，但心里有点儿不安。他向外长吉多·施密特承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先行采取行动，以防止政变，取得时间，以待国际形势转向有利于奥地利。”与这样一位残暴的对手对垒，许士尼格确不是个合适人选。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个不慕虚荣、没有野心的正人君子。与希特勒角逐，他确处于不利地位。

2月11日晚许士尼格在吉多·施密特陪同下，他登上了开往萨尔茨堡的夜车，跨过萨尔扎希河，来到了德国边境。巴本已在那里等候，一个凶兆出现了。巴本说，三位将军“非常偶然地”来到了贝格霍夫，相信奥地利客人不会介意。许士尼格不喜欢令场面难堪，也不想去招惹希特勒。他说“我不介意。不过，此事颇怪。”

车抵贝希特斯加登郊区时，他们突然折向左边，来到上萨尔茨堡脚下。等候在那里的半履带车，沿着又陡又冷的山路，将他们拉往贝格霍夫。沿途他们从一座座排列整齐、房顶被残雪覆盖的农舍和一座破旧的教堂前走过。接着便是党卫队的营地。

希特勒伸出一只手，朝他们走过去，俨然是个和蔼可亲的主人。在将他身后的三位将军介绍给奥地利总理后，他便领众人上了二楼，进了他的书房。在这里，元首突然脸色一变，和蔼的举止立即消失。他粗暴地指责奥地利为所欲为，不执行睦邻政策。德国退出国联后，奥地利仍呆在国联，这能说是友好吗？奥地利从未帮助过德国，那怕是一分一毫。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是一部不断叛变的历史。“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许士尼格先生，我已下决心将这一切结束。德意志帝国是强国，如果它要解决边界问题，谁也不敢吭一声。”

许士尼格耐着性子反驳说，奥地利的全部历史曾是德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是主要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奥地利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绝对是零！我告诉你，绝对是零！”希特勒喊叫。听起来，他不像是生在奥地利、长在奥地利的人。后来，许士尼格把贝多芬抬了出来，提醒希特勒，贝多芬是下莱茵兰人。“我再次告诉你，事情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负担着一项历史使命，我将完成这项使命，因为上帝注定我要这样做。我完全相信这项使命。它是我的生命……你好好看看今天之德国吧，许士尼格先生，你会发现德国只有一个意志。”他所走的道路是德国前人从未走过的最伟大的，比任何德国人作出的成就都大。“我是靠德国人民的爱前进的。在德国，无论何时，我都可不带卫兵，自由自在地行动。这是因为，德国人民

爱我、信任我。”

他指责奥地利在德国边境加强工事，极其荒谬地在破坏通向帝国的桥梁和道路。“你不会真的相信能挡住我，或将我的进军推迟半个小时吧，是不是？也许，某一天一早醒来，你就会发现我们已进了维罗纳，会给你一些颜色瞧瞧的！我很想不让奥地利遭此命运，因为这种行动意味着流血。”

许士尼格回答说，奥地利并不孤立于世，入侵奥地利也许会意味着战争。希特勒嘲笑了他。谁也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指头，意大利不会，英国不会，法国也不会。“考虑一下吧，许士尼格先生”，说着，他的声音放小了。好好考虑一下，我只能等待至今天下午。假若我这样说了，你就得这样听，我是说一不二的。

他的策略使许士尼格胆战心惊。他想抽烟，便有人曾警告他，切勿当着元首的面点烟。他问希特勒究竟想要什么。希特勒突然宣布会谈结束，“我们下午可以讨论讨论。”他拉了拉门铃，门便从外边无声无息地开了。他们在餐厅进餐，由身穿洁白制服的党卫队队员在一旁侍候。在别人面前，希特勒待客彬彬有礼，谈话也轻松了，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希特勒他一走，许士尼格便浑身轻松，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同时，他也得到了与三位将军交谈的机会。说来也怪，这三位将军谁也不明白为何被召至贝格霍夫。下午4时，许士尼格才被领进一小房间内与里宾特洛甫相见。里宾特洛甫递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好的长达两页纸的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所有被监禁的国社党人，包括谋杀陶尔斐斯的杀手在内，在三天内获释，所有被解职的文武官员也在三天内官复原职，德国就将重新全力支持奥地利的主权。温和的泛德派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应出任内政部长，全权地、无限制地控制奥地利的警察部队。

在许士尼格看来，这些让步等于是结束奥地利的独立。他压住怒火，像一位公平而冷静的律师，对所列各点一一进行抗争。他好不容易才从里宾特洛甫那里争得几个小小的让步，不料，外边又传话进来，说元首在楼上等着见他。

希特勒在书房内激动地来回踱步。“许士尼格先生”，希特勒继续不用那个尊称“冯”，“我决定作最后一次尝试”。说完，他便把另一份协议草案往前一推，“无可讨论，一星半点儿也不能更动。你就照这样子签，否则，我们的会见便徒劳无功。你若不签，那我晚上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许士尼格拒绝签字。他说，即使签了，这也是废纸一张。因为，按宪法规定，只有总统米克拉斯才有权委任内阁成员和宣布大赦。他也无法确保文件中规定的时间限制得到遵守。

“这你得保证做到！”

“我恐怕保证不了，帝国总理先生。”

许士尼格挖空心思的法庭式回答，令希特勒怒不可遏。他冲到门前，高声喊道：“凯特尔将军！”他转身对许士尼格说：“我以后再让人叫你来。”身在冬天花园里的凯特尔，听到希特勒的大声吆喝后，像一条忠实的狗似的，急急忙忙跑上楼去，就在许士尼格快出房时走进书房。凯特尔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元首有什么吩咐。“什么也没有！你坐下就是了。”凯特尔摸不着头脑，乖乖地在角落里坐下。

由于希特勒的恫吓，所以，待许士尼格来到冬天花园时，已是胆战心惊

了。他把情况向外相施密特叙述了一遍。施密特说，若在五分钟内，将我们抓起来，我也不会惊奇。

当许士尼格再次走进书房时，希特勒已是宽宏大量的希特勒了。“我已决定”，他说，“改变主意，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过，我要警告你，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三天时间，到那时协议就生效。”

在经过两次交锋两次受震惊后，希特勒的小小让步使许士尼格同意签订协约了。一当修改的文本被送去打印时，希特勒又变成殷勤的主人了，他说“相信我，总理先生，这是最好不过的。今后五年内我们可靠这项协议行事了。”

待双方签署这份协议后。希特勒请许士尼格和的密特两人共进晚餐，但他们却急于要起身回萨尔茨堡。在巴本陪同下，两人默默地冒着大雾，连夜赶回萨尔茨堡。巴本终于说：“总理先生，你现在明白了，与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是多么困难。”但他又急忙说，他相信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你知道，元首有时也会变得非常迷人。”许士尼格暗想，恐怕不会有下一次了。

在贝格霍夫，希特勒又在进行另一个恫吓。他向将军们发出指示，在尔后几天内，在德奥边境进行模拟入侵演习。进攻的威胁有希望诱使奥地地总统米克拉斯批准这一协议。

许士尼格总理回到维也纳时已是星期天了，而星期二下午即十五日协议就要过期。他立即与米克拉斯磋商。总统同意特赦在押之纳粹，却强烈反对委任赛斯一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决不能将警察和军队交给他。

在贝希特斯加登进行秘密会晤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奥地利。全国出现了不安的情绪。内阁成员之间出现了唇枪舌剑，一部分成员说，许士尼格应将希特勒在贝格霍夫玩弄的野蛮战术公诸于世；另一部分人则称赞总理之小心谨慎。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到期前 24 小时，召开紧急会议。许士尼格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重新挑选一位总理，这便可不承担在贝格霍夫许下的义务；在新总理领导下执行协议；或者在许士尼格领导下执行协议。

边境不断传来德军人侵的报告，室内充满了绝望的气氛，此后的争论不仅激烈，且变得牛头不对马嘴。连最不可行的建议，包括将希特勒的故乡布劳瑙割让给德国也提了出来。许士尼格确信，若拒绝接受希特勒要求中的任何一点，希特勒就会入侵奥地利。米克拉斯终于在压力面前屈服，勉强同意了总理的第三个建议：让许士尼格留任，接受贝希特斯加登条约。

希特勒在贝格霍夫打的哑谜，在边境上搞的模拟入侵，把奥地利人吓降了。奥地利新内阁宣誓就职。次日，2月15日，把事情的部分真相秘密地通知奥地利驻外各代表机构。通知称，由于德国将要求一再加码，希特勒又口头施加压力，德奥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曾有过“尖锐的分歧”，只是在经过许多小时的谈判后，才找到协议的基础。

在维也纳，公众呼声越来越高，要求许士尼格将贝希特斯加登会谈的真相公诸于世。他恪守了诺言，在星期天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前保持沉默。

维也纳产生了相当大的骚动，全城不少犹太人准备移民。总理遭受来自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双方的强大的压力。犹太人主要通过证券交易所发动进攻，给货币施加压力。资本大量外逃，大量奥地利货币非法偷越出境。

7. 意法助虐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人们期望已久的讲话，该讲话也在奥地利全国转播。宣称他与许士尼格为“欧洲的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希特勒指责奥地利虐待其境内的德国少数民族。他说，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世界强国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胞因为同情整个日耳曼民族意识形态的团结而不断受苦受难。他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援引事实和数字，使皇冠剧院内的大多数听众听得如痴似呆。

四天后，许士尼格对希特勒作了回答。这个回答是在联邦议会的开幕词中作出的，并向两国作了广播。议会的舞台是按奥地利的色彩红—白—红，用许多萝卜装饰起来的。在讲台的附近放着一尊已故陶尔斐斯的半身像。总理抬头挺胸走向讲台，他一出现人们便高喊“许士尼格！许士尼格！”“会议唯一的议程是”，他用疲倦的语调说，“奥地利。”这又博得满堂喝彩。许士尼格深受感动，谈到了从女皇玛丽亚·特莱萨至陶尔斐斯等为奥地利的独立而战斗的人们。他的演讲催人泪下，从未如此有力过，也从未如此热切过。在贝格霍夫受希特勒欺负的知识份子的那种温良恭谦让的自我克制，早已不翼而飞了。当他终于提到贝希特斯加登协议时，他的语调刚毅了。“我们作出了让步，且又到了尽头，到了我们必须停下来，‘只能如此，不能再过份了’的地步。”接着，他宣布，“奥地利的口号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主义！”民族要自由，为此，奥地利人将不能不战斗到底。他以此战斗口号结束了演讲：“红白红：至死不屈！奥地利！”

内阁全体成员刷地站了起来，拼命朝他鼓掌。他们的欢呼声连外边的人都听到了。有人带头吧起了《上帝保佑》一歌。独唱变成了合唱，成了怒吼。街道上的热情延伸至全国，产生了某种希望。甚至连巴黎也受到感染。次日，法国下院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法国外相宣布，奥地利的独立“是欧洲平衡不可分割的因素”。

在奥地利全境，当地的纳粹分子开始示威游行。动乱的中心是格拉茨，在那里在许士尼格演讲过程中，市政厅楼顶升起了卐字旗。他们藐视政府关于不准举行政治集会的禁令，宣布举行全国6.5万名党员参加的集会。许士尼格立刻作出反应，向格拉茨派出了军队，轰炸机和装甲车。纳粹分子只好龟缩一旁，取消了集会。

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威胁，激怒了法国人。法国向伦敦建议，由两国共同向德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这个提议抵达伦敦时，安东尼·艾登刚刚辞职，外交部暂时无人领导。奥地利事件尚未激起英国公众的热情，而首相仍在致力于执行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伦敦《泰晤士报》又在为张伯伦加油，它发表社论宣称，“两个德语国家之间所能得到的最自然的东西，莫过于互相谅解”。“奥地利是绝不反对日耳曼人的。”再没有比他这句话更令人信服的了。

前一年秋，罗斯福曾对所有侵略者进行谴责。罗斯福这一行动也未影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分毫。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各国均对法西斯进行抵制的具体可行的建议。但这也未使张伯伦有所动作。罗斯福还派遣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罗埃尔·英格索尔上尉前往伦敦，按总统的指示探索长期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的可能性。英国海军部深表赞同，对英格索尔说，他们“准备封锁日本的所有海上通道，封锁的海域大致从新加坡起，通过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新希伯莱群岛，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东。”然而，首相张伯伦使这一计划化为乌有。罗斯福邀请英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

张伯伦的拒绝出席对罗斯福是个重大打击，使他放弃了原来或许能阻止全球发生进一步侵略的强硬的外交政策。相反，他使美国恢复原来的孤立状态。

大不列颠王国要执行绥靖政策已无可挽回。3月3日，英国驻德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拜会总理府，通知希特勒说，英国政府原则上准备与德国商谈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汉德逊竭力装作友善和绝对正确，他那副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使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发怒。

汉德逊讲，真心诚意地要改善两国的相互关系。为了解决装备限制和轰炸限制等严肃的问题，以及和平解决捷克和奥地利等问题，英国准备作出某些让步。希特勒准备为欧洲安全和和平作出什么贡献呢？

在冗长的阐述过程中，希特勒弯身坐在扶手椅上，不停地皱眉。希特勒生气地回答说，支持许士尼格的只有一小部分奥地利人。英国不应该反对公平合理的解决“日耳曼人的家事”。他突然采取攻势说，毫无疑问，法苏条约和捷苏条约都是对德国的威胁，德国要重新武装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武装限制的程度要看俄国人如何来定，我们永远不应允许俄国进入欧洲。希特勒最终以“模糊的回答”将奥地利问题搁在一边。

希特勒派其主要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前往奥地利。他将德奥合并看作是两国财政上之必须。许士尼格对凯普勒的诸如立即任命一纳粹分子为经济部长，取消对《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将国社党合法化等要求，作出了强硬的反应。

许士尼格对纳粹的态度，招来新的动乱，把奥地利抛进一种未宣布的内战状态。在维也纳，冲锋队和纳粹同情分子高喊“欢呼胜利！欢呼胜利！”“希特勒万岁！”越过多瑙运河，闯进犹太人居住的里奥波德斯达特区。对手们则高喊“许士尼格万岁！”“红白红，至死不屈！”予以对抗。他们经常发生冲突，直到警察挥舞警棍前来，冲突才算告终。一般说来，挨打的总是爱国者，因为警察更多地忠于内务部长赛斯-英夸特，而不是总理许士尼格。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于3月7日向墨索里尼提出呼吁，警告说，为了挽救时局，他可能举行公民投票。墨索里尼声称他相信戈林不使用武力的保证，敦促许士尼格勿举行公民投票。对一位在国外遭受入侵威胁，在国内因太宽容而受工人攻击、因限制太死而受纳粹攻击的总理来说，这封信是件令人泄气的事。他决定置墨索里厄的劝告于不顾。

3月9日，许士尼格宣布公民投票将在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城举行。他身穿奥地利的传统服装信步走上市内广场讲台，深情地宣布，全国公民将在四天后前往投票站去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赞成建立一个日耳曼人的，自由、独立、友善、信奉基督、团结的奥地利？”他结束讲话时说“战士们，战斗的时刻到了！”两万名听众义愤填膺同声高呼，坚决抵抗。

在奥地利全境，路牌上都贴满了海报，宣布进行公民投票。装有大喇叭的卡车，在城镇街道上穿梭，督促公民们星期天投票时应投“赞成”票。在维也纳，爱国者闹得比纳粹还起劲。一队队的爱国者走上街头，高喊“许士尼格万岁！”“自由万岁！”以及“星期天，投票天，大家都投赞成票！”

8. 奥托战役

这一宣布令希特勒采取了强硬手段。德国与奥地利合并是向东扩展的必要前题，公民投票便可能使希特勒之整个生存空间计划遭到破坏。他是不能容忍这种挑战的。3月10日上午，他对凯特尔将军说，由于奥地利问题如此严重，他应该作好适当的准备。凯特尔说，总参谋部已做好一个计划，即“奥托战役”，防止奥托·冯·哈布斯堡重登奥地利王位。“作准备吧！”元首下令说。

凯特尔连忙赶回在本德勒大街的参谋总部，发现“奥托战役”不过是纸上谈兵，便大吃一惊，后悔不该急急忙忙地讨好元首。于是，他便把起草是否可能入侵奥地利的报告的任务交给了贝克将军。“我们什么准备也没有”，贝克埋怨说，“什么也没有，一星半点儿也没有。”贝克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并建议武装入侵奥地利时动用两个兵团，外加第二装甲师。希特勒告诉贝克，这些部队须准备于12日越过边界。他大吃一惊，对一个职业军人说来，要在48小时内作好这样一个战役部署，是不可想象的。贝克反驳说，这就意味着今天下午6时前要把命令发至各个部队。希特勒说，那就这样办吧。

希特勒更加关心的是意大利的反应而不是后勤问题。他致函给墨索里尼。他写道，奥地利已接近无政府状态，他不能袖手旁观。“本人系日耳曼帝国的元首和总理，也是这块大地之子。为尽本人之天职……本人决心恢复家乡之法律与秩序，使那里的人民得以按自己的判断，用确实无误的、明确的、光明磊落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命运。”他提醒墨索里尼，德国曾在意大利困难时刻，即在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援助过他。他答应，承认意大利与帝国之间的疆界为布列纳山谷，并以此作为意大利的支持的报答。“这个决定既不会改变，也不会被怀疑。”

3月11日凌晨2时，以“奥托战役”为代号的入侵计划发出去了。希特勒亲自控制这次战役。“若其它措施不成功”，计划里写道，“我拟武装入侵奥地利，以创立立宪条件，阻止对亲德居民进一步施暴。”有关部队需于12日中午前后作好准备。“我保持决定实际入侵的时间的权利。部队的行动必须给人这种印象，即我们无意发动战争，反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

清晨，许士尼格得悉萨尔茨堡的德国边境已被关闭，铁路交通全部停顿。慕尼黑地区的德国帅已被动员，其口的地是奥地利，德国报纸的电讯稿也同样令人吃惊，它们宣称，共产党的旗帜已在维也纳上空飘扬，暴徒们在高呼“莫斯科万岁！”“许士尼格万岁！”

上午10时，许士尼格的不管部长格莱赛·霍斯特瑞带着希特勒和戈林的书面指示来到巴尔豪斯广场。汇报柏林的要求：许士尼格必须辞职，公民投票必须推迟两个星期，如戈林在中午前后得不到电话答复，便采取“相应的行动”。

许士尼格利用这段时间权衡了反抗的可能性。他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维也纳依旧平静。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应急措施。他提出三种选择：拒不接受最后通牒，立即向世界舆论呼吁；接受最后通牒，他本人立即辞职；妥协，接受希特勒关于改变公民投票方面的要求，但拒绝其他任何要求。他们决定妥协。

许士尼格便只好在完全屈服和抗拒之间作出不愉快的选择。他匆匆与米克拉斯总统进行了磋商，决定取消公民投票。许士尼格总理对英夸特和霍斯特瑞说，希特勒关于延期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业已获准。柏林方面绝不同意

许士尼格总理所作的决定。在愉快的外表下埋藏着阴险的戈林要求许士尼格及其内阁立即辞职。他也重复了“给柏林发个电报，请求德国援助”这个要求。

两位部长庄严地返回办公室。阁僚们已在那间大办公室里集合等候。脸色惨白，心情紧张的英夸特打开笔记本，传达了戈林的最后通牒。接着，众人便七嘴八舌地向他提问，弄得他无处藏身。“别问我”，他痛苦地回答说，“我不过是鹦鹉学舌，是女电话线务员罢了。他补充说，在2小时内，如他自己不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奥地利。

在维也纳，一切如常，似乎并未发生任何事情。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撒下的传单铺天盖地，敦促公民们于星期天投“赞成”票。街道上，“祖国战线”的卡车队开过时，人们高喊爱国口号，挥动手绢，向它们致意。连素不相识的人们也用“奥地利”彼此问候。一时间，全国团结一致了。猛然间，各家电台播出的快乐的华尔兹舞曲和爱国进行曲全部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宣布一道命令：凡1915年出生的未婚预备役军人立即报到入伍。过了不久，头戴钢盔的士兵坐着卡车，像流水似的开赴德国边境。

在绝望中，许士尼格向伦敦求援。在向伦敦说明他如何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以免冒流血之险后，他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告诉他应如何行动为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电报被送至张伯伦手中时，他正在唐宁街设午宴款待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夫妇。张伯伦冷冷地将里宾特洛甫请进书房，说他自己和新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有句话私下谈谈”。在紧张的气氛中，平常沉得住气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张伯伦更加紧张，而张伯伦至少在表面上显得泰然自若和头脑冷静。英国首相念完维也纳发来的电报后，里宾特洛甫声称他对此情况一无所知，还表示怀疑这些报告是否属实。他补充说，如果属实，和平解决的办法最佳。

这番话抚慰一个决心与希特勒友好相处的张伯伦。尽管他的外交大臣气愤地指责说，许士尼格已受到入侵的威胁，张伯伦还是同意里宾特洛甫的看法，说眼下没有德国动武的证据。张伯伦便叫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电给奥地利政府：“英国政府无责任为总理阁下采取任何会将其国家暴露在危险面前的行动提出忠告；英国政府也不能保证保护奥地利不遭危险。”

许士尼格并不抱幻想，不指望英国或意大利会予以援助。他提出辞职。米克拉斯总统勉强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断然拒绝执行关于委任英夸特为总理的命令。他挑选警察局长为总理，但遭拒绝。武装部队总督和前基督教社会党政府总理也婉言谢绝。由于无人肯任此职，米克拉斯总统便劝许士尼格再作考虑。他勉强同意作为退位总理留任，直至委派了新政府首脑时为止。说完，他便退回办公室，开始收拾办公桌。

随着天色慢慢黑下来，总理府内压力也变得几乎无法忍受。柏林的压力不断增加，戈林说，晚7晚30分，英夸特新内阁要组成，他便口述了一份包括他妹夫在内的内阁部长名单。数分钟后，英夸特亲自与戈林通话，说米克拉斯已接受许士尼格的辞呈，但坚持让一前总理接替他的职务。戈林咆哮着说，告诉米克拉斯立刻接受德国的要求，否则，“在国境全线的德军，将向前挺进，奥地利将不复存在……告诉他，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如我们得悉你已在7时30分前被任命为总理，进军令便会停止，德军将留驻在我方一边。”

维也纳纳粹分子响应柏林的号召，正在将街道夺取过来。一群向内城涌去的党徒边走边喊“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绞死许士尼格！”等口号。置

身于总理府的许士尼格，不但听见了这些口号声，还听见了前进的脚步声。他认定这就是入侵的前奏，便赶至总统办公室，向总统作最后一次请求。但米克拉斯坚决不同意，顽强地拒绝委派一名纳粹党徒为总理，当许士尼格一再坚持时，总统便说：“你们现在就抛弃我吧。”许士尼格仍找不出比英夸特更合适的人选。他说，赛斯-英夸特是个天主教徒，又有忠诚可靠的好名声。他于是便提出，由他通过电台，立即向奥地利人民发表广播演说。

在奥地利全境，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广播。”米克拉斯总统要我转告全体奥地利人民，我们已在武力面前屈服了。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现在的最后关头，我们应无意让日耳曼人流血，我们已指示我们的陆军，若有入侵，他们便不战而退，继续待命。”许士尼格的声音会变成啜泣声，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我用日耳曼人的告别方式，也是能衷心表达本人的愿望的方式：‘上帝拯救奥地利！’向奥地利人民告别。”

英夸特7时57分与戈林通话。这边的政府刚刚宣布辞职了，奥军正从边境后撤。这里的诸君决定坐等入侵。

戈林听说英夸特还未被任命为总理，立刻便发火：“那好吧！你定要掌管，这全靠你了。把我现在给你说的迅速传达给各位负责人：谁反抗德军，谁组织反抗，谁就将受到我们的法庭的审判。”

在两次向维也纳发布最后通牒强行左右时局的间隙中，戈林一直在敦促希特勒入侵奥地利，而不管有什么情况发生。希特勒为“奥托战役”签署了“第二号通令”，宣布德军于1938年3月12日拂晓开进奥地利，“以阻止奥地利各城市流血。”

希特勒签署通令后3分钟，戈林用电话向经济专家凯普勒再次发出命令。英夸特必须用奥地利省政府的名义发电前来，急速派兵至奥地利，帮助奥地利恢复法律与秩序。英夸特必须立即办理此事，“他不一定真发电报前来，只说他发了就行。懂我的意思吗？”

按戈林口述，以奥地利临时政府的名义发来的，请求德国立即派兵援奥的电报，给希特勒戴上解放者这副假面具的机会。他精神振奋，令其部队大张旗鼓地开进奥地利。赫森打来长途电话：“我刚从维内西亚宫回来”，“墨索里尼总理听到消息后反应很好。他向您表示深切问候。”这是墨索里的保证。

希特勒欣喜若狂，喊道：“请您转告墨索里尼，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感激之词被倾泻出来了，“永远，永远，永远！不管发生什么！”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想签什么协议就签什么协议。我们的处境已不像片刻前那样可怕了。我最衷心地感谢他。我永世不忘他！”“若他需要帮忙或处在危险中，我都与他同舟共济，生死与共……”

在柏林，英夸特关于遏制德军的请求，被用电话传至外交部。接着，凯普勒也提出类似请求。他的请求被传至陆军司令部和总理府。凌晨，希特勒被叫醒了。沉思片刻后，他把这项建议顶了回去，返身上床。

9. 吞并奥地利

希特勒与凯特尔一起飞往慕尼黑，出发前，他签署了一项公而告：“自今日凌晨起，德国武装力量跨过了德奥边界。在维、也纳新的国社党政府的召唤下，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和步兵，以及飞翔在蓝天的飞机，将保证奥地利人民早日有机会用真正的公民投票的办法，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本人，帝国元首和总理，将以一个自由德国公民的身份，幸福地漫步在我家乡的土地上。”

早晨8时，德军已像流水似的涌进奥地利。某些边境据点已被当地居民拆除。这次入侵更像是军事演习。德军开进奥地利后，当地的妇女和孩子，兴高采烈，向他们投掷鲜花。纳粹的坦克挂起两国国旗，还用花草予以装饰。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人们互相握手，亲吻，眼睛里还流着喜悦的泪水。

希特勒于中午时分抵达慕尼黑后，车队便开往穆尔多夫。入侵部队司令冯·博克将军向希特勒报告说，他们未遭任何抵抗。在布劳瑙，希特勒的车子一步一步地爬行。车子慢慢驶过古老的小城门，朝他出生的波默旅店驶去。

希特勒的颇有感触的返乡之行，第一阶段结束于林嗣。其时，天色已晚。在集市广场上，等候在那里的10万名市民，欢喜若狂地把希特勒的车队团团围住。当元首和新总理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时，群众简直疯狂已极。希特勒泪如泉涌。

在回乡时，希特勒并未理解合并的全部意义，只觉得它是个松散的联邦，一如昔日之奥匈帝国。但是，一天来所见到之热情，使他的概念变了。要把全体日耳曼人纳入大日耳曼帝国中去。

希特勒令内政部的一位官员草拟一项关于德奥合并的法律。至中午时，法律已草就。希特勒批发给了身在维也纳的英夸特，并令他于当天通过。

古德里安将军的先遣队于午夜后才抵达维也纳。即使时已过午夜，古德里安发现，街上仍站满了激动的市民。看到第一群德国士兵后，他们便立刻“疯狂地欢呼”。入侵部队由奥地利军乐队开路，打歌剧院前走过。人们用鲜花和用沙哑的声音表示的友情迎接他们。

希特勒虽坚信合并可以立法确立，他在等待墨索里尼的正式批准。墨索里尼发来一封简短的电报：

“对您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方法本人表示祝贺。我曾警告过许士尼格。”

元首的喜悦可说是完美无缺了。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发了一封更短的电报：

“墨索里尼，我永不忘此事。”

当晚，更像是跟班而不是政府总理的赛斯—英夸特来到希特勒的房中。3月13日，将奥地利变成德国一个省的法律业已通过时，奥地利独立的日子也就此告终。

在鲁道夫·赫斯的亲自指挥下，根据国社党关于党和国家关系的思想重建奥地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希姆莱主持对政治上的反对派迫害。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已到莫尔津广场走马上任，他手下的特工人员开始检查奥地利秘密警察局的档案。

当地冲锋队已开始迫害犹太人，把他们从家里、办公室里拖出来，强迫他们洗刷写在墙上和人行道上的宣传许士尼格的口号。还有的被抓来洗党卫队营房的厕所和清扫街道。

这些情景并未挫伤大多数维也纳人的热情，因为他们还陶醉在过去 48 小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中。人们热烈地欢迎新政权以及昨晚宣布的将奥地利并入帝国的决定。要否认这点是不可能的，希特勒的行动受到了奥地利人民的欢迎，那是因为合并能结束 60 万人失业。

每座建筑物，包括教堂在内，都悬挂奥地利和德国国旗。希特勒进城时坐的是敞篷车，他笔直地站立着，一手前伸。列队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一看到希特勒，便高声欢呼，直喊到声嘶力竭。欢呼是疯狂的，又是自发的。他的车在“帝王饭店”前停了下来。希特勒进饭店后，只觉得自己的另一个梦想也实现了。

人们不停地高喊着。“我们不回家，我们不回家，元首快讲话！”他只好步出房间，走上阳台，群众仍在疯狂地高喊。他向他们敬礼，还挥手向他们致敬。

他不禁忆起了当年他是如何在帝王饭店前来回走过的：“我看得见大堂里的灯火和吊灯，但我明白，我是不能进去的。有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积雪足有几英尺深。我得到了一个铲雪挣钱的机会。我们五六个人恰好就被派到帝王饭店前去清除人行道上的积雪。”就在那天晚上，哈布斯堡皇族刚好在里边宴客。“我亲眼看见卡尔和吉达步出御车，踏着红地毯，昂首阔步走了进去。我们这些穷鬼得把四面八方的雪铲掉，每次贵族老爷们光临时我们还得脱帽致意。他们对我们不屑一顾，他们身上的香水味留在空间。那晚整夜大雪下个不停，但这家饭店连一杯热咖啡也不送过来。”旅馆内欢快的乐声不但使他想哭，且使他为生活的不公平大鸣不平。“当晚，我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必定回帝王饭店来，也踏着红地毯，走进灯火辉煌的旅店去，到哈布斯堡皇族跳舞的地方去。那时，我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和在什么时候，但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今晚，我就在这里了。”

星期二早晨他醒来后，他的胃不再像在林嗣时那样痉挛了。在赫尔顿广场上举行的有 20 万人参加的欢迎会上，他精神抖擞地发表了一篇演说。演讲结束后，希特勒转身小声对广播员说：“请宣布，帝国奥地利总督英夸特讲话。”

当日晚些时候，红衣主教英尼泽划着十字向希特勒表示问候，只要教会能保持其自由，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们就会变成大帝国的最忠实的儿子。在庄严的今天他们已被带回大帝国的怀抱。

希特勒大受欢迎的浪潮尚未平息。由红衣主教英尼泽和另外 5 名主教签署的宣言，指示奥地利的天主教徒要去投票：“公民投票日，是我神职人员宣布我们为日耳曼帝国的日耳曼人之日，也是我们的民族责任。我们希望，所有基督教徒都能认清他们的责任所在。”

不管走到哪里，希特勒都被当作救星和元首加以欢迎。4 月 8 日，希特勒再次来到林嗣，再次受到狂热的欢迎。市民们个个都吵着要见他。9 日，一见到库比席克，希特勒便喊道：“库斯特尔！”库比席克伸出右手，希特勒紧紧地握住它。希特勒说，他已不像往日，再也没有私生活了。接着，他又开始详细说明他先前为林嗣制订的计划。应该建一座新大桥，一座新剧院，一座对得起布鲁克纳的现代化音乐厅。谈到在林嗣建立新的交响乐队时，希特勒想起了库比席克的宏愿。你干什么了？库比席克难堪地回答说，在埃弗丁镇上当小职员。他解释说，战争迫使他放弃了他的音乐抱负，否则就得挨饿。不过，他还指挥一个业余的管弦乐队，他的三个儿子颇有点儿音乐天才。

听到这些，希特勒自动提出，他将负责培养他的三个儿子。我不能让有天才的孩子们像我们那样过苦日子。你最知道我们在维也纳熬的是什麼日子。

元首站起身来。库比席克以为会见到此结束，其实不是，希特勒是在叫副官，指示他应如何将库比席克的三个孩子送进布鲁克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希特勒详细看了库比席克带来的画、信件以及明信片后，他建议他的老友写一本有关他的书。最后，他握着库比席克的手说，咱们要常常见面。

在维也纳，希特勒作了这次选举运动的最后一次讲演。他说，他为自己出生在奥地利而感到骄傲，“把一个孩子从这里送进帝国，让他长大成人，成为民族的领袖以便把他的家乡回归帝国，这是上帝的旨意。”

次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超出了意料之外。在奥地利，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三的投票者赞成合并。在德国，赞成联合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二，赞成他提的国会候选人名单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希特勒的勇敢之举，几乎得到了德奥两国人民的一致认可。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它也证实了他的信念和他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应沿着这条道路朝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走去。

第十一章 “绿色计划”

1. 德意“交易”

希特勒向奥地利挺进前，他就曾表示，他再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的严重迫害。这虽然与他要将失去的人民和土地归还给帝国的誓言相一致，但其主要关心的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威胁。他说，捷克是在战后由盟国一手制造出来的国家，这块半岛应纳入昔日帝国的疆土。它一日尚存，一日就是帝国东部的威胁。

认为捷克是一把尖刀插入德国心脏的并不止希特勒一人。从东西两方同时向帝国拦腰砍来的魔影，使德国人制定了“绿色计划”，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两年来，“绿色计划”只不过时纸上谈兵。轻取奥地利一事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一夜之间，希特勒便获得了打破欧洲力量平衡的大好时机。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其强大的防御系统，便能令德军进攻波兰或苏联畅行无阻。他所需要的是找个入侵借口。在德奥合并一举鼓舞下，居住在苏台德地区的 350 万日耳曼人，也要求作类似的合并，因为，他们是受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喊冤叫屈，以及敌视捷克一切事物的传统，使这个小小的共和国自奠基以来一直倍受折磨。近三年来，希特勒秘密地资助由康拉德·汉莱因领导的苏台纳粹党，日耳曼少数民族运动全由他控制。1938 年 3 月下旬，元首任命汉莱因为其私人代表，并指使他向捷克政府提出它不能接受的要求。这样，德国对它的援助便有理由了。希特勒希望，制造出一个永远动荡不安的局势，最终使德国以阻止内战、保护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侨民的生命为由，进行武装干涉。

借口虽然有了，但希特勒因为惧怕法国、英国或俄国会反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依然有所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他便有必要取得其唯一的盟友的支持。在 1938 年 5 月 2 日，希特勒率领包括外交官员、军事将领、安全官员、党的领导和新闻记者在内的 500 名随从，浩浩荡荡奔赴罗马。

离开柏林时，希特勒百感交集。滴血未流征服莱茵兰和奥地利所带来的喜悦，却由于他胃痛的复发而减少。由于怕自己身有不幸，在开赴罗马的火车上，他又花了几个小时去立遗嘱。《我的奋斗》一书的稿费就达 552.5 万德国马克。他把自己的财产、贝格霍夫别墅、家私和照片全部都给了党，给爱娃和他的两个姐妹每年每人 1.2 万马克的生活费，对希皮塔耳的诸位亲戚、文特太太和他的仆人，他各有遗赠。他也指示党好好照顾他的两名副官，布鲁克纳和魏德曼的终身生活。

德国人的列车开进意大利，铁路两旁站满了仪仗队。家家户户的房顶上，或竖起标语牌，或悬挂旗帜，颂扬元首和德意友谊。代表团快抵达罗马时，希特勒把一名副官找来，并令他通知每个人。说到罗马时，一个个子非常矮小的人会出来欢迎我们，说大家的举止应该检点，不准发笑。因为侏儒是意大利国王。

当列车驶抵专为此次来访而建造的圣保罗火车站时，天色已经晚了。火车站上空旗帜飘扬。出来迎接希特勒的是维克多爱麦虞埃国王而不是墨索里厄，这使他快快不快。在 4 匹马牵引下，车子沿旧日的罗马凯旋道奔驰，由被灯光照亮的喷泉旁边驶过。探照灯光和火把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灯火辉煌的罗马圆形大剧场似乎遭了火灾。沿途站满了人群，朝客人们欢呼。车行至一处时，一队非洲骑兵突然朝客人们飞驰而来，好像是从“沙漠之歌”里冲出来似的。希特勒却觉得被小看了，因为坐的是一辆如此古老的车辆。奎林纳尔宫内的房间也一点儿不合他的口味。这宫殿既不舒适，又缺少光线，好

像是个博物馆。

君主公开表示出来的冷淡使希特勒很反感。他不断抱怨说，你墨索里尼应出来当主人。在奎林纳尔举行的洗尘宴会，也丝毫未缓和这种局势。希特勒神情紧张地转动着眼珠子，胳膊上挽着个子比他高的皇后。个子矮小的国王则挽着高个子总督夫人。四人组成了一个滑稽的场面。皇后进入宴会厅时，意大利人不是跪下就是深深地鞠躬，有几个人竟吻了她的裙子。进餐时，希特勒与皇后没说过一句话。皇后脖子上挂的那个大十字架特别令希特勒烦恼。国王还散布谣言，恶意中伤他的客人。说元首到奎林纳尔的当晚就要女人。当希特勒一行在那不勒斯观看《阿伊达》时，这恶意又表现出来了。第一场演完后，观众故意不鼓掌，而让坐在皇家包厢里的贵宾首先带头。希特勒很难堪，转身看看国王，以得到一点儿启示。这位君主假装未发现希特勒的不安。

歌剧演完后，按计划希特勒将检阅德国殖民地内的纳粹的操练。因为他穿的是燕尾服，便叫林格带一顶军帽和军衣前来应景，但国王的副官却告诉林格，回罗马的火车过几分钟就要开了。为了不使正在等候的党员们失望，他急忙走到街上，像指挥官那样抬臂行礼，沿着队伍往前走。按正规方法，他应将左手大拇指插进皮带后才行礼，但是，由于穿这种裤子不用皮带，他只好一手贴住屁股一手行礼。此情此景煞是可笑。德国元首兼帝国总理看上去倒像个事业达到顶峰的餐馆领班。

回罗马后，希特勒已恢复了平静。在 5 月 7 日于威尼斯宫举行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讲。这篇演讲非常成功，将他周围的冰雪全融化了。实际上，他主动提出将获洛尔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主人。这是个最慷慨的礼物。早在 1924 年当他还在兰茨贝格监牢服刑时，他就曾通过戈林提出过同样的赠予。那一次，为了支持意大利对这块争得面红耳赤的地盘提出的领土要求。他曾向意大利索借 200 万里拉，但未借得一文，使希特勒忿忿不平。墨索里尼明白今晚的赠予是某种信号，某种大大的报酬是少不了的。

自希特勒抵达意大利以来，这次讲话才是有政治意义的第一个事件。墨索里尼让国王出面当主人，自己退居幕后，把他的客人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让他白天黑夜忙个不停。这安排是很聪明的，因为这便可避免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后来，里宾特洛甫向齐亚诺递交了一份建议结盟的条约草案。齐亚诺看了一眼，没有吭声。

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终于找机会提出了他最关心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墨索里尼几乎毫不在乎地给希特勒一种印象：这个小小的国家对他无关紧要，他的注意力在他处。有了这个保证，希特勒可放开手脚去完成下一步计划了。

贝奈斯总统及捷克其他的领导人均有幻想，认为希特勒不敢冒险进攻捷克，因为他害怕这会触发一场大战。他若真的进攻，法国、英国和俄国会想法子制止。但是，这三国却无意当保护国。张伯伦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你只要看看地图便知道德国人若是有意要蹂躏捷克斯洛伐克，不管我们或法国作何努力，都不太再能解救它，我们不打算帮助捷克斯洛伐克，除非我们有将它打得跪在地上求饶的前景。我看不出有此前景。所以，我已放弃了向捷克斯洛伐克作出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向法国就对捷克的所承担的义务一事作出保证。”英国首相的三心二意，令法国领导人很担忧。他们虽然一再发表大胆的声明，但是，目光锐利的观察家们都相信，自莱茵兰被占领以来外

交政策就一直跟着英国的屁股转的法国，是不会很快去保卫捷克的。第三个潜在的保卫者苏联则抓住一切机会，公开敦促英法两国与德国人抗衡，自己暗中却无所事事。斯大林所需要的，是让西方而不是他自己去控制希特勒。5月6日，苏联驻布拉格的代办向美国大使承认，除非法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否则苏联是不会这样做的。

希特勒猜透了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加上墨索里尼又默许他，将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他于是便令戈培尔加紧宣传攻势，反对这个倒霉的国家。希特勒的11个步兵师和4个装甲师正浩浩荡荡开赴波希米亚边境，德国和奥地利的部队已在西里西亚南部和奥地利北部摆灯了进攻的架势。

5月20日，贝奈斯召开内阁和最高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在未与法国盟友磋商的情况下，捷克便下令“局部动员”。次日，捷军便占据了边防要塞和劳台德地区。欧洲出现了1914年以来未有过的炽热化危机。一个小国采取主动反对一强国，并让世人明白，在欧洲强权政治的游戏中，捷克是不当马前卒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种做法，想迫使英国和法国做后盾。

法国总理达拉第便召见德国大使，并让他看了放在办公桌上的动员令。“在这份文件上我签不签字”，他说，“阁下，这就要看你了。”在柏林，英国大使汉德逊向外长冯·里宾特洛甫提出警告说，“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着一定的义务，若这些义务不可避免要完成，英国皇家政府也不保证，在形势所迫下它不被卷入。”里宾特洛甫认为英国是主要敌人，矢口否认德军威胁捷克边境。他说，假若英法两国竟疯狂到了武装反对德国的地步，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殊死一战。

里宾特洛甫乘专机离开柏林，前往贝希斯特勒加登与希特勒磋商，希特勒也与他的外长一样气得七窍生烟，因为德国没有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一个较大型的军事调动或集结。

西方的报纸散布消息，是因为受到外国压力元首才取消入侵的。外国报纸的羞辱使希特勒真正行动起来了，他强烈赞成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

2. 剑拔弩张

并在朱特堡炮兵学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将删节后的文本呈给了希特勒。

希特勒力排众议，决定以武力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并令陆军于 10 月 1 日执行“绿色计划”。在法国边境上建造“西壁”防御系统的任务，由建筑高速公路的弗里茨·托特承担，并加速进行。数星期后，近 50 万人便在加紧修建工事，以便在东线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闪电战的同时，能以最小的兵力抵住法国。同时，德国也加紧了它的宣传战。用威胁的办法，吓住捷克人，磨掉他们的抵抗力；另一方面民族团体懂得如何支援的军事行动，并影响中立派，使之有利于战争。

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加强了希特勒东进的决心。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有意要避免冲突，准备在合理范围内作出让步。目前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拖入战争，国内情况困难惧怕两线作战。

“绿色计划”已付诸实施，但希特勒的意图还是要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他应向战争悬崖走近多少，希特勒连自己也不知道。他靠的是直觉，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上尉于 7 月飞赴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任务。魏德曼的正式任务是探讨戈林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可能性，但希特勒亲自指示他通知哈利法克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虐待。若在近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只好用武力解决。

魏德曼转述了他的意见。但哈利法克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在限制到来以前，许多问题都可解决。他还在原则上同意戈林来访，还含糊地邀请元首本人作为国王的客人前来。

数星期后，威廉大街的秘密代表里茨·赫塞从伦敦发回一份报告说，张伯伦已考虑将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希特勒对此不感兴趣，他深信英国一旦武装完毕，便会将德国打得粉身碎骨并在朱特堡炮兵学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将删节后的文本呈给了希特勒。

希特勒力排众议，决定以武力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并令陆军于 10 月 1 日执行“绿色计划”。在法国边境上建造“西壁”防御系统的任务，由建筑高速公路的弗里茨·托特承担，并加速进行。数星期后，近 50 万人便在加紧修建工事，以便在东线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闪电战的同时，能以最小的兵力抵住法国。同时，德国也加紧了它的宣传战。用威胁的办法，吓住捷克人，磨掉他们的抵抗力；另一方面民族团体懂得如何支援的军事行动，并影响中立派，使之有利于战争。

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加强了希特勒东进的决心。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有意要避免冲突，准备在合理范围内作出让步。目前苏联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拖入战争，国内情况困难惧怕两线作战。

“绿色计划”虽已付诸实施，但希特勒的意图还是要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他应向战争悬崖走近多少，希特勒连自己也不知道。他靠的是直觉，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上尉于 7 月飞赴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任务。魏德曼的正式任务是探讨戈林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可能性，但希特勒亲自指示他通知哈利法克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虐待。若在近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只好用武力解决。

魏德曼转述了他的意见。但哈利法克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在限制到来以前，许多问题都可解决。他还在原则上同意戈林来访，还含糊地邀请元首本人作为国王的客人前来。

数星期后，威廉大街的秘密代表里茨·赫塞从伦敦发回一份报告说，张伯伦已考虑将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希特勒对此不感兴趣，他深信英国一旦武装完毕，便会将德国打得粉身碎骨。元首曾对时宾特洛甫说：“现在已没有什么国际廉耻可言，有什么战利品可抢谁都抢。我要把这点作为教训。”在英国人将他包围前，他将先发制人。

赫塞解释说，张伯伦的私人顾问曾要他非正式地通知元首，伦敦《泰晤士报》那篇说英国准备接受对德国有利的解决办法的社会，系首相亲自安排的。希特勒不相信捷克人会拱手将苏台德军事基地交出的想法。他说，“他们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

希特勒的态度是强硬了，但他的将领们却在继续反对他的扩张政策。贝克在公开散布：在新的战争中，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与上次大战相比，将更重要；战败的后果将比1918年的失败更为惨重。7月，他为勃劳希契草拟了第三份冗长的备忘录。他肯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带来另一次大战。这种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德国的全面灾难。人民不要这场战争，陆军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

7月16日，当贝克将此文件呈交上去时，他的讲话尤其大胆，他让勃劳希契在军事将领中组织抵制。倘若军事将领们不按他的特有的政治见解和良心行动，历史就会将罪过加在他们头上……若大家行动坚决，战争政策就执行不了……。

8月初，在众人劝说下，勃劳希契召开了一次高级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备忘录，预言入侵捷克必将导致一场大战，德国一定打输。为了苏台德，竟拿民族存亡去冒险，这是不值得的。众人一致认为，军民皆反战。将领们认为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或许可打败捷克人，但要打败欧洲强国的联盟，是绝对不行的。会上只出现两条反对意见，布许将军重弹了军队不该干预政治的老调；莱希瑞变为纳粹的将军则告诫其同僚，应单独与希特勒辩论，不要集体前往。勃劳希契采纳了他的建议，单独前去面见元首。

将领们的否定态度使希特勒气馁。8月10日，他将总参谋长等人请至贝格霍夫进行午餐。他又历时3小时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政治理论。众人的一致反对反倒加强了元首的决心。5天主将贝克将军再次提出辞职，勃劳希契不予接受，他就索性不再上班。为解决这一问题，希特勒接受了他的辞呈，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令他保密，不得让公众知道。作为一个忠实的德国人，贝克同意保密，但仍继续支持反希特勒集团，这个集团在暗中策划，待元首最后下令执行“绿色计划”时，便将他逮捕。如此众多的文官武将密谋用武力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密谋者包括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为克莱斯特提供护照）、前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以及代替贝克总参谋长职务的弗郎兹·哈尔德。哈尔德秘密地派出第二个谈判者前往伦敦，将克莱斯特的警告重述了一遍，再次无济于事。这项阴谋还牵涉到赫加尔玛·沙希特和其他文官，包括豪斯霍弗的长子以及外交部主要官员。

他们公开对元首施加更大的压力。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格克提出，“我与英国和英国人相识多年”，“我认为，从他们反复声明的态度来

看，他们决心干预一事绝不是虚张声势恫吓。即使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不要战争，但他们身后还站着终将继位的丘吉尔和艾登。他敦促希特勒要有耐心。他说，时间会为德国效劳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盟国。只有等待才能取胜。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分子、犹太人和捷克人现在就疯狂地要将我们推上战场的原由。

所有这些忠告在希特勒身上都未产生多大效果。他一心要战。那年夏末，在视察陆军的演习后，他用手套拍了一下大腿，对两个副官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一次战争。

9月3日，他将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召至贝格霍夫，讨论“绿色计划”的最后一稿。他惊愕地发现，主攻方向竟选在捷克的防御系统的中央地带，且由第二军担任主攻。他说，进攻如此森严壁垒的地区将会带来无谓的牺牲，正中捷克人的下怀。应该改由第十军攻进波希米亚才对。勃劳希契有气无力地反对，说摩托化部队的景况不好，援军短缺，各级领导又训练不足，等等。但希特勒一概不听，说这是失败主义的论调。他下令给第十军增派摩托师和装甲师。

3. 诡辩欺瞒

纽伦堡党代会期间，纳粹大规模地炫耀其武力和纪律。这次大会是正在日益发展的政治危机的前奏。1938年的节日“大德国首届党代会”。在140年后，希特勒又将第一帝国的标志（皇冠、帝国宝球、王节和皇剑）从维也纳带了来。在向大会介绍这些帝国主义的象征时，他庄严地发誓，说这些宝物将永远留在纽伦堡。无论是在开幕词还是在次日下午接见所有外国使团时，他都未提到战争。

希特勒坚信，英国无意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冒险进行战争。有鉴于此，他便不顾一切继续推行入侵计划。这个决定是精明的测算、直观和不可抗冲动的结合。“你知道，我像个流浪汉，必须踩着刀刃过深渊”，希特勒对弗兰克说，“但是，我必须过去，就是要过去。”他将勃劳希契、凯特尔和哈尔德召至纽伦堡。9月9日午夜前，他们在德意志旅馆会晤，由新任总参谋长扼要地叙述了修正后的“绿色计划”。令人惊奇的是，主攻的任务仍由第二军担任。不过，这份计划提出了两夹攻的战术。希特勒承认，这是个聪明的想法，能否成功仍没有把握。从政治观点看，特别需要速战速决。政治上，第一个星期是决定性的，必须大量取得领土。他指出，德国的榴弹炮是摧毁不了捷克的防御攻势的。计划未包括突袭的因素。

希特勒滔滔不绝地教训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使凯特尔目瞪口呆。凌晨3时，希特勒再也按捺不住了，断然令其将领们按其旨意行动，冷冷地、恼怒地打发他们上路。

公开宣布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的是戈林，而不是希特勒本人。“欧洲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他说，“正使人类的生活无法忍受。没有文化的劣族捷克人正在压迫一个文明的民族。在他们身后，与莫斯科一起站着的，是犹太恶魔永不消失的面孔！”

纽伦堡党代会于9月12日举行闭幕式。这是希特勒发表全世界都害怕他会发表的那篇讲话的最后时机。晚7时前，他来到那座庞大的露天体育场，在“胜利万岁！”的吼叫声中，在聚光灯照射下，他抬起右臂敬礼，目光直视前方，缓缓朝主席台走去。开始时，他只讲党的斗争。某些外国观察家希望，他不会提到当前的热门话题。猛然间，他开始谴责捷克人，“本人决不愿在德国的心脏地带出现第二个巴勒斯坦。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既不会手无寸铁，也不会遭到唾弃。人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

听众中“胜利万岁！胜利万岁！”的咆哮应声而起。这正是周来全世界都在等待的时刻。人们原以为随此急转直下他会提出最后通牒的，但他只为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申张正义。结束时，他说“如果此事竟影响或破坏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我们表示遗憾，但责任并不在我们这边！”

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害怕希特勒讲这番话后会言出必行。人们却一般认为，希特勒的愤怒和咆哮是给德国的极端分子看的，实际上他要的是和平解决。墨索里尼也有同感。

然而，健康愉快之感却又是短暂的。希特勒对捷克之谴责，使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受到了鼓舞，举行了抗议。至上午，埃格尔全城已挂满了卐字旗。一万多名抗议者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决”的口号，州警开枪射击，死1人伤10余人。不到24小时，流血的骚乱便遍及整个苏台德地区，死亡人数增至21人。在汉莱茵为自由而斗争的号召鼓舞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举行了罢工，还拒绝交税。布拉格宣布对苏台德实行包围。在边境地区还实

行军事戒严，更多的苏台德德国人被枪杀。在全欧，传言四起。说希特勒又下了最后通牒。巴黎与伦敦大惊失色。当晚，达拉第紧急致函张伯伦。他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否则，法国将履行其条约规定的义务。他建议立即邀请希特勒与他们会晤，搞出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来。

张伯伦致电希特勒，建议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希特勒既惊奇不已又暗自高兴。当日下午，他电复张伯伦说，他接受张伯伦的提议，并建议于次日下午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9月15日，张伯伦在广大的人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唐宁街10号。在克罗伊登登机前，在哈利法克斯及其他要员的陪同下，他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说：“本人的政策历来是维护和平，本人的建议被立即接受这一事实，使我受到鼓舞，并希望今日出访会有所收获。”

洛克希德·伊莱克特拉号飞机起飞了。首相时年69岁高龄，坐飞机作如此长途飞行还是首次。张伯伦是个讨价还价的能手。他说，我的方法首先是决定合适的可行途径，然后再将其它东西纳入这一途径。张伯伦的父亲原是个商人，事业很成功，后来一跃成了杰出的政治家。与他父亲一样，他也笃信英国国教，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道德准则的化身。他身材消瘦，道貌岸然，笑容冷漠，令人望而生畏。像他这样一个人确信希特勒是半个疯子，须小心对付，想到自己手中有些硬牌，心头又有点热。他觉得，只要能与元首谈判下去，捷克斯洛伐克便可安然无事。在飞往慕尼黑途中，他超然绝俗，沉默不语，泰然自若，坚定自信。下午12时30分，飞机降落于慕尼黑机场，由汉德逊前来迎接。

天虽然下着毛毛雨，在通往慕尼黑火车站的道路两旁，依然站满了人群。他们热情洋溢，不停地喊着“万岁”，还抬臂敬礼。下午4时许，张伯伦一行才开始走上通往贝格霍夫别墅的陡峭、弯曲的道路。山头云雾缭绕，天空漆黑一团，接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希特勒彬彬有礼地站在通往屋的台阶下。进屋后，他们一边喝茶，一边不自然地开玩笑。突然，希特勒开口问客人对会晤的日程有何建议。张伯伦说，他希望与他单独交谈。

在这间几乎毫无装饰、俭朴的小木屋里，希特勒心平气和地历数了导致目前危机的一系列事件。张伯伦聚精会神地听着，带着友好的笑容回答问题。一会儿后，他双目盯着希特勒的脸说，只要你不动武，我便准备讨论为德国人申冤的可能性。

“动武！”这才激动起来的希特勒说，“谁说要动武？在苏台德地区对日耳曼人使用武力的不正是贝奈斯吗？”山风呼啸，雨打窗台，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说着。“我再不能容忍了”，希特勒喊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或那样。”

张伯伦吃了一惊，但回答得很坚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准备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果若如此，您为何又让我前来贝希特斯加登？此行纯系浪费时间，在此情况下还不如立即返回英国。

希特勒未料到会遭此反击，便迟疑了片刻。希特勒心平气和地说，如您承认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话，我们便可继续讨论，看如何将此原则付诸实施。

张伯伦未立即表示同意，只说在苏台德举行公民投票会碰上巨大的实际困难。英国首相说，关于自决的问题，在未与同僚们磋商的情况下，他不好给希特勒作出答复。因此，我建议此次会谈到此结束，本人立即赶回英国与同僚磋商，然后再与您见面。

希特勒显得有点不安。他了解到张伯伦愿意再次与他会晤时，他便宽下心来，且喜形于色，立即表示同意。张伯伦问：“其间局势，将如何维持”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保证，除非“发生了特别残暴的行为”，否则，他不会下令进军。3小时的会谈也就结束了。下楼时，两人客气地交谈，希特勒希望首相在回国前能去游览一下风景胜地。但张伯伦说他抽不出空，因为生命正在受到威胁。他对此次会谈表示满意，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贝格霍夫。

在华盛顿，罗斯福却很关切。他生怕这类会谈会拖延要爆发战争的时日。于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哀叹英国首相竟不惜一切代价祈求和平，英法两国是要使捷克人陷入困境，然后再洗掉他们之背叛者手上的血迹。英内阁也出现了反对张伯伦的情绪，但他坚持己见。由于备战极差，英国便只好继续采取绥靖政策。

9月18日，张伯伦对达拉第率领前来英国讨论这一问题的法国代表团说：“必须将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但是，我们很难将捷克斯洛伐克拦腰砍开，除非捷克政府自己承认有必要进行边境调整。”

达拉第同意，只要向捷克人施加友好的压力，他们便可将苏台德地区的某些部分割让出去。同时，应向捷克人说明，对割让后余留的地区会有某种国际保证，德国必须参与这种保证。张伯伦先是犹豫不决，会谈中间休息结束后，便同意了。

当英国公使将这一建议通知贝奈斯总统时，贝奈斯大受震动，起初竟拒绝讨论此事。英公使巴塞尔·牛顿爵士虽觉难堪，但仍着重指出，他必须尽速批准，因为张伯伦拟在48小时内与希特勒重新会谈。贝奈斯愤怒地指责说，他的国家已被抛弃。他惧怕的是，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就此了结，而只是希特勒最终统治捷克的一个阶段。

张伯伦整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答复。贝奈斯却在拼命地求助于苏联。他召见苏联公使并提出两个问题：如法国履行其条约义务，苏联是否也会履行？希特勒发动进攻，苏联是否会向国联呼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法国不这样做的话？晚7时，莫斯科终于作了肯定的答复，政府拒绝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这两位公使各自拿到一份迫于英法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当晚，贝奈斯政府发表公告，宣布投降，这给西方人带来了耻辱。公告说：

凭友邦可能给予的援助，我们曾作出答复。欧洲危机之性质已趋于严重。因此，友邦提出忠告，我们须作出牺牲，购买自由与和平，这也是他们无力相助所致……共和国总统及我国政府已无其他选择，因为我们已孤立无援。通过代理人，希特勒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9月21日，张伯伦在登机前对记者说：“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圆满解决是加强英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主要前提；而它又是欧洲和平的无可争议的基础。本人的目标是欧洲和平，我也希望此行能打开通向欧洲和平的道路。”

英德两国领导人将在莱茵河上的戈德斯堡浴场会晤。首相的座机在科隆着陆时，前来迎接的有当地的要员。机场上还有仪仗队；冲锋队乐队高奏《上帝拯救国王》。仪式完毕后，英国人乘车来到下榻地彼得斯堡旅馆。这家旅馆位于河对岸的山上，与戈德斯堡隔江相望。

希特勒历来是个和蔼的主人。他首先询问的是彼得斯堡的住房是不舒

适。但是，在会议室内铺着羊毛地毯的长台前刚一坐定，他们便谈正事了。张伯伦一开始便历数了他和法国人从捷克人那里好不容易争到的种种让步。在将领土移交的全面而复杂的计划作了扼要说明后，他提到了英法两国向捷克所作的保证，说完，他便往椅背上一靠，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希特勒平静地回答：“本人非常抱歉，张伯伦先生。我不能再与您讨论这些事情了。经过近日来事态的发展后，这种解决办法已行不通了。”

首相唰地站了起来，浓眉下的和蔼的眼睛，放谢出愤怒的光芒。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不明白！这种解决办法完全符合元首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要求。希特勒诡称在波兰和匈牙利所提要求得到的满足前，无法与捷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将英法提议一一予以反驳，断然要求德国占领苏台德。

张伯伦回答说，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既令他失望又令他摸不着头脑。这是个崭新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提的要求。他二次访德所带采的计划足以满足元首的一切要求。此时，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递给首相一张条子，上面说，德军已在埃格尔跨过了边界。张伯伦马上抓住了这点，敦促元首与他一起不遗余力地、有秩序地、和平地将问题解决，勿让枪击和事故扰乱和平工作。他问，希特勒有什么建议能使他们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回答是德军立刻占领苏台德，疆界日后用公民投票办法决定。由于这一要求几乎意味着捷克的彻底投降，两人便唇枪舌剑地交锋。埃格尔又传来消息说，有 12 个德国人质已被枪决。希特勒又大发议论，说捷克人如何的极度不公平。他发誓说，“如果布拉格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人质继续被枪决，他便立即进行军事干涉。”

会谈进行了 3 个小时，彼此不欢而散，但又约定明日继续会谈。

在渡过莱茵河，乘车上山回旅馆的途中，首相虽不露声色，内心却愤怒万分。只在此时他才想到，他未使会谈破裂是否是个错误。希特勒是处于发狂边缘呢，还是具有善恶二重性？若如此，张伯伦便有责任去打破僵局了。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点。

张伯伦业已在草拟一封妥协信。他建议由他出面探听捷克人的风声，看是否能作出安排，让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自行维持法律的秩序。

23 日早餐后，这封信被送过了河。由于根本不想妥协，希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想法的断然拒绝。在与里宾特洛甫及其他顾问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磋商后，希特勒写了一封很不友好的信作为回答。信的内容重复了他在会议上说过的话。

不到一小时，张伯伦便派两人渡河，给希特勒送来了答复。这封信既是妥协又是恶兆，是玩弄外交辞令的典范。首先，他答应将希特勒的提议交给捷克人，要求希特勒给他发一份详尽地阐述他的要求的备忘录。他建议，一俟收到元首的备忘录，他便动身回英国。

他们进行了二次会谈。是张伯伦回国之威胁所致。双方同意，张伯伦于该晚前往德莱森旅馆，一方面去取备忘录，一方面去听希特勒对此所作的解释。会谈于晚 10 时左右开始。由于参与会谈的人数增多，会议是在一小饭厅内举行的。希特勒要求捷军从地图上所示的地区撤出。撤军将从 9 月 26 日开始，苏台德于 28 日正式割让给德国。

“这是最后通牒！”张伯伦喊道，并举双手抗议。

“是一道命令！”喜欢炫耀其德语的汉德逊用德语附和道。张伯伦拒绝

将这样的一份文件转给捷克人。他说，且不谈其内容，其语调就足以引起中立派的愤怒。他怒斥了希特勒，好像元首是他的一个不顺从的阁僚似的。接着在所提的日程问题上他又受到三位英国政治家的联合攻击，因为这份时间表给捷克人所留时间实在太短，无法从苏台德撤军并移交苏台德。由于这份计划既行不通又具有危险性，它有可能导致一场欧战。

谈判因此陷入僵局。此时，有位副官进来了，给元首带来一份电报。贝奈斯通过电台刚刚宣布，捷克各武装力量实行总动员。

最终打破沉默的是希特勒，即使发生了这一闻所未闻的挑衅，我当然仍将遵守诺言，在谈判期间不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先生，在您在德国逗留期间，我不会这样做。他言简意赅地说，捷克的总动员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张伯伦匆忙地指出，动员不外乎是个预防措施，不见得是进攻性措施。希特勒回答说，在他看来，总动员一事表明，捷克人无意放弃任何领土。张伯伦再次不同意此说。他辩论说，捷克人已原则同意苏台德实行自治，他们不会自食其言，出尔反尔。

那么，何故总动员？希特勒紧迫不舍。

首相说，首先总动员的是德国嘛。

那你也叫它总动员？元首尖酸刻薄地反驳说。他又再次进行威胁。这次危机不会长期拖延下去了。

张伯伦说，既然如此，继续谈判便无意义了。因为他亲眼看见他为欧洲和平的一切希望已破灭，他将带着沉重的心情返回英国。为了和平，他已竭尽了全力。不幸的是，他并未在希特勒先生身上找到回声。

希特勒最怕的是张伯伦拂袖而去，所以，他便急忙向他保证，在谈判时间，他决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语有如一阵雷雨，使空气变得清新。为了让您高兴，张伯伦先生，沉默片刻后，他说，“在日程问题上本人将作出一个让步。我是很少向人让步的，您是我作让步的其中之一。我同意10月1日作为撤退的时期。”

在其他枝节问题上又谈了一阵后，张伯伦答应将此最后通牒转给捷克人。此时已是凌晨1时30分了，众人只好体会。元首对首相为和平而奔波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捷克问题是他在欧洲的最后领土要求。

张伯伦在称心如意的再见声中离开了德国。目击他步出旅馆大门的人们，并未在他脸上看出他有一丝一毫的不快之感。

4. 慕尼黑四国协议

英国内阁会里，张伯伦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阻力。海军部的达夫·古柏勋爵根本不相信元首之保证，提议立刻实行总动员。会议决定先与下令实行局部动员的法国进行磋商。

内阁再次举行会议时，外相哈利法克斯说，我觉得，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未给我们，只在那里发号施令，好像他已不战而胜似的。只要纳粹主义依然存在，和平就不巩固。斯坦霍普和毛姆两勋爵力主向捷克施加压力以接受希特勒的备忘录，温特顿勋爵则主张出于道义应拒绝其建议，内阁意见大相径庭。捷克大使扬·马萨里克来访，提出了严重抗议。他说，希特勒的备忘录之内容，使他的政府目瞪口呆。这份备忘录实际上是最后通牒，剥夺了捷克斯洛伐克保卫其民族生存的任何一个权利。我的政府反对这些残酷的要求，必然会奋起尽力反抗。我们将这样做，让上帝保佑。

法国代表团又返回伦敦，代表团团长达拉第宣布，法国不承认希特勒有权占领苏台德地区。张伯伦提出“若希特勒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将一边界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上，你法国是否会宣战？”他的答复却含混不清。

张伯伦致函希特勒建议成立共同委员会以决定如何将捷克业已接受的建议付诸实施，由霍拉士·威尔逊爵士转交给元首，若希特勒先生对此信拒绝不作答，霍拉士·威尔逊爵士便有权代表本人转达如下意见，如本呼吁遭到拒绝，法国将参战，若如此，我们似乎也应卷进去。

施密特将信读完。希特勒怒不可遏，“到10月1日，我要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喊道，如果法国和英国想打，那也请便，他毫不介意。希特勒恢复平静后，表示同意与捷克人谈判。然而，他却坚持要在48小时内接受戈德斯堡备忘录内所列的各条款。无论如何，德军将于10月1日占领苏台德。

张伯伦以在报上发表声明的形式也再次向元首呼吁。他说，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英国将保证让捷克履行其从苏台德撤军的诺言。次日上午，他的特使威尔逊带着这个新建议，再次来到德国总理府，但希特勒却拒不讨论。捷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或拒绝德国的建议。“如果他们宁愿拒绝，我就将捷克斯洛伐克打得粉碎！”他威胁说，贝奈斯若不于次日下午两时前投降，他就将部队开进苏台德。

霍拉斯爵士猛然起身，大声朗读一份声明。“如法国为了履行其条约义务积极卷入对德的敌对行动中，那末，联合王国认为它自己不得不支持法国。”

希特勒大怒，英法两国若要打，那就请便。我完全不在乎。我已为一切可能性作好了准备。

首相草拟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私函，把最近一次向希特勒的呼吁告诉了他。“本人相信，阁下将通知德国总理，您愿意充当代表，并敦促他接受本人之建议，因为本建议将令各国人民不致发生战争。”

9月28日工作至深夜，是希特勒最后通牒到期的一天，这是可怕的一天。在危机的核心地区柏林，这天是在狂乱中开始的。早晨8时，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便打电话给威兹萨克，紧急求见元首，说要提出新建议。弗朗斯瓦·本塞法国大使挥舞着地图说，若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战火必然会蔓延至全欧。自然，你有必胜的信心，就像我们有信心打败你一样。不过，你的主要要求无须战争便可得到满足时，你为何要冒险？

弗朗斯瓦·本塞的一席话，又慢慢地扭转了乾坤，有利于和平了。希特勒已不再火冒三丈，但也不能为这位法国人的逻辑作出回答。突然，一个副官插话说，阿托利科大使在门外求见，说带来了罗马的急信。

阿托利科说他身上带有墨索里尼的急信，“意大利总理通知您，不管您作何决定，元首，法西斯意大利都作您的后盾。”“然而，意大利总理的意见是，您还是接受英国的建议为好。他求您勿搞总动员。”“告诉意大利总理，我接受他的建议。”希特勒说完便走进了冬园。

他对弗朗斯瓦·本塞说，墨索里尼刚询问他是否接受建议。两人继续会谈，但希特勒心神不定。很明显，他仍在考虑墨索里尼的意见。一会儿后，他站起身来，表明会晤到此结束。

墨索里尼建议大家在慕尼黑开会碰头。希特勒同意后，便匆忙向达拉第和张伯伦发出邀请。

大多数德国人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反希特勒集团却惊诧得目瞪口呆。这条新闻破坏了他们武力捉拿希特勒并建立军事统治的计划。当哈尔德得悉要在慕尼黑开会时，他觉得在此情况下已再无法将起义计划付诸实施。

下午6时，在群众的热烈的吹呼声中，意大利总理的豪华专列离开了罗马。他神采飞扬，眉飞色舞。这是因为，他不但被作为和平的救星而受到全球的欢呼，而且还因帮助希特勒度过难关而赢得了他的感激。墨索里尼觉得，在一场外交战中他赢了英国。

9月29日清晨，元首在慕尼黑与边界之间迎接墨索里尼。此举不仅是给予一个盟友的礼遇，而且还使希特勒有机会将事态的最新情况告诉墨索里尼。当两个独裁者乘坐元首的专列开往巴伐利亚的首府时，希特勒透露说，西壁一旦竣工，他就用不着害怕来自那里的攻击了。假若英法两国真的笨到发动突然袭击的地步，那么，敌人还来不及动员战争便会结束。我没有必要去动员。德国陆军严阵以待，只要行动，我的目标便能实现。

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另外两名成员是乘飞机前往的。张伯伦离开赫斯顿时，天下起了小雨。他对记者们说：“小时候，我常常说，‘第一次若不成功，那就努力，再努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所为。待我回来时，我希望我能够说，冲破艰难险阻我们摘下了这朵鲜花——安全！”

法国总理在“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的喊声中，在勒布盖机场登上了飞机。飞机是在浓雾中起飞的，上午11时15分，这架双引擎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阵落了。弗朗斯瓦·本塞是看着达拉第走下飞机的。他发现，达拉第双眉紧锁，眼角的皱纹既多又深。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德国人竟兴高采烈。他们用热情的欢呼声迎接他，好像他是个英雄似的。

张伯伦是在午前数分钟着陆的。在前往里奇纳宫旅馆途中，他也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旅馆里停留数分钟后，他坐上敞篷汽车前往新近落成的元首大楼。这座元首大楼系国家社会主义党围绕科尼希广场而建的大楼群之一，用巨石砌成，建筑紧凑，中央厅宽广异常，高65英尺，宽100英尺。大厅里有壮观的石阶，通向会议室。

张伯伦及其两名同事，身穿黑色制服，首先来到会议室。接着前来的是墨索里尼，他抬头挺胸，步履轻快，无拘无束，好像他是主人似的。最后抵达的是元首。他的目光严厉而奇特，使达拉第感受不浅。会议参与者及其助手们座位设在餐厅内的长台上，他们彼此互相打量，客气但冷冷地握着手。希特勒极力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在眉宇之间却现出关切、因为客人们大

部不讲德语，他不能与他们自由交谈。拘谨地进完自助餐后，希特勒领着众人进了一间四方形的房子。房子很是壮观，四周的墙壁用皮革覆盖，还有不少花草和各种画。还有个大理石砌成的壁炉，壁炉上方悬挂着仑马赫画的巨幅俾斯麦画像。

由于准备工作极差，且又没组织好，会议一开始便混乱不堪，且越开越糊涂。会议既无主席又无日程，也没有大家同意的程序，完全成了各有关人士间的自由交谈。

墨索里尼就如何解决苏台德问题提出了一份书面提案，使会议稍稍有了点儿秩序（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德国人起草的，但墨索里尼将它作为自己的提案提出来）。那时已是下午3时了，会议体会进午餐。午餐后，会议开得更加混乱，简直是乱亡八糟。

快到傍晚时，室内的空气更加紧张了。英国终于端出了一份提案。除苏台德公民投票以及要为捷克的新边境提供国际保证等条件外，其余全被接受。

协议看来可以签订了，但仍有若干点需要澄清。那时已是晚上8点了，希特勒已不耐烦了。他原已准备好了酒席以庆祝会议结束，此时饭菜已凉了。他建议体会，先去赴宴，英法两国代表以要向政府打电话为由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当代表回去和他们的顾问们在壁炉前坐下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他们重又将协议作了广泛的修改。由于拖拖拉拉，一直到深夜后才达成协议。实际上，这早已成定局，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他们谁都无意为拯救捷克斯洛伐克而作出任何牺牲或去冒险。

凌晨1时30分，一份众人皆可接受的文件被正式放置在一张红木台上。条约规定，从10月1日起，苏台德的撤退工作将分四阶段完成。协定还规定建立国际委员会，以决定在何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及最终划定疆界。希特勒显得心满意足。第一个签字的是他，最迟来的是他，但第一个走的也是他。希特勒眼中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大步走下元首大楼的宽阔的石阶。张伯伦和达拉第又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离开。他们的责任是相当痛苦的，要把捷克的命运通知捷克人的。凌晨2时15分，捷克的代表被带至张伯伦的旅馆房内。这两名代表在听候宣判时，室内的气氛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张伯伦长篇大论，如此这般讲了一通，达拉第便将一份协议书递给捷克人，张伯伦开始打哈欠了。捷克人哭了。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达拉第乘敞篷车前往希特勒寓所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欢呼。英国首相此次德国之行还担负着一项重大使命。他已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表明两国决心永不交战。

希特勒一听完便连声称“行！行！行！”两人未费多少口舌便在上边签了字。张伯伦将一正文交给希特勒，另一份则由自己保存，他坚信，希特勒也与自己一样热心。

张伯伦从机场至宫中的途中，他受到盛大欢迎，给予英雄的欢迎，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数周来的危机终告结束。英国除少数人外，均兴高采烈，然而，捷克新总理詹·西洛维将军通过电台宣布由于他们已遭抛弃、孤立无援，本届政府被迫接受慕尼黑的命令。他说，这是“领土之减少与国家之死亡”之间所作出的选择。

墨索里尼也受到了盛大欢迎。这次欢迎，是他整整 20 年法西斯生涯中所受到的最盛大的一次。在每个火车站和交叉路口，不计其数的人们在等候他的列车并尽情欢呼。许多人们还下跪迎接。在岁马，他乘敞篷车沿国家大街缓缓前行，从用枝叶搭成的凯旋门下驶过，人们齐声高喊“领袖！领袖！”当他最终在阳台上出现时，群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尽管如此，在慕尼黑会议的参与者中，最受世界推崇的仍首推张伯伦。他的消瘦身材和那个鹰钩鼻，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和平的象征。

10 月 1 日拂晓时，希特勒的专列驶抵捷克边境。第一个向希特勒表忠的将军莱希瑞向他报告，“我的元首，今天，陆军正在作出一次士兵们所能为他们的最高统帅作出的最大的牺牲，那就是，不发一枪地向敌人的领土挺进！”另一个将军插话说：“不错，我的元首，今晨我到了我旧时呆过的团。由于禁止进攻捷克的平房，许多士兵都在哭泣！”希特勒说“失败主义者一直在向我嘀咕，说什么我的政治会导致战争！”说得如此尖刻，他所指的失败主义者是谁？

3 天后，专为实施慕尼黑协定而建立的国际委员会一致投票赞成不举行公民投票。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早已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即以 1910 年的人口普查为谁，以决定哪些地区该割让给帝国。事情越来越明显，原来的协定已受到歪曲，捷克将被剥夺最后一道防御工事。

10 月中旬，弗朗斯瓦·本塞最后一次呼吁希特勒要讲道理。那是在他调任罗马前向元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的。希特勒向来喜欢这位大使。为了对法国大使 7 年来在柏林作的服务表示感谢，希特勒特邀他前往建在克尔斯坦山顶的茶馆。

下山时，弗朗斯瓦·本塞重温了这次会晤，“我知道他是朝三暮四，装聋作哑，矛盾重重，举棋不定”，他向巴黎报告说，“希特勒温文尔雅，酷爱大自然的美景，在饭桌前讨论欧洲政治时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他可以变得极度疯狂，如醉如痴，并野心勃勃。有时候他站在地球仪前，恨不得将各国、和大洲的历史和地理一古脑儿推翻，活像是发了疯的造物主似的。有时候，他又梦想做个和平的英雄，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坚立雄伟的纪念碑。”

5. “水晶之夜”

1938年11月7日，赫尔切尔·格林兹本的犹太青年在巴黎枪杀了德国外交部的一名小官，这件事为反犹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格林兹本的父母已被驱逐至波兰。他潜入使馆的目的是要刺杀大使，却碰上了恩斯特·冯·腊特领事。腊特本人是反犹主义者的仇敌。原拟打在他上司身上的子弹却打在他身上。

11月9日下午，腊特与世长辞。其时，希特勒正在慕尼黑市政厅参加党的干部会议。腊特的死讯传到了希特勒耳中。他离开了会议室，与戈培尔交谈了片刻，然后便踏上了他的专列。戈培尔回到会议室宣布，腊特之死激起了反犹的骚乱。元首已决定，若骚乱自发地遍及全国，不必加以阻止。

对德国犹太人而言，这是个绝望的夜晚。按官方的统计，814家商店、171个家庭被捣毁；191个犹太教堂被焚毁；36名犹太人死于非命，36人受重伤。海德里希本人也承认，这些数字肯定被大大缩小了。

国外立刻对此作出了反应。因窗户大量被砸，这次暴行也得到了一个难忘的名字“水晶之夜”。德国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攻击，被称为野蛮的国家。众多的德国人同意此说；党的许多官员与希姆莱一起，谴责戈培尔的暴行。

戈林当面向元首抱怨说，这些事件使他无法完成他的任务。他后来证实说，“为四年计划我尽力将经济力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在向全国作的多次演讲中，我要求全国人民将每个牙膏瓶、每一个锈钉、每一块废料都收集起来使用。现在，一个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一方面毁坏了如此众多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在经济生活中闯出如此多的乱子，从而打乱了我的如此困难的计划。这是不能容忍的！”据戈林说，希特勒听了此话后，“他为戈培尔开脱，但从总的看，他也同意，这些事是不该发生的，日后不允许它们再发生。”

希特勒给人以这种印象，他本人对“水晶之夜”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在抱怨太可怕了。实际情况是当宣传部长向元首说他和冲锋队在几个小时后就要发动的一次袭击犹太人的店铺和教堂的大规模行动时，希特勒高兴得尖声笑了起来，兴奋得拍了一下大腿。当财政部长波比茨说，“水晶之夜”的肇事人应受到惩罚时，德国元帅说道：“亲爱的波比茨，你是否也想惩罚元首！”

集体屠杀却仍在继续。至11月12日，估计被运往集中营的犹太人已达2万人。同一天，曾以经济原因为由反对破坏财产的戈林，召开了一次部长会议，以便决定由谁负责赔偿。他说，“我收到鲍曼一封信，是奉元首之命送来的。信中要求将犹太人问题现在使用某种方法一举永远加以解决。昨天，元首来电话再次向我指出，应协调地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在这一指示的鼓舞下，与会者一致同意，损失应由犹太人负责赔偿，向犹太人罚款11亿马克。

正当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全部消灭的计划得以实施时，其它德国人，包括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内，都在私下里对“水晶之夜”的过火行为深表关切。政府的官僚和党的领导人深知，这些暴力行动历来是控制不住的，他们便抗议说，集体屠杀的代价太昂贵了，在反对犹太人的战斗中几乎不算取得什么成绩。

国外的抗议对希特勒产生了一些效果。在“水晶之夜”后一周，希特勒支持了文职人员任用制保护半犹太血统中的日耳曼血统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像国社党那样，把半犹太血统看作是犹太影响的传播者。他的支持表现在他签署了“帝国公民法首项规定”。这项公民法把所谓的非雅利安人纳入肯定

的范畴。根据该法的定义，至少祖籍三辈是犹太血统的，或祖籍两辈是犹太血统且信奉犹太教或与一犹太人结婚者，才算是犹太人。

接着又出现了半血统一类：这系指祖辈只有一人系犹太血统，或祖辈双方有犹太血统但既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一犹太人成婚的那些人。希特勒将大笔一挥，便使被他所憎恨的敌人中的一大部分人从他的愤怒下死里逃生。是他灭绝犹太人的决心有所弱化了呢，还是由于在他的祖辈中，有一方可能有犹太血统，他便有意无意地企图拯救自己？“半血统”的规定还救了耶稣，因为，按希特勒的论点，耶稣虽是上帝之子，但祖辈都有犹太血统，他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一犹太人成婚。

一群银行家反对希特勒之庞大的重新武装的计划，这使他的情绪更坏。备忘录写道，“帝国的无边无际的开支是对货币的最严重的威胁。开支的巨额增加使我们无法作出正常的预算；即使加紧税收，它也使国家财政走向崩溃的边缘。同样，它也破坏了帝国银行及我国的货币。”沙希特警告说，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政策，我国的货币是难以维持稳定的，“停止这种做法的时机已经到了。”

沙希特知道，希特勒肯定会怒不可遏的，因为他这一说实际上是要结束军事冒险。他把自己的所为告诉了施威林·冯·克罗希格，并说，他准备被解雇。财政部长说，如沙希特走人，他就主动要求解职。然后，他便草拟了一份类似的备忘录，送给了希特勒。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 1939 年 1 月 19 日深夜，沙希特的电话铃响了。他受令于次日上午 9 时会见元首。在这个时间会见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希特勒很少在凌晨 3 时前上床。会见时元首开门见山地说，我等你来，目的是要告诉你，你被解除了帝国银行总裁的职务。这是解职书。沙希特接过了解职书。“你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图景格格不入”，希特勒说完，等待了片刻，看沙希特有何话说。沙希特依旧沉默不语。接着，希特勒便斥责了他一番，说他不该在圣诞之夜有银行工作人员参加的晚会上谴责“水晶之夜”。

沙希特被解职后，很快，魏德曼上尉便被召至冬园。近几月来，希特勒待他越来越冷淡，而魏德曼也猜到了自己也会被开除的命运。自“水晶之夜”以来，元首似乎就生活在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世外桃源中。每当魏德曼试图讨论体制上的缺点时，希特勒总是对他置之不理。

“身居高位，或处身于内层的人们，若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就毫无用处”，他简明扼要地对魏德曼说。“我解除你我的私人副官的职务，委派你为旧金山领事。对此新职，你可接受也可拒绝。”魏德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此职，但说，希望不要减他的薪水。听到这里，希特勒的语调缓和了一些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这样，经过四年紧密相处后，这两个战时的同志便在互无怨恨的情况下分手了。

沙希特与魏德曼之下台标志着约瑟夫·戈培尔重新获宠。他的失宠系与寻花问柳的行径有关。“每个女人都使我热血沸腾”，他在二十多岁时的日记中写道，“像一头狼似地，我来回徘徊。”与玛格达结婚后，他也没有节制。与此同时，他与众多女人保持性的关系，且从不公开妥协。就是说，直到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夏天他爱上了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时为止，玛格达原以为这不过是通常的打情骂俏，到后来，到 1938 年，她失去了耐性，要求离婚。对同性恋行为，希特勒曾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但是，对于党的

领导人抛弃曾助他取得权力的伴侣之举，他却非常难过。他要戈培尔与那个女演员断绝来往，开始时，他拒绝了，并提出辞去部长职务，愿到日本或其它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后来，他在压力面前屈服了，放弃了他的伟大的爱情。在警方的“劝告”下，巴洛娃回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她一定，希特勒马上把戈培尔全家召到贝格霍夫。戈培尔夫妇和三人孩子在克尔斯坦茶馆门口照的照片，被公开发表，以证明这家人诸事如意。

国外针对“水晶之夜”而发的抗议风暴，也可能加深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1939年2月他对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未消灭犹太人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提供保证的。他说，“这些客人虫必须消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国的犹太人将一个不留。”

德国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发出一份通知，指出犹太人问题系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德国对犹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住在德国领土上的全体犹太人的移民。自国社党降临以来，只有10万多一点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出去，在新的东道国安家落户。

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其突然改变了的战术。在庆祝纳粹党掌权6周年的大会上，在向国会作的演讲中，他向世界犹太人宣战。他攻击说，英国、美国 and 法国，至今仍不断邀犹太和非犹太鼓动家的煽动，仇恨德国和德国人民，而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安静和平罢了。他说，这些旨在带来战争的谎言及企图，丝毫影响不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这也是自他上台以来首次挑开最终计划的面纱。如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寡头得以将各国再次抛入世界大战中，那末，结果将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的被消灭！

6. 捷克斯洛伐克不存在了

过去一年中，希特勒毁灭了一个主权国家，瓦解和瘫痪了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令西方卑躬屈膝。1939年预示着更大的政治征服。1月1日，墨索里尼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德国在去年秋天的所作的提议，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从只起宣传效果的条约变成不折不扣的军事联盟条约。

在新年文告中，希特勒宣布，德国政府希望能为世界的和平成功地作出贡献。他的下一个步骤是全面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时候以来，对慕尼黑条约他深觉后悔，因为，他原可把整个捷克吞并而又不会遭到报复的。现在呢，他却要寻找某种人们接受得了的借口，以便向捷克进军，把残留部分拿到手。

2月，他令戈培尔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政府的宣传攻势。指控捷克政府在日耳曼公民中制造恐怖，在苏台德边境集结军队，暗中与苏联密谋，粗暴地虐待斯洛伐克的居民。最后的一项指控是最有成效的，因为斯洛伐克的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早就对此诱饵跃跃欲试，并开始提出实行完全独立。这种局势是爆炸性的，若捷克政府中某个经验不足的高级官员稍有不慎，便会授希特勒以柄。

在伦敦，由于德国外交部官员埃里希·科尔特提供了一份假报告，反绥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了。科尔特密告一英国官员，说希特勒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轰炸伦敦。这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想使英国与德国发生战争。这只是科尔特及其他与这一阴谋有关的外交部官员发出的一系列的假情报之一。张伯伦对轰炸之说很是认真，特为此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虽然未有纳粹飞机出现，但怀疑的温度仍在上升。英国驻柏林大使汉德逊也奉召回国述职，并就希特勒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作出汇报。汉德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大臣贾德干相信，德国人并未考虑立刻进行冒险，他们的指针正指向和平。狡猾的贾德干并不那样乐观，他说，希特勒的意图是极可耻的，他也不大相信希特勒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

汉德逊回到柏林后，继续发来乐观的估价时局的报告。他报告说，关于纳粹要在乌克兰或者荷兰进行冒险的谣言已消声匿迹。虽然某些人士说，目前的平静可能是另一次风暴的前奏，但，我本人目前并不持如此悲观的观点。

希特勒在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宴上的行动，却令他担心。他双眼紧盯着我，强调中欧没有英国的事，别老干预德国。元首的态度令汉德逊模糊地感到有点不安。

德国的阴谋很快便昭然若揭了。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关系朝危机的方向发展。在这件争执中，德国人起了什么作用这还有待人们去猜测，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的商业部长和交通部长，在专家的陪同下访问了柏林。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艾尔·哈查终于犯下了希特勒一直在坐等的一个大错误：他解散了斯洛伐克政府，并令部队准备开进斯洛伐克地区。

希特勒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他取消了前往维也纳参加德奥合并的庆祝活动的计划，以便为下一次入侵作好准备。他原怕苏联会匆忙援助布拉格，但这小小的恐惧也几乎立即消失了，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会上说，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西方利用苏联为它们火中取栗。他们公开宣布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忠实盟友，却一点儿险也不愿冒。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是根据与捷克签订的条约，只有在法国采取行动后，苏联才能提供援助。

星期六，即希特勒最喜欢起事的日子，他以通常的灵巧采取行动了。他

指示凯特尔将军起草一份最后通牒，强令捷克不准抵抗，服从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军事占领。接着，他又向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土内的特工人员发出了破坏的指示。

当晚，希特勒在奥地利的两名傀儡领导人，在 five 名德国将军的陪同下，乘车过了多瑙河，进了布拉迪斯拉发，冲进斯洛伐克新内阁的会场。他们让内阁僚们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但新内阁企图拖延时间，声称他必须首先与布拉格政府讨论局势。他的前任约瑟夫·提索要求斯洛伐克新内阁于 3 月 12 日即星期天上午开会。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提索透露他已获得邀请，去见希特勒于柏林。他说，他是在不是德军就是匈牙利军占领的威胁下接受这一邀请的。3 月 13 日晚 7 时 40 分整，里宾特洛甫将提索领进希特勒的办公室。元首表情严峻，忿忿不平。两名最高军事领导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分列左右。命令业已下达给陆军和空军，令他们作好准备，于 15 日早晨 6 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指责说，捷克斯洛伐克是多亏了德国才未被进一步肢解。可是，捷克对德国表现出来的巨大自制力并不领情。他提高嗓门把问题直接向提索提了出来，斯洛伐克想还是不想独立？明天中午我将采取反对捷克的军事行动，由冯·勃劳希契将军完成。他指了指这位总司令。德国并不想将斯洛伐克纳入它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立刻宣布斯洛伐克独立的原因。否则，我就对它的命运不感兴趣了。为了让你选择，我把时间定在明日中午以前。到那时，捷克就会像德国这架压路机压碎！

提索迟疑了片刻，然后给布拉迪斯拉发的内阁挂了个电话，并用德语说，他是在元首办公室挂的电话。他要他们明日上午召开斯洛伐克议会会议。他及时赶回布拉迪斯拉发，向议会宣读了由里宾特洛甫起草的独立宣言。反对宣言的势力垮掉了，一个名义上独立的新斯洛伐克便宣告诞生。

当天下午，在伦敦，张伯伦单枪匹马在下院英勇地回答关于政府为何不与希特勒对垒的各种愤怒的质问。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跑到哪里去了？他反驳说，那个保证只在无缘无故受到攻击时才适用。未发生此类的侵略。

正当张伯伦在议会里寻找各种借口时，希特勒采取行动了。这出戏的最后一幕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被过去几天来的事件搞得昏头昏脑又胡里胡涂的哈查，此时要求紧急会见元首，这是苍蝇自己要求进蛛网。

在吊了哈查的胃口数小时候后，希特勒终于同意见他。心理上已被粉碎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女儿和外交部长的陪同下，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由于心脏衰弱，他不能坐飞机前往。

正当哈查离开布拉格时，在文塞斯拉斯广场近咖啡店的常客们，依然在悠闲自得地喝咖啡，不知外界有何事发生。黄昏时分，脚穿白袜的苏台德日耳曼军突然从天而降。他们六人一排，列队进入广场，打着纳粹旗帜，口中高喊“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跟在他们后边的，是打着捷克的三色旗的法西斯合作者。布拉格失陷给德国，捷克的工业重镇摩拉夫斯卡、奥斯特拉发事实上已落入德国之手。希特勒卫队的精兵已在天黑后不久占领了这个地区，目的在于保护这个现代化钢铁厂，防止被波兰人占领。

在柏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正集中在总理府的客厅内看电影《大势已会》。坐在希特勒身旁的是凯特尔将军。如果必要的话，凯特尔将随时发出入侵的执行令。晚 10 时 40 分，布拉格开来的火车抵达了安哈尔特车站，但

直到午夜后希特勒才召见哈查。他对凯特尔说，他之所以要等待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他要让这位老先生好好休息一下，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然而，这个拖延却增加了哈查的不安。他与外长契瓦科夫斯基打党卫队的仪仗了前走人希特勒的书房。

哈查向希特勒作了个私人呼吁，声言他从未与政治混在一起。他卑躬屈膝，请求希特勒饶恕。他坚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已在元首手中。

即使如此奴颜卑膝，哈查也免不了要受希特勒一顿呵斥。希特勒攻击说，在新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精神仍然活着，虽没有表面化。在希特勒的进攻下，哈查这个可怜虫步步退缩。希特勒改变战术说，他并不是不信任哈查，他的结论是，总统虽然老迈年高，此次来德，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大有好处，因为过不了几个小时德国就要干预了。

哈查及其外长好像成了石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希特勒继而说，对于任何国家，他都不怀敌意，他依然相信哈查的忠诚。希特勒说，在星期天，大局已定了。令德国陆军入侵的命令业已下达，将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帝国的命令也已下达。

这两位捷克人目瞪口呆地坐着。希特勒宣布，他的军队将于清晨 6 时，从各个方向开进他们的国家；德国空军则将占领神无主的捷克人被带至邻室时。说哈查昏过去了。人们连忙让莫雷尔医生进来，莫雷尔医生早被叫来值班，以防年迈多病的捷克总统随时需要他。哈查若有不测，明天全世界都会说他在总理府被谋杀的。就在此时，布拉格的线路通了。施密特前去叫哈查，惊奇地发现他已醒转过来，这该感谢莫雷尔医生打的一支维他命针。哈查来到电话机旁。在将发生的情况转告内阁后，他建议投降。

事先草拟好的公报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满怀信心地把捷克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日尔曼帝国元首。这份公报实质上是一份投降书。哈查要求莫雷尔医生再给他打一针。注射后，哈查精神好多了，拒绝在公报上签字。如果他们继续拒绝，在两小时内半个布拉格就会被炸成废墟，而这还只是开始。数以百计的轰炸机正在待命起飞，一份命令将于早晨 6 时发出，假如你们不签字的话。

哈查最终让步了。他脸色通红，双手发抖，于凌晨 3 时 55 分签了字。签完后，他转向莫雷尔医生，感谢他为他治病。签字笔刚从哈查麻木的手指中间掉落，希特勒便急忙离开会议室，冲进自己的办公室，两名中年秘书正在等候。他当时脸部变形，喊道：“快！孩子们，吻我吧！快！”施洛德和乌尔夫亲了他的双颊。“哈查刚才签了字”，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凯旋！我将作为一个德国伟人载入史册！”

尽管夜已很深，希特勒仍无睡意，还在品尝这次胜利。莫雷尔医生插嘴说，要不是有他，公报恐怕签不了。他说，“好在有我在场，及时给他打了针！”

“滚你他妈的针的蛋！”希特勒喊道。“你把老先生弄得精神奕奕，我还怕他会不签字呢！”凯特尔报告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执行令已发下去了，但附有一个条件，除非遇到抵抗，否则不要开火。他请求希特勒允许他退场。希特勒指示他几小时后前来报到，以便陪同元首登上开往捷克边境的专列。

在伦敦，首先听到入侵消息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汉德逊又打来电话，宣读了希特勒与哈查签署的协议。口述了希特勒刚发给德国人民的公告内

容：自星期天以来，在捷克的许多村庄里都现出了反对日耳曼人的野蛮的过份行为，受害者和受迫害者提出的呼吁与时俱增。大受震惊的汉德逊至少应明白，他出使柏林最终翻了般。

在从柏林开出的火车上，希特勒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直到那值得纪念的3月15日的中午才醒来。“我必须第一个到布拉格”，他一边穿衣一边对男仆说。越接近边界他便越紧张。希特勒一行在边境附近下车，转乘汽车前往。希特勒坐的是第一辆车，坐在司机肯普卡身旁。由1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冒着大风雪，缓缓前行。不久后，他们便碰上了在风雪中挣扎着前行的德军。肯普卡把车子驶离大路，沿着弯弯曲曲的泥泞旁道前行，直到黄昏后才驶抵布拉格。车队驶抵赫拉德欣宫时，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希特勒一行决定在堡垒内宿营，便派人进城去搞点布拉格火腿、面卷、奶油、奶酪、皮尔斯纳啤酒等食品和饮料。希特勒喝啤酒还是首次。

德国的最新侵略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应。英法两国群情愤激，为了对此作出反应，英法两国政府答应向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保证。与此同时，两国政府还主动与苏联进行政治和军事会谈。连希特勒自己的盟友也火冒三丈。

希特勒早已派菲力甫·冯·赫塞亲王携解释信前往罗马。他希望，墨索里尼能予以谅解，并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最近发生的事件。墨索里尼虽对齐亚诺抱怨意大利人会笑话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就给我写一封信，他仍决定，与胜利者结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不能改变政策，我们不是政治娼妓。向这个年轻的伙伴称臣却又是个耻辱。齐亚诺从未见其岳父如此垂头丧气过。

对国内外的批评，希特勒似乎已忘得一干二净。到3月16日，他的洋洋自得似乎又是不无理由了。当时，他处身于波希米亚国王城堡，城堡四周的城垛上飘扬着“卐”字旗帜。他站在城墙上，一方面视察被他最近征服的国家，一方面为占领了一座有如此众多历史古迹的古城而感到高兴。1621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徒起义的27名领导人，就在市政厅前被正法。在共和国广场，德皇威廉、俾斯麦和毛奇在普法战争期间曾在著名的“蓝色的星”旅店下榻。布拉格的富丽堂皇的建筑，其中许多系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顿文化影响的结果。只有日耳曼人才能建筑这样的城堡、桥梁和其它建筑物！

一个副官打断了希特勒的遐想。副官通知他，英法两国均未动员。我知道，他说着，又作了个预言，再过两星期便不会再有人谈论它了。有报告说，亲纳粹的捷克人已走上布拉格街头，用彩色大字将犹太人的店铺标出。这才是更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报告！

当日晚些时候，提索神父电告柏林说斯洛伐克已独立，并请求德国保护。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便真正解体了。希特勒的军队毫不犹豫地开进了斯洛伐克。卢西尼亚省，也要求将它纳入他的轨道，但希特勒更感兴趣的是抚慰匈牙利人。他允许匈牙利部队涌过边境，占领卢西尼亚省，一直占领至波兰边境。在仅仅独立了20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再次成了被奴役的国家。

英国虽未总动员，却怒不可遏。哈利法克斯警告德国大使，我完全了解希特勒先生用不流血的办法取胜的口味，但用不了多久，他将发现自己面临的将不是流血的东西！

好些时候以来，他以及直言不讳的贾德干都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某

些方面，但出于忠诚，他们还是支持了他。不过，采取某种立场的时刻已经到了。外相找到了张伯伦并作了明确表示，全国、全党和下院均一致要求，公开地、积极地谴责希特勒的侵略。

张伯伦注意了这种劝告。18日，汉德逊大使奉调暂时离柏林回国。当晚，即首相70岁生日的前夕，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说，一举改变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他警告说，人们若认为大不列颠没有骨气去尽力抵抗这种挑战，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不能算是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但由于此话出自妥协的象征性人物之口，它便激起了听众的热情，它的确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结束。

它也表明，希特勒首次大大失算。不错，希特勒用武力威胁的方法把捷克斯洛伐克拿到了手，但他未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捷克斯洛伐克也终会和平地纳入他的轨道的。由于他撕毁了他的政府参与的国际协议，他便完全扭转了英法两国的官方和公众的舆论。张伯伦及其追随者再也不会相信希特勒的话

那末，元首为何会犯如此明显的一个大错呢？首先，他未料到他的行动会惹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在奥地利问题上，他借口恢复法律与秩序，这西方不是也接受了吗？在慕尼黑，他们不也对那似是而非的论点满意了吗？他认为，趁他体力尚好、德国的军力强于其敌手的机会，他必须占领德国所需要的领土，以保证条整民族的未来。

当他跨进捷克斯洛伐克时，下一次将在哪里打和打谁，他心中是无数的。他只想到，在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前，他必须拿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所以，在希特勒看来，他并未犯什么大错，只是在国际关系上受点挫折罢了。

